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拿破仑时代

下 卷

〔法〕乔治·勒费弗尔 著





2 035 4427 2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拿破仑时代

下卷

〔法〕乔治·勒费弗尔 著

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

端木正校

商务印书馆

1985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拿破仑时代

（上、下卷）

〔法〕乔治·勒费弗尔著

上卷：河北师大外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

下卷：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

端木正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414

1978年10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85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530千

印数 9,700册　印张22 1/8　插页8

定价：4.45元

目 录

第 四 编

提尔西特条约后帝国的对外征服(1807—1812年)

第　五　编

1812年的世界

第 六 编

拿破仑的败亡(1812—1815 年)



第四编　提尔西特条约后帝国的对外征服（1807—1812年）

253

第一章　大陆体系（1807—1809年）

尽管英国故作镇定，“提尔西特的成就”有几个月还是似将见效。大陆屈服于拿破仑，而经米兰敕令强化后的封锁政策似已将英国的贸易关在大陆的门外。

东方国家的叛离，尤其是拿破仑所激起但又未能平定的西班牙起义，使大陆体系刚刚实行便又成了问题。

一、英国的觉醒

英国在获悉提尔西特会晤的消息后，看出1801年法俄协约业已恢复，从而估计到这样的危险性：继德意志之后，波罗的海有再次对英国封闭之虞。多亏坎宁行事果断，英国走在敌人的前面。古斯塔夫四世看来的确是可靠的，因为他在7月3日刚刚重新对法作战，而且卡斯卡特已经率领一万军队前往波美拉尼亚。但是丹 254 麦方面还捉摸不定，又有谣传说它在动员舰队。此外，贝尔纳多特从汉堡出发几日之内就能占领丹麦。坎宁性情急躁，具有斗士气质，他是分秒必争的。如果说他在7月16日就得悉提尔西特会晤，那么也只是到21日才开始了解详情，而且很不完全。直到8月8日一家法国报纸宣布后他才知道和约的签订。不过，海军上将甘比尔7月18日就接到命令，带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往哥本哈根，

并于 8 月 3 日到达该地。卡斯卡特此时已撤离波美拉尼亚并得到增援，他带来了三万军队。丹麦王太子在基尔得到通知，要他和英国结盟，并把军舰交给英国处置。由于王太子拒绝这一行动，首都哥本哈根被封锁，接着于 9 月 2 日遭到炮轰，7 日就投降。以后坎宁徒劳无功地力图争取丹麦人，并曾试图驱使瑞典人占领这些群岛；他绝望之余表示准备在丹麦留下英国军队。他的同僚则主张撤离。但是丹麦舰队却被带走了。翌年，穆尔在斯堪尼亚登陆，海军上将索马里兹能够自由进入波罗的海护送商船。这是最主要的事。

在颁布柏林敕令的前夕，从事出口商品生产的大工业已经成为英国经济的命脉，因此任何打击这些大工业的危机都必然使英国的经济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这些大工业大都依靠同欧洲和美国进行贸易来推销产品，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还靠那里供给原料，所以在封锁的威胁下，尤其是如果在封锁的同时美国又停止对英贸易，这些大工业就会遭到损害。还必须指出的是，英国的海军装备和粮食供应都依赖北欧，英国的银行结构和支付平衡也不稳固。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英国经济的雄厚实力和灵活性。技术上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组织体系都使英国大大地超过法国。1801 年，大不列颠的人口为一千零九十四万三千人，1811 年增至一千二百五十九万七千人，人口的实际变动促进了整个经济的上升，特别是为工业保证了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和大量廉价劳动力。英国的农业从技术上讲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因此虽然土地革命打乱了传统的农村社会，但是它使一个迅速增长的人口只有一小部分食品需要依赖进口。统治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寡头集团对自己的命运信心百倍，表现出几乎不可动摇的必胜信念。中产阶级中实力最强的那部分人，即伦敦和各大港口的银行家和商人，长期以来和贵族有着牢固的联系，他们和贵族一样猛烈地反对威胁着他们的商业利益

255

和殖民利益的法国。至于工业家，社会地位一般都很低微，他们的政治作用还非常微弱。最害怕封锁的是工人，封锁会给他们带来失业和物价昂贵，从而使他们本已贫苦的生活更为恶化。但是正如人们所强调指出的，经过1799年和1800年"结社条例"的进一步强化之后，国家的社会结构"固若金汤"。唯有一场持久的严重危机才有点可能激起中产阶级反对寡头统治并促使无产阶级起来造反。

托利党政府不但没有被柏林敕令所吓倒，反而靠牺牲中立国，加强了英国封锁的商业性质。长期以来，一些重要人士坚决主张引用各项航海条例采取措施来反对中立国航运。1802年从英国各港口开出的船舶中悬挂中立国国旗的是百分之二十八，而1807年则是百分之四十四；英国造船业主和船主们因此忿忿不平。美国的贸易空前兴旺：1807年，他们输出额达到一亿零八百万美元，其中将近六千万是殖民地的产品，而且有一部分是来自英国的敌国的殖民地。安的列斯群岛的种植园主埋怨糖价下跌。辉格党人并没有热心地听取这些怨言。1807年1月7日，他们只限于把"1756年规则"扩大到在英国船受排斥的敌方港口间的沿海贸易。2月份起，珀西瓦尔建议强迫同法国进行贸易的中立国船舶必须途经一个英国港口，因为国家的荣誉要求采取一些报复措施。珀西瓦尔一上台马上就付诸实施。在再度禁止与敌国的任何贸易时，人们并不隐讳，特许证颁发制度将不会有丝毫修正，这种制度允许英国商人为了国内贸易的利益，可以违反此项禁令。人们也不隐讳，这是针对中立国的，目的在于"把全世界的贸易从属于英国海运和航海事业的发展"。根据1807年11月11日、15日、25日和12月18日的"枢密院令"，任何开往敌方或从敌方开来之中立国船舶均须在一指定英国港口卸货，在该港口缴纳关税（税额也趁机显著提高了），并领取特许证。此外，还禁止向法国运输某些商品，如金

256

鸡纳和棉花等。至少在理论上，还是象以往一样，仍然允许中立国把敌国殖民地的产品直接运往本国，甚至可将产地的谷物和原料输往在拿破仑控制下的各港口。除了这些例外，海上贸易似已将为英国垄断。英国人向中立国货物抽税，为的是要阻挠中立国运输外国殖民地的产品，这些产品的竞争减低了英国殖民者的利润；如果英国人不需要中立国的航运，就可以用拒绝发给特许证的办法来中断它们的航运。这一点正是英国船主和种植园主所期望的。

这些措施与坎宁的战绩同样地使英国人为之振奋。英国人毫无争议地就接受了政府加在他们头上的负担，以便使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单枪匹马地与各国争斗，因为政府已预见到英国不久将陷于孤立。政府增加了捐税，卡斯尔雷着手加强了辉格党人曾有所忽视的军队。1806年4月13日，温德姆曾经撤销了皮特的法案，中止了国民军的抽签选征办法，恢复正常的征兵制而放弃了从国民军中招募正规军的办法，并且表示了对志愿兵有反感。终身兵役制废除了，代之以为期七至十二年的雇佣兵制。卡斯尔雷则恢复了抽签选征国民军的办法鼓励志愿兵，但是他把志愿兵改编为由政府控制的一支地方国民军。特别是他恢复了皮特补充正规部队的制度：他从国民军里抽调出二万一千人作为正规军。1807年和1808年招募了四万五千名新兵，而当时军队仅仅损失了一万五千人。1809年初，他在大不列颠已建立起二十万军队，其中三万可作为远征大陆之用。就这样，他通过一些远较高明的手段重新实行了皮特的政策。不过，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1807年起，直接税的收入从1804年的三百万镑和1806年的六百万镑上升为一千万镑，支出从1804年的七千六百万镑和1806年的一亿零六百万镑增为1808年的一亿二千万镑。由于1807年和1808年的出口显著减少，负担就显得愈加沉重。然而，面包仍是便宜的。英

257

国坚定沉着地目睹大陆与拿破仑结盟，但它深信这不会持续很久。

二、把英国人关在门外的欧洲
（1807—1808年）

1807年7月27日，拿破仑回到巴黎。人们称他为“大帝”，就象以前缔结奈梅根的和约①之后称路易十四为“大王”一样。8月15日，拿破仑为庆祝凯旋和欢迎“大军”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大家都以为大陆的和平已有了保障，普遍的和平也将在短期内接踵而来。拿破仑自己说过：“提尔西特的成就将决定世界的命运。”因此，这些庆祝活动是真正得到人民支持的，而拿破仑此时又成了一位民族领袖。8月18日，威斯特法利亚王国正式成立。不久，庆贺了热罗姆和符腾堡的公主卡塔琳娜的婚礼。接着，9月和10月，拿破仑在枫丹白露设朝听政。如同从奥斯特里茨凯旋归来时那样，他又重新投入了行政工作。正是在1807年，他清洗了司法人员；在1808年设立了大学。

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他愈来愈明显地对个人专制和贵族深感兴趣。1807年8月19日，他取消了保民院。早在9日，他通过授予塔列朗“副大选侯”的称号，而实际上撤销了他的外交大臣的职务。他责备塔列朗贪财纳贿，实际上大概是不能原谅塔列朗曾审慎地表示过异议。1805年10月，塔列朗擅自建议宽待奥地利，他想牺牲土耳其来抚慰在意大利和德意志两地遭到损失的奥地利，这个政策以后经常受到称颂，但是这只不过是个空想的政策而已，因为奥地利即使接受了给予它的东西，也不会忘记它深感遗憾的事情。

---

① 奈梅根在荷兰，1678—1679年路易十四在该地先后与荷兰、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及瑞典签订和约，结束从1672年开始的战争。奈梅根和约扩大了法国领土，树立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译者

在华沙,塔列朗表现出鄙视波兰人。弗里德兰战役之后,他向获胜的拿破仑祝贺时说他对这次胜利感到高兴,因为他深信这将是最后的胜利。拿破仑再也不能容忍一个如此富有独立性的部属,便把他撤换了,代之以只是一个好雇员的尚帕尼;然而不幸的是拿破仑仍要不断地向前任大臣咨询事务。同时他还继续组织新贵族阶层:他向军事长官分发了一千一百万年金,恢复了贵族长子世袭财产①,最后于1808年组成了整个的帝国贵族。

258

与此同时,他对外国的态度更为强硬。1807年10月,他在枫丹白露同来自伊特鲁利亚、不来梅及葡萄牙的使者之间争执频繁。他说:"如果葡萄牙不按我的意图办事,从现在起两个月里,布拉干萨家族就别再在欧洲统治。"这是多余的威胁,因为实际上他主意已定,但是他愈来愈不能克制自己。梅特涅写道:"拿破仑不仅不再承认任何界线,而且完全撕掉了假面具。"尚帕尼自己承认:"和俄国取得一致后,他就谁都不怕了。"现在世界就象一副钢琴的键盘,拿破仑可以在上面随心所欲地弹奏他的幻想曲。

法俄联盟起初尚符所望。事实上亚历山大并不急于和英国决裂,他让布德贝格接见了威尔逊这位充当中间人的业余外交家。坎宁没有肯定地拒绝调停,他相信沙皇与法国结盟只不过是为了摆脱危局。实际上,亚历山大是想保护留在地中海的、由西尼亚文统率的舰队,并害怕喀琅施塔得遭到突然袭击。哥本哈根被炮轰后中止了这场对话,结果布德贝格让位给鲁缅佐夫,俄国于10月31日对英宣战。普鲁士不得不效仿俄国,于12月1日宣战,另一方面却秘密地向英国道歉,并让它的大使雅各比和坎宁协商,以便通过中间人弗朗索瓦·德·伊韦尔努瓦来维持两国间的联系。至于

① 贵族长子世袭财产(majorat)原是旧制度下封建贵族的不动产继承制度,随受封称号而设,随继承封号而继承,不得出让。资产阶级革命深入展开后,国民公会为了削弱和分散封建贵族的财富力量,在1792年11月14日废除此制,1804年《民法典》也予以禁止。拿破仑于1806年8月14日恢复此制,这是明显的倒退行为。——译者

奥地利，虽然拿破仑对它在最近一次战争中的表现还肯屈尊表示满意，但是这次他不再向奥地利提出结盟了，而且他于10月16日催迫奥地利履约公开宣布反对英国。驻伦敦的施塔伦贝格和驻彼得堡的默费尔特都极力反对，但已无效。维也纳曾为提尔西特这一非常事件惊恐不安，现在揣测是否俄法有瓜分土耳其的计划，奥国是希望参加瓜分的。梅特涅从巴黎公开表示赞同施塔迪翁的意见，并拟出了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到后来他出任大臣才予以实施：此时别无他法，只有等待“欧洲能够结束这种基本上不安定的状态的日子到来，因为这种状态违反自然，违反文明。”1808年1月1日，施塔伦贝格根据一个紧急命令不得不向坎宁递交一份不受欢迎的照会，于是奥地利就跟着对英宣战，不过暗中还是表示遗憾。10月30日，丹麦已经与法国结盟。瑞典尚在坚持，但是斯特拉尔松和吕根岛已经失陷；1808年1月16日，亚历山大对瑞典发出最后通牒，2月21日入侵芬兰，同时丹麦也对瑞典开战。 259

在拿破仑方面，1807年11月16日他已出发前往米兰和威尼斯去安排意大利的事务。他对伊特鲁利亚王后的行为表示不满，伊特鲁利亚王后从1803年路易一世死后一直摄政，同她的丈夫一样，她完全听从教会，赋予教会完全自由。她宣布僧侣的财产为不可让与的财产，并把对出版物的检查权委托给主教，另一方面，对英国的走私活动她却眼开眼闭。拿破仑在取得西班牙同意后，便废黜了伊特鲁利亚王后，但给她保留了葡萄牙北部。拿破仑把托斯卡纳并入帝国，并于1808年5月24日建立总督府，作为大公国赐封给他的妹妹埃利兹。同时，拿破仑合并了巴马和皮亚琴察。他试图通过欧仁制服教皇，但沒有用；1807年11月，他占领了马尔凯，1808年4月2日又把马尔凯并入意大利王国。2月2日，米奥利斯进入罗马。因为土耳其仍是朋友，而朱诺在1807年11月30日又拿下了里斯本，大陆的联合就似乎即将完成。

封锁随着本身的进展而变成一个很有威胁性的现实。直到战争结束,柏林敕令的重要意义没有改变。在德意志,特别是在汉撒同盟的各城市,对英国货物的没收均先于柏林敕令。由于急需金钱,拿破仑征收罚款后就发还这些被没收的英国货物,这些货物还是回到流通领域,以致截获英国货物变成为财政上一种权宜之计。在法国军队推进到波兰时,走私活动猖獗起来,荷尔斯泰因,主要是通宁港①,已取代汉堡而成为英国的仓库;大家很快就知道,利用金钱可以得到许多法国人,包括军官、领事,甚至海关人员的通融。布尔里埃纳和布律纳在汉堡做出了最恶劣的榜样。另一方面,法国的实业家看到封锁变成了战争武器,感到惊恐不安,因为打起仗来就对他们关闭了德意志,波兰和俄国,并且当时工业危机又很严重;为了从事进出口贸易便利起见,他们希望继续给予中立国的船舶以一切自由。柏林敕令宣布,如果中立国船舶"直接"来自英国或英国的殖民地就不再予以"接待"。但是它们可以提出证明只在英国停泊了一下,这样,它们就不受被没收的威胁,而可以象以往一样安全地来到法国。在这种情况下,柏林敕令便失去了任何意义。柏林敕令模棱两可的条文证明,拿破仑颁布这个敕令时还在国民生产的需求和战争的需要两者之间犹豫不决。这种迟疑不定的情况持续了一年多。为了使美国人不受损害,他对他们保证大陆封锁对公海无效;还在 1807 年 8 月 26 日,丹麦人就获准不必遵守柏林敕令。7 日,拿破仑曾考虑过是否可以向中立国发放特许证,使其与以往一样在法国各口岸进行贸易,条件是要再输出与其输入等值的物资。这种在 1809 年又采用的办法再次强调封锁政策的重商主义性质。

260

尽管提尔西特联盟显示出它的影响,事物却向相反方向演变。

① 通宁港在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西海岸。——译者

原来的计划被抛弃了。枫丹白露敕令（1807 年 10 月 13 日）和 11 月 23 日曾重新规定条款的第一道米兰敕令补充了柏林敕令。米兰敕令宣布殖民地产品和大批商品从性质上讲都是英国货，除非出示原产地的证明，尤为重要的是它明确指出，任何船舶只要曾在英国靠岸就必须连同全部货物一律加以没收。英国的多次枢密院令使中立国更屈从于英国的利益，这就使拿破仑决定采取最后的步骤。根据 1807 年 12 月 17 日的第二道米兰敕令，任何中立国船舶只要屈从于英国人的要求就被认为是“剥夺了国籍”而变为英国的财产，因此，不仅在各港口，而且在公海上该中立国船舶即成为合法的捕获品。这样就又回到 1798 年的形势。由于中立国船舶无法逃过英国人，所以帝国对它们就等于是关闭的。封锁又从商业性质变成战争性质。因为大陆和法国结盟，所以封锁不是没有效果的。军队已经派到德意志，没收英国货物的工作委托给海关人员，并授权他们在必要时可请求出动武装部队。奥地利封闭了亚得里亚海。虽然波罗的海仍属开放，但是除了瑞典之外，只能进行走私活动。英国的出口大大地减少了。海关课税值从 1806 年的三千三百五十万下降到 1808 年的三千零四十万，申报值则从四千零八十万下降到三千五百二十万。这一成功在拿破仑的精神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要使封锁更趋完善的欲望推动他去吞并更多的领土，最后到 1811 年，拿破仑就成了征服思想的化身。

大陆和平有了保障以后，拿破仑又想重新发动海战。在意大利，他命令约瑟夫准备攻打西西里，命令冈托姆离开土伦前往配合作战，不过首先要为爱奥尼亚群岛补充给养，法国人在 1807 年8月同时夺取了爱奥尼亚群岛和科托尔。雷尼埃把英国人驱逐出勒佐；至于冈托姆，他只完成了任务的第二部分。命令接二连三地发给了德克雷。到处都在进行海军建设：到 1808 年 5 月 28 日，拿破

仑知道不久便可以率领七十七艘法国船，五十四艘外国船和三十万集结在特塞尔岛至塔兰托沿岸的军队。他说:“我看这简直象是在下棋,不必要求太多的运气,也不必要求我们的海军作战非常灵活，这盘棋就能使我们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来不及对英国在海上或对其本土重新施加威胁，因为大陆联合甚至在完全组成之前就已开始瓦解。

首先是对东方的形势估计错误。从拿破仑和俄国结盟的时候起,拿破仑的政策在东方就每况愈下,因为土耳其和波斯靠拢拿破仑只不过是为了对付俄国而玩的把戏。穆斯塔法四世同意法国的调停后，1807 年 8 月 24 日吉耶米诺安排了斯洛博齐亚的停战协定; 10 月 21 日，亚历山大以各种借口拒绝停战，因为实际上他想保留多瑙河各公国，而苏丹则以为拿破仑是同意亚历山大的。然而欧洲暂时还沒有恢复战事; 相反亚洲却继续在打仗，俄罗斯人在亚洲战胜了埃尔祖鲁姆的帕夏。英国在君士坦丁堡充分利用了这一点来扩大影响,以致拿破仑终于在 1808 年 4 月召回塞巴斯蒂亚尼。不久，土耳其又发生一些革命活动，使它完全疏远了拿破仑,因为“旗手”穆斯塔法计划使苏丹塞利姆复辟;穆斯塔法四世从容不迫地害死了塞利姆，接着于 1808 年 7 月 28 日他自己也被推翻,其弟马赫默德二世因而得以登上王位; 11 月,土耳其近卫军步兵再次兵变并杀害了“旗手”穆斯塔法; 马赫默德在派人绞死穆斯塔法之后，就成为奥斯曼王朝的最后一个代表: 正由于这个原故，他才得以幸免于难。1809 年 1 月 5 日,马赫默德与英国媾和。

262

在波斯，事态的进展也是如此。加尔达内在那里设法安排了停战,而法布维埃上校开始组织一支军队。在这里,亚历山大又拒绝放弃他所征服的领土，而且不久便围困了埃里温。波斯王背离了法国,马尔科姆又在德黑兰出现。此外,沙皇的态度意欲别人让他在东方放手干; 这是严重的征兆，因为拿破仑早已决定寸步不

让。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拿破仑早已有心将伊比利亚半岛并入"大帝国"，而伊比利亚半岛却对"大帝国"进行了意想不到的抵抗，这种抵抗造成的无穷后患使提尔西特的成就完全破产。

三、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事件
（1807—1808年）

自从执政府以来，拿破仑就窥伺着葡萄牙。葡萄牙的贸易几乎全部都是和英国人进行的；英国人在葡萄牙控制了工商业，并投入了大量资本，尤其是在葡萄园方面；这是一个走私基地和英国舰队的据点；这个国家如果和英国断绝关系就不能生存，因为它的收入中三分之一以上来自关税，而且它进口的麦子要从海上运来。总之，正如英帝国主义所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英国殖民地，收益可观且又无须付出任何代价。甚至在提尔西特时，拿破仑就已经决定征服葡萄牙。一回到巴黎，他就在 7 月 29 日下令在波尔多组织一支远征军。达劳若拒绝逮捕英国人和没收其财产；他只答应封闭葡萄牙的各港口并对英宣战，打算就这样装模作样应付。坎宁拒绝参加这出喜剧，接着法国和葡萄牙便决裂了。10 月 12日，拿破仑命令朱诺带兵出发。

但是必须穿过西班牙才能到达葡萄牙；因此，有关葡萄牙的计划一开始便和拿破仑对西班牙的政策交织在一起。1805 年，戈多 263 伊曾暗示过想要从葡萄牙分割一个公国，而且在 1806 年 5 月 24 日用书面提出了这个要求。每一次，战争都中断了谈判，戈多伊感到很失望，以至对与法国结盟感到厌恶。1806 年 6 月 27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丢失似乎成为丢失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前奏，因此在西班牙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导致戈多伊向英国提出媾和，而英国则要求戈多伊加入反法同盟，就象普鲁士人和俄国人也向他建议过

那样。戈多伊迟疑不决。虽然他并沒有象有人指责过的那样，同普鲁士有了默契；1806 年 10 月 5 日他向西班牙人发表公告，号召武装起来；这个公告具有双重含义，拿破仑佯作相信这是来协助他的，但他当然不会忘却这个公告。在耶拿战役之后，戈多伊急忙和俄国断绝关系，1807 年 2 月 19 日他加入大陆封锁，派遣拉·罗曼纳侯爵到德意志去，拉·罗曼纳侯爵于 8 月初率领八千人的军队到达汉堡，而戈多伊终于热心地接受了对葡萄牙的作战计划。根据 1807 年 10 月 27 日的枫丹白露条约，葡萄牙王国分成三个部分：北部给伊特鲁利亚王后，南部给戈多伊，拿破仑保留着中部包括里斯本，这或者是由于拿破仑想把里斯本这个港口一直占领到恢复和平为止，或者是由于他把里斯本纳入他有关西班牙的计划里。

拿破仑认为西班牙政府腐败无能，同时又沒有全部得到他以为西班牙能够提供的一切，所以他长期以来就认为有必要"革新"西班牙，这种看法在他的左右亲信中极为普遍，以缪拉为首，要求此项任务者不乏其人，他们希望在西班牙找到一株比葡萄牙更多油水的"摇钱树"。塔列朗也竭力赞同采取激进的措施。然而，夺取西班牙并非当务之急，因为西班牙已经归入大陆体系；无庸置疑，拿破仑新近取得的胜利再次加强了他追求权力的决心，促使他突然地采取行动。然而对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我们只能进行揣测而已。拿破仑似乎曾在两种解决方案中摇摆不定。现在我们就通过假设来回顾一下这两种方案。

的确，西班牙王室内部的分裂助了拿破仑一臂之力。从他签订枫丹白露条约之时起，他就已在幕后操纵一个隐约可见第一种解决方案的密谋。阿斯图里亚斯亲王仍是戈多伊的敌人，他怀疑戈多伊想在查理四世死后篡夺王位；他的两个朋友，英范塔多公爵和他以前的师傅埃斯魁基斯神甫计划使他和一位法国郡主结婚，

以确保拿破仑的支持。拿破仑的大使，一个博阿尔内家的人，大概看到如果把约瑟芬的一位堂妹捧上西班牙王位就有可能扩大他自己家族的势力。于是他自行与埃斯魁基斯建立联系。尙帕尼得到消息，显然是根据他主子的命令，要求费迪南写信正式求婚，费迪南于10月11日把信交给尙帕尼。在拿破仑的保护下，费迪南可能变为他的工具，也许不得不割让直至埃布罗河的各省以换取里斯本；不论怎样，1808年2月29日，西班牙的使者伊斯基耶多在他制订的计划中谈到了合并的可能性。

然而，朱诺此时正用强行军的方式在艰险的道路上和恶劣的气候中前进；象惯常那样，他们出发时不带粮草，也不带辎重；西班牙本该提供一切，但是给得极少。这样，一路上队伍就不断有掉队的。幸亏葡萄牙对朱诺的军队毫无抵抗，并且有三支西班牙纵队分别沿着杜罗河，在塔霍河以南和阿尔加夫斯省也侵入了葡萄牙。10月22日，葡萄牙摄政王与英国人缔结了一个协议，授权英国人占领马德拉群岛并解决葡萄牙王室去巴西的交通问题。英国各仓库的大量物资都装上了船；停泊在里斯本由西尼亚文统率的俄国舰队被押送英国，11月29日葡萄牙宫廷的人员便扬帆而去。30日，朱诺进入里斯本。他强迫葡萄牙交出一亿法郎的赔款，并且将葡萄牙所剩下的八、九千人的军队送往法国。朱诺的处境极为危险，这给予拿破仑很好的借口逐步占领西班牙。10月12日，他已下令组织一个新的军团。11月，杜邦带领这个军团占领旧卡斯蒂利亚，翌年1月，交给蒙塞带领的另一个军团随着杜邦到达布尔戈斯；然后，穆东又组织了第三个军团。

此时已有可能采用第二种方案来解决西班牙问题。10月底，戈多伊已经发现并揭露了费迪南的阴谋，便逮捕了费迪南。戈多伊向拿破仑表示不满，拿破仑大叫大骂起来，并厚颜无耻地否认曾和费迪南有过任何同谋。查理四世和戈多伊害怕了，终于让步。他们

释放了费迪南，而费迪南的朋友们在释放后被放逐出国；但是，从此拿破仑似乎已经认为这个内定的继承人可能会被宣布无力统治西班牙。12月2日，拿破仑在威尼斯向约瑟夫提及西班牙的王位问题，尽管他请吕西安将其女夏洛特送到巴黎，也沒有任何迹象证明他要把她嫁给费迪南；1月12日，他下令就埃斯戈利亚尔宫的阴谋和费迪南的丑恶行径撰写一些小册子，但事实上他从来沒有下令散发这些小册子。这段时间里，拿破仑的队伍仍在继续前进。2月，法军拿下潘普洛纳和圣塞瓦斯提安。现在，迪埃斯梅指挥着一支东比利牛斯山军团深入到卡塔卢尼亚，夺取了该地区的巴塞罗那和菲盖拉斯。3月初，贝西埃尔来布尔戈斯担任指挥，而缪拉被任命为法国在西班牙军队统帅，开始向马德里进军，23日进入马德里。

3月份，拿破仑似乎重新倾向于第一种解决方案。但是，西班牙的一连串事件又一次解决了这个争论。戈多伊惴惴不安，他已把在葡萄牙塔霍河以南作战的军团召回到安达卢西亚；法国人的进军引起人心惶惶，有人认为戈多伊这个宠臣有意随王室前往加的斯，而后坐船去美洲。在1808年3月17日到18日的夜间，阿兰胡埃斯发生了暴动；军队反叛了；戈多伊被捕下狱；19日，国王退位。拿破仑于26日获悉这次暴动，于是立即决定出发前往巴荣纳。27日，他得悉查理四世退位，而在他的心目中，西班牙王位已告虚悬；同日，他把西班牙王位许给路易，这是我们对拿破仑的意图所掌握的第一个肯定的迹象。拿破仑于4月2日离开巴黎，15日到达巴荣纳。

然而，查理四世曾向缪拉诉说人们对他使用了暴力，于是拿破仑便邀请查理四世前往会面。同时拿破仑也下令把费迪南送来，费迪南不敢违抗。5月2日，王族动身前往法国，这激起了马德里反对法国人的暴动。缪拉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而拿破仑对这

个不妙的预兆却毫不介意。他说:“西班牙人和其它民族一样，他们将非常乐意接受帝国宪法。”查理四世向他的儿子索回了王位，然后于5月5日交给拿破仑；惊慌失措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投降了，整个王室被送往瓦朗塞的塔列朗的城堡。路易和热罗姆都拒绝了西班牙的王冠之后，拿破仑武断地把它授予约瑟夫，而那不勒斯王国则转给缪拉，缪拉深感失望。缪拉曾转达过几个自由主义者希望实行一部宪法的心愿。皇帝似乎对此漠不关心，而主要关注于行政改革；然而他还是让步了。从6月15日到7月7日，在巴荣纳召开由经过挑选并分成三类选举人选出的“政务会”①，一百五十个成员中只有九十一人应召而至。西班牙接受了一部类似各附庸国的宪法；不过，在西班牙不得不放弃使这个国家世俗化的 266 打算：唯有天主教仍是合法的宗教，而异端裁判所也沒有被取缔。此外还要设法对付公共舆论：沒有任何迹象表明西班牙已沦为附庸国，西班牙的捐税也沒有增加。7月20日，约瑟夫隆重地进入马德里，可是他在那里只逗留了十一天。他的王国早已造反了。

四、西班牙起义(1808年)

西班牙又出现了那不勒斯反叛的某些因素；然而查理四世的臣民中忠于王朝的思想较之那不勒斯更为强烈，虽然地方主义的 267 传统依然比法国更甚，他们并不缺乏民族精神。不过在人民中间，民族精神同对外国的仇恨和宗教的狂热似乎还沒有分开，这种对外国的仇恨和宗教的狂热曾由于同摩尔人的斗争而根深蒂固，②

① 音译“洪达”。——译者

② 摩尔人指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北非的柏伯尔人，他们在八至十三世纪曾统治西班牙大部地区，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为了抗拒伊斯兰教的统治，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直到十七世纪初在用残暴手段迫害摩尔人后，才解决了摩尔人的问题。——译者

由于地形起伏和落后的经济而得以发展，再由于僧侣使西班牙的知识界不能接触到欧洲的思想而被保持下来。当时，排外思想主要转向异端的英国人，並反对法国人，法国人曾一度长期与它为敌，而后又成为麻烦的盟友，从 1789 年起又被谴责为魔鬼的代理人。然而要使这种排外思想推动各阶级民众揭竿而起，就必须出现大量外国人，他们的出现也必须给所有的人都带来显著的灾难；在这方面，法国人的入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可是起义却主要是在法国人沒有入侵的省份如阿斯图里亚斯、加利西亚和安达卢西亚等地开始的。这样就必须向人民说明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幷号召他们武装起来：这不是各地当局，而是贵族和僧侣努力的结果，一般地说各地当局是对法军屈从的，或者持保留态度。

贵族具有比平民更高昂狂热的民族情绪。贵族作为一个阶级被排斥于政权之外，他们又鄙视戈多伊，目之为品德不修的暴发戶，所以他们高兴地抓住机会重获政权。他们提防法国人可能提出的改革；某些人还梦想建立英国式的君主政体；他们之中沒有人愿放弃社会优越地位。如果当时资产阶级实力强大幷获得了新思想的话，那么这个运动就会向相反方向发展；然而除了在加的斯以外，资产阶级的力量仍然很薄弱，而且文化很低。除了沿海各省和卡塔卢尼亚具有民主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外，西班牙仍然是一个贵族大地产所有制的国家，这里大贵族只要发出一个信号就可以把受奴役的农民动员起来。此外，西班牙人把他们国家的一切灾难都归咎于戈多伊；正是这一点使费迪南在一个短时期內深得民心。268 如果拿破仑当时以他为幌子赶走戈多伊的话，那么他只会遇到很少的抵抗；但是当侵略者被说成是那位民愤很大的大臣的同谋者时，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城市里的老百姓和农民一道带动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起义首先指向西班牙中央政权的代表人物，其中好几个人遭到杀害。

至于僧侣，拿破仑认为他们是主要的角色。他说："这是一次修道士的叛乱。"人们却否认了这一点，因为有一定数量的主教和神甫如波旁红衣主教，即托莱多大主教等参加了巴荣纳"政务会"，或者至少在形式上服从约瑟夫。可是高级僧侣中有几个例外是说明不了什么的。西班牙有六万个世俗僧侣，十万个正规僧侣。因此，是他们而不是他们的教长，通过和人民接触向人民进行了说教鼓动的。如同旺代和其它地方一样，传教和忏悔室引起了表现为各种各样奇迹的极度的宗教狂热；一想到眼看国家要被世俗化和拿破仑同教皇决裂，僧侣的愤激就很容易解释。然而某些迹象使人设想至少有些教长是领导了这次宣传活动的，并早就考虑到组织抵抗的计划。1808 年 6 月 30 日，红衣主教德斯品-达思托，即塞维利亚的前大主教从罗马写信给格拉纳达的大主教说："您很清楚，我们不应该承认一个象所有波拿巴家族和法兰西民族那样的异教的、路德派的共济会会员为国王。"他预见到自己可能会被迫离开那座圣城，接着又写道："我将设法回到西班牙以便执行我们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当我们看到该格拉纳达的大主教、塞维利亚的副主教、桑坦德的主教在起义的"政务会"中扮演了主要角色的时候，当我们证实了有一些通告送给各主教并嘱咐他们广为散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揣测到这个计划是什么。有几份通告被截获了：

"一旦他们成了西班牙的主人，他们就会引进形形色色的宗教以便废除真正的宗教……他们将强迫你们所有的人当兵，以便实现他们征服欧洲和全世界的计划……武装起来吧！……以上帝的名义，以上帝白璧无瑕的圣母的名义，以圣母的崇高的丈夫，天父圣若瑟的名义前进吧，胜利必定属于你们。"

起义并没有立即爆发，从查理四世出国到开始起义历时将近一个月。起义在奥维亚多开始，那里由于圣克鲁斯侯爵的策划，阿斯图里亚斯的等级议会向拿破仑宣战。6 月 6 日，塞维利亚的"政 269

务会”也向拿破仑宣战。这就象一连串的炸药一样地接连爆炸了。起义往往都伴随有谋杀和抢劫；在巴伦西亚，司教会员卡尔沃指挥屠杀了三百三十八个法军。不久便成立了十七个起义的“政务会”，主要分布于西北部，南部和阿拉贡。这些“政务会”毫无经验，内则个人之间争权夺利，力量削弱，外则彼此闹独立性，互不相服；乌合之众没有任何军事价值，而在拥有民兵的各省如阿斯图里亚斯和卡塔卢尼亚，居民远非一致响应号召，尤其是不愿屈从去从事正规战争。有两个理由也使起义令人恐惧。第一，与葡萄牙相反，西班牙掌握着一支重要的军队；这支军队主要集中在加利西亚和安达卢西亚；因此这两个省便占居优势；加利西亚的“政务会”使阿斯图里亚斯的“政务会”，尤其是使莱昂的“政务会”和旧卡斯蒂利亚的“政务会”从属于它自己；塞维利亚的“政务会”则以中央政权自居，称为“西班牙和印度①各地最高政务会”并从6月15日起着手夺取在加的斯的法国舰队。第二，坎宁避免重犯皮特在旺代犯过的错误，5月30日，阿斯图里亚斯的使者到达伦敦，而6月12日起，坎宁就答应给他们援助。他接待立即蜂涌而至的各地“政务会”的代表确实不是那么热情：这是因为他不放心他们的地方主义，并想引导他们组织起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他知道西班牙人并不乐意接受一支英国军队；但是他在葡萄牙可以自由行动，而朱诺因西班牙起义之故已与法国隔绝。坎宁就决定利用这一点，于是他派了一支远征军到葡萄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碍这支队伍最后进军马德里。只是到这个时候，英国人通过特拉发加胜利所确保的制海权的意义才完全表现出来。这就是：英国人决定利用他们的制海权使战斗最终转移到大陆上，而只有大陆上的战斗才是决定胜负的。

① “印度”此处指西属美洲各殖民地，因哥伦布最初发现美洲时，误以为是到了印度，故称该地为印度，旧名沿用仍称“印度”。——译者

1808年6月1日，法国军队拥有十一万七千人，直至8月15日才又增加了四万四千人。要征服西班牙，这支军队太少了；而且它远远不如留在德意志的“大军”，因为它是由“临时联队”仓猝组成的，也就是说一些新兵和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水手、巴黎的警卫兵，而主要是外国人，包括汉诺威人和其它的德意志人、瑞士人、意大利人、波兰人，这些人第一次成为军队的重要部分。指挥也属第二流的，物质准备和通常一样几乎沒有，而西班牙又不能提供法军指望按惯例在当地获取的资源。此外，地理条件又不适合拿破仑的战斗方法。然而这支军队如果适当集中，是不怕列阵战斗的；使这支军队败北的却是皇帝，因为他蔑视起义者，把兵力分散以便同时占领各省。 270

法国人在西北部夺取了桑坦德、瓦利阿多里德和毕尔巴鄂。由布莱克指挥的三万人的加利西亚军队前往击退法国人；7月14日这支军队在梅迪纳-德尔-里约塞科被贝西埃尔击溃。在阿拉贡，帕拉福斯这个虽然很有名却极平庸的领袖被赶到土德拉以外。而韦迪埃则围困了萨拉戈萨，8月初他击退了一次突围。但是迪埃斯梅在卡塔卢尼亚不得不从赫罗纳退兵，而后在巴塞罗那受到包围。此时蒙塞已到达巴伦西亚城下，但因无攻城装备只得退向塔霍河。战争立刻具有一种极为残酷的性质；西班牙人拷打或是屠杀他们的俘虏；法国人怒不可遏，又饥肠辘辘，以焚烧村庄作为报复，并且用剑把村民刺死。与后来揭示了这次冒险行动的严重性的历次惨败相比，这些困难还算不了什么。

杜邦被派往托莱多。根据皇帝的命令，他于5月24日仅仅带了一个师离开托莱多去占领加的斯。到达安达卢西亚之后，6月7日他在阿尔科勒亚强渡瓜达尔基维尔河，并攻下了科尔多瓦，该城被洗劫一空。不久，杜邦知道卡斯塔尼奥斯率有三万正规军摆好阵势准备与他作战，并至少有一万名起义者增援，就于19日退

至安杜哈尔以等候增援部队；韦代尔师穿过德斯佩尼亚-佩罗斯隘口并驻兵拜兰以监守德斯佩尼亚-佩罗斯，接着，在戈贝尔师接防以后与杜邦会合。安杜哈尔离拜兰七法里路[1]，是一个不利的防御阵地；杜邦冒着有受攻击和被包围的危险，但是他只考虑重新发动进攻，可能他是轻敌，并且急于争取大捷以博得元帅的节杖，这根节杖他在弗里德兰战役中本已应该拿到，但却被维克托得到了。

271

卡斯塔尼奥斯指挥作战的手段机动灵活：他用佯攻拖住了杜邦，使雷丁推向了门吉瓦尔；戈贝尔战死，他的那个师向隘口败退。然而雷丁感到这太冒险因而重新渡河，韦代尔离开杜邦以后于7月17日重占拜兰。这样，本来没有什么损失，但韦代尔又向隘口退却，而本该紧紧跟随着他的杜邦则将出发时间推迟到18日夜间。雷丁和科皮尼带领一万八千人得以重返拜兰，结果19日早晨杜邦率领九千多士兵试图强行通过，却未能成功，并且负了伤，因而开始谈判。但是韦代尔听到炮声就折回来从背后打击敌人。他的上级由于已经作出保证所以拒绝重新开战，并下令韦代尔停火。22日，杜邦签订了一个协定，包括韦代尔在内。韦代尔尽管已经撤离，但还是很软弱地前来交出他的部队。没有发生投降之事，因为安达卢西亚的法国军队本应从海上遣送回国。杜邦这一决定的本身并不比朱诺不久以后所采取的决定更应受谴责，而拿破仑也从来没有为此责备过朱诺。但是塞维利亚的"政务会"拒绝承认这个协定，把那些不幸的俘虏软禁在卡夫雷拉岛上，并且故意让他们饿死。皇帝对待他们的长官残酷无情，他象对维尔纳夫那样地对杜邦进行无以复加的凌辱，判处革职并把他囚禁在监狱中直至1814年。有时人们又过分地为杜邦推卸责任；他的错误是无可否认的；

---

① 古法里（lieue）的长度在各省各地略有出入，大致合四公里。——译者

但是拿破仑的轻举妄动也不能不说是这次败北的根源，如果杜邦不是在1814年出于报复而愤激地投向波旁王朝一方，而是庄严地为他的案件申辩的话，那么拿破仑使他所经受的遭遇必定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同情。

与此同时，朱诺眼看着葡萄牙人效仿他们的邻居起义了。波尔图的西班牙师返回加利西亚，法国人不得不集中在里斯本周围；他们仍然守住阿尔梅达和埃尔瓦什两个要塞，起义的队伍敌不过他们。就在这时候，阿瑟·韦尔斯利，即韦尔斯利侯爵的弟弟，未来的威灵顿勋爵于8月1日带领了一万三千人连同七千葡萄牙人在蒙得戈河口登陆。德拉博德试图把韦尔斯利阻截在罗里萨却没有成功，8月21日朱诺只带九千五百人就决定在维米埃鲁向阿 272 瑟·韦尔斯利进攻，但是他也失败了。8月30日他与刚取得盟军指挥权的休·达尔林普尔爵士签订了辛特拉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在葡萄牙的法国军队——计有二万五千多人——连同有亲法嫌疑的葡萄牙人都撤回法国。从英国的观点来看，这样安排得到辩护，认为是有利的，因为法军不经过战斗就交出了里斯本，这样就能够向马德里进军；不过还是有人提出尖锐的批评，因为朱诺的军团又回来投入了1808年的战役。

辛特拉不如拜兰那样引起议论纷纷，因为据说胜利是由一支正规军取得的。相反，杜邦之败北在欧洲轰动一时。人们由此得到证明：法国人并非是不可战胜的，这是对法国所有的敌人的一个鼓舞；而且人们忘记了战胜者也是正规军，而把这次事件当作人民起义的胜利来庆祝。自6月15日起，谢里登以曾长期赞同法国革命的辉格党人的名义，称颂西班牙的起义正是受法国人自己的正确原则所启示，法国人由于违反了这些原则，转而压迫别人，所以又眼看着这些原则反过来反对他们了。欧洲的贵族并没有受骗：毫无疑问，西班牙起义是民间起义，因此使欧洲的贵族甚至疑虑暗

生；事实上，西班牙起义在贵族和僧侣的鼓动和领导下既保卫国家，也保卫了旧制度，并且表明统治阶级能够如何利用爱国的感情为他们的私利服务。迄今为止，各国的贵族此时都还无从使他们的事业取得胜利，因此他们就小心翼翼地不去戳穿这种暧昧状态，而热烈地欢迎这从天而降的援助。

拿破仑感觉到了这一打击，为了弥补损失和恢复他的威望，他决定把“大军”调到西班牙。从此，谁来约制普鲁士和奥地利呢？在提尔西特体系里，这个角色由沙皇扮演。提尔西特体系要经受考验了。

273

五、法俄联盟的初期和埃尔富特会晤(1808年)

亚历山大回到彼得堡时已经发现贵族群起反对与法国结盟。萨瓦里被任命为驻俄大使后，由于他在当甘公爵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俄国贵族有所借口，纷纷享以闭门羹。贵族不愿和法国革命发生关系，并害怕对英封锁会使他们的小麦和木料无法出口。科兰古于12月接替了萨瓦里，他以奢华的排场缓和了同贵族的关系，但是没有消除他们的疑虑。俄国驻外大使都和贵族一个想法：驻维也纳的拉祖莫夫斯基完全倾向于奥地利；阿洛佩尤斯驻柏林时曾完全倾向于普鲁士，而移驻伦敦时则又完全倾向于英国；派到巴黎的托尔斯泰伯爵被认为是法国死敌之一；他在巴黎组织间谍活动，策划叛卖活动，并与梅特涅勾结合伙。梅特涅的社交活动与情场上的关系（他是波利娜和阿布朗泰斯公爵夫人的情夫），使他成为一个宝贵的情报提供者。然而亚历山大似乎毫不动摇；他对萨瓦里和颜悦色，对科兰古更为和蔼；他的国内政策又变得自由化了。至少说起来好象法国的影响使他回到不久前他曾公开发表过

的那些计划上；自 1805 年以来，“密友委员会”已经四散，但是斯彼兰斯基得宠于沙皇，并向他呈上了一个又一个的计划。不过，如果说他热衷于对法联盟的话，那是因为他希望从中得到好处。托尔斯泰在巴黎竭力要求法国从普鲁士撤军，以便拔掉一个反对他的国家的军事基地；在彼得堡，鲁缅佐夫对拿破仑颇怀好感，但是也很想保留多瑙河两公国。关于普鲁士，亚历山大并非不感到悔恨，他为放弃了亚得里亚海因而削弱了他在东方的地位而感到遗憾。他听任他的代理人各自继续执行他们个人的政策。

在原则上，已经确定法军应于 1808 年 10 月 1 日从普鲁士撤退。7 月 22 日，拿破仑需要金钱，便责成达律尽快结算赔款。首先必须计算各省所付的金额总数，也要计算征发的数字：大家一致同意减少四千四百万，而交付余额一亿五千四百万。事实上，普鲁士人付出的远不止此数：他们断言多交了五千万；拿破仑只注意计算军需处正常的征收，拒绝把国王在波兰所拥有的抵押债权收益约有四百多万盾计算在内。普鲁士将如何偿还这笔债务呢？它的预算已出现赤字；纸币票值下跌了百分之二十，而且由于只能按市场价格兑换，故已听其自然发展；尼布尔在荷兰商谈借款没有成功。最简单的办法似乎是出售王室产业，这些产业是在仍留给弗里德里希-威廉的领地上，据说收入接近三百五十万盾。尽管达律再三反对，拿破仑还是准备接受这份产业；但是这样就等于在普鲁士王国内创建一个法兰西国家，国王决定不下来。当 10 月 1 日到来的时候，拿破仑声明暂时将继续收取普鲁士的赋税，11 月 7 日达律通知普鲁士必须缴付一亿，作为第一年的付款。随后事情就拖延了下来，因为俄国仍留在多瑙河两公国，从那时起拿破仑宁愿把普鲁士留作抵押品。1808 年 1 月，国王的弟弟威廉亲王来到巴黎提出结盟的建议，但以减少赔款和立即撤军为条件；亚历山大和托尔斯泰急忙支持威廉亲王；他们的干预遭到拒绝，因为俄国没有

274

签署1807年7月12日的条约，又不能负担普鲁士的债额。到1808年8月，事情还是悬而未决。

东方问题更要棘手得多。随着对弗里德兰战役的记忆逐渐淡薄，亚历山大深信自己已经付出了代价而一无所获；自从他和英国决裂以来，总自以为有权获得补偿。在拒绝了斯洛博齐亚停战协定之后，11月18日他要求保有两公国。以为拿破仑是如此来理解他们之间的联盟的，那是错看了拿破仑，何况拿破仑认为在法律上他的地位是无懈可击的，因为根据提尔西特条约，沙皇应该无条件地撤离两公国：这是"木已成舟"的了。拿破仑并不拒绝在互有所得的基础上把两公国送给沙皇：在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就要占领西里西亚。对于亚历山大来说，再次肢解普鲁士是不能考虑的，于是他

275 感到失望。皇帝感觉到了这个危险，为了赢得时间，他才写给亚历山大那封著名的1808年2月2日信件，并暗示他瓜分土耳其帝国和穿过波斯与阿富汗远征印度的前景。亚历山大从中又看到了提尔西特的那种诱人的前景，于是从3月2日到12日，鲁缅佐夫和科兰古讨论了肢解土耳其的问题。俄国将向前推移，直到巴尔干半岛，奥地利将取得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而法国则获得埃及和叙利亚。但是，当谈到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的时候，他们便不能达成协议。如果俄国获得博斯普鲁斯海峡，那么科兰古就要求达达尼尔海峡。对此鲁缅佐夫加以反对，认为这是用一只手收回另一只手所送出的东西。最后他们把谈判记录送交拿破仑；5月31日拿破仑向沙皇建议举行会晤，以便解决一切问题，亚历山大接受建议之后，还必须等候皇帝从巴荣纳回来。

然而，俄国军队进驻芬兰后，在这方面对法国人的态度也不满意。贝尔纳多特、拉·罗曼纳和丹麦人完全能够轻易地在斯堪尼亚登陆制服瑞典，但是他们却按兵不动。瑞典人再次进攻，击退了敌人，重占果特兰和阿兰群岛。加之，阿洛佩尤斯代坎宁转交巴黎

一份关于在沙皇的调停下和按“实际占有”的原则进行谈判的建议。拿破仑并没有回绝。这个试探虽然没有下文，却产生了坎宁无疑想由此得到的效果：亚历山大怀疑其盟友想抛弃他，从此产生猜疑。

到1808年7月，拿破仑就已经从联盟中获得他预期的全部利益，而他则什么也没有付出，也没有要求条约规定以外的任何东西。拜兰之败却使整个形势改变了。现在拿破仑需要亚历山大在“大军”不在德意志的时候来约制德意志各大国：他变得有求于人了。一夜之间，他给了他一直固执地拒绝给的东西，向沙皇宣告他要撤离普鲁士并决意把两公国放弃给他。亚历山大同意于9月27日在埃尔富特举行一次会晤；但是他根本不是抱着感激的心情来到埃尔富特，因为“大军”非离开普鲁士不可，否则就不能去西班牙。他很明白，他已经掌握了主动权，可以提出他的条件。拿破仑现在对他所作的让步，原是他索取过的应得的东西，这既不能消释旧怨，也不能成为承担新的义务的理由。此外，撤离普鲁士的问题是以一种完全不是他所愿望的方式解决的。拿破仑保留了从10月1日起征收的租税，并把总额定为一亿四千万；由于他需要流动资 276 金以便远征西班牙，他接受了普鲁士商人们所签发的票据和以王室田产为担保，由各省抵押银行签发的抵押证券，他希望两者均能贴现。虽然他召回了军队，他还是在奥得河上保留了三个要塞，从而强制普鲁士负担新的地役①，普鲁士必须把其军队总数限制到四万二千人，并与法国缔结反奥联盟。尚帕尼只是在拿出截获的信件后才使普鲁士在9月8日签订协定，从这些截获的信件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已成为普鲁士政府首脑的施泰因正在准备侵犯

① 地役(servitude)，即国家地役，指一个国家同意把领土一部分或全部，在一定范围内永远为另一个国家的某种目的或利益服务。普鲁士被迫同意在它领土上保留三个法国要塞，这是法国为军事目的而取得的地役。——译者

法国。

9月 27 日，拿破仑首先到达埃尔富特。他带来了宫廷的全部随从人员，召集了他的附庸各邦君侯，因此对亚历山大的接待，场面十分豪华，并令塔尔马在“满座帝王”之前进行演出；但是他的客人对如此光彩夺目的场面可能感到嫉妒甚于愉快，不管怎样，亚历山大并沒有为之着迷。如果梅特涅的说法可信，那么塔列朗曾自夸他要亚历山大注意：俄国支持拿破仑反对奥地利并促使他扩张势力，对俄国是无利可图的；相反，俄国应该遏制拿破仑，这样对法国对欧洲都有好处。他说：“法国是文明的，但其君主却不是这样。”当皇帝向他的盟友试探要与其妹安娜女大公联姻时，塔列朗劝告亚历山大支吾搪塞过去。此外，他还怂恿他的朋友科兰古在亚历山大面前充当两个君主的调停人。这样做法只能损害他自己的君主。塔列朗的背叛是无容置疑的，他因此很快就得到了报答；通过科兰古牵线，他的侄子同库尔兰公爵夫人的女儿，狄娜女公爵结了婚。但是，如果他讲了梅特涅后来所转述的那番话，那是他夸大自己的功劳，以便在奥地利人面前抬高自己的地位；因为亚历山大虽然在科兰古催促下向维也纳进行干预，要求施塔迪翁暂时停止奥地利的武装，但是他已经声明只是限于建议而已。拿破仑不仅准备让亚历山大合并多瑙河两公国，而且还愿意在撤离华沙大公国问题上让步，但也未能改变沙皇的态度；沙皇拒绝威胁奥地利，事实上，梅特涅得到塔列朗提供的情报后，深信俄国不可能再被“轻易拉来”反对奥地利了。

277 这一次还是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拿破仑扮演了受骗者的角色。埃尔富特和提尔西特一样是权宜之计：只是为了争取足够的时间以便战胜西班牙人，从而再把“大军”带回到多瑙河上；拿破仑可以合理地相信，10 月 12 日的协定保障了和平，一直维持到来年夏天，他所要求的也不过如此而已。同日，撤回到易北河以西的

“大军”被改编了。达武单独留在德意志，带领两个军团组成了新的“来因军”。沙皇已经说服拿破仑把普鲁士的债务减为一亿二千万，11 月 1 日普鲁士就以商业票据的形式，每月付四百万，偿还了五千万，余额用国家的证券交付，一面等待抵押银行的证券确定下来。鲁缅佐夫根据新签订的法俄协定前来长驻巴黎，试图和英国恢复讨论。这个计划必然失败，因为坎宁不能同意按“实际占有”的原则把葡萄牙和西班牙给予拿破仑，除非拿破仑已经征服了它们。

六、拿破仑在西班牙
(1808 年 11 月—1809 年 1 月)

约瑟夫不管他弟弟再三命令他坚守布尔戈斯和土德拉，竟擅自退到埃布罗河以北；此外，尽管除了卡塔卢尼亚部队以外他只有六万五千人，他却把这些人分散在从比斯开省一直到阿拉贡各地。很快地他就自以为俨然是查理第五和腓力第二。[①] 他署名“朕，国王”，并且拒绝把金羊毛勋带授予贝西埃尔。拿破仑又见到他时，说道：“他完全变成国王的模样了。”儒尔当于 8 月 22 日充任他的助手后，他开始制订战略方案，因为皇帝写信给他说：“军队简直象是由驿站视察员指挥的一样。”

西班牙人没有利用这些有利的形势。他们直到 8 月 13 日才从巴伦西亚赶到马德里，卡斯塔尼奥斯于 23 日才到达马德里，而且只带了一个师。这是因为各地的“政务会”既很无能而又威信不高，他们考虑的首先是自己的领域，而且互相争吵不休：加利西亚

① 查理第五(1516—1556 年在位)和他的儿子腓力第二(1556—1598 年在位)是西班牙极盛时的国王，当时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且是最大的殖民帝国。——译者

注意到阿斯图里亚斯恢复了自治，而旧卡斯蒂利亚的将军奎斯塔不服它的领导。在塞维利亚，蒂利伯爵建议军队不要出安达卢西亚境外作战，另外一些人建议用武力迫使格拉纳达的"政务会"服从于塞维利亚的"政务会"。觊觎摄政王位者大有人在：费迪南四世的一个儿子在那位已与正统王族和解了的奥尔良公爵陪同下，从西西里来到西班牙，英国人却拒绝让他登陆。根据木尔西亚"政务会"在弗洛里达-布兰卡推动下提出的建议，终于设立了一个中央"政务会"，由各省"政务会"代表共三十五名组成，大部分是贵族和神甫。9月25日，在阿兰胡埃斯召集的中央"政务会"陷入起草繁文缛节的议定书或有关政权结构的冗长的争论中。霍韦兰诺斯周围的大部分人倾向于采用英国制度，而弗洛里达-布兰卡则坚持开明专制。随后成立了一个内阁；但是为了不触犯将军们起见，沒有委任总司令。由于将军们服从于只受一个委员会约束的陆军部长，所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征兵问题沒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招兵最少的是受中央"政务会"直接管辖的地区，莱昂和旧卡斯蒂利亚；10月份还不到一万二千人。英国人已经运来十二万支枪，一船船的军需品以及现款五百万；一大部分物资却留在各港口沒有使用。在里斯本，达尔林普尔已经恢复由若奥亲王所任命的摄政会议，但是这个摄政会议几乎毫无作为。正规军已召集起来；不过到11月底，在三万二千人中只有一万三千人领到枪支，并且在1809年以前并无一兵一卒参加战斗；"全民抗战"运动只有一些长矛作武器，只是到处进行骚扰。在葡萄牙，唯一有组织的武力是现在共有二万人的英国军队，由穆尔指挥。不过这支部队直到10月份才开始行动，而贝尔德也只是在这个月底才率领另一个有一万三千人的军团在拉科鲁尼阿登陆。

当拿破仑于11月5日到达维多利亚的时候，他发现面前的西班牙军队分布于从比斯开省到萨拉戈斯之间，有两支主力：加利西

亚的军队在布莱克指挥下在埃布罗河发源地防守，中央军在卡斯塔尼奥斯率领下靠近土德拉；这两者之间，加卢索带领一万二千人左右从厄斯特列马都拉来到杜罗河。穆尔的部队分两路纵队前进，纵队之间相隔甚远，而且还只到达西、葡边界；贝尔德几乎沒有开始出动。面对拿破仑及其素质上无比优越的军队，各路盟军似乎注定要败北。然而，皇帝仍需小心翼翼地指挥作战，因为他手下只有十二万人，莫蒂埃和朱诺的军队还留在后面。在中部，苏尔特击溃了加卢索，并攻占了布尔戈斯和瓦里阿多里德。拿破仑准备从那里先后攻击敌军两翼。但是甚至在他到达之前，勒费弗尔和维克托就已经过早地进攻布莱克，并把他击退得很远，以致无从再抓住他；由于勒费弗尔和维克托相互妒忌，不能很好配合作战，因此 11 月 10 日和 11 日他们在埃斯皮诺萨就只使布莱克受到一般的挫折。这样，就要施展策略攻打卡斯塔尼奥斯。拉纳顺埃布罗河而下，于 23 日在土德拉战胜了卡斯塔尼奥斯，至于內伊则沿杜罗河而上，以切断卡斯塔尼奥斯的退路；但这些军事行动沒有算计安排好，因为拉纳这么早发动攻击，內伊就不可能及时赶到；卡斯塔尼奥斯久经战阵的军队终于经卡塔拉尤德逃往昆卡。拿破仑向马德里前进，30 日在索莫山脉隘口，和敌人的一个师遭遇，在狙击兵攻击和只有一连的波兰轻骑兵的冲击下便溃不成军。首都于 12 月 4 日被占领，法军扫清了首都周围的敌军：勒费弗尔把加卢索击退到塔霍河彼岸，维克托在乌克列斯也击溃了中央军。拿破仑在马德里郊区的查马丹安顿下来，沒有与约瑟夫商量便颁布了一系列改组西班牙的敕令，他废除了异端裁判所，削减了修道院的数量并沒收了它们的财产。

然而穆尔正在萨拉曼卡以北把军队集中完毕，并与拉·罗曼纳会师。拉·罗曼纳从丹麦逃出后重返阿斯图里亚斯，并当上了司令官。穆尔将军突然变得非常大胆，对守卫布尔戈斯的苏尔特

发动进攻，以便割断法国的交通联系。拿破仑很迟才得到消息，12月20日，他派内伊的军团开向萨拉曼卡和阿斯托尔加，穿过暴风雪的瓜达腊马山脉，以便从侧面进攻穆尔。24日，穆尔仓猝溃退。由于苏尔特追击不力，穆尔终于逃脱。1809年1月3日，拿破仑在阿斯托尔加移交了指挥权。7日，苏尔特在卢戈作战，随后于15日和16日在拉科鲁尼亚作战，但是攻击不力，未能阻止英军登船撤走。至于拉纳，他已经到萨拉戈萨前面和蒙塞会合。帕拉福斯英勇地保卫了这座城市；法军费时一月才攻破城防工事，又花了一个月才摧毁逐街逐屋的抵抗。当1809年2月20日战斗结束时，西班牙人死亡十万零八千，其中四万八千人是病死。

280 在这个距离很远、冬季严寒和交通困难等等都对拿破仑不利的国度里，而其居民又只对他的敌人提供情报，拿破仑无法歼灭敌人。如果当时拿破仑能够至少消灭穆尔的军队，那么英国政府就难以得到议会批准另派一支军队，无论如何也需要很长时间来准备另一支军队。的确，穆尔不得不烧毁他的军火库并牺牲许多士兵；他自己也受了致命的重伤；不过主力部队还是逃脱了，并且不久就重新出现在葡萄牙。然而，如果拿破仑当时能在西班牙多逗留一些日子的话，那么他就能迅速抵达里斯本和加的斯。但是1809年1月17日他离开瓦利阿多里德返回巴黎了，因为他那时已确知奥地利将在春天发动进攻。

这样，西班牙依然有待于征服。拿破仑从此就不停地受到这项任务的沉重压力，这项任务不是由于迫切需要，而是由于雄心勃勃而承担的。继引起英国的牵制行动后，又引起奥地利的牵制行动，而后者导致了法俄联盟的破裂。从这时起，拿破仑必须有两支军队；新兵的比例有所增加，这就损害了“混合编制”的办法；拿破仑不敢要求法国征募足够数量的士兵，于是就将越来越多的外籍军团编入军队。这样，两支军队的质量就都降低了。

第二章　1809年的战争　281

1809年的战争是西班牙起义的自然后果。大军撤离德意志唤起了奥地利的希望，并驱使它去冒险。西班牙人的榜样燃起了德意志人的浪漫主义激情，这种激情促进了危机的发展。拿破仑感到事出意外，只得仓猝组成一支新军，这支新军好不容易才赢得了胜利。瓦格拉姆战役的胜利似乎恢复了大陆体系，但是，法俄联盟由于未能消弭这次对帝国的新的攻击，注定要瓦解了。

一、德意志的觉醒

自从十九世纪初年以来，德意志的思想界越来越沉溺于浪漫的神秘主义。冷静而沉着的歌德，尽管在1805年席勒死后极度孤 282 立，却仍然自信不移。曾在耶拿和柏林聚首的朋友们风流云散，诺瓦利又与世长辞，思想界活动中心转移到海得尔堡，第二代浪漫主义者主要的首脑聚集在该地神话注释学者克罗策尔的周围。这些人物中有：原籍意大利的一个来因地区商人的儿子克莱门斯·勃伦塔诺、普鲁士容克阿希姆·冯·阿尼姆、前者的妹妹和后者的妻子蓓蒂娜·勃伦塔诺，以及法国亡命者的后裔拉·莫特富凯等；戈雷斯在科布伦茨任教后，终于也同他们会聚在一起；他们跟蒂克有联系、跟在科隆力图恢复中世纪艺术研究的布瓦塞雷兄弟有联系，也跟在卡塞尔的两位图书馆馆员雅各布与威廉·格林兄弟有联系。当时，这一派思潮风行一时，这有利于越来越沉缅于神秘象征主义的谢林；而费希特则与谢林相反，他煞费苦心地捍卫着自己的

声誉。至于黑格尔，他到 1806 年才完成他的《精神现象学》。

神秘主义、复古，以及有时候对切身利益的关切，都迅速地驱使浪漫主义者转向传统的宗教和反革命。施莱尔马歇重新担任牧师的职务；亚当·米勒在 1805 年，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在 1808 年，都成了天主教徒。他们都歌颂"过去美好的时代"，描绘了一幅虚幻的景象，说在那个时代，人们在贵族的家长式统治下，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蔑视费希特的理智主义，费希特自己虽和他们断绝了关系，但仍摆脱不了他们的影响；早在 1804 年，他在《知识学基础》第三版中，在"自我"意识之上，重新树立一种需要作出自我努力的"绝对性"，而排除无条件的自我独立性；同时，在他的《当代基本特征》中，他将人类历史区分为几个时期，用传教士的说法称之为"无罪期"、"初罪期"、"全罪期"，最后这一时期标志着人的现状陷入了毫无节制的个人主义，必须强制把人从这种个人主义中解救出来，以确保"灵魂的得救"。他无疑还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但是，在研究了马基雅弗利以后，他的性情又倾向于赞赏对外进行征服的英雄的国家，而厌弃启蒙运动的功利主义理想；随着他的悲观主义的和权力观点的思想日益严重，他越来越倾向于利用国家来迫使性本恶的人们遵循"理性"，遵循《知识学基础》。

283

德意志浪漫主义就其本身而言，正如奥古斯特·施勒格尔从 1801 年到 1804 年在柏林进行教学时所解释的那样，是促进文化领域里爱国主义的一个强大动力；他抨击古典艺术是崇尚矫揉造作的成果，而浪漫主义则是日耳曼天才的自然表现，是完全自发性的；他由此得出结论：德意志文明在世界上占据首要地位。但是，聚集于海得尔堡的浪漫主义者，通过具体研究本国过去的文学史而产生了更为迅速的影响。作为诗人，这些浪漫主义者并不重视方式方法，而是以一股好奇的激情去搜集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加

以翻译和改写。1803年起，蒂克树立了榜样；1805年和1808年，勃伦塔诺与阿尼姆一起出版了他们的著名选集《儿童魔笛》；他们的榜样带动了戈雷斯，他于1807年同样从《德意志民间故事集》中选辑了一定数量的故事。《爱情歌手》从被遗忘中抢救了出来，《尼伯龙根》被译成现代语，加之，拉·莫特富凯发现了《西格夫里特》，在这个意义上，施泰因能够写道："正是在海得尔堡主要燃起了后来赶走法国人的那种德意志火焰。"

这种民族感情虽然如此深厚，却仍然停留在文化方面而不在政治方面；然而，不止一个迹象表明，它暗中正在演变。法国恢复了专制政体，使得自由主义者们感到绝望和忿怒；波塞尔特在莫罗被判决后不久就自杀了，施拉布伦多夫和赖夏特已经开始从事反对拿破仑的写作，贝多芬在《英雄交响乐》总乐谱中划去了波拿巴的名字；他们谴责法兰西民族背叛了1789年的原则，并且宣称它是一个邪恶而又轻浮的民族。1804年，民族主义情绪的迸发使得赫德尔的世界主义思想黯然失色，他写了一首颂歌献给日耳曼。普鲁士人并不是唯一因奥地利的败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消失而感到激动的人民。从1805年起，阿恩特在他的《时代精神》的第一部分中，表现了他对法国的公开敌意。作为强制性组织的国家，直到当时一直受到德意志思想家的憎恶，现在在他们的眼里开始具有了一定的价值，成了共同集体的保护者和个人的教育者。1802年，阿恩特在另一部书《日耳曼和欧洲》中肯定，占有自然疆界和取得海洋自由通道是一个民族自由发展所必需的。费希特从1800年起，在描述能使人人都有自由和平等的一种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认为这种社会只有采取能自给自养的"闭关国家"的形式才是可能的，因而他认为这种国家有权建立相当辽阔和相当多样化的领土来满足自己的需要。1805年，他也转而指望国家把人从罪孽中解救出来。 284

然而，这需要1806年的灾难和法国的占领来加速这种演变，特别是普及这种演变。这并不是说这种演变是突然的和普遍的运动；耶拿战役以前和耶拿战役以后一样，如果说不是法国，那么就是拿破仑个人仍拥有一些崇拜者，例如在柏林的布赫霍尔茨，便是其中之一；此外，约翰·米勒当了热罗姆的大臣；来比锡大学把一个星座命名为拿破仑；在埃尔富特会晤时，歌德曾会见拿破仑；黑格尔在耶拿看见过拿破仑，称之为"世界的灵魂"，甚至到1809年在纽伦堡任教授的时候，他还建议巴伐利亚人采用《民法典》。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从1807年起有一些德意志民族的知识界首领开始改变调子，采取挑战的态度，有的颂扬日耳曼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有的自称忠于当地的王朝；一些迹象表明，在人民群众当中，尤其是在普鲁士，漠不关心的状态已被忿懑和敌意所取代。某些公开发表的政见是很有名的，如施莱尔马歇在哈勒和柏林的讲道，这些讲道结果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怀疑；1808年，阿尼姆的《隐士报》问世；而最著名的则是费希特1807年于柏林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

普鲁士的不幸，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突出的反响，他们的出身和事业都与普鲁士密切相关；同时，一些北德意志人把浪漫主义和民族自豪感移植到德累斯顿和维也纳，浪漫主义和民族自豪感正在变为两位一体，不可分割。亚当·米勒，原籍普鲁士人，改信了天主教，他是根茨的朋友，成功地设法为根茨在奥地利政府机构里谋得一个职位。1806年春，亚当·米勒在德累斯顿开始举行一些有关保证国家生存及维护的原则的讨论会；1807年他在那里跟克莱斯特合作出版《太阳神》杂志，其宗旨是"维护德意志科学及艺术"；奥古斯特·施莱格尔作为斯塔埃尔夫人的儿子的家庭教师在科佩久居之后，随同这位夫人周游了德意志，他在维也纳获准开讲文学课程，在讲课中，他表明了比在柏林时更为鲜明尖锐的观点；

285

卡洛琳娜·皮希勒的沙龙则成为一个传播浪漫主义的中心。

这些文人到处跟主战派建立密切关系。由于不得不小心对付外国人和谨防政府的猜疑，他们不能号召听众武装起来，而只能继续突出强调说明日耳曼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特别是费希特，他重新讲述并发展了施莱格尔的下述论点：每一个民族都通过其特有的一种艺术去展示自己的灵魂；但是，在所有的民族当中，德意志民族得天独厚，使用一种从最初就不断发展起来而本质上没有受到外来语言混杂影响的语言，一种“原始语言”；因此，它存在的实体和表达的方式构成一个很和谐的整体。相反，各种罗曼语只是一种死语言的残余，英语是一种混杂土语；而法兰西人古典文学的体裁与规格，则沿袭自古代；由于拉丁民族和盎格罗-萨克逊民族没有创立他们自己的表达方式，因此只能通过人为的方法去表达他们的思想，这种人为的方法窒息了他们语言的生命力和自发性；唯有德意志文学确是很独特，在精神领域里是首屈一指的，这种文学所体现的文化是上帝向人类传递的讯息。神圣罗马帝国要统治全世界的抱负，特别是对几百万波罗的海人及斯拉夫人的征服和压迫，已经使得德意志人自视为统治民族；自从路德以来，神秘主义已使德意志人的灵魂如醉似狂，而今费希特的《演讲》既以神秘主义为德意志人民族自豪感的依据，便必然成为大日耳曼主义的福音书之一。就对国家的观念而言，亚当·米勒没有费希特那么激动人心，然而或许更为新颖。事实上，费希特继续把国家看作是有利于保障个人进步的一种工具，而一旦把法国人赶走，他保留给予他本国人民以一种如同法国人那样进行民主和共和革命的权利。相反，真正的浪漫主义者米勒却把国家视为一个自在的，追求它特定目标的物体，而个人必须使其命运从属于这些特定目标，因此，当他在一群贵族听众面前讲话的时候，他在捍卫德意志独立的同时，也捍卫着反对新思想的封建社会。

这些通过口头来表达的学说，最初只能够产生一种相当有限 286 的影响，即使印成书似乎也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将其传播出去。然而，这些学说可能促进了共济会和秘密结社的活动，因而传播得会比人们起初想象的更为迅速。不管怎样，人们夸大了这些学说的直接影响，没有充分考虑法国征服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后果，直接激起了各阶级的仇外情绪，并不是一定需要借助于这些学说的影响。在作家本身中间，担心法语将会重新推翻德语作为一种文学语言，从而削弱德意志的文化遗产，这种恐惧心理在不断地产生着影响。克莱斯特写道:“有谁会知道，一百年以后，在这个国度里，是否还会有人讲德语呢?”

除东普鲁士外，战争的破坏并不很大；但是，军税和征用似乎过于繁重，而军事占领带来暴行和流弊以及各种负担，如占住民宅、运输、防务劳役等，则更激起人们的愤恨；从战事象 1807 年时那样连绵不断之日起，拿破仑的战争方式就在这里得到了意外的反响。可是，拿破仑的财政政策和政治上的大变动似乎产生了更重大的后果。在他控制的国家里，拿破仑象对敌国一样征收军税，连缪拉和热罗姆统治的国家也不放过；同时，为了使这些国家能够供养军队，拿破仑通过勾销国债、中止年金和津贴的支付，以及毫无补偿地解雇大批政府官员和军官等方式，重新稳定了它们的财政。尽管普鲁士已陷于破产，它也不得不照此办理，由于裁减军队以及丢掉那么多的省份，至少就普鲁士来说前景暗淡。民族的苦难引起了 1806 年 12 月黑森的起义，促成了在波美拉尼亚与普鲁士发生个别袭击法国军队的事件；但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变穷、被革职的军官和政府官员的忿怒，以及就业困难的青年大学生的忧虑不安情绪，这些情况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痛苦和激情在民族感情中找到了使这些人感到崇高的理由。然而，正是从这些社会成分中间，才能找到抗法运动的领袖，也正是在他们中间才出现

了例如“道德协会”这样的组织。1808年4月这个组织在科尼希斯贝克建立，到1809年计有二十五个分会，七百多成员，其活动并 287 不限于普鲁士王国，因为我们知道，卡尔·米勒使来比锡的爱国者与这个组织建立了联系。表面上，这个组织也是属于文化性质的组织：它是一个“为了提高公民道德的团体”；其实，它试图监督国家官吏和公民，揭露和惩罚那些私通外国的人；它尽管得到国王的批准，然而，大臣们却视之为敌对势力，施泰因斥之为“帝国秘密法庭”[①]的重现。

不难相信，这个组织最后可能成为人民起义反对拿破仑的核心。全民抗战的思想导源于浪漫主义的激发；导源于歌颂原始的日耳曼战士，在赫尔曼[②]率领下，在荒野的森林中抗击作为专制工具的罗马军团的文学作品中；导源于通过席勒于1805年写的关于威廉·特尔和属于日耳曼族的瑞士人的起义的作品，《威廉·特尔》这一最优秀的作品已经成为民族遗产。这种思想还从法国最近的历史中吸取了养分，它一方面使人回忆起旺代人叛乱的榜样；另一方面又使人回忆起志愿军和救国委员会的榜样。然而，主要是西班牙的起义使这种思想变得非常激昂，从1808年7月开始，报纸、小册子以及演讲都在描述这一起义，争先恐后地加以称赞，并且得到各地政府的默许。由于渊源复杂，这一起义受到各方面的赞同：贵族把西班牙人看作是忠诚的臣民，民主派把他们看作是起来反抗压迫者的自由战士，而政治家则把他们看作是赶来援助正规军的善良公民。

---

① “帝国秘密法庭”(Sainte Vehme)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惩治封建主和“土匪骑士”的法庭，到十五世纪造成很大恐怖。西班牙的查理第五为皇帝时废除了这个法庭。——译者

② 赫尔曼(德语 Hermann)即阿尔明(Armin, Arminius)，约公元前17年——公元21年，后称阿尔明为舍罗斯克（今汉诺威附近）人赫尔曼。赫尔曼曾率领日耳曼部落反抗罗马异族统治。公元9年条陀堡森林一役，予敌重创，歼灭三个罗马军团。——译者

可是，全民抗战不可避免地与法国革命所传播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它唤起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它鼓动人民要求把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授予他们将为祖国战斗的人作为回报，它是作为新兴力量的象征出现的，如果国家通过取消特权，解放了个人能力，并且借助大革命领袖拿破仑自己的武器来反对他，那么国家就会取得这股力量。正因为如此，所以贵族和旧制度的各国政府终于拒绝公开求助于民众。也因为如此，在德意志民族运动的历史上又一次288 出现了奥地利跟普鲁士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从一开始，爱国者按照他们各人的出身，经历和宗教信仰，同时也按照他们的政治倾向，转向奥地利或者转向普鲁士。具有天主教传统的奥地利，窒息了全部文化生活，蒙昧主义剥夺了改革和群众运动的任何希望。相反，普鲁士总是自诩为准许一定的思想自由，它已经公正地吸收一定数目的人参加政府工作，这些人来自德意志各地、接受西方的影响，并决心使社会和政府现代化。然而，浪漫主义激情却是在奥地利找到了施塔迪翁伯爵那样的实践者，而在普鲁士，爱国运动的首领最后竟为国王所屏弃。因此，非常激动人心的1809年危机证实了德意志二元状态社会矛盾所产生的令人沮丧的影响。

二、普鲁士

古老的普鲁士是由官僚统治的，它的军队则由贵族率领：要是换在别的这类国家里，遇到1806年的灾难，会归罪于官僚和贵289 族，很可能会引起一场革命。的确，拿破仑是不会容忍发生这样一场革命的，因为，剥削被征服国家的最简单方式是保留它的旧统治机构。由于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普鲁士人不可能起来反抗；改革派就是从高级官僚之中产生的，并得到少数贵族和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协助。其特点是这些贵族既是保守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

者，他们相当明白事理，察觉到必须进行国家改革，他们也有足够的道义力量来贯彻他们的观点。假如说创立现代的普鲁士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直延续到整个十九世纪，那么他们至少是开了一个头。

提尔西特的第二天，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又定居科尼希斯贝克。在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诺的领导下，一个委员会负责清洗整顿军队的指挥机关，他们两个慢慢地又取得格罗尔曼、戈特曾和博于恩的帮助。另一个委员会的任务首先是改组整个东普鲁士，在该委员会主席施勒特尔主持下，舍恩、尼布尔和阿尔滕施泰因参加了这项工作。自从7月10日起，施泰因在拿破仑本人的推荐下被召回来了，大概是因为拿破仑知道了他在被解职后路经柏林回来因地区时，给法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于9月30日才抵达科尼希斯贝克，随身带了他在夏天拟就的一项改革方案，就是著名的"纳索备忘录"。这些改革家中有些人，如舍恩、施勒特尔、克劳塞维茨和博于恩等都出生于普鲁士，但是，最有名的人物都来自德意志的其他地区：格罗尔曼是威斯特法利亚一个地方官吏的儿子；戈特曾是弗兰科尼亚的伯爵；沙恩霍斯特原籍汉诺威；格奈森诺原籍萨克森；施泰因出身于来因地区的帝国骑士。他们中间也有一些出身普通家庭的人物，如：沙恩霍斯特的父亲是个副官；格奈森诺是一个军官的儿子，在冒险事业中成长起来。普鲁士没有奥地利那么死板，又被1806年的激荡所解体，因而形成了德意志的一股民族活力。

由于出身和气质不同，这些人物相互之间差别很大，因此对于鼓舞着他们的精神是什么，他们的事业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也就不足为奇。一些人只把他们看成是开明专制的普鲁士传统的继承人；可是，由于他们决心通过使人民参加革新事业来创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显然已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框框。不要 290

忘记，容克们是激烈地反对他们的，国王本人也并不喜欢他们。另外一些人却把他们视为德意志道德和宗教文化的代表，热衷于把改革和民族历史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说哲学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同样确实的是他们的计划的某些特点更自然地表明了西欧的影响。事实上，没有人会怀疑已经谈到的关于英国的影响；也没有人否认施泰因阅读过孟德斯鸠的著作，并且大概了解重农学派的思想及杜尔果与杜邦·德·内木尔①的计划。相反，在法国革命影响的问题上却引起了争论。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普鲁士，有些人对法国革命是很熟悉的：科尼希斯贝克的警察总监弗雷在1808年拟订整顿市政府的条令时，肯定已经读过法国制宪议会的法律；而曾经递呈一份宪法计划给施泰因的西里西亚贵族雷丁杰，也通晓西哀耶斯的著作。格奈森诺看来最明白可以从法国经验中吸取什么东西。他说过：

"多少无穷的力量蕴藏在这个民族内部而没有得到发展和利用啊！当一个帝国在虚弱和耻辱之中苟且度日的时候，一个恺撒或许正在最贫困的农村推犁，而一个伊巴密农达②正在辛勤劳动，依靠双手糊口度日。"

不论他们对英国和法国多么注意，人们还是毫不困难地一致认为：他们从来没有打算效法英国采用议会制度，他们也屏弃了法国大革命的精华，即平等主义精神。在现代普鲁士，资产阶级和农民应该参与国家生活，但是，权力仍将留在国王手里；社会等级应该废除，但是，容克的社会权势仍将保持。这是介于西欧国家和旧制度君主政体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创造，尽管它与后者的关系比前者更为密切。

㊸

① 杜尔果(1721—1781年)，路易十六时任过财务大臣，推行改革受到特权阶级反对而失败。杜邦·德·内木尔(1739—1817年)，重农学派经济学家，1789年当选三级会议代表。——译者

② 伊巴密农达（公元前420—410年间生，362年死）是古希腊底比斯城邦民主派领袖之一，英勇善战，为国捐躯，成为希腊史上有名的爱国者。——译者

科尼希斯贝克政府的任务并不是令人羡慕的，一方面要跟达 291 律商讨安排赔款的偿付，另一方面还要忙于恢复劫余的乡村，这样，农业改革就提上日程。重建农庄，重新扶持饲养牲畜，为农民提供种子，甚至在象现在遭灾时为他们提供食物，这副担子落到了封建领主身上。但是，领主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于是，对于他的抵押债务不得不给予宽限或者延期。在领主的心目中，最简便的办法是把遭到蹂躏的农民的份地和他自己的领地重新连成一片，而使这些农民沦为短工。由于法律禁止夺佃，领主要求废除"农民保护法"①，而自己反过来却不付出任何代价：农民仍然是"仆从"。官员们的看法却不是这样，他们深受亚当·斯密和杨格学说的熏陶，特别是舍恩，表示赞同大规模经营，决不反对废除"农民保护法"；但是，自由经济的首要原则是废除封建制度。尽管王室允许资产者以个人名义购置土地，并且在王室领地上比较彻底地废除农奴制，使承租领地的佃户改为土地所有者，然而，它还从来不敢触动容克土地所有制的垄断权，不敢打击划分等级的制度，也不敢干预领主庄园的内部事务。

现在王室抓住了这个机会，而这就是1807年改革的重要性所在。一方面，王室以取消农民的"仆从身份"作为废除"农民保护法"的交换条件；另一方面，它允许资产者和农民占有土地；王室在取消了对贵族的削贬身份制度时，相应地准许贵族从事那些直到当时只让资产阶级从事的业务，同时也给农民同样的权利。王室已开始以阶层、就是说根据财富和职业划分的阶级来代替等级制度。东普鲁士省议会只好服从，并于1807年8月原则上决定在该省实行改革。阿尔滕施泰因没有征询其它各省议会的意见就立刻

① "农民保护法"是普鲁士国王在十八世纪颁发的一系列敕令，主要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19，1738和1739年颁发的敕令，内容是要保护向国王纳税并为国王服役的农民，免遭领主夺佃与体刑。容克反对国王为保证财源和兵源的这些敕令，以致它们实际上已多成为一纸具文。——译者

建议将改革推广到整个王国。拿破仑正在华沙大公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里按照法国原则改组社会；这种榜样起到了一些影响，因为它即使不是招致普鲁士居民外移，也可能激起不满情绪。

施泰因只是在9月30日才抵达，因此，他并不是改革的创始292人。此外，他的《纳索备忘录》也没有谈到改革；他不赞成资本主义，至于他对农民问题的态度，人们至少可以注意到他并没有解放他自己的农奴。他实际发挥的作用只是支持阿尔滕施泰因，并在无条件废除"农民保护法"问题上做了某些保留，这个问题便推延到以后再解决。1807年10月9日，国王签署了改革敕令。至于"农民保护法"，放弃了采用一个全王国统一的法律的想法，而代之以各省的法令。各省法令在1808年到1810年间先后公布，事实上都表现为一种妥协折衷办法："新的"租佃地，就是说根据各地情形从1752年或1774年以来所租佃的份地，可以收回租佃权；"旧的"租佃地，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可以和领主的领地联结起来：建立农庄的总面积相当于已经消失了的租佃地的总和，但是，比其中任何一块租佃地都大得多。王室领地仍然比私人庄园走在前面；1807年10月29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自己的领地上取消了农民的"仆从身份"，这只是在西里西亚才有其重要性；1808年7月27日，他把先前在其他各省公布的敕令扩大到东普鲁士，这些敕令宣布凡已缴付补偿费和强制赎买封建租税的佃户，便可以取得土地所有权：可以肯定说，这个省有三万农民因此成为土地所有者。

1807年的敕令和它的补充法令在德意志和英国引起了异口同声的称赞。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其中有些赞扬是过甚其辞的。这些改革措施的动机首先是为了财政和经济的目的，改革的主要成果是有利于国家和容克。正如所预期的那样，国库增加了可观的收入；授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国王就摆脱了惯例上对农民的种种

责任，同时也取消了农民对国王自己土地，主要是他的森林的使用权，他从而获得很大的收益。在私人庄园里，让与农民的利益主要是法律上的；从1810年起，农民的"仆从身份"不得不取消了，尽管沒有作出明文规定。可以认为，此后允许农民随意离开耕地，可以自由结婚，使其子孙免于"仆役劳务"；但是，其他许多义务沒有明确的规定，这是对农民不利的。租税和劳役还是全部保留了下来，所得到的份地也完全是不稳固的。领主保留了司法权，这种权利使他继续担任村子里的行政长官，掌握制订治安条例和处罚，甚至体罚的权力。就眞正取得了的进步而言，它对好多的农民是得不偿失的，他们由于土地被收回而变成短工了。在王室领地上，赎买的重担和自然灾难使他们不得不出卖土地，使土地集中得以实现；甚至，谁也不想把抵押贷款的好处给予农民，然而却给予资产阶级。至于贵族的特权，除了垄断土地所有权以外，则全部原封未动。 293

这次改革促进了土地的再集中和习惯权利的消失，因而促进了农村公社的解体。经济自由同样要求工商业的大改革。在东普鲁士，施泰因进行了一些这样的改革：废除了好几个行会，取消了领主的磨坊专利权，宣告城乡平等，这使得农民可以就地买卖。最后这项改革严重地影响了货物税的收入，这种货物税是集中在城市里征收的，因此，这项改革成为征税制度改革的预兆。事实上，施泰因表示他赞同征收所得税；由于东普鲁士为支付战争赔款而发行了公债，施泰因促使省议会表决要征收所得税，这是第一次要征收这种税；但是，所得税沒有推广到全王国，它仍然是一个例外。

施泰因的个人努力主要是在官僚机构的改组方面，他企图吸收全国的代表人物充任官吏，从而削减官僚包办一切的强大权力。专权、急躁，甚至脾气很坏的施泰因，曾强烈要求国王撤换两个宠臣——洛姆巴德和拜姆，要求任命沙恩霍斯特领导于1809年并入

陆军部的军事内阁，他也曾准备把中央政府重新组成为五个完全专业化的部，并且成立各部大臣会议。事实上，在处置国王的心腹顾问方面却未能成功：普鲁士国王的文官内阁和军事内阁，在这以后和以前一样，仍在掌握实权。施泰因还计划创建一个全国性的咨询议会；当他不得不在东普鲁士要求批准成立征税机构和发行要付给拿破仑的抵押债券的时候，他修改了省议会的组成，增加了资产阶级代表的人数，接纳了根据缴税的选举资格当选的农民代表，并采取个人投票表决的方法；他的全国议会原定也由各等级的代表组成，至少在财政问题上采取个人投票表决法，其中平民的代表权则授给富人。但是，在其他各省，省议会没有进行改革，全国议会因而也没有成立。294

行政改革是 1808 年 12 月 26 日在施泰因下台后颁布的，这一方案仅仅是把省以下各级行政区划中旧领地的“村民会议”的权力，和仍然是合议制的“管理局”结合起来，并且只是取消了后者仍拥有的司法职权。省的首脑人物是“首席长官”，从前这是一个习惯上的官职，现在却要正式任命了。在管理局里，在官员以外增加了县的代表，即贵族。可是，不久就显出来，这二者是不能合作的。施泰因曾经想要保留官僚机构，同时也仿效英国设治安法官，可是没有成功；为了不摹仿拿破仑的郡守制，施泰因保存了合议制度，然而他没有看到这是同他要使行政机构具有魄力和首创精神的计划背道而驰的。他在 1808 年 11 月 19 日颁布的法令仅仅是在城市里产生了重要而持久的成果。他没有排除地方的特殊性，但拟定了所有的城市都要遵循的总方针。各城市都应有一个选举产生的市议会和由市议会推选的地方行政官。这样，国家的监督权即使没有被取消，也是受到了限制。主要的新特征是取消行会参加市议会的选举权，而把选举权授予具有一定财产资格的有住所的居民。德意志以前只有行会的选举权；个人选举权甚至在英国的

城市里也是罕见的，而德意志人则并不熟悉这种体制；不管怎么说，毫无疑问，施泰因的主要改革是受到了法国人的启示，他的顾问弗雷无疑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施泰因掌权只有一年多一点，因此他的内阁的特点是愿望多于成果，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同时也得承认，这些成果并不足以振奋人心，而改革派的军事上的成就，则对普鲁士的复兴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沙恩霍斯特和他的助手进行的这些军事改革，在1809年已有相当进展。指挥部的清除整顿和改组工作已经完成；连队的自治权取消了；步兵采用一种重视法国战术的新的操典。尽管如此，普鲁士军队还不能战胜拿破仑。改革者们知道这一点，295 一直到1807年7月，他们只是想使法国撤军；1月，沙恩霍斯特和施泰因合作，使威廉亲王为此目的而向法国提出普鲁士与法国结成联盟，或者参加来因邦联；格奈森诺提出的唯一的异议是"一旦进入独眼巨人① 的巢穴，我们能够希望得到的全部好处是最后一个被吞噬掉"。但是他们一听到西班牙起义的消息，甚至在知道拜兰战役失败之前就变卦了。自7月23日起，戈岑被派往西里西亚去跟奥地利人秘密接洽。8月6日，决定召集由于财政情况而不能正规入伍的新兵进行一个月的训练，以便在必要时能够把他们动员起来，这就是有名的"速成兵团"，一支备用增援骑兵部队。在这个月中，在一些备忘录中记录下这项计划的细节。这就是号召全体德意志人民武装起来，进行一场殊死的战争；疏散妇幼，全国坚壁清野，用起义的民兵武装袭扰并围困敌人。这项计划的精神显然是革命的：王侯和贵族们如果不站在民族起义队伍的前列就会被剥夺权力和尊荣；国王将向他的人民颁布宪法。

德意志象它在十九世纪将实现的那样，第一次作为一个同外国人相对立的政治实体出现在这些改革家的思想里。奥地利无疑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在上额中部有一只独眼。——译者

地将在可能的盟国之列，但是却作为一个不同的国家；正是普鲁士应该号召德意志人民起来，并且应该担负领导的责任；可是他们只是把普鲁士视为一个工具，并且丝毫不把普鲁士王朝所将冒的风险放在心上。沒有任何事情能更生动地表明西班牙起义的影响以及起义所引起的浪漫主义激情。为了谨慎小心起见，施泰因同意用结盟的方式来欺骗拿破仑，直到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为止。“难道唯独拿破仑才可以用专断取代法律，用谎言取代眞理吗？”为了准备起义，施泰因既沒有相当广泛的秘密组织可以使用，也不象西班牙人那样有一个由僧侣组成的、顺从的圣职团可以支配；他不得不让过多的人知道內情，同时他对法国间谍也警惕不够；他的两封信件，其中之一是给正在梅克伦堡温泉疗养的威特根施泰因将军的，都落到拿破仑的手里。

在普鲁士，贵族被激怒了。驱逐法国人无疑地是他们所想望的，但是这要在国王的率领下，在联合起来的王侯们的协助下，通过正规军来进行，同时人民大众却仍然应处于传统的从属地位。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受到威胁的特权，憎恨那些一步登天的客卿[①]，把他们看作是雅各宾派；在维也纳，人们连声附和，而弗里德里希-威廉对这些攻击并非无动于衷，因为他坚持旧制度，坚持他那专制君主的权力，同时更加愼重地考虑到所冒的风险，所以如沒有俄国沙皇的支持，他就什么都不愿意干。在8月23日的会议里，他拒绝了这些密谋家的建议；亚历山大在前往埃尔富特的途中曾劝他等待时机，因此他在9月29日批准了8日在巴黎签署的协定。爱国者们曾全力以赴地阻止他这样做，博于恩也建议召开一次国民大会。他们只是在10月才知道这一决定；施泰因在递交他的辞职书以后，又恢复进攻。28日，他拟定了一个新的起义计划，11月6日交给国王一份进行大规模改革以激发公众舆论的宣言

296

① 指从德意志其他各地来到普鲁士、主张改革，受到国王重用的人。——译者

书。在这个时候，象哈登堡和阿尔滕施泰因这样一些人组成了第三派，他们在原则上同意改革，但是他们注意不伤害作为国家唯一支柱的贵族，并且企图和国王一道争得时间和避免冒险。因为施泰因反对国王和王后去访问亲爱的亚历山大，所以王后抛弃了他：11月24日，他被革职，12月15日，拿破仑宣布放逐他于帝国之外。

阿尔滕施泰因和德纳继起执政，改革运动变得缓慢无力；唯独留任的沙恩霍斯特继续进行他的工作。全国规模的工作却被推迟到一个未卜的将来。容克们胜利了。11月26日，约克公爵写道：

“这些疯人的头头之一垮台了；其他阴险恶毒的人必将作法自毙。最可靠、最明智的方针是冷静地等待政治事件的发生。冒险攻击敌人，挑动敌人，完全是狂妄行为……德意志决不会诉之于西西里的晚祷①或一场旺代战争。普鲁士农民如果没有接到国王命令，如果没有大量军队并肩作战，决不会动手……我们在国内国外的形势都开始好转了。”

这种乐观主义使爱国者陷于狂怒和绝望之中。戈岑在跟奥地利人协商时愤怒地谈到他们所遇到的阻力，并且宣告：民族运动开始时，有些人将会人头落地。格罗尔曼跟随施泰因出走国外，而且 297
也不止是他一人这样做。王朝的声望下降了，普鲁士的声望也随之下降；奥地利一时又为政治意识觉醒了的德意志人所瞩目，克莱斯特提出的口号“奥地利与自由！”表达了他们的希望。

三、奥地利

在奥斯特里茨之后，弗兰茨皇帝更换了他的班子。查理大公

---

① 西西里的晚祷发生在1282年，当时法国国王路易第九之弟安如的查理为西西里国王，西西里人约定在复活节的星期一晚祷时，以晚祷钟声为号令，一齐动手杀尽法国人，结果赶走了法国统治者。——译者

重新担任总司令，并在 1806 年 2 月 10 日复任军务院主席；前任大使菲立普·德·施塔迪翁出任宰相，他的哥哥司教会的成员弗里德里希·施塔迪翁是奥地利驻在慕尼黑的代表。查理大公和雷尼埃大公也坚决要改变政府体制，但是毫无结果。弗兰茨继续想要事必躬亲，控制一切。在他的内阁中，巴尔达齐享有和他的前任科洛雷多同样的权势，他为人聪明，勤劳和正直，据说是科西嘉一个雇佣兵的儿子，也有人说他是一个贵族的私生子。出身非直属皇帝附庸的帝国骑士的施塔迪翁，弄权专横，野心勃勃，很想做出一番事业。他虽然颇有教养，为人豁达，但过分囿于他的贵族出身，以致不去触动贵族的种种特权；他效仿开明专制君主，创建工场，开办学校，修筑公路，但丝毫没有变动国家和社会结构。他是一个迷人的和机伶的社交家，一个讲求享受和挥霍无度的人，他过于轻浮以致不能设想出大规模的改革；事实上，他是个舒瓦瑟尔[①]的拙劣摹仿者，而不能同施泰因相提并论。他甚至沒能从匈牙利获得适当的补助金，也未能取得军事上的变革；在 1807 年的匈牙利议会上，纳吉领导的反对党谴责任何参战的想法，并重复以往提出过的一些牢骚不满意见。奥皇则一如既往，拖延审察这些不满意见，而满足于征召一万二千人入伍的兵额和有限的征税。唯一尚有成

298 效的工作，即查理大公的工作，也因财力不足而受到阻碍；长期赤字使得负债额从 1805 年的四亿三千八百万盾增至 1809 年的五亿七千二百万盾，而纸币的发行量亦从三亿三千七百万盾增至五亿一千八百万盾，以致盾的票面价值在奥格斯堡交易所里的损失从百分之二十六增至百分之六十七。1806 年，齐希伯爵曾试图通过一个强迫购买公债的办法缩减纸币发行量，但是 1807 年的军备抵消了这项措施的效果，1808 年 8 月，他让位给奥多纳。当战争突

① 舒瓦瑟尔，法国路易十五的大臣，在七年战争失败后，他主持法国的恢复工作，而施塔迪翁在奥斯特里茨战败后当政，所以著者引以对比。——译者

然爆发时，奥多纳还来不及作出任何决定。在投机商人和出口商人之中，而尤其是在主战派之中，热烈主张实行通货膨胀的大有人在，这些人看不出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提供打一场仗的军费。

施塔迪翁从第一天起就想到这场新的战争，以便借此树立自己的荣誉；然而，1805 年的教训是如此沉重，以致好战派长期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梅特涅从巴黎建议采取观望政策，施塔迪翁不得不采纳这项建议，而在 1807 年冬季没有参战。接着而来的提尔西特和约又迫使他参加大陆封锁，并与英国决裂。在这段平静的期间，浪漫主义正盛行于维也纳，有些人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唤起人们注意奥地利君主国的历史往事，以此论证奥地利应该作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存在：它曾经是基督教徒抗御异教徒的前哨阵地，并且曾在马扎尔人和斯拉夫人中传播西方文明。他们还以同样的历史往事论证奥地利应在德意志大家庭中占有首要地位。国家档案馆馆长、历史学家赫尔迈尔男爵在这场运动中大露锋芒，成为运动的头头，他与约翰大公关系密切，渴望成为一个实际行动的人物。

西班牙起义也同样把奥地利从其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解救了出来。施塔迪翁把巴荣纳悲剧的故事在公众中大肆传播，同时为费迪南的忠诚臣民大唱赞歌。这种宣传立刻使马扎尔的贵族大为感动。1808 年 8 月 28 日，匈牙利议会极为热情地欢迎弗兰茨的第三个妻子玛利亚·路易丝·德·爱斯特新皇后，她被加冕为匈牙利王后。议会通过军队增征两万新兵，并取消顶替办法，同时预先授权国王一旦战争爆发时实行为期三年的独裁统治，这使国王能根据他自身的权力，号召"起义"或全民抗战。匈牙利的作家们开始攻击法国。早先曾翻译《马赛曲》的弗尔塞格，在 1809 年出版了《马扎尔人的忠诚》，而基斯法卢德则发表了《致马扎尔贵族的爱国演说》。西班牙的榜样立即提醒奥地利人：失去的各省，尤其是对 299

巴伐利亚人统治不满的提罗耳省，大有可能成为很有价值的辅助力量。法国大军的撤离和塔列朗在埃尔富特的谈话终于使施塔迪翁作出决定。此外，梅特涅本人也认为现在是时候了：他观察到拿破仑只有一支大军，而且，这支大军刚刚撤离德意志；他根据塔列朗的话，相信皇帝在法国的地位已是摇摇欲坠了。

主战派迅速地重整旗鼓；除了查理大公以外，所有的大公都参加了；帝国所有的大使也都参加了；维也纳再度成为欧洲贵族的大本营；在拉祖莫夫斯基的身旁，波佐·迪·博尔戈又出现了；斯塔埃尔夫人在奥古斯特·施勒格尔陪同下刚刚到达，奥古斯特·施勒格尔同弗里德里希·施勒格尔相会，后者已成为查理大公的秘书。皇帝被他的新皇后和新岳母推向战争，他的岳母对于失去她的摩德纳公国始终不甘心。奥皇终于在1808年底作出了让步。查理大公反对参战坚持得比较久些，但也不得不屈服了。另一个活动中心在布拉格成立了，而施泰因正在布拉格避难，在那里并不缺乏跟德意志爱国者联系的渠道。施塔迪翁和赫尔迈尔听从梅特涅的建议，发动了一场仿效法国人做法的宣传运动，由于这样大肆宣传，主战派的运动争取到资产阶级、大学生和各大城市人民的支持。他们成倍地扩大发行报纸杂志和小册子，并利用了戏剧和音乐；格莱希编写了一些剧本，科林创作了一些爱国主义的歌曲；后备军的建立成为举行大型集会的机会；在大学生中间，有一定数量的志愿军，其中就有格里尔巴策，他很快就改变了调子。向人民发出的这些号召，未能使人对施塔迪翁的政策产生幻想：虽然他试图激发民心，但这是在旧制度的奥地利国家的范围之内和专为它的利益而进行的。施塔迪翁能博得容克们赞许，而不能获得施泰因的赞同。1809年初，赫尔迈尔接见了提罗耳人的一些代表团，其中就有霍弗尔领导的一个代表团，这些代表团想发动农民起义来同赫尔迈尔配合行动；但赫尔迈尔的这些手法未能再使人上当受

骗了，他不过是要煽起一个合法的运动。如果说奥地利或许还指望在德意志会爆发一些骚乱，它却断然反对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而且对此并不讳言。转向了奥地利的德意志爱国者们深感失望：奥地利欢迎他们对胜利的祝愿，也愿意接受他们来效劳，但并不打算听取他们的意见，它指望靠自己的力量战胜拿破仑，然后在德意志和在意大利恢复它昔日的统治。 300

在查理大公的主持下，奥地利军队取得了无可否认的改进。首先，奥地利军队建立了预备兵役，办法是，在每一个团的征兵区组成每年有义务受三个星期训练的两个营。1806年6月10日，后备军正式建立，由退役士兵和志愿兵组成，在每个县编成为营，并由退伍军官和绅贵担任指挥。1809年初，后备军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总共有十五万二千人，加里西亚则另作编排。另一方面，奥军又努力推行法国的作战方法。1807年的操典采纳了用狙击的方法进行战斗；事实上，步兵并未实施此法；但是1808年9月1日，人们决定组建九个提罗耳猎兵师，拥有二万三千狙击手；这些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奥地利骑兵倾向于分散作战，查理大公把其中一部分编成一些独立的军团。他也把直到那时分散在各步兵营的炮兵集中组成联队，组织了一个工兵团和改善了后方勤务：设立医务队、军马补充队和军邮局；把各联队的辎重减少一半；恢复就地征发的办法以减轻运输的负担。最后在1808年7月，部队原则上被整编成几个军团，并且组成了一个总司令部。

可是，这些革新要取得成果，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因为改组驻扎部队所费不赀，各军团并未建立起来；原有的储备和护送辎重制度没有彻底抛弃，部队仍然是臃肿的；由于高级军官年纪太大，而干部又多由特权和贿赂而来的，以致充塞无能之辈，因此战术的改进也微不足道。尽管有这一切弊病，1809年奥地利军队的面貌比起1805年要好得多，而这警告拿破仑不能掉以轻心。归根

到底，他们特别是缺少一个眞正的军事统帅。查理大公有许多长处：勤勉、谨慎和冷静。可是，他擅长的是防御而不是进攻，他过分拘泥于传统战略，用尼布尔的话来说，即把战争视为“弈棋”，并且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他的目标不是要歼灭敌人，而是要攻城占地。尤其要指出，查理大公为人优柔寡断。他的这些缺点都可归因于他的性格；虽然他只有三十八岁，但健康状况欠佳；他缺乏热情和主动精神。还是同一个尼布尔注意到，他投入战争时不是心情愉快的。

301

奥地利人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以致不重视寻求盟国。事实上，他们只能指望英国人；在柏林，施塔迪翁开始的谈判仍无进展。甚至在伦敦，英国人的态度也不明朗。梅特涅在10月间已答应把四十万人投入战场，条件是英国提供五百万镑，外加二百五十万镑用作动员经费；迟到12月24日，英国人才答复他说，这是太过分的要求。然后，英王乔治要求奥地利首先签订和约，这使奥地利势必与拿破仑决裂。坎宁汇到的里雅斯特二万五千镑硬币；但是4月10日，他借口西班牙战争的开销太大，还是食言了。事实是，英国政府处于深刻的分裂状态。是否该在大陆上采取行动，这是不再有争论的；关于这一点，没有一个大臣提出异议；问题是在于究竟应在大陆的何处采取行动。坎宁要在伊比利亚半岛投入所有能使用的力量，而卡斯尔雷则赞同在荷兰采取行动；甚至还有人谈到波美拉尼亚。这后两个牵制行动可能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尤其是第二个，或许会在德意志引起一次范围广泛的起义，并把普鲁士卷进去。卡斯尔雷选择了荷兰，因为荷兰是他的欧洲政策的主要目标；如果这次远征进行得好，或许会袭取安特卫普。然而，这次出动准备不足，对奥地利人毫无帮助。正如麦克在1805年一样，施塔迪翁实际上并未期待援助。这次，他更可以振振有词了。拿破仑没有准备，因此可以指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然而，不容置

疑，由施塔迪翁激发起来的浪漫主义激情，最后也使他自己卷进去。

四、1809年战役

这场战争对拿破仑是灾难性的，因为在他未能结束西班牙战争之前，它就过早地突然爆发了。只有亚历山大可以制止它，如果他肯说一句话。然而他却闭口不言。他在埃尔富特的经验使他懂 302
得：为了从拿破仑手里得到一些好处，就要利用他的不利地位，而奥地利的进攻来得正中下怀。战事继续在芬兰进行，还将在土耳其重起，俄国人却可在那里为所欲为。再者，亚历山大又采取了他的1805年波兰计划。尽管恰尔托雷斯基失宠而回到了普瓦维，亲俄派仍然在华沙大公国大肆活动。1809年春，一些华沙和加里西亚的贵族向沙皇表示愿与俄国合作，条件是他承诺恢复波兰王国；6月27日，沙皇答复说，他决不会放弃已属于俄国的省份，但是如果条件许可，他愿意把大公国和加里西亚合并，重新建立一个波兰。显而易见，这得要由他经手办并对他有利，因为过后不久，他就反对拿破仑进行这种合并。感情同样可以起到它的作用：1809年1月，普鲁士国王和王后到了彼得堡，唤起了对往事的种种回忆。据说沙皇在劝告施瓦岑贝格大使要等待时机的时候，曾说了这样的话："复仇的时刻不久就会到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这个时候起，俄国同拿破仑的一场新战争在沙皇的脑子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拿破仑从瓦利阿多里德派一个军官去向亚历山大建议：双方的大使把同样的照会交给施塔迪翁，要求圆满答复，否则即断绝外交关系。亚历山大同意发出照会，但不同意断交，并且坚持应由特派外交使节去办理此事，这就把事情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了。拿破仑并沒有抱任何幻想。尽管他向沙皇倡议，在奥地利解除武装的

303 条件下，共同保障奥地利的安全。他只是妄想在查理大公发动攻势之前争取时间以完成其新军的集结。

回到巴黎后，他不得不承认，国内士气不振。保王党人并不足为患，可是，他们没有解除武装。1806 年 8 月 23 日，瓦纳主教遭到拉埃·圣伊莱尔的绑架，直到 1807 年才把后者逮捕归案；次年，阿歇子爵的同谋勒谢瓦利埃在诺曼底的冒险行动全被平定。保王党在泽西岛的据点不断地派遣特务到法国西部：1808 年，枪决了普里让和另外六个人，1809 年 2 月 20 日，又枪决了子爵的表兄弟阿尔芒·德·夏托布里昂。雅各宾派的危险性更小；警察追踪他们，毫不放松。1807 年底，警察逮捕了从前担任过革命法庭陪审员的狄迪埃；1808 年，有人向巴黎警察厅长杜布瓦告发共和党人的一个阴谋，这是自 1801 年以来第一个共和派阴谋。牵连的人有：过去是救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德马约、马莱将军、前国民公会议员弗洛朗-吉奥和李科尔以及前保民院议员雅克蒙；富歇在康巴塞雷斯的协同下，终于说服皇帝最好把这件事掩盖下去，不了了之。

这些未遂行为并没有引起什么风浪。使全国惊恐不安的是拿破仑自己的政策。他的节节胜利一点也不能安定人心，因为战事总是在周而复始地进行。“这场战争必定是最后一场战争”，当他 1807 年开始对俄作战时，他慎重地这样说。后来，他把提尔西特和约看作是和平的保证。然而不到一年，又发生了西班牙的事件；这一次，不可能把责任归咎于查理四世。菲埃韦写报告给皇帝说：“法兰西忧心忡忡。”在皇帝的臣仆中间，忧虑并不稍轻。1808 年战争前夕，丰塔内作为立法院主席，大胆地表示了他们的忧虑：“陛下出征，我不知道大家心里多么惶恐不安，这种担心是由爱戴的心情所引起的，由于抱着希望而有所减轻。”在私下谈论中，德克雷更直率地说：“皇帝疯啦！完完全全疯啦！他将自取灭亡，而我们所

有的人都将跟他一起灭亡。"既然他肆无忌惮地盲目投奔死亡，某些人就认为，聪明的办法是叛离他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同时用国家利益的理由来粉饰这种卑劣行为，因为国家的事业应该与暴君的事业分开来。另外，如果他万一战死，或者大败的话，那还必须寻找一个继承人；可是，沒有得到外国的赞成是什么也不能干的，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向列强提出一些保证，这就是塔列朗内心的想法。 304

在远征西班牙的时候和在奥地利进攻的前夕，正如在马伦哥战役时一样，有人设法找一个拿破仑的继任人，这当然不是毫无意义的事。1808 年 12 月，塔列朗跟富歇言归于好，似乎达成了协议，选中的人是缪拉。到处都在这么谣传。据说欧仁截获了一封给那不勒斯国王的信；富歇的一个秘书说到这件事，所以皇太后向她的儿子提出了警告。肯定的是拿破仑在回到巴黎时认为自己被出卖了。他把塔列朗痛骂一顿，撤掉他侍从长的官职。富歇得以幸免，或许是为了在局势危急中不使警务人员解体，或许是因为在提尔西特以后，他是首先劝拿破仑离婚，甚至是与约瑟芬谈过此事的人。在如此大发雷霆以后，拿破仑的克制态度似乎是既出人意外又显得很笨拙。拿破仑可能害怕打击他的一个老同谋者会引起其他人的恐慌，会激起新的阴谋。可是，他不是谈得太多，就是谈得不够。莫利昂说，塔列朗的失宠引起了"一种不安，而且是普遍的不安，因为对失宠的原因一无所知，以致人人自危。"然而，由于他的左右亲信充斥了前朝贵族，由于他盼望同一个皇室联姻，拿破仑怎能为了叛国罪而再次枪决一个亲王①呢？

在拿破仑出发到前线去以后，他的敌人还保持着警觉。英国人在法国海岸登陆不是不可能的，因为 4 月，英国人击败了停泊在

---

① 塔列朗被封为本尼凡托亲王，拿破仑已枪决一个亲王，即指 1804 年镇压当甘公爵。——译者

埃克斯岛①港外的罗什福尔舰队。在普罗旺斯省，保王党人和共和党人蠢蠢欲动。在那里，巴拉斯跟吉代尔和莫尼埃两位将军，跟过去的一个私掠船主夏拉波和一个商人都建立了关系，这个商人提供活动经费。他们想使目前被软禁在马赛的查理四世和戈多伊潜逃；7 月，夏拉波企图与正在海上巡航的科林伍德联系。拿破仑跟罗马教皇的冲突在天主教徒中间引起了激昂的情绪；整个夏季，法国西部产生了新的动荡不安局面，而在萨尔地区和乌尔德郡②也发生了骚乱。甚至军队中也有可疑分子。我们对于“费拉德尔非人”这一秘谋所知不详，它可能是由后来在瓦格拉姆战死的乌代上校领导的；但是在葡萄牙，苏尔特的军队里边，一个名叫达尔让顿的军官组织了一个阴谋集团，寻求威灵顿的支持。我们并不夸大危险性，但是把 1809 年的思想状态跟 1807 年 8 月得胜回朝时相比，就可看出鲜明的对照。整个帝国建立在胜利的基础之上；在 305 西班牙的失败打击了它的威望，这一打击更为沉重的是西班牙的失败引起德意志一场新战争。全国都清楚地意识到，这场新战争是在不利的情况下开始的。摆在拿破仑面前的是武装起来的奥地利、正在反抗的西班牙、英军进驻的葡萄牙和动荡不宁的德意志；在他的背后则是苦闷不安和叛卖；自 1805 年以来，他没有下过这样可怕的巨大的赌注。

但是，拿破仑照常冷静地做备战工作。不论以来因部队名义留在德意志的，或者保留在法国可以调动的大军，人数总共有九万。此外，还有盟国军队十万，其中有德意志人、荷兰人和波兰人。1808 年 1 月征集的 1809 年适龄应征入伍青年也是可以动用的。为了从训练营里把他们替换出来，皇帝在 1808 年 9 月征集了1810 年适龄应征入伍的青年，从 1809 年 1 月 1 日起服役；几乎是在同

① 埃克斯岛在法国西部夏朗德河口外，是罗什福尔的外港。——译者

② 乌尔德郡在今比利时列日附近，以乌尔德河命名，当时并入法国。——译者

一个时候，皇帝把分遣部队的兵员从六万增到八万人，追溯到1806年起生效：这样就征集了十四万新兵。现有的团都增加了一个第四营；布伦大营和阿尔萨斯大营新建立了几个师，然后被派到来因以东的地区去。最后，近卫军急急忙忙地从西班牙调回来了。1809年3月，拿破仑在德意志拥有三十万战士；他可以把十万人驻扎在意大利，其中六万人在威尼西亚；此外，马尔蒙在达尔马提亚仍拥有一万五千人。创建这支新的军队是一个奇迹；可是，对这支新军的价值不能抱任何幻想。其中近乎半数是由外国人组成的，这些外国人在前线令人大失所望。法国军队大部分是新兵，干部配备不齐，而且是临时凑集的。

物资准备不足，象往常一样马虎，这在年轻的军队里特别明显。最高统帅部本身也大有逊色：由于内依和苏尔特留在西班牙，不得不把三支军队交给勒费弗尔、旺达姆和热罗姆指挥，把意大利军队交给欧仁指挥。1809年的军队比1805年的差得多，但是仍拥有参加过1807年战役的十多万法国士兵，他们是胜利的保证；然而，这是一支临时凑合的部队，是演变到1812年部队的前奏。目前，危险并不在于它的构成；事实上，拿破仑尽管积极活动，也不能很快地把它建立起来并及时地集结：3月底，贝尔纳多特还是在萨克森，带领着五万波兰兵和萨克森兵；热罗姆在德意志中部，带领着荷兰军队和威斯特法利亚军队；拥有六万精兵的达武部队，驻扎在多瑙河以北的巴伐利亚；乌迪诺率领着巴伐利亚军队和其他德意志军队驻扎累赫河上；马塞纳更落在后面，近卫军还在从西班牙回来的途中。因此，大部分兵力正分散在一条一百五十公里长的、离敌人不到一天路程的前线上。4月10日，查理大公发动进攻，而拿破仑只是在17日才抵达多瑙沃尔特。如果奥地利人集结重兵猛攻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306

奥地利一方的兵力比1805年布置得较为合理。约翰大公只

带了五万人侵入威尼西亚，其中只有一万人在沙斯特勒指挥下驻扎在提罗耳，六千人驻扎在克罗地亚；而费迪南大公则必须带走三万五千人去防卫加里西亚，以防波兰人的袭击。在德意志，查理大公拥有二十万人。他最初想在波希米亚打开一个缺口以粉碎达武的部队，把法国军队切成两半，这一战略或许会是够得上拿破仑的水平的。但是他一想到维也纳毫无防御，就感到不安，他决定沿多瑙河右岸前进，占领巴伐利亚高原。这样，他就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并使自己的军队疲劳不堪；尽管如此，如果他迅速地、全力以赴地贯彻执行的话，根据这个新计划也同样能取得一些决定性的成果。然而他却把两个军团留在达武前面，自己越过了因河缓慢地朝伊扎尔河方向前进，由希勒率领的纵队掩护他的左侧，这支纵队人数很多，却配合得很差的。因此，达武能够向南方退却，并且本来还可能在靠近英戈尔施塔特的地方和其它军团会合，如果不是贝尔蒂埃不准确地解释皇帝的命令而把他留在累根斯堡的话。

拿破仑于 17 日到达，马上就命令达武同他会合，19 日，达武元帅沿河的右岸进军，从而在敌人面前通过，给敌人以粉碎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是查理大公没有利用这个机会，结果达武在滕根就能抵抗住奥地利军队微弱的压力。在这个时候，拿破仑错把希勒的部队当作主力部队，准备拦截希勒开向因河，而迫使他退到多瑙河。在中路，拿破仑组成密集队形，由拉纳指挥，20 日向阿本斯堡一线攻击奥地利军队左翼各纵队，迫使他们退到兰茨胡特，而马塞纳则向这个城市进军，从后面攻击他们；可是，他到得太晚了，以致 21 日，希勒被赶出兰茨胡特之后，能够退到因河。大公利用了这一段耽搁的时间，把他的队伍跟留在多瑙河以北的部队联合起307 来，这时累根斯堡的卫戍部队已经投降了；22 日，他终于决定猛烈攻击达武；但是，在他的右翼能够开始行动去阻截达武到达多瑙河之前，他的左翼却在埃克米尔遭到达武的袭击，接着，从兰茨胡特

赶来的拿破仑从后面攻击他；他边战边退，轻易地再次渡过多瑙河。他的军队损失了三万人左右，并且被切成两部分；然而他们也不难撤退到维也纳重新集结，人数还超过十万。23日，法国人再度占领了累根斯堡；然而，希勒却打败了贝西埃尔。大公便沒有遭到麦克同样的命运。

皇帝沒有在波希米亚追击查理大公，而向维也纳进军；这并非是他受到占领敌方首都这一政治目的诱惑，而是必须穿插到奥地利主力部队和意大利及提罗耳部队之间。当达武现在得到了贝尔纳多特的支援，正监视大公动向的时候，马塞纳击退了希勒的部队，而拉纳力图翻山越岭去包围希勒。攻占萨尔斯堡的勒费弗尔迫使耶拉西希退向德拉瓦河，并且监视着提罗耳。在特拉翁河渡口的爱贝斯堡，希勒经过一场浴血战斗之后，渡过多瑙河去和他的司令会合。5月12日，法军进入了维也纳。这次，他们却发现桥已切断，河的左岸有十一万五千敌人。拿破仑率军到河中各岛，这些岛屿在维也纳以下把河分成好几条支流。他下令架设便桥，在20日的夜晚，不顾已很可怕的洪水冒险渡河。21日，三万法军遭到了奥地利全军的进攻；法国人幸运的是，奥军沒有集中攻其一点，而是把兵力从阿斯佩恩到埃斯林分布成半圆形，以致不能突破法军。22日，拿破仑率领六万兵力采取攻势，要从中央突破敌人阵线；如果主要的桥梁沒有被折毁，增援部队可以通行无阻的话，他也许会突破成功。但他不得不停止前进，不得不往后撤退，并在即将弹尽援绝的情况下，顶住敌军的反攻；他终于坚持下来，从23到25日，得以从左岸撤退。二万名法军和二万三千名奥军倒毙了；拉纳元帅和许多将军战死了。大公不善于利用这一良机，但是，他的对手却已失败。埃斯林之战产生了比拜兰之战更为深刻的影响：这一次，拿破仑的个人威信受到了打击。

局势又变得很危险。在法军的后面，当沙斯特勒在4月9日 308

经由普斯特尔塔尔进入提罗耳的消息传开时，整个提罗耳全面爆发了起义。巴伐利亚取消提罗耳地方议会和自治，因而激起民愤。然而，特别是经济情况更是火上加油：捐税大量增加；商业由于大陆封锁以及意大利和奥地利边界的关闭而遭到破产；禁止流通奥地利纸币，取消作为银行及慈善机构的修道院，这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征兵制度好象在火药上点了火，不得不暂时停止实行，以平息骚动。此外，蒙特热拉的开明专制是属于约瑟夫二世式的；天主教僧侣由于优势和特权受到了威胁，已经起来应战了；而僧侣在提罗耳如在旺代和西班牙一样，具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因为起义的主要领袖安德烈亚斯·霍弗尔的师傅是方济各会修士哈斯平格。赫尔迈尔和约翰大公善于利用时机准备起义。这一起义主要是农民起义，它并不尊重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同巴伐利亚派来的官员一样遭到抢劫和虐待。只有五千名士兵驻守这个国度，他们不久就被包围并投降了。可是，沙斯特勒没能把起义者组织起来，他们在战斗之后都回了家，而霍弗尔尽管因勇敢和虔诚赢得了起义者的信任，却是一个能力有限而又优柔寡断的人。勒费弗尔没有费多大的气力就能沿因河前进，于5月19日进入因斯布鲁克。沙斯特勒撤退了，起义似乎已经结束，于是在提罗耳只留下德鲁伊一个师。然而，埃斯林战役的消息传来以后，起义又爆发了；拿破仑需要他所有部队，因而召回德鲁伊，放弃了提罗耳。农民们不想出境打仗，然而对巴伐利亚却进行了袭击。7月，意大利效法提罗耳的榜样，在阿迪杰河和罗马涅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

如果约翰大公把分散在奥国南部的全部兵力集结起来，他也许会得到一些宝贵的支持。但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4月10日，他越过纳梯松那流域和科巴里德，采取了攻势。仍然处于分散状态的欧仁的部队措手不及，一直退到明乔河，放弃了整个威尼西

亚。但是，当维也纳受到威胁的时候，约翰大公还沒有设法集结奥地利军队便撤退了。他自己赶到泽默林；背后遭到欧仁的追击，后来他又退到拉布河以北；朱莱向莱巴赫撤退，在麦克唐纳的紧追下又从那里逆流而上，经过马里博尔到格拉茨。从提罗耳来的沙斯特勒幷沒设法同朱莱会合。至于在克罗地亚的奥军，马尔蒙先行后撤以集中兵力，然后经阜姆、莱巴赫和格拉茨把他们击退。结果，法国所有的军团都与大军重新会合，而约翰却相反，他的兵力只剩下二万人左右。6月14日，达武前来威胁普莱斯堡，欧仁在拉布河上打败了大公。然后，两人都向维也纳强行军，以便参加会战；约翰为了同样的目的，渡到多瑙河左岸，然而他晚到了几小时。

309

埃斯林战役法军战败，可能造成的最可怕的后果是引起普鲁士国王的介入。他的好几个军官已经擅自采取有损于他的行动；克特试图攻取马格德堡，4月28日，席尔带了他的轻骑兵从柏林出击，但被马尔向将军轻易地制服了。德意志中部也骚动起来了；4月22日，当过上校的德恩贝格带领着几百农民向卡塞尔进军；6月，另一个领取退休金的军官试图发动马尔堡起义；陶贝尔河流域一带农村举行了起义。至于奥地利军队则开进了萨克森，萨克森国王逃走了；不伦瑞克-厄尔兹公爵带领着那些由黑森选帝侯集结到波希米亚的黑森军队，占领了来比锡。最后，英国人对汉诺威和荷兰施加影响，7月8日企图进取库克斯港。如果普鲁士人行动起来，热罗姆很可能就难于保卫他的王国。弗里德里希-威廉最初似乎准备采取行动，经过考虑后，他只限于暂停交付赔款；虽然他派了一个使者去维也纳，后者却在7月21日才抵达该地。

总之，拿破仑终于能够把他所有的兵马重新集结起来，幷且毫不困难地利用了被占领各国，或者从法国调来增援部队和储备物资：二万步兵，一万骑兵，六千近卫军和大量的大炮，以补救部队的

素质不高。洛鲍岛[1]已认真仔细地构筑城堡,增加了坚固的桥梁。在危急中,皇帝还是沉着镇定;他甚至继续采取最可能使他在自己的臣民中丧失民心的措施:5月17日,他决定并吞罗马。听到庇护七世将把他革除教门的消息,他就下令逮捕教皇,并把他流放出去;7月6日,即瓦格拉姆战役的那一天,罗马教皇的确被宪兵队带走了,不久以后,1810年2月17日的元老院决议案使并吞事宜合法化。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他发布命令采取这样的行动,正好表现出他的个性。他面不改色地在孤注一掷。这一次,他又迫使命运站到他的一边。

310

现在,他拥有十八万七千人和四百八十八门大炮,对方仅有十三万六千人,但确实也配备着几乎同样强大的炮队。7月4日夜晚风雨交加,拿破仑在埃斯林下游开始强渡多瑙河,第二天下午便告结束。皇帝打算通过这一着来包抄查理大公,但是,他的部队在平原上扇形前进时,却没有发现大公的队伍;大公注意到法国人的准备工作,认为这次不可能阻止敌人渡河,因而稍微向后撤退了一些,其左翼在鲁斯巴赫河后面,与多瑙河并行,其右翼则与多瑙河垂直,三角形的顶点以阿德尔克拉和瓦格拉姆两村为标志。这一阵地左面背靠筑有堡垒的高地,地形是很有利的;但是它过于宽阔,使大公无从保留后备部队。拿破仑失望之余不得不仓促地调动军队,只能在晚上七点钟开始进攻鲁斯巴赫:攻击没有成功,因为萨克森人在阿德尔克拉后退了。6日黎明,他倾全部兵力再次发起攻势;达武扭转了局势,迫使罗森贝格后撤;然而在阿德尔克拉,卡拉·圣西尔被击溃了,贝尔纳多特的萨克森部队再次瓦解了。这期间,奥地利右翼正猛攻单独进行阻击的布代师,并从他手中夺取了阿斯佩恩和埃斯林,进而威胁法军的后方。皇帝不得不在激战中修改他的部署。马塞纳向多瑙河挺进,采取侧翼攻击,迫

[1] 洛鲍岛是多瑙河中的大岛,在维也纳的下游。——译者

使奥地利右翼停止前进；而这一空缺则由配备着百门大炮的炮兵队填补，在这支炮兵队后面，麦克唐纳率领后备军以密集的纵队前进。两点钟，向鲁斯巴赫再次发起全面攻击；敌方左翼最后被彻底击溃，中路被迫后退。大公下令后撤，而法军已筋疲力竭，也就没有追击。大公损失了五万人，对方损失了三万四千人。拿破仑这一天所施展的军事天才赢得了战术家们的赞赏；但从这次战果来看，它不能与奥斯特里茨和耶拿两战役相比。敌军仍然有八万人以上，正在秩序井然地经摩拉维亚撤退；11 日在兹奈姆又开火了，然而大公并不是布吕歇尔：战斗在他看来是绝望的，他要求停战，并于 12 日实现了。

危机远远没有结束。德意志仍然情绪激昂，一个名叫施塔普斯的学生试图谋杀皇帝。然而，秩序很快地恢复了。普鲁士国王坚持谨慎、克制的态度。奥地利军队撤离了萨克森；不伦瑞克-厄尔兹冒险穿越热罗姆统治的王国，企图抵达英国人正在准备接应他的海岸。相反，提罗耳在 7 月份尽管遭到来自萨尔斯堡、福腊耳贝克和阿迪杰河三方面总共四万人的攻击，还是奋勇抵抗，歼灭了一个萨克森师，再度迫使勒费弗尔撤退；德鲁埃·戴尔隆和欧仁仅仅是在和约签订后才得以平定提罗耳。霍弗尔曾经归顺，后来，又采取了敌对行动；一个同乡出卖了他，1810 年 2 月 20 日他被枪毙了。然而英国人在制造更多的麻烦。7 月 30 日，他们的远征军终于在瓦尔赫伦岛前面出现了，并在 8 月 13 日占领了符利辛根港，这是他们派到大陆上来的最大的一支队伍，共有四万人，由三十五艘船和二十三艘帆舰护送；其统帅查塔姆勋爵是一个完全无能的宫廷宠臣，在登陆后按兵不动，反之，如果他直奔安特卫普，那么大概已经攻进去了；他的军队很快地遭到瘟疫的袭击。9 月 30 日，他又登船回国，战死者一百零六人，病死者四千人。

311

然而，整个帝国却惶惶不安，对此，富歇要负大部分责任。因

克雷特患病，6 月 29 日拿破仑要他代理内政部事务。作为两个政治性的大部的首脑，他进行了不寻常的活动：取缔各修道会，逮捕充当罗马教皇和天主教徒中间人的诺阿耶，镇压西部和来因地区的暴乱，并且不和莫利昂商量就在交易所进行买卖以支持政府发行的公债。当他知道英国人登陆的时候，他向同僚们建议动员北方十五个郡的国民自卫军，毫不考虑反对意见；贝尔纳多特由于在瓦格拉姆战役之后曾替萨克森人辩护而与拿破仑发生了争执，他刚回到法国，富歇就接受他的建议，并要他负责保卫安特卫普；然后他命令各郡郡守对国民自卫军总动员，作好准备以防英军侵袭沿海其他地区，尤其是对普罗旺斯的侵袭。在巴黎，国民自卫军重新建立起来了；富歇把各种军衔分授给资产阶级，这是他们乐于接受的，他还检阅了自卫军。这引起了军界人士大为惊恐。人们担心是否又回到了 1793 年？克拉尔克大发雷霆，菲埃韦给皇帝写了

312 报告。看来无疑的是富歇如今又有机会发号施令，他踌躇满志，不禁回想起他在国民公会时期充当人民代表的日子。然而也可能他还别有用心；或许他知道普罗旺斯的阴谋，并且通过塔列朗的亲信蒙隆伯爵，跟英国人有勾结，蒙隆伯爵是他派到安特卫普的。在 1808 年一连串阴谋之后，人们可以想象到拿破仑的猜疑。8 月，他赞同富歇最初的一些措施；9 月，英国人沒有动静，他就开始听信那些批评富歇的意见，取消了巴黎国民自卫军，派贝西埃尔接替贝尔纳多特，并且断然地要求富歇不要把帝国搞得这样乱七八糟。他回来后就在 10 月 27 日对富歇狠狠训斥了一顿，然而并沒有撤换他，因为富歇赞助即将进行的离婚；8 月 15 日，拿破仑反而把他晋升为奥特朗托公爵。

后方的事情这样烦扰着拿破仑，使得他更担心亚历山大的态度。根据科兰古的请求，沙皇在加里西亚边界已经集结了六万人，然而迟迟沒有开战。当然，他首先要忙于自己的事务，这些事务已

经有所好转。3 月，在挪威边界统领军队的瑞典埃德尔斯帕雷男爵公开反对古斯塔夫四世，29 日，国王被迫让位给他的叔父绪德尔曼尼亚的老公爵，后来称号为查理十三。瑞典马上谈判媾和，并在 9 月 17 日割让了芬兰。4 月，和土耳其人的战争又开始了，被尊为塞尔维亚人世袭君王的卡拉-格奥尔吉，于 1808 年 12 月入侵黑塞哥维那；8 月，土耳其人从他们的一边进入塞尔维亚，然而，当巴格拉吉昂拿下伊兹密利亚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在 9 月份撤退。由于加里西亚没有奥军，亚历山大尽管有这些急务，还是能够毫不费力地加以占领，并在签订和约时就可以据为己有。但他对拿破仑的敌意超过了对他自身的利益的考虑，因此这种敌意变得显而易见。费迪南大公因而得以侵入大公国并占领华沙。波尼亚托夫斯基一面听任他前进，一面自己深入奥地利领土，占领了卢布林、扎莫什奇，甚至伦堡。这时亚历山大作出了决定，6 月 3 日，他的军队进入了加里西亚，从波兰人手里夺取这个省份。然而费迪南急忙赶来，重新攻取了散多梅希。哥利津将军拒绝援助波尼亚托夫斯基抢救这个要塞，却跟敌人缔结了一个秘密协议，答应不越过维斯瓦河；大公一枪不发就在他的前面撤退了；更妙的是当波尼亚托夫斯基接近克拉科夫的时候，他请俄国人来，并且把城市交给他们。亚历山大反对华沙大公国的情绪越来越激昂，而鲁缅佐夫自从知道已经摆脱了瑞典人以来就不再有别的想法。7 月 26 日，俄国要求拿破仑保证决不重建波兰。8 月 3 日，亚历山大对科兰古说："无论以任何代价，我要求安静地不受干扰。"这样的声明，其目的是要离间波兰人和法国，同时，这个要求意味着否决了大公国领土的任何扩大，至于是否恢复波兰国名在实质上是无关紧要的。沙皇的态度引起拿破仑越来越大的愤慨。拿破仑说道："这不是我的一个盟国。" 过去，他不得不忍气吞声，而今，他还得迂回前进。313

奥地利注意到从四面八方袭击着拿破仑的困难。弗兰茨在普

莱斯堡附近的多第斯城堡里避难，他的周围，主战派蠢蠢欲动。皇后、施塔迪翁和巴尔达齐都责备查理大公停止了战斗和抛弃了提罗耳及萨克森；他们削减了他的权力，使他只限于指挥他自己的一支军队，这就导致了大公于7月23日的辞职。主战派希望得到俄国人的支持，所以在8月中旬，梅特涅与尚帕尼在阿尔腾堡开始和平谈判之后，他们竭力使谈判拖延下去。这一手法对拿破仑也是正中下怀：8月12日，他向沙皇建议，把加里西亚分割给沙皇和大公国，后者得五分之四；作为回报，他同意开始关于波兰问题的正式谈判；他提出，在等待答复期间，他要继续据有所占领的全部奥地利领土。最后于9月1日，车尔尼舍夫来阻止奥地利人采取行动，因为目前俄国不会跟法国决裂。被征服者于是不得不从命，从那时起，他们虽然给予法、俄在加里西亚所要求的一切，而另一方面却寸土必争地保卫着他们西部的省份。这种策略是太明显了：正如拿破仑一样，奥地利人现在明白，亚历山大几乎要求得到他们所能放弃的一切。拿破仑不想使离叛了他的亚历山大得到好处，也不想驱使其走极端，因此决定减少分给俄国的份额。奥地利最后的抗拒被最后通牒所粉碎了，10月14日在肖恩布鲁恩签署了和约。巴伐利亚得到了因河地区和萨尔斯堡。拿破仑拿到了沿海的克罗地亚区，和阜姆、伊斯的利亚和的里雅斯特，以及奥国的克林底亚省和卡尼奥勒省的一部分。华沙大公国的人口增加了一百五十万，包括卢布林和克拉科夫两地；俄国增加了四十万人并拿到了塔尔诺布尔。奥地利失去了三百五十万居民和全部通向海洋的通道；同时支付七千五百万赔款。

314

和约最显著的特征是，拿破仑沒有考虑亚历山大的要求，沒有维持从一开始就定下来的瓜分加里西亚的比例。这样，他就提醒俄国所处的附庸地位，侍候主人不周到、沒有尽责，因此工资就减少。亚历山大向科兰古表示了他的不满，而皇帝沒有惊慌失措，仍

然炫示他以放弃重建波兰来满足沙皇的愿望。但是，俄国的这项要求仅仅是烟幕。实际上，亚历山大所希望的作为他帮助皇帝反对奥地利的代价，是拿破仑给他华沙大公国，加里西亚就更不在话下；他很失望，暗中拒绝加以援助，尽管如此，他并沒有放弃其野心。在秋天的日子里，跟法国决裂对他来说似已不可避免，当恰尔托雷斯基回到彼得堡的时候，沙皇开始坦率地对他谈到其1805年计划，以及利用波兰人去反对拿破仑的可能性。相反，拿破仑并不正视这一现实：在他看来，大陆体系仍然稳固地建立在提尔西特协议的基础之上。事实是因为他现在决心与约瑟芬离婚，自从埃尔富特会晤以来，他一直想娶亚历山大的妹妹。象平常一样，他只顾眼前的打算；法俄联盟对他有用，他就不愿看到这个结盟已是名存实亡。在选择新皇后问题上发生的意外变化，将使这种结盟变为公然的敌对关系。

五、同奥地利联姻

拿破仑的第二次结婚，必将使还未充分复原的大陆体系改变格局，并加速必然使他毁灭的战争的到来。这件婚事主要是拿破仑政权演变的结果，其次才是受对外政策的影响。早在1800年，某些人刚打算授予他世袭的权利，就考虑到他跟约瑟芬离婚的问题，因为她沒给他生儿育女。在重建君主政体之后，离婚就越发成为迫切的问题。可是，也许有段时期，拿破仑曾怀疑过自己是否能做父亲；尽管人们认为好几个私生子是他生的，然而这种疑问似乎直到1807年12月13日莱昂伯爵诞生之后才消除。他也可能是为跟约瑟芬离异而感觉痛苦；即使她是不忠实的，她在他心里所燃起的热烈情感，也还是他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自从抛弃了她之后，拿破仑一听说她愁闷不乐就觉得非常难过。后来他说过：“我

315

不愿意她伤心落泪。”在奥坦斯生下一个儿子的时候，拿破仑曾为这个孩子举行隆重的洗礼仪式，人们还以为他将收之为养子；可是，小孩于 1807 年 5 月 5 日夭折了。此外，直到这个时候，拿破仑仍未发现可以替代约瑟芬的人。从他称帝之后，他就不得不要将一个出身帝王之家的公主扶上皇后的宝座了；随着他的政权变得更加贵族化，更加专制，他认为罗马教皇涂的圣油越来越不够了。他在好些帝王面前夸耀他是自己打下天下的，但也于事无补：他一心渴望成为正统的皇朝。

提尔西特的会晤使得进入一个历史悠久的正统王朝家族的梦想似乎一下子变得可能实现了。年底，离婚的可能性由于富歇的安排而更为明确了。即使拿破仑不公开承认有意于此，在去埃尔富特之前他还是下了决心，因为那时他要对亚历山大试探向其妹求婚。1809 年 11 月 15 日回到巴黎的时候，他想的只是如何实现这个愿望：22 日，科兰古奉命向俄国正式提婚。由于亚历山大坚持要把关于波兰的诺言写进一项条约，这位大使也就被授权签订条约。然而沙皇的思想已到了这个地步，不可能再提有关婚姻的问题。然而拿破仑的求婚还不失为一个天赐良机，因为亚历山大可能在表示拒绝之前使条约获得批准，这个条约有助于俄国此后把波兰人拉过来。令人惊讶的是：科兰古在这次交易中竟然受骗。他从谈判条约着手，1810 年 1 月 4 日签署了这一条约，它规定永远不得重建波兰王国，甚至波兰这个名称也要从正式文件中消失。他一直迟到 12 月 28 日才提及婚事。然而，他知道沙皇有意制造借口拖延，因为塔列朗在埃尔富特已为他出谋献策，借口是：必须同皇太后商量，而她还得听取住在特维尔的女儿叶卡德琳娜的意见。叶卡德琳娜沒表示异议，可是做母亲的虽然沒有直接拒绝，却以女儿年幼，只有十六岁和宗教信仰不同等为理由提出异议。事实上她对这件婚事极为反感。亚历山大作为一家之长和专制君

316

主，有权作出最后决定。但是，他却谨慎小心地一直拖延不复。

可是，时间紧迫了，11 月 30 日，拿破仑在一个著名的场面向约瑟芬表示了自己的意愿。12 月 15 日，约瑟芬在全体亲王和帝国大勋爵的会议上宣布同意离婚。16 日，一项元老院决议案认可了离婚，可是，这样的离婚既不符合《民法典》，也不符合皇室条例的精神，即使在文字上没有违反皇室条例。约瑟芬仍然保留皇后的称号，并得到了马尔梅松皇宫和一份产业。在解除宗教婚姻方面，碰到的困难稍为多些；你不能去求助于被囚禁的罗马教皇；而且埃梅里方丈认为，根据过去的先例，这种事情也不必由教皇出面干预。结果，费什决定了程序：由巴黎的神职人员，首先是在教区法庭，然后是在大主教教区法庭负责宣布拿破仑的宗教婚姻无效。前者认为，婚礼是秘密举行的，没有"教区本堂神甫"和证婚人在场，遵照法国天主教教会的教规，这个婚礼即使享有任何的特免（甚至教皇特免），都不能得到承认。后者则提出皇帝所举的理由：1804 年的婚礼，是出于形势所迫，本人不曾明确表示同意，因而是无效的。

1810 年 1 月 12 日，这个问题了结之后，拿破仑焦急地等待着 317 沙皇的答复。当他获悉沙皇拖延答复时（当时正呈送给他审核 1 月 4 日签订的条约），他觉得这里面有鬼，于是就暂不批准条约。以后看来很可能会遭到亚历山大拒绝一事是一种侮辱；但拿破仑有办法报复：奥地利给他另一个可供选择的未婚妻。

自从和平以来，梅特涅一直出任外交大臣。他跟施塔迪翁之间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法国的征服使他沦为非直属附庸，一个社交场上活跃的、放荡的和迷恋女性的贵族，并和施塔迪翁一样也有着仇恨法国和法国革命的双重动机。可是，他有更多的外交经验，尤其遇事沉着冷静，因为浪漫主义的热情对他从来是陌生的。这是一个属于十八世纪的人物；作为考尼茨的门生和女婿，他热衷于欧

洲均势老概念，而要恢复这种均势，那就得打倒拿破仑。他对开明专制也仍然信守不移，并且在尊重贵族的社会优势地位的条件下（其尊重较之约瑟夫二世犹有过之），他在原则上无疑地并不表示反对那些足以强化国家的改革。有人认为，他具有一种来自伯克的和以经验理性主义为特征的独创的政治哲学。梅特涅知道，根茨善于为任何论点找出根据。他既重用根茨，实际上便拥有一个理论武库；但是有人认为梅特涅的政策是出于公心，毫无私念，那是过分地美化了他。

梅特涅乐于行使权力，并决心保持这一权力，因而竭尽全力为哈布斯堡皇室效劳。虽然他看到这个政权的种种缺点和毛病，但他并不愿因坚持要纠正这些缺点和毛病而冒犯皇帝和贵族。除非根茨指望哈布斯堡皇朝所领导的欧洲十字军能使奥地利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得到好处，否则梅特涅对它不感兴趣；梅特涅毫不迟疑畏缩的现实主义正是他的主要长处。到1809年，他曾认为拿破仑已经完全腐败衰落了；这种错误的估计使得他在此后几年里行事非常谨慎小心。他只想保全奥地利，一直捱到可以不冒风险地参与瓜分赃物的那个时刻。由于法俄联盟岌岌可危，已经出现了一种有利的局面：必须促使它化盟为敌；如果能同战胜者言归于好，奥地利的安全会更有保证，而这个新的提尔西特甚至能够产生积极318 效果。因此，拿破仑欲娶新妇正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如果拿破仑娶了玛丽·路易丝公主，他就会同亚历山大失和，而必将把奥地利看作天然盟友。

梅特涅比任何人都更明白，哈布斯堡皇室的人想必把这种联姻视为玷污皇室。可是，向拿破仑建议提出求婚，并把求婚作为最后通牒向弗兰茨提出的话，就会使弗兰茨明白，应为国家利益而让步。11月29日，梅特涅在同亚历山大·德·拉博德（法国派到维也纳的协理专员）谈话时，似乎第一次作了暗示。奥地利驻巴黎的代

办弗洛雷骑士跟塞蒙维尔在一次官方晚宴上交谈时说得相当明确，使得塞蒙维尔急忙跑去向马雷报告。12月16日，拿破仑指令向奥国大使施瓦岑贝格进行试探，亚历山大·德·拉博德在月底回来时会见了这位大使。沒有理由认为拿破仑从这时起就已决定优先选择奥地利公主；然而他一定感到很得意。当他知道沙皇拖延答复的时候，对他来说，选择奥地利公主就是一个解决的办法。皇帝左右的人意见不一。反对革命的上流社会赞成与奥地利联姻，妄想维也纳宫廷会要求惩治那些投票赞成判处路易十六死刑的人，法国因此就会大步转向倒退。以富歇为首的参加过革命的人则持相反意见。博阿尔內家族和约瑟芬本人赞同玛丽·路易丝；波拿巴家族，首先是缪拉，赞同俄国女大公。1810年1月29日，拿破仑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让两派各抒己见，但他本人仍不表态。最后，2月5日，收到科兰古发来的一份急件说，沙皇再次要求宽限答复，他觉得这是一种侮辱，于是抢先采取对策；6日晚上，欧仁亲王就去向施瓦岑贝格正式提婚，并且附带一个条件——立即签署婚约：次日，婚约就这样签署妥当。这正是时候：因为4日，亚历山大通知科兰古表示拒绝；他看到自己被挫败而大为恼火，但在外交上则处于有利地位，因他可以说拿破仑要两面派。梅特涅的估计很准确；法俄之间的裂痕扩大了。

3月22日，玛丽·路易丝抵达斯特拉斯堡。拿破仑前往迎接，并且迫不及待地无视一切礼仪先占有了她，然后带她到圣克卢。4月2日在卢佛尔宫举行婚礼，接着在月底到北方旅行。1811年3月20日，玛丽·路易丝生下一个儿子（从1810年2月17日起，就已作出决定，封此子为罗马王），6月9日，罗马王的洗礼是帝国最后一次盛大庆典。

同奥地利联姻加速了拿破仑远离法国革命的演变。他叫曾充任法国王室子女家庭教师的孟德斯鸠夫人去当玛丽·路易丝的亲 319

身随从；菲埃韦成了查案官；拿破仑由于如此结亲而变成玛丽·安托瓦内特和路易十六的内侄女婿；在他的宫廷里，那些归附的前朝贵族在宫廷里占居优势。相反地，富歇于6月3日失宠下台，由萨瓦里接替他任警务大臣。这些前朝旧人看准了事情是不会到此为止的，有谣言盛传婚约中有一条秘密条款，规定放逐"弑君者"，并且要隆重地为路易十六恢复名誉，王党分子的小册子已在不断地替路易十六鸣冤叫屈；而购置国有产业者则接到一些恐吓信。政府机构也同样采取一些步骤向着旧制度蜕化：1810年，国家监狱和随意捕人下狱的活动正式恢复；通过设立出版管理局，重新公开实行检查制度。

另一方面，拿破仑由于建立了新家庭，使其亲族十分不满；他虽不断给他们各种高官厚禄，却不能使他们心满意足。他们的互相攻讦、倾轧和生活放荡扰乱了他的私生活，又损害了新皇朝的威信。玛丽·路易丝正值十八年华，再次焕发起他的青春，给了他欢乐，她显得温柔而娇媚，似乎也分享了这种欢乐。但对他的儿子，拿破仑一直保持严格的态度；他意识到，而且也讲过，只有罗马王也才华超众，才能保住帝国；然而作为一个男人，父亲的身份使他感到非常自豪，并不为儿子发愁。他如此强烈的家族观念，有人把它归因于拉丁民族的传统，而且更可能归因于科西嘉人的风俗习惯，这种观念很自然地使他从此以后更加关注自己的子孙后代。1810年1月30日，拿破仑在规定新皇后的产业、将来儿女们的领地，以及他们之间将来如何分配皇室年金时，他沒有一个字提到他的弟兄。也有人认为，同奥地利联姻对当时开始明显地出现的大帝国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大帝国似乎有从分封制，即人们称之为加罗林王朝式的国家，变成君权制的或罗马帝国式的国家的倾向：所有被拿破仑征服的国家都必须保留给罗马王，因而就要并入法国，无论如何，充其量也只能分给罗马王未来的弟

弟。意大利王国预先指定给他的弟弟就是这种情况，结果撤销了欧仁·博阿尔内的王储身份而改任法兰克福大公国达尔伯格的继承人。可是，人们还是夸大了婚姻对这一点的影响。长期以来，皇帝因皇亲国戚不听话和无能而大为恼火，他曾威胁过要归并他们的国家。当路易失掉他的王国，当缪拉、甚至约瑟夫和热罗姆估计到也会遭到同样命运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埋怨拿破仑把他们作为牺牲品奉献给他的新家族；实际上，这是分封制的帝国本身正在向统一的帝国的方向演变着。 320

同奥地利联姻的主要后果是：这次联姻为瓦格拉姆的胜利增添了最辉煌的战果，在拿破仑看来，它使大陆体系转危为安；个人的洋洋得意又一次地激发了他的权力欲。在接近奥地利时，他无意把它当作平等的国家对待，也不打算同他缔结一个梅特涅所希望的新的提尔西特条约。在巴黎，梅特涅曾表示过他对俄国在东方的进展感到不安，并暗示过双方可以协同加以制止；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承认法、奥利益是一致的，万一亚历山大企图向多瑙河南部推进的话，他答应出面干预，但不想签订什么条约。奥地利依旧仰承他的鼻息。他大概以为哈布斯堡皇室不会再冒犯它的女婿，所以仍把奥地利当作附庸看待。他在表示不与俄国争夺多瑙河两公国以尊重埃尔富特协议之后，在好几个月的时间内还抱着一种幻想：提尔西特条约安然无恙。

英国因此又成了唯一的敌国。梅特涅为避免承担反对英国的危险义务，提出了一个重建海上和平的设想。1810 年 3 月，他起草了一份惊人的备忘录，根茨在备忘录中居然很认真地极力向英国人表明，法国是不可战胜的，他们为切身利益最好是放弃大陆，包括西班牙在内。几乎在同一时间，富歇也在这方面进行活动；他派遣一个其父住在伦敦、名叫法冈的以前的亡命者去找当时在外交部任大臣的韦尔斯利侯爵。路易也认为这种全面的和解是保住

其王国的唯一方法；看来，英国似乎想防止法国并吞荷兰，因为荷兰对它来说仍是一个重要的商品销售市场，而且荷兰的银行家，尤其是拉布谢尔，都是忠于它的。1810年2月，拉布谢尔也会见过韦尔斯利。最后，还有乌弗拉尔被富歇所利用，富歇无疑地想起了321 他们一起搞投机勾当而一直在庇护他。这位金融家仍然不断同拉布谢尔进行交易，念念不忘墨西哥的银币；结果，他制定了一个政治计划：把查理四世送到墨西哥城；英国把西西里让予拿破仑，而拿破仑则放弃马耳他岛给英国，并帮助英国再去征服美国；乌弗拉尔从圣佩拉吉监狱中出来后便同拉布谢尔商议，拉布谢尔又让巴林知道这个秘密。韦尔斯利在同巴林和坎宁讨论了这个计划后，拒绝放弃西班牙和那不勒斯。就在这时，路易以为他哥哥知道这件事，所以，在他4月27日路过安特卫普时就和他谈起此事。乌弗拉尔被逮捕起来，同时也为撤换富歇找到了借口。于是，谈判便破裂了，皇帝也和英国一样不想做出让步。

在这一年期间，他忙于改善大陆封锁的状况；8月5日，颁布了著名的特里亚农敕令，10月18日，又颁布了枫丹白露敕令。为监督执行这两个敕令，他更加紧从事吞并，由此可以确实可靠地说，大陆封锁此刻重新燃起征服精神。1810年初，荷兰不得不让出西兰和直到来因河的南部诸省；7月2日，路易逃往波希米亚；9日，他的王国被吞并。12月13日的一项元老院决议案追认了这次行动。为了牢靠地封锁北海各港口和荷尔斯泰因的边界，拿破仑于1811年1月22日把位于利佩至特拉弗河一线以北的德意志各邦并入法国：包括汉撒各城市、贝格大公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的一部分、阿伦贝格公国和扎尔姆公国，以及奥耳登堡大公国。为彻底禁止瑞士人将走私品运到意大利，他强占了伐累，并对特辛州实行军事占领。

然而，伊比利亚半岛上始终在战斗。因此在瓦格拉姆战役之

后，拿破仑似在准备一次大规模的远征以歼灭英国军队或强迫它撤退回国；在此之后，要征服这个半岛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他确实派出了十四万人以上的援军，这支部队本来就不足以予敌人以重大打击，但是他还不能为部队提供必需的辎重物品，而最关紧要的是他未能御驾亲征。拿破仑由于专心处理皇朝家事和迷恋于新婚妻子，而让决定性的一年就这么过去了：到 1810 年底，他不可能再全力以赴地亲征西班牙，因为亚历山大的态度令人不安。追求个人的丰功伟绩和他的婚姻妨碍了他重新集结全部大军，并且在不得不把一部分重要兵力留在后面的情况下，开始对俄国的战争。 322

同奥地利联姻不是这场重大冲突的主要原因；然而，它加快了这场冲突的到来（尽管拿破仑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它引起了俄国人的嫉妒，他们看到奥地利人在拿破仑的宫廷受到优遇，尤其是因为它导致了波兰谈判的失败。皇帝在向施瓦岑贝格正式提婚的同时，否决了科兰古签署的条约。他另起草一个条约，寄出时还附有他的批准书，指明他决不帮助任何人重建波兰王国，并同意在正式文件中取消波兰名称，而俄国和萨克森也要保证不去取得在大公国之外的任何波兰省份，同时必须保守条约的秘密。这并不符合亚历山大的意愿：7 月 13 日，涅谢尔罗杰拒绝对 1 月协议作任何变动。从此拿破仑中断了谈判。此外，他还拒绝批准给俄国的一笔贷款。1810 年夏，他还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可是他也看到，如果亚历山大跟他疏远，就可能会同英国言归于好：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不得不诉诸武力。

瑞典的事变同时也激怒了沙皇。1810 年 1 月 6 日，查理十三已经同法国签订了和约，并参加大陆封锁。实际上，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严格遵守封锁法令，尤其当索马里兹的舰队控制波罗的海的时候。不久，皇帝大发雷霆，他威胁说要重新占领波美拉尼亚。瑞典答应了他的一切要求，特别是因为国内刚发生一场王位继承

的危机。查理十三已指定为继承人的奥古斯滕堡的查理-奥古斯特，即丹麦王弗里德里希六世的内兄弟，于1810年5月28日去世；有人指责说，这是1809年革命的敌人毒死的，而在其出殡的那天，费尔森在一场暴动中被杀。政府希望由查理-奥古斯特的兄弟接替；可是，拿破仑沒有明确表态，一个起源不明的阴谋就乘机利用了这种暧昧态度。在斯德哥尔摩有一派倾向法国的人，他们倾向于由拿破仑的一位亲属或部将来代替，指望因此赢得拿破仑的保护以对抗俄国；6月底，默尔纳少尉代表这一派人来试探贝尔纳多特，并且得到曾经奉命来巴黎参加拿破仑结婚大典的符雷德伯爵的支持。贝尔纳多特又将此事告知皇帝，他犹豫不决。显而易见，选择一个法国元帅，亚历山大是很难接受的，因为假如战争一旦爆发，瑞典将会给予法国大力支援；其实，贝尔纳多特不是一个可靠的人，欧仁还更可取些；皇帝相信，想要收复芬兰的瑞典亲法派必能迫使贝尔纳多特忠于法国。所以皇帝不反对他接受，但由于不愿得罪沙皇而沒有正式宣布同意。在厄勒布鲁召开的瑞典议会看来对奥古斯滕堡有利，而这时一个叫富尼埃的人出场了，他曾任法国驻哥德堡领事、一个破产了的商人。尙帕尼同意派他去作观察员，但事实上他是贝尔纳多特的代理人；他冒充皇帝的正式代表，建议挑选这位元帅。国王的一位亲信，一个法国亡命者絮尔曼伯爵带来了国王同意的口信，8月21日，议会跟着也批准了。如此迅速得到的解决使拿破仑大出意外，他应否同意，仍在犹豫不决，然而，要使英国蒙受耻辱的念头占了上风。此外，瑞典的亲法政策看来很坚定，11月17日，瑞典对英宣战。但问题还有不利的另一面，亚历山大很恼怒。可是，拿破仑还不知道最坏的情况：贝尔纳多特毫不迟延地极力使沙皇放心，他向路过斯德哥尔摩的车尔尼舍夫表示，他绝不是皇帝的人，也从不打算收复芬兰。这样，亚历山大很快就可以指望这位新国王的背叛会向他保证，瑞典即

使不能与俄国合作，至少也保持中立。

虽然拿破仑未曾觉察到这种情况，但俄国的备战工作却在进行着。沙皇首先竭力劝诱恰尔托雷斯基出些主意；而后到 1810 年 4 月，他决定把话说清楚：战争将于九个月内开始，俄国能否得到华沙大公国的援助，并迅速将俄军一直开到奥德河上，从而带动普鲁士人参战？恰尔托雷斯基表示很冷淡，因为拿破仑是如此使他敬畏。虽然这样，亚历山大还是继续进行准备。他任命阿洛佩尤斯和波佐·迪·博尔戈为驻那不勒斯和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并要他们取道维也纳赴任；他们发现维也纳上流社会在定期举行的社交聚会中对他们的主上亚历山大抱有好感，对拉祖莫夫斯 324 基和巴格拉吉昂郡主极为倾倒。他们设法当面向梅特涅的父亲（梅特涅去巴黎期间的代理外交大臣）说，奥地利可以夺取塞尔维亚，甚至更多的地方，以解决俄、奥两国在东方的分歧。当梅特涅回到维也纳时，他中止了谈判。在这一年的最后几个月里，俄国军队却悄悄向西移动；既然少了奥地利的帮助，亚历山大似乎就把某种希望寄托在波兰身上；或许恰尔托雷斯基已下定了决心。

这年年底，由于埃尔富特协议遭到双方破坏，法俄联盟正式瓦解。象所有的纯粹农业国一样，俄国吃了封锁的苦头，但得不到任何补偿；亚历山大细心听取贵族们的怨言，并且看出财政由于商业不振而处于困境；既然成了拿破仑的敌人，他就倾向于靠拢英国；虽然战争是决定要打了，但他却挑动敌人先发动进攻以便显示自己有理。他早已谨慎地不实行特里亚农和枫丹白露两敕令的措施。1810 年 12 月 31 日，他更进了一步：对来自帝国及其盟国经陆路输入的商品提高关税，而对中立国船舶的海上贸易则给予优惠，同时对被拿破仑正式禁止的对英贸易也给予优惠。与此同时，拿破仑向奥耳登堡大公（亚历山大的妹夫）建议以图林根换取奥耳

登堡大公国，奥耳登堡大公加以拒绝，他就吞并了这个大公国，尽管在埃尔富特曾保证其领土完整。从这时起，一场新的战争已无可避免。

第三章　英国的成就 325
（1807—1811 年）

正当拿破仑巩固其大陆霸权之时，英国正顽强地、幷几乎是静悄悄地努力使自己最终成为海洋的主人。直至 1808 年，似乎还未取得决定性的成果：一些舰队仍然驶离法国港口，幷不是所有的法国殖民地都已受制于英国。西班牙起义在海上和大陆上都给了英国的政策以决定性的助力：它终于把海洋交给了英国，同时把英国重新引进大陆，以便直接援助反法同盟各国，而只有各盟国才能最终打败征服者。

一、统治海洋及其后果

特拉发加海战之后，英国的舰队又恢复了对敌人港口的封锁；一些巡逻的船舰密切监视着敌港，在外海的舰队时刻准备着追击 326 可能逃跑的船舶。这种单调的、成效不显著的监视也难免要冒海上的风险：从 1806 年到 1815 年，尽管沒有一条船被敌人拿捕或击沉，英国人却损失了十八艘军舰。护航队也需要许多军舰。因此他们不停地造船；海军预算 1803 年还沒有达到九百万英镑，到了 1811 年就超过了二千万英镑；到 1814 年，他们就拥有二百四十艘军舰，外加三百一十七艘快速帆舰和六百一十一艘不是那么重要的小艇。凡是可能加强法国人力量的各国军舰都逐渐地落到英国人手里，其中有荷兰的、丹麦的、那不勒斯的、葡萄牙的船舰。1808 年和 1809 年，西班牙人和土耳其人倒向英国人这边；继西尼

亚文的舰队之后，被封锁在喀琅施塔得的俄国船舶也于1812年被带到了英国。

拿破仑确实也在不停地造船：从1800年到1814年建造了八十三艘军舰和六十五艘快速帆舰；1814这一年他拥有一百零三艘军舰和五十四艘快速帆舰；但是，他只有成为整个大陆霸主后才能恢复均势，并且要付出多年的努力的代价。然而，直到1809年他并没有放弃海战，不过他把海战限于袭击敌人的交通线或是进攻他们的殖民地。1805年莱伊赛格和维约梅，1806年勒迪克和索莱伊，1808年阿勒芒和冈托姆，1809年维约梅、朱里安、特鲁德和博杜安都成功地冲过了封锁线。但他们很快就被追赶上，几乎都遭到了严重损失或彻底溃败。英国人在圣多明各摧毁了莱伊赛格的舰队；维约梅的六艘军舰损失了两艘；1806年，利努瓦从法兰西岛回来时，在加纳利群岛损失惨重；1809年，维约梅和朱里安在出发到安的列斯群岛之前，在埃克斯岛的港外停泊处汇合了，甘比尔就派出纵火船攻击他们；他们的船舰搁浅了，如果甘比尔支援果敢的科克伦的话，将没有一条船能逃脱。特鲁德的舰队终于到达了诸圣群岛，但是，在那里被击溃了。只有年老力衰的科林伍德——1809年死于海上——才让阿勒芒和冈托姆过去，把给养送到科学岛。
327 西班牙的起义结束了这些突破封锁的企图；西班牙的政务会强夺了停泊在加的斯和费罗尔港口的法国船舰；以前，英国人由于查理四世同法国督政府的联盟而被迫放弃地中海，现在英国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些港口建立了一些宝贵的据点。更重要的后果是在远洋。西班牙殖民地不再给法国人做基地，而向他们的敌人开放了；海战、私掠船和殖民地斗争的情况都因此发生了转变。

从1806年到1815年，法国和他的盟国损失了船舰一百二十四艘，快速帆舰一百五十七艘，小艇二百八十八艘。1806年英国有三万六千法国俘虏，1815年有十二万：其中大部分俘虏是海军。

海战结束时，法国人剩下的仅是些私掠船。战争也给英国人带来些损失：损失最多的是在 1810 年共六百一十九艘；从 1803 年到 1814 年损失共达五千二百四十四艘，占进出港口舰艇的百分之二点五。加上海上的损失使他们的商船减少了百分之五。尽管造船业从 1803 年的一千四百零二艘共十三万五千吨下降为 1809 年的五百九十六艘共六万一千吨，但这还是比填补损失的要多，1810 年他们的商船队从 1805 年的二万二千艘发展到二万四千艘。这些数字清楚地表明：私掠船如果没有舰队的支援就不可能严重打击有护航舰的敌人运输。海上安全的程度可以用保险费来证实：保险费多少因地而异，差别很大，对在波罗的海航行总是提得很高；但是对于远洋航行则迅速减少，平均从 1806 年的百分之十二下降到 1810 年的百分之六，而在法国革命时期曾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曾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英国人成为海上霸主，消灭了法国及其盟国的商船队。1801 年，法国还配备了一千五百艘远洋船；1810 年只剩下三百四十三艘；到 1812 年就只有一百七十九艘了。捕渔业减少到几乎没有。所以海上优势确保了英国控制海上贸易，并大大扩大了它的贸易，这就使它能顶住大陆封锁、不断地增加开支，并资助反法同盟各国。

英国的注意力主要正是放在使商业充分利用它的舰队的胜利；与人们所能想象的相反，征服殖民地只是第二位的事。从重商 328 主义的观点看来，主要的是要禁止中立国与敌方殖民地通商，而把这项贸易保留给自己；此外，直到特拉发加海战以前，英国政府必须把全部力量集中在欧洲水域。英国在 1803 年夺取了圣卢西亚岛、多巴哥和荷属圭亚那的一部分之后，就不得不等到 1806 年才能夺取苏里南；1807 年又依次夺取了库腊索岛、丹属安的列斯群岛中的圣托马斯岛和圣克鲁斯岛；1808 年夺取了马里加朗特岛和德西拉德岛。英国人也对通向印度的非洲沿岸的海港感兴趣。

1806 年 1 月，波帕姆、贝尔德和贝雷斯福德在开普登陆，迫使荷兰守将然森斯投降；1807 年，英军占领了马德拉群岛，而后又占领了其他葡属殖民地；1808 年，英国夺取了戈雷岛，1809 年又夺取了圣路易。[1] 在美洲，西班牙起义改变了局面。直到那时，英国人意识到必须小心谨慎，因为拉丁美洲海岸可能成为敌人远征的基地。西班牙起义后，局势完全改变了。1809 年，圭亚那和马提尼克岛被英国征服；1810 年，瓜德罗普岛、圣马丁岛、圣尤斯特岛和萨巴岛也被征服了。

在印度洋上，西班牙的转变也使驻扎在法兰西岛的德凯恩失去了西属菲律宾的支援；但是，印度洋上胜负之局主要取决于历任印度总督的政策。

在韦尔斯利离开印度之后，他的继任人康华里、巴洛和明托采取了一种与他完全不同的态度，与各土邦王公们进行和解以便恢复和平。辛地亚首先进行谈判，英国人把拉吉普他拿交还给了他；霍尔卡随后收回了绝大部分国土；兰吉特·辛格这个旁遮普锡克人的统治者暂时又占有了旁遮普，他最后站到了英国人一边，于1809年签定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把边界固定在萨特累季河并把斋普尔给了他。这一边平静后，辛格就夺取了木尔坦、白沙瓦和克什米尔，同时与重新占领了俾路支斯坦和信德的阿富汗结成联盟。这些和解安排需要一定时间，并为将来留下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此外，放任不管的印度中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成群结伙的散兵游勇和强盗，即被称为“平达利斯”的，在那里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劫掠。传教事业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伦敦布道会于 1804 年在印度开始工作；浸礼会于 1807 年进入缅甸，1812 年又进入锡兰；1813 年，印度有了它的第一个主教；但是过激的宗教狂热对 1807

① 戈雷岛在今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港口外海上；圣路易港在达喀尔以北。——译者

329

年发生于维洛尔的印度士兵起义起了一定的作用。放弃沃伦·哈斯丁斯和韦尔斯利的侵略政策至少有利于明托勋爵能在印度以外推行强有力的政策。

在马斯克林群岛，德凯恩能够贯彻拿破仑的意图：他取消了各殖民地的代表大会，恢复了中央集权，并以国民自卫军的名义把原有的民兵队重新组织起来。到殖民地来的移民丧失了在大革命时期实际上享有的自治权，因此很感惋惜，但他们屈服了，因为贩卖奴隶又合法化了。为了供应奴隶市场，德凯恩与马达加斯加建立了关系，并在塔马塔夫设立了一个贩卖奴隶的商站。但他从来没有放弃对印度的念头；1804 年为他要求增援以支持马拉塔人；提尔西特和约之后，他建议在海上进行牵制攻击以便支持计划中的法俄联合远征；1808 年 1 月，他的兄弟前来向皇帝请示此事，皇帝答应派出一支舰队和一万五千人。尽管英国人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他们却痛恨这个“海盗巢穴”，因为絮尔古夫[①]使得他们日子不好过。1810 年，明托勋爵决定结束这种状况；7 月份，他夺下了波拿巴岛(原称波旁岛、留尼汪岛)。8 月，迪佩雷和布维在路易港的锚地摧毁了英国四艘快速帆舰的舰队；但是在 11 月底，英国一万六千人在法兰西岛的北部登陆，只有一千八百四十六人的德凯恩被击败，并于 12月 3 日投降了。翌年，英国人占领了塔马塔夫。塞舌尔群岛从一开始就同英国人签订了中立协定。明托勋爵便转向荷属印度：爪哇和摩鹿加群岛落到了他手里。

法国和荷兰的殖民帝国同西班牙殖民帝国相比是很小的。1804 年西班牙对英宣战以后，温德姆和格伦维尔就支持波帕姆和米兰达的计划。米兰达曾向波拿巴表示愿为他效劳，但被波拿巴于 1801 年驱逐出境，因为波拿巴当时正在与西班牙进行谈判，而

① 罗贝尔·絮尔古夫(1773—1827年)是拿破仑战争期间有名的私掠船主，他给英国海运相当大的打击；拿破仑封他为男爵。——译者

且得知米兰达是被英国收买的。米兰达回到了伦敦；他取得了波帕姆的同意，在 1804 年 10 月建议同时进攻加拉加斯、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瓦尔帕来索；格伦维尔甚至想攻取墨西哥，一方面从墨西哥海湾，另一方面从太平洋登陆，准备一支远征军从印度出发，中途夺取马尼拉，最后在阿卡普尔科登陆。当时，皮特正忙于策动第三次反法同盟，他只决定派米兰达到美国去进攻西属佛罗里达；杰330 佛逊不同意，而只准他组织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去进攻委内瑞拉，这次远征在 1806 年 2 月失败了。在安的列斯群岛巡航的科克伦提供了一支新舰队，它于 7 月份从格林纳达出发，但也没有成功。1807 年，米兰达又回到了英国。

由于波帕姆的倡议，事情变得更加严重了：他自作主张，从开普带走贝雷斯福德的军队，并于 1806 年 6 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登陆。这里的西班牙总督被打败，城市失守。一个叫做雅克·德·利尼埃的法国亡命者负责附近地区的防务，他赶到蒙得维的亚，带回一支小部队，迫使贝雷斯福德于 8 月 12 日投降。但是，英国政府还企图保存这片征服的土地，而且奥克芒蒂的远征队正在途中；当远征队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在利尼埃手中时，便于 1807 年 2 月 3 日占领了蒙得维的亚，原先要去瓦尔帕来索的克劳弗德也到了那里，随后，怀特洛克也来了，并担任起指挥工作。7 月 5 日，怀特洛克攻进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但在一次巷战中被包围了，第二天他签订了一项撤退协定。作为西班牙对利尼埃的报答，封他为伯爵和西班牙大公，并成了总督。

西班牙事件又一次为英国人提供了报复的机会。1808 年 5 月，拿破仑想利用利尼埃使约瑟夫得到承认——利尼埃曾经把他当作查理四世的盟友那样写信给他——于是，拿破仑派萨塞内侯爵去见利尼埃，同时派了另一个贵族去加拉加斯。结局却是很不幸的。在蒙得维的亚，萨塞内侯爵找到一个叫做艾利奥的西班牙

人，此人嫉妒利尼埃，一听到消息马上就去警告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同胞们；他们在萨塞内到达时迫使利尼埃把他送回蒙得维的亚，艾利奥在那里把他监禁起来。在加拉加斯，一次暴动迫使总督驱逐法国军舰，法国军舰便被英国人捕获了。人们处处宣布费迪南七世为国王，西属美洲便脱离了拿破仑的控制。可是，西班牙也有丧失美洲殖民地的危险。土生白人知道西班牙软弱无能，他们把被囚的费迪南只看作一个名义上的君主，便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来确保自治，要是不能争取到独立的话。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愿意支持利尼埃去反对企图颠覆他的西班牙人；但是，在加拉加斯，博利瓦尔和他的朋友们于 1808 年 7 月夺取了政权；翌年，他们又在基多、查尔加斯和拉巴斯夺取了政权。但是夺得过早了。塞维尔的"政务会"派去了新的官员，这些官员一般地说可以毫无困难地行使权力。昂帕朗在加拉加斯恢复了旧制度，西斯内罗斯取代了利尼埃。利马的西班牙部队攻下了基多以及上秘鲁的各城市。成 331 为西班牙盟国的英国人不敢支持起义的土生白人；不过，他们从这些事件中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利益。1807 年，波帕姆已经通告英国商人，请他们把所能买到的货物运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跟着就发生了一次异乎寻常的抢购热潮。而后，土生白人开始自由地与他们国王的保护者做买卖。1809 年 11 月 6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府正式允许英国人在西属殖民地经营商业；1810 年，那里的海关收入达二百五十多万皮亚斯特，而战前还不到一百万皮亚斯特。巴西也向英国人开放了港口。正当欧洲威胁着要拒绝英国的出口货时，能取得这样的市场，在英国激发了热情。但是，土生白人的新的起义引起了内战，很快就成了英国贸易进展的障碍。

在欧洲，英国的制海权所取得的商业利益也并不稍少。在进一步加紧对帝国封锁的同时，英国占领的各据点仍足以促进走私的发展并突破大陆封锁。在北海，赫尔果兰岛成了英国的一个仓

库;在法国沿岸,很多岛屿起着类似的作用:如圣·马尔库岛、肖塞群岛、莫莱内岛、格莱楠群岛、乌阿岛和瓦伊迪岛、拉西奥塔对面的绿岛、耶尔群岛;英国人把一些系船浮标投在基伯隆和杜瓦尔奈内的海湾里。另一方面,英国的舰队仍然控制着松德海峡和波罗的海。而在地中海及其东部沿岸诸国,英国的进展尤其显著,以致拿破仑为了把他的势力一直推进到波斯而结盟的一系列盟国都倒转过来反对他自己。英国占据着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它关闭了西地中海;自 1798 年以来,它就控制了西西里,1806 年,占领了这个岛的东北角;1808 年 3 月 30 日的同盟条约同意给费迪南四世一笔三十万英镑的补助金,后来又增加到四十万英镑,并明确地指定用于军备,这使得伦敦政府可以要求清查帐目,不久并取得对那不勒斯军队的监督权。尽管这样,英国政府还总是对那不勒斯宫廷的意图,主要是对王后玛丽亚-卡罗莉娜的意图感到不放心。监护人的权力似乎很大,补助金却很微薄。1810 年,国王要征收新税的建议没有在等级会议中得到表决通过,他就使用自己的权力加以实行,在 1811 年 7 月 19 日逮捕和流放了五个最固执的男爵,从而粉碎了等级会议的抗拒。

332

然而,24 日,同时被授予外交权和总指挥权的本廷克勋爵登陆了。他是马德拉斯前总督,是一个专横粗暴的殖民主义分子;同时他又是一个真诚的辉格党人,他认为:把英国宪法制度移入外国似乎是一项为了人类幸福而应尽的良心上的责任。此外,他还支持宫廷的反对党,通过这个办法来使那不勒斯宫廷头脑清醒。由于宫廷没有听从他,他便于 8 月 27 日离开那里,到伦敦去要求授予他全权,并暂停支付补助金。回来后,他把军队都集中在巴勒莫周围,提出由他指挥西西里军队、召回那些被放逐的人士和辞退大臣等要求。国王为了保全面子,于 1812 年 1 月 14 日把他的权力至少在名义上交给他作为副帅的儿子;以后,本廷克迫使王后离开

巴勒莫；3月，王太子不得不把政府交给那些被放逐的人士，本廷克要他们召开议会以批准一部合他心意的宪法。在这个时候，由于西班牙起义而把巴利阿里群岛交出给英国，致使地中海西部几乎变成了英国的一个内湖。“蛮邦人”①尽管沒有放弃海盗活动，却也顺应形势，摩洛哥的苏丹也与海上霸主保持友好关系。从马耳他和从西西里出发，英国可以很容易地进入亚得里亚海；1809年，英国战舰占据了除科孚岛之外的爱奥尼亚群岛；随后，它们进攻达尔马提亚群岛并占领了其中好几个岛屿；1811年3月，它们还在利萨岛取得了一次海战的胜利。对亚得里亚海的统治保证了它们在阿尔巴尼亚和埃皮鲁斯的优势：阿里-泰布兰又一次改换门庭，投靠英国。

在东地中海，英国人于1807年同时从马耳他和西西里出发，向君士坦丁堡和埃及采取了行动。但沒有成功；然而，土耳其的海岸却已在英国人控制之下，不久，被法俄联盟激怒并感到不安的苏丹便同英国和解，而答应英国对外国军舰重新关闭两海峡。英国外交大臣的堂兄弟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于1809年在君士坦丁堡开始了他显赫的生涯，以他为首的英国外交官从此就在土耳其人和俄国人之间进行调解。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市场热衷于与英国人做生意，使英国贸易很快就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波斯同样地也改变了立场。尽管加尔达内作出努力，战争还是在亚美尼亚重新爆发了。俄国人在纳希契万战役取得胜利后，包围了埃里温。英国人与土耳其人缔结和约后，从印度赶来，进入波斯湾。1808年5月，马尔科姆在邦代-阿巴斯港登陆。波斯王既沒有从法国那里得到什么帮助，就决定接见马尔科姆的使者哈福德·琼斯爵士；因此加尔达内于1809年2月1日离开德黑兰。3月12日，英、波

333

① “蛮邦人”，欧洲人污蔑北非各族人民的称呼，包括埃及以西直到摩洛哥沿海居民。——译者

签订了一个条约，使这个国家不再对法国人开放；1814 年又签订了一个条约保证波斯的领土完整以防俄国侵犯。1809 年，一个英国使团又从阿富汗的埃米尔得到保证，他不帮助任何反对印度的冒险行动。

埃及、叙利亚和巴格达的帕夏们的独立确实是不断地引起一些顾虑。英国人也就与所有这些人的敌人瓦哈比教派建立了联系。1804 年，瓦哈比教派首领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赛欧德夺取了麦地那，威胁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1808 年和 1811 年两度进攻巴格达的帕夏。巴格达的帕夏在北面受到苏莱曼尼亚的帕夏以及库尔德人的攻击，他看到英国人正在巴士拉登陆，便也成了英国人的朋友。赛欧德还帮助英国人打击马斯喀特的伊玛目，并在阿拉伯地区到处对法国人进行骚扰。至于穆罕默德-阿里，他长期忙于降服在 1808 年重新拿起武器的最后一批马穆鲁克；1811 年 3 月 1 日，他用奸计达到了目的：他邀请他们参加一个宴会，把他们杀害了。而后，他开始征服瓦哈比教派；在 1811 年一次失败的进攻之后，他的儿子图松于 1812 年重新征服了瓦哈比教派占据的圣地①。翌年，穆罕默德亲自作战，却沒有成功；但是，1814 年图松占领了塔伊夫；1815 年赛欧德死后，穆罕默德能够攻下内志首府拉斯，并签订了和约。这些艰巨的工作使他不能向英国人寻衅。这样，整个东方都摆脱了拿破仑的势力，从直布罗陀到印度，从海上到陆上，英国人都顺利地孤立了拿破仑帝国。

二、威灵顿的战役

因此，拿破仑帝国就象是一个孤岛，它的居民不能从那里出去，而它的敌人却在周围，在整个地球上自由地行动。但是，只要法

334

① 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和麦地那。——译者

国军队沒有被摧毁，帝国也是一个既不能用饥饿逼降，也不能用猛袭攻破的堡垒。英国舰队只能把一些军队送到适当的地点登陆去援助大陆各盟国。这种威胁尽管是有用的，因为它迫使拿破仑守卫所有的海岸，并引起当地居民的不安，但是还不够。英国的盟国很明白这一点，它们尽管拿英国的钱，却并不因此就感到满意：只要英国的舰队不把英国兵送来，他们就谴责它控制海洋只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英国的大部分大臣和绝大多数公民都反对在大陆上作战，这首先是由于1793年和1799年的经验①以及可能登陆英国的威胁所大大加强了的岛民情绪，但也由于人力的不足。虽然说英国人是自愿为保卫祖国而当兵的，但也只能用奖金在穷人中招募军队，尽管如此，也还找不到所需要的足够的兵源。海外的领土在不断地扩展，英国不可能把所有的军队都从本国调出，更不用说正在受着军事管制的爱尔兰。因此，可以动用的士兵很少，人们就更不愿意让一支远征军去冒险，因为他们知道要费好大的劲才能重建一支远征军。

还应当考虑到开支和货币的困难：英国军队经常要偿付从驻 335 在国那里征用的东西的款子，甚至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甚至1814年在法国都是这样。因此必须把硬币送给军队，或是用汇票换取硬币。最后，在议会里，对大陆采取任何行动都给反对党提供了煽动群众的机会；他们公然声称，拿破仑在陆地上是不可战胜的：这是主张和平的一种转弯抹角的论调。由于这些理由，福克斯及其继承人除了给波美拉尼亚的瑞典人派遣援军以外，决不在大陆上进行任何干涉，这种态度在不小的程度上造成他们疏远俄国。坎宁和卡斯尔雷主张一种完全相反的政策；但是提尔西特和约瓦解了反法同盟，坎宁只是在哥本哈根才能显示他的才能。

在这个问题上，西班牙起义也起了主要作用。坎宁毫不犹豫

① 即第一次和第二次反法同盟的经验。——译者

地答应支持各地"政务会";他并不限于给"政务会"送钱送物资，他还使英国政府同意收复葡萄牙，在此之前英国是一直拒绝给葡萄牙任何军事援助的，并同意派贝尔德去加利西亚。对他很有利的事情是一开始辉格党人就热烈支持西班牙起义。但是在皇帝采取军事行动后，他们却唱另外一种调子了。反对的呼声又起来了，他们批评辛特拉协定并强调葡萄牙是不可能保卫的。这便是穆尔的意见，以致政府不知是否必须召回留在里斯本的克拉多克和一万士兵，或是再派遣从加利西亚仓惶撤回的军队去葡萄牙。这一次是卡斯尔雷作出了决定。他和阿瑟·韦尔斯利商量后就于1809年4月2日派他去葡萄牙，因为韦尔斯利保证只要带三万人就能保住葡萄牙。但奥地利在这个时候参加了战争；卡斯尔雷是皮特的好学生，他就乘此机会以帮助奥地利为借口，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荷兰，要立即派遣一支远征军到那里去，结果英国在1805年到1807年一直没有采取行动之后，现在却同时干预两处，以致派往葡萄牙的援军只有二万六千人。另一方面，在1809年春，如果英国把所有的兵力都派到德意志沿岸去，它也许能够给敌人以决定性的一击。但瓦耳赫伦岛的远征却失败了，从此，英国在大陆的行动一直到最后仍只限于伊比利亚半岛。(10)

336 尽管如此，英国在政策上还是犹豫不决，辩论不休。1809年，波特兰内阁解体了。坎宁和卡斯尔雷由于出身和性格不同，很难合作共事；坎宁很想成为政府首脑，既想指挥战事，也想领导外交；四月，他要求他的同僚在他的对手与他之间进行选择。他们想等到战争结束时才作出决定；但在远征瓦耳赫伦岛失败后，危机暴发了。坎宁提出了辞职，卡斯尔雷于9月21日在决斗中使他受了伤。随后，波特兰去世了。留在财政部的帕西瓦尔重组内阁，任命前印度总督理查德·韦尔斯利为外交大臣，韦尔斯利竭力加强他兄弟的军队。但这个政府仍然处于很虚弱的地位。奥地利的失败

以及拿破仑的婚姻在舆论中引起了疑虑；格伦维尔、格雷和庞森比要求放弃西班牙，对韦尔斯利将军进行了批评并对他的成就提出异议。政府不得不对西兰远征[1]进行调查。同时，王室也因查明约克公爵的情妇卖官鬻爵这件丑闻受牵连而名誉扫地。更糟糕的是国王又发疯了。而威尔士亲王因为公开控告不伦瑞克的卡罗莉娜不贞而同她发生争吵，所以大失人望，尽管如此，仍被任命为摄政王[2]，条件与1788年相同，摄政到1812年2月1日为止。由于他一向与辉格党人关系密切，人们以为现在他掌握了全部政权，必将召他们组阁。最后，于1811年，发生了一次震撼全国的可怕的经济危机，金融混乱、风潮迭起。帕西瓦尔政府对此时已晋封为威灵顿勋爵的韦尔斯利表示保留态度，这并非是意料之外的。政府明白地告诉他：如果他打了大败仗就必须撤退。1810年当马塞纳发起攻势时，政府警告威灵顿：他撤退得过早总比撤退得过迟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谅解。政府派遣增援部队十分吝啬，并在财政方面使这位将军陷于非常令人烦恼的困境。

马塞纳的退却使政府对将军恢复了信心：增援大大地加强了，使他能够发动1812年那次胜利的战役。然而，在三年的期间里威灵顿只能依靠自己，一面进行战争，一面要鼓舞起政府的斗志。这说明了何以直到1812年他的战略总是非常审慎的，而他对改组葡萄牙军队又何以是那么认真。他最杰出的优点之一就是不管怎样困难都能坚持下去，并把战争纳入他非常了解的英国总政策的范畴。他指出：就西班牙军事行动本身来说，它就具有重大意义，并使英国的制海权产生实效。有了他，还有坎宁和卡斯尔雷，英国才能揪住那个巨人搏斗。 337

① 西兰远征即远征瓦耳赫伦岛，该岛属西兰省，省会即设于该岛上。——译者

② 王太子在其父乔治三世不能理事时于1810年为摄政王，1820年乔治三世死，继位称乔治四世。——译者

在1809年，阿瑟·韦尔斯利同拿破仑一样是四十岁。在他哥哥的领导之下，从1798年到1803年，他曾长时期在印度服役；而后才开始在欧洲的事业。他很有节制，身体非常强健，他象拿破仑一样，可以长时间工作而很少睡眠。他的头脑清晰而精确，实事求是并富有组织能力；他的意志顽强而冷静，但又不排除决断果敢。他年青时具有独立的性格，当了将领就极其独断专行，他不容许他的部下有任何主动性，其实他的部下也就是些庸碌之辈。在他脸上表现最为强烈的是贵族式的傲慢，这种傲慢由于在印度"土人"中间的长期生活而更突出了。他目中无人，以傲慢态度对待军官；他无比地蔑视平民以及他统率的那些来自平民的士兵，称他们为"地上的唾沫"，"一群流氓"，"一群混吃喝而来的只能用鞭子管教的人"。至少可以说，种族优越感把他跟自己的社会阶层和国家密切结合在一起，在他看来，这个社会阶层就是国家的合法主人；他一心只想为他的社会阶层和国家效劳；他是个铁石心肠的人，缺乏想象力，也沒有情感，因此他是沒有浪漫色彩的个人主义，而这种浪漫色彩的个人主义毁了拿破仑，但也使拿破仑的天才增添了永恒的魅力。

作为军人来说，韦尔斯利的思想和性格完全适宜统率一支兵员不多的职业军队，去打一些进展缓慢而单调的战役，有时穿插着防御战，其主要目标是要消耗敌人。从技术观点来看，他基本上是个步兵司令；他很少使用骑兵，极少去追击敌人；他的炮兵部队不论是步行的或是骑马的都很出色，但为数不多；他沒有进行围攻的装备，沒有工兵，也沒有工程师；他的步兵不得不应付一切，而在攻击堡垒时遭到重大损失。比起皇帝的所有对手来，他具有一个很突出的长处，即事先已经就对付法国人所应采取的战术问题进行过深思熟虑；他保持着线式队形以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他把他的队伍隐蔽在树篱、废墟、有锯形防壁的房子后面或者是斜坡的后

338

面，以对付法国的射击手；此外，他也不忽视使用分散的、独立作战的火力：每个营都分出一个连走在前面；从1809年起，他使用了一个"来福枪"团和为此而建立起来的一些由外国人组成的军团。但是他也考虑到，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敌人倾向于缩短射击战，而使他们的营以纵队形式越来越迅速地向前推进，在迈达一战中，他们甚至还沒有射击就冲锋了。因此，韦尔斯利把他的士兵掩蔽起来，他料想到法军在不能正确估计火力效果时，或者对射手的推进迟缓感到不耐烦时，他们更会急于用刺刀冲锋；在这种情况下，稀疏散开的队形能使一支军队大体上保持完整而又能沉着应战，充分发挥其火力。英国步兵是职业士兵，都认眞地受过齐射的训练；他们的枪所发射的子弹比法国人的要重。此外，韦尔斯利采用了两排而不是三排的线形：八百人的一个营一次能齐射八百颗子弹；法国人一个营由单个的连队列成纵队，每行四十人，前后共十八行，或是由成对的连队列成纵队，每行八十人，前后共九行，所以前两行只能以八十或一百六十发子弹回击；这种队形如果要展开的话，在两军接近时，兵员就会遭到很大损失，队伍通常就会溃散。无论如何，进攻就会停止。这种战术一旦证明有效，这位英国将军就会象在阿拉皮莱斯战役① 中那样，一有机会就毫不迟疑地以同样的队形采取攻势，以线式队形齐步前进，并有秩序地停下来进行射击。他的战术在防御性的战斗中更显得出色，这确实也与他历次战役的一般条件相适应；这种战术必须以职业军队为前提，象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队那样机械地以铁的纪律和体罚进行训练。拿破仑的部将一点也沒有从韦尔斯利给他们的打击中吸取教训，拿破仑沒有亲自来看过这种战术，因此，只有等到在滑铁卢战场上才能认识其作用。

---

① 阿拉皮莱斯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省，1812年7月22日威灵顿在此地战败法将马尔蒙。见下文104页。——译者

如果韦尔斯利不能控制葡萄牙的话，即使拿出他全部的才能，339 大概也不可能在半岛上站住脚。他在那里取得了一个基地，英国舰队可以从那里自由取得给养，还在那里重新组织起一支民族军队，为他提供大量兵员。葡萄牙摄政府从来不能同英国平起平坐；1810 年，它吸收查理・斯图尔特参加政府工作，此人就成了政府决策人。然而，韦尔斯利不断地抱怨葡萄牙贵族重用亲戚、玩忽职守，和坚持保留他们的免税特权。他要求由他支配英国给的补助金，先是一百五十万后来是二百万英镑，用来供养军队。伦敦为慎重对待葡萄牙人起见，总是不同意这样做。由于这个国家只靠从美国运来的粮食生活，出售的酒又不到战前一半，所以摄政府只有用贬值的纸币来支付为士兵征用的食物，才能摆脱困境；士兵营养很差，大量地病倒或开小差。1809 年 2 月，摄政府要求英国人给他们派一个总司令：英国人指定了贝雷斯福德，他是一个平庸的将军，但却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他把一定数目的英国军官和教官安插到葡萄牙军队里。除两个人外，所有的将官都是英国人。1809 年 9 月，葡军已有四万二千人；1810 年，差不多达到预计的人数五万六千人；但是要把他们装备起来却很费劲，总是不能使所有的骑兵都有马骑。他们还利用民兵来守卫要塞，进行侦察以及打游击战。1810 年，甚至又采用了普遍征兵或号召全民抗战。

西班牙人却没有使英国人这样满意。他们不愿听任别人支配，到 1812 年，他们一直拒绝使他们的军队听从英国人指挥。此外，中央“政务会”又缺乏权力；它在 1808 年 12 月逃亡到塞维利亚以后，又于 1810 年 1 月不得不躲到加的斯，把权力交给一个摄政会议；9 月，西班牙议会复会并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到 1812 年议会又设立一个新的摄政府代替执行委员会。所有这些政府都优柔寡断，都有滥用私人和贪污的嫌疑；卡斯蒂利亚的旧议会和塞维利亚的旧“政务会”不服加的斯政府权力，而有些人诸如蒙蒂霍伯爵、

英范塔多公爵、帕拉福克斯的兄弟等都阴谋推翻政府。各省的“政务会”也不稳定，大部分从这个城市迁到那个城市，碰上高兴就服从加的斯政府的命令。“政务会”与军事将领之间的谅解协作关系总是岌岌可危，游击队员也总是擅自行动。另一方面，虽说人民都憎恨侵略者，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的人都准备参加战斗，无论如何，他们反对 1811 年中央“政务会”规定的征兵制度；尽管 340 预计有一支八十万人的军队，但正规军的数目从来没有达到十万人；此外，这些军队的统率和给养都有困难，尽管从美洲运来了白银，第一年几乎就达到三百万。除征兵以外，还号召全民抗战，这一制度在北方许多省份已成为了习惯，1809 年 4 月 17 日中央“政务会”又加以全面号召，其结果也不见佳；例如，在阿斯图里亚斯，1809 年能对农民进行动员，但到 1810 年他们还是呆在家里；此外，也没法为他们找到军官和武器，只能利用他们来做辅助勤务。

最适合西班牙的是游击战争，因为在游击战争中士兵可以自己作主。1808 年 12 月 28 日，中央“政务会”使游击战争合法化，游击队于是到处活动，其中有些很出名，象卡斯蒂利亚的一个农民恩佩西纳多的游击队和纳瓦拉两个米纳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骚扰法国人，袭击法国的粮秣征购员、辎重队和边远孤立的哨所，通过逐日给敌人造成的零星损失，使他们疲惫不堪，力量削弱，或使他们不得不派重要的部队去守卫交通线；在北方，皇帝不得不增加宪兵队的骑兵连。可是，人们夸大了这些游击队的实效；每次当法国人以充足的兵力能占领一个省时，游击队却远不能加以阻止，也不能对他们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在博内指挥期间，阿斯图里亚斯的情况就是这样，尽管这个地区具有进行游击战争的理想条件。此外，游击队十分复杂，常常无法明显地与拦路抢劫的盗匪区别开来；当它们由虔诚地忠于宗教事业的农民组成时，他们的苛求和掠夺也同样使富人感到十分恐惧，因此法国人有时反而得到同

情支持。博內能够组织一支反游击军，苏尔特在安达卢西亚成功地建立了护送连队，这是由亲法分子组成的眞正的国民自卫军。游击队在旷野上的抵抗最终被摧毁时，他们很快就会不见了。而正规军沒有英国人的帮助也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可是中央“政务会”对英国人同样表示非常不信任，拒绝让他们到加的斯去；尽管 341 亨利·韦尔斯利(未来的考利勋爵)再三努力，中央“政务会”甚至在塔拉韦腊之战后仍不承认威灵顿是总司令，西班牙的将领也很勉强地同他合作。南美洲的动乱以及西班牙殖民地向英国贸易开放使这种爭执不和的局面更为严重。

如果拿破仑在瓦格拉姆战役之后回到西班牙，法国的胜利是不成问题的，如果他把达武那样的将领授以全权留在西班牙，法国的胜利或许也不成问题。约瑟夫身边虽然有儒尔当，但也不足以指挥这场战爭。约瑟夫甚至也无从行使民政管理权力。乌尔基霍、阿桑萨、卡瓦鲁斯、司教会成员略伦特以及其他人都投效约瑟夫，人数相当多，可以组成一个宫廷、一个內阁、一个参政院。但是缺少钱，国王只好靠城市税收，强迫推销的公债和以出卖教会仅有的一点产业作担保的纸币等等办法勉强维持，而教会的财产能否卖出还很成问题，因为拿破仑把从反叛者那里沒收的财产都归为已有。在各省，将军们仅能依靠自己的军队，甚至连军饷也领不到，他们便把任何可动用的物资都抓到手。他们养成了只考虑自己的区域的习惯，当拿破仑把指挥权交给某个元帅时，其他元帅就有意或无意地破坏一切计划。內伊甚至公然拒绝服从马塞纳。由于皇帝下达作战计划时把命令直接送给各军将领，这就使无政府状态更为严重。更不用说他有时不了解情况或者因距离遙远，结果所发出的指示或是不可能贯彻的或是已经过时了的。如果说威灵顿有理由抱怨西班牙将军们的话，那么，他的敌手的行动也是同样混乱的，所以威灵顿能够打败他们或者个別阻击他们。

至于战争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起伏不平的地形、气候恶劣、沒有大路、缺少粮食——，人们常常说，而且说得有道理，这些条件使法国人受到很大的挫折；但是必须补充说，他们的敌人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疾病使许多英国兵送了命，运输给他们招致很大困难。人们特别感到军队给养极为重要，这对所有军队都沒什么区别。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还习惯于匮乏的生活；相反地，英国人却远远不能适应；至于骑兵队，一部分人由于缺乏草料而不止一次地沒有马骑。双方的正规军也都是如此，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养成了游击队那样的生活习惯，以致整个半岛好象是回到了一大帮一大帮散兵游勇横行的时代[①]。西班牙的友军和敌军都对居民进行抢劫。而劫掠又诱致士兵开小差；由于英国队伍中有许多外国人，又由于拿破仑派了许多附庸国和盟国的团队来到西班牙，所以逃兵从这国兵营跑到另一国兵营，或互相来往、不分敌我；他们组成一些为自己的利益而作战的股匪。法国军队习惯于就地解决生活困难，可是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经常挨饿，只能通过突然出击或全凭武力才能夺得一点东西，结果军队风纪荡然；他们的将领也经常给他们作出敲诈勒索的榜样，象塞巴斯蒂亚尼、克勒曼、苏尔特、在巴塞罗那的迪埃斯梅，以及听候审讯而于1812年自杀的戈迪诺就是这样。英国人以骇人听闻的纵酒狂欢和照例劫掠攻占的城市来减轻他们的痛苦。从战略观点来看，给养不足和运输困难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威灵顿很注意不要太远离基地，并在每次战役后又要撤回基地。这也证明威灵顿在法国人的攻势面前具有信心是有理由的：他打算采用焦土政策来阻止他们的进攻，他坚信即使法国人在

342

① “大帮散兵游勇”指十四世纪下半叶，英法百年战争主要作战阶段之间为患很大的散兵游勇。这些散兵游勇在停战间歇时期，在法国各地横行无忌，劫掠骚扰。这些人主要是来自西班牙的阿拉贡和纳瓦拉，还有来自来因区等地的外国雇佣兵。在法国围剿他们以后，又跑到西班牙骚扰。——译者

进军时建立了仓库，他们也必定缺乏骡马和车辆。如果拿破仑亲自来准备西班牙战役，如同他准备俄罗斯战役那样谨慎小心，其结果将迥然不同。由于他沒有下这个决心，归根结蒂优势是在威灵顿这一边：由于威灵顿以现金付款，农民——他们对英国是友好的——给他提供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再由于英国有舰队，他能从国外得到增援，并设立了仓库，而法国人却不能从本国得到什么东西。1812 年威灵顿发动一次冬季战役，打得法国人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不可能在收割之前开始作战。

这些一般的条件使西班牙战争具有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拿破仑战役的特点。相当大部分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兵力是分散的，这导致一连串出其不意的战斗；每支所谓的军队都是各自为战，只是顽强地单调地忽而前进，忽而后退，因此都不能进行决战。当拿破仑离开半岛时，他沒有料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以为：1809 年 1 月，在里斯本只留有克拉多克统率的一万英国兵，而这些人看来也是势必要撤退回英国的，在他们撤离以后，西班牙人就不能支持很久。韦尔斯利的到达打乱了皇帝的部署。拿破仑留在西班牙的

343 十九万三千人之中有三分之一多一点是在西班牙的西部作战。内伊驻守加利西亚；苏尔特则带领二万三千人离开了这个省，向里斯本进军，以便在那里与维克托会合，后者率领二万二千人沿塔霍河而下。拉皮斯从萨拉曼卡出发，负责进行联络工作。苏尔特好不容易才赶到波尔图，并于 1809 年 3 月 29 日占领了这个城市。他梦想成为葡萄牙国王，便不再前进，只是忙于策动支持他的请愿；其实，军队很不喜欢这项“尼古拉斯国王”的计划——尼古拉斯是苏尔特的教名——而不满情绪这样高涨，以致酝酿成一个阴谋，达尔让顿与英国人接上了关系。在这个期间，维克托把奎斯塔逐到瓜的亚纳河以南；3 月 28 日在梅德林把他打败了，但沒有摧毁他，随后维克托要求拉皮斯来增援；但是他们让人炸断了唯一可以用

来渡过塔霍河进入葡萄牙的阿尔坎塔拉桥。因而，韦尔斯利能于4月22日安然登陆，在科英布拉集中了二万五千人，分头进攻两支法国军队。

他首先攻击苏尔特，苏尔特防守不严，于5月12日失去波尔图；由于贝雷斯福德已在上游渡过了杜罗河，苏尔特只有通过山区才能逃走，这样他就要牺牲他的炮兵部队。内伊和苏尔特不是互相配合作战至少保住加利西亚，以后仍然各自采取行动，最后便从加利西亚撤走，内伊向莱昂撤退，而苏尔特向萨莫拉撤退。韦尔斯利回头来进攻维克托；由于他在进行准备时以及在同奎斯塔配合行动时遇到了许多困难，所以他直到6月27日才重新开战。维克托向马德里退却以便与塞巴斯蒂亚尼的部队集合。他们也指望莫蒂埃的援助；但是拿破仑把莫蒂埃与内伊都置于苏尔特的指挥之下，命令他们通过格雷多斯山脉切断威灵顿的退路。维克托和塞巴斯蒂亚尼虽然在名义上受约瑟夫的指挥，却采取了攻势，并于7月28日进攻数量多一点而稳扎在塔拉韦腊的联军。他们的进攻被击退了。受到苏尔特威胁的韦尔斯利重新渡过塔霍河，向巴达霍斯撤退；然而，他的胜利得到大肆宣扬，他被晋封为威灵顿勋爵。尽管法国有五个军团集结在那里，尽管通往里斯本的大路是畅通无阻的，但谁也不敢利用这个机会采取大胆的行动，相反，他们却彼此分开了。塞巴斯蒂亚尼急忙赶来把从曼查省来的贝内加斯的军队驱逐到阿尔蒙內希德去。

威灵顿对贝内加斯和奎斯塔都不满意，同时“政务会”拒绝推举他为总司令，威灵顿从此就撒手不管；由于奥地利打败了，威灵顿预料到拿破仑将会大力对付他，他为慎重起见决定收兵到葡萄牙建立一个巩固的基地。“政务会”并不关心这件事，还命令来一次总攻击。阿里萨加率领安达卢西亚的军队向塔霍河前进，11月29日在奥卡尼亚被苏尔特击败。德尔·帕尔克暂时攻入萨拉曼卡； 344

但是克勒曼突然赶来，于 11 月 28 日在托尔梅斯河上的阿尔瓦击溃了由阿尔武格尔克率领的厄斯特列马都拉的军队。于是约瑟夫和苏尔特建议征服安达卢西亚，拿破仑被可能在那里取得物资的前景所诱惑，便听从了。法军沒有遇到什么抵抗，于 1810 年 2 月 1 日占领了塞维利亚，5 日又占领了马拉加。可是他们犯了沒有直接进军加的斯的错误，因为那里是中央"政务会"的避难所；2 月 3 日，阿尔武格尔克及时赶到加的斯，闭门坚守，他们围攻这个城市就沒有成功。三个军团便被牵制在安达卢西亚。

更令人恼火的是，象威灵顿预料到的那样，拿破仑正在准备对葡萄牙一次新的远征。1811 年，拿破仑在半岛上有三十六万多人。交给马塞纳的军队照理应该是十三万人。由于他要博内负责重新占领阿斯图里亚斯并坚守纳瓦拉、比斯开和旧卡斯蒂利亚，实际上，他只留有六万人，兵员完全不足。他既沒有修建军火库又沒有设立辎重运输兵站，等待收割结束才攻占罗德里戈城和阿尔梅达，直到九月份才开始出发。他发现这个地区差不多是空的了，因为当地已经发动了"全民抗战"，要居民撤退和销毁不能带走的生活必需品。威灵顿只是在科英布拉附近的峡谷中才与马塞纳交战；他在布萨库高地掘壕筑防，于 9 月 27 日击退了马塞纳；但当马塞纳设法扭转战局时，他便撤退了。马塞纳在追击中，不久就碰到托里什-韦德拉什防线，一道后面又是一道，共三道防线；第一道长达四十公里，包括配备着二百四十七门大炮的一百二十六个防御工事；威灵顿指挥有三万三千英国军队，三万葡萄牙军队和六千西班牙军队，这还沒算上游击队，由于他从海上补充给养，所以也不存在因饥饿而削弱兵力的问题。马塞纳沒有围攻的装备而且只剩下三万五千人；尽管他要求增援，德鲁埃只给他派来一万人。饥饿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1811 年 3 月 5 日，马塞纳下令一直撤退到达萨拉曼卡。威灵顿紧跟追击，很快就包围了阿尔梅达。为了摆脱

345

困境，5月5日马塞纳在科阿河上的弗温特斯-德奥尼奥罗进攻威灵顿，但被击退了。正在这个时候，拿破仑已开始准备进攻俄国；这次失败至少暂时是无可挽救的。只有苏尔特一个人接到了支援马塞纳的命令；他不敢违抗，但只是在3月11日才去夺取巴达霍斯。威灵顿估计自己的处境已很稳固，可以分兵派出贝雷斯福德去对付苏尔特，贝雷斯福德迫使苏尔特撤退，并包围了巴达霍斯，于5月16日在阿尔布拉击退了苏尔特的进攻。威灵顿摆脱了马塞纳之后，赶来与贝雷斯福德汇合；但是已在萨拉曼卡负责指挥的马尔蒙同样也去与苏尔特汇合。在有利的条件下，向英葡联军发动一场大战的最后一次机会摆在眼前。但两个元帅似乎都没想到这样做：他们分手后又各自回去了。威灵顿向罗德里戈城进军；由于马尔蒙逼近了，他才不再前进，而撤回了葡萄牙。

这种情况并没持续很久。威灵顿得到增援后，心里明白：与皇帝所想的相反，他的兵力已超过了只有三万四千人的马尔蒙；此外，他打算打一场出其不意的冬季战役。这一次他很果敢，并取得了完全胜利。1812年1月7日，他开始出动，19日突然攻占了罗德里戈城，并立即向巴达霍斯进军，4月6日又占领了这个城市。苏尔特行动迟缓，马尔蒙不敢发动一场重要的牵制战。此外，威灵顿命令各处加强攻势，使敌人得不到增援。加利西亚军包围了阿斯托尔加；波帕姆出现在比斯开沿岸，挡住了卡法雷利；而本廷克派梅特兰到巴伦西亚沿岸去对付絮歇。由于拿破仑已召回了二万五千人去俄国，因而约瑟夫想要苏尔特撤到安达卢西亚便不可能实现。6月14日，威灵顿重新发起攻势，马尔蒙只得退到杜罗河以北。马尔蒙把博内从阿斯图里亚斯召回来，巧妙地重新渡河包抄了英军，迫使英军退向萨拉曼卡；他渡过了托尔梅斯河，于7月22日进攻阿拉皮莱斯阵地，但是很不幸，他在激战中遭到袭击而被击溃了。法军损失了一万四千人，克洛泽尔好不容易才把残部

一直带到布尔戈斯。威灵顿向马德里进军，约瑟夫撤出马德里以便与絮歇汇合；最后，苏尔特离开了安达卢西亚，于10月份与他们一起把首都夺了回来。威灵顿已去占领布尔戈斯，这时便向托尔梅斯河退却，苏尔特并未立即攻击他，威灵顿便撤回到葡萄牙，他俘虏了二万人，缴获和摧毁了三千门大炮，并攻取了安达卢西亚。

346

在西班牙东部，战斗以单独作战的方式继续进行着。在卡塔卢尼亚省，罗萨斯于1808年沦陷，赫罗纳于1809年沦陷；菲盖腊斯于1811年失而复得；英国人无法平定这个省。在阿拉贡，絮歇首先抗击威胁着萨拉戈萨的布莱克；他得到增援后，于1810年攻占了莱里达和梅基嫩萨；1811年又占领了托尔托萨和塔拉戈纳。被提升为元帅后，他在萨贡托的要塞下和在巴伦西亚城前相继打败了布莱克，1812年1月9日他进入巴伦西亚。他的一部分部队被撤回去了，因此他不再继续向前推进，梅特兰才能在阿利坎特驻扎下来。

所以，威灵顿不仅实践了他的诺言，而且大大超过了这一点。他不仅援救了葡萄牙，而且还在半岛上牵制了相当大的一支法国军队。但是应当注意的是：直到那时英国在大陆上的牵制行动还没有发生任何决定性的影响，既没有使奥地利免于被战败，也没有阻止法国入侵俄罗斯。如果俄国被征服，威灵顿就不再有任何可能保持他的立足点，甚至在葡萄牙也站不住脚。直到1813年，原驻西班牙的法军调到德意志去确保拿破仑的胜利，威灵顿才给予反法同盟一次决定性的援助，但是，首先必需由严冬来摧毁“大军”。

第四章　大陆封锁

347

虽然英国当时控制着海洋，但它也不能从法国军队手中夺取欧洲大陆，尽管它出兵西班牙牵制了法国。从拿破仑方面来讲，虽然他竭力要把整个欧洲联合在他的指挥之下，但他至少在很长的时间内，仍然不能到英国本土上打击敌人。这就是在提尔西特和约之后，经济战起着头等作用的原因所在。英国的封锁差不多具有一种纯粹重商主义的特性：英国不是想使敌国挨饿并阻碍敌国军需制造业——大陆的经济状况会使这种企图无法实现，相反，它竭力要通过中立国向敌国出卖大陆所需要的一切商品。海上封锁的目的是要使英国自己致富，而不是想毁灭法国的军事力量；何况这后一目的也不是英国力所能及的。

拿破仑在最初几年里执行了一种类似的政策以后，通过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而恢复了国民公会与督政府的政策，表示要紧闭大陆杜绝英国商品，从而使大陆只能在封闭经济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过活。如此断然采取这一决定，它本身就包含着很多的冒险成分，就是横下一条心要把大陆封锁转变成为战争武器。只要拿破仑没有掌握制海权，他就不能幻想要能使英国挨饿和无法获得原料。但是，拿破仑没有充分估计到英国资本主义的牢固基础，也不了解它的现代化结构，他认为：这种经济结构是建立在信贷和出口之上的，因而是非常脆弱、一打就垮的；他并且设想，这种结构一旦动摇就会引起破产、失业，或许还会激起革命，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导致英国的投降。这个威胁是否确有实效？经济学家们对此都是否定的，一般来讲，人们都和经济学家抱有同感，但 348

是这还有待分晓。再说，拿破仑是否已经雷厉风行地加以贯彻？他是否能够完全摆脱商业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这些考虑必然会削弱这个威胁的意义。这是附带的问题，但也应加以探讨。

一、大陆封锁最初几年的英国贸易

直到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公布，英国在经济战中保持着进攻的优势。在禁绝了敌国的航运并能随心所欲地摆布着中立国以 349 后，英国就能干扰法国的出口，夺走法国的市场，而在适当的时候却能继续向法国输出，甚至从法国购入商品。拿破仑对欧洲的征服以及大陆封锁完全改变了英国这种有利的地位。法国想阻止英国向欧洲这个最好的顾客供应商品；英国不得不退居守势：必须向敌国强行推销商品。

为了摆脱困境，英国并没有修改它的政策，什么也没改变。相反地，它更加强调了经济实用主义；1808年 4 月，英国政府经议会授权可以随意地颁发特许证，不惜违反政府在 1807 年刚刚颁布的法令中所提出的方针。这样，英政府就允许进出口违禁品，允许船舶航行到严格地被封锁的港口，允许空船从敌人的一个港口开到另一港口，甚至容忍悬挂法国国旗的船舶进入英国港口。虽然在1809 年 4 月 26 日因为法奥战争，突然取消了对法帝国的特许证，但对德意志和波罗的海的特许证依然照发，而事实上，立刻又开始对荷兰和意大利颁发特许证。很快地，9 月 28 日，由于农作物收成使人感到不安，政府竟然允许空船开到从荷兰到巴荣纳所有的港口，这是没有先例的；这种容忍政策到 11 月取消了，在 1810 年5月又恢复了，到 10 月又取消了，接着又重新恢复了，完全是根据粮食供应的情况的考虑而定的。1811 年，与敌国的贸易再次被禁止了；但在 1812 年又重新开放，甚至对已经对英宣战的美国也一律

开放。从1807年到1812年，总共颁发了四万四千三百四十六个特许证，而在1809年和1810年两年内就颁发了将近二万六千个。中立国从中也拿到了一部分，就是在大陆上似乎也在买卖这种特许证。的确，正是通过这条途径来开展所有的海上贸易的，甚至是在政府并不要颁发时，人们也照样要求它发给特许证，因为军舰对敌人和朋友几乎不加以任何区别。其实到最后，颁发特许证已变得沒什么眞正的规章可循了，而只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而已；这样颁发特许证必然产生任意专断、收受贿赂、办事拖拉和造成过失；这套措施长期地把航海条例束之高阁，幷使1807年的各项法令沦为具文，所以有人反对这种做法。然而它却大有助于英国的自卫，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特许证允许的进口是以再出口作为条件的；这样，特许证就提供了施加外交压力的手段，同时因为每个特许证要缴纳十三至十四英镑，所以这也是一项很可观的收入。 350

在欧洲，英国的封锁能否收效，首先要看大陆体系是否牢固。提尔西特和约之后，在1807年和1808年，它暂时是很牢固的，因而显著减少了来自英国的进口。但好景不长；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摆脱了拿破仑的控制；1809年，土耳其与英国人缔结了和约，向英国人开放了地中海东岸各地；奥地利又重新让英国人进入；战争使法国军队远离德意志海岸各地，在那里几乎又恢复了自由通商：这在荷尔斯泰因称为“第二个通宁时期”。① 另一方面，在拿破仑的附庸国或盟国里，人们也可以取得各国政府一种或多或少是公开的默许。直至1810年，荷兰仍是英国的一个重要的市场。路易曾颁布了柏林敕令，但幷不认眞执行；从1806年开始，他同样也开始颁发特许证，对英国的出口继续不断，必然也有来有往：1807年从荷兰运到英国二十三万七千多夸特的粮食。此外，商船上都习惯地

① 指通宁在1807年前曾为走私活动的中心，现又再度走私猖獗。参看上文第11页。——译者

备有两种文件，一种是给英国人看的，另一种是给法国人看的；利物浦有一个商行发出通告可以代办后一种文件。最后，英国人充分利用走私活动；他们为了鼓励这些“走私船”，便采用了法国人的包装和贴商标的办法，还采用了种种狡猾手段，比如把一些装满货物的网袋沉没在预先商量好的地方，让渔民在夜晚打捞起来；他们特别在尽可能靠近法帝国的海岸上建筑了一些仓库。1808 年，在北海选中了赫尔果兰岛，在那里进行了很大的工程；有二百商人，其中有汉堡的银行家柏里什兄弟之一，从汉堡移住该岛；因此人们把那个地方叫做“小伦敦”。在 1808 年，从 8 月到 11 月，有一百二十艘商船在那里靠岸，据估计每年进港的商品达到八百万镑。货物从该岛到达荷尔斯泰因，再经由阿尔顿纳进入汉堡，或者在夜晚将货物卸在驳船上；然后可以很容易地运到法兰克福、来比锡、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去。在波罗的海，哥德堡成为主要的中心。在 1808 年，这个港口就已经出口一百三十万镑的咖啡以及将近三百万镑的食糖；到 1809 年，又分别增加到四百五十万镑和七百五十万镑；第二年，又增加了一倍。通过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这些货物有一部分上运到来比锡；也有人把一部分发往波兰和俄国。至于地中海方面，1808 年以后的直布罗陀、撒丁岛、西西里岛、马耳他岛、巴利阿里群岛，1809 年以后的爱奥尼亚群岛和达尔马提亚群岛，都成了切合需要的据点；毫无疑问，其中马耳他岛成为主要的仓库。经过的里雅斯特和维也纳可以到奥地利，再从那里到来比锡。当英国人在土耳其取得了立足点以后，又开辟了从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到贝尔格莱德和匈牙利的一条新路，从这两条商路中获利的都是维也纳。

351

根据英国的统计，向北欧的出口，其中包括法国，可能直到 1808 年才受到明显的打击；但在 1809 年就有所恢复，在 1810 年便又出现了很接近 1805 年的出口额。如果把 1805 年的出口额作

为 100，则 1808 年，英国本国货物出口的指数为 20.9，再出口为 51.6，主要是殖民地食品的再出口；在 1809 年，这些指数分别提高到 55.2和 140；在 1810 年，又提高到 74.6 和 97.3。向同一地区出口的总量，与 1805 年相比较，其指数在 1808 年是 32.6，在 1809 年是87.5，在 1810 年是 83.2，1809 年指数上升是由于奥地利战争，1810 年指数下降是由于大陆体系重新巩固以及特里亚农敕令和枫丹白露敕令最初所产生的影响。在 1810 年，英国向北欧和法国的出口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是，1808 年令人震骇的突然下降，证明了大陆封锁就其本身而言是有实效的：一切要看它的执行情况是否完善，时间是否持久，也就是说，要看法国军队的实力如何。

然而，即使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扩展到整个欧洲并得到严格执行，它也不能完全禁绝英国的出口，因为大陆只能够消耗殖民地食品的四分之三；至于直接来自英国的商品，则减至三分之一：在 1805 年是百分之三十七，在 1808 年是百分之二十五，在 1810 年是百分之三十四。因此，除非拿破仑也能够征服东方，并迫使海外各国，至少是美国，采用同样政策（无论是否和他协调一致），他才能有把握达到目的。事实上，如果英国经受到真正的困难，那是由于美国人与瑞典人、挪威人、希腊人、"蛮邦人" 相反，反抗了英国 1807 年的各项法令。当然，美国也不喜欢拿破仑的一系列敕令；352 但美国人对英国却另外有一些不满："强迫征募" 问题以及船员国籍问题都悬而未决。1807 年 5 月 27 日，英国人拿捕了美国的一艘商船并抓走了船上好几个水手；在伦敦，人们谴责这一举动，但实质上并没有让步，跟着两国关系就破裂了。12 月 22 日，杰佛逊宣布禁运：对已采取措施反对中立国的各交战国封闭美国港口，禁止本国船舶出港。只有英国人受到这项禁运令的损害。诚然，禁运并未严格执行，尽管在 1808 年通过了《执行法案》；不过在那一

年，从美国进口的谷物只有1807年的二十分之一，在利物浦，人们只收到二万三千袋棉花而不是1807年的十四万三千袋；面包涨价了，制造业也发生了危机；工资的下降在曼彻斯特引起了一次总罢工，并由此引起了一连串的骚动。另一方面，大陆上从殖民地进口的货物之所以明显地减少，是由于美国船舶不来欧洲；据荷兰财政大臣高格尔说，在1807年，荷兰从美洲进口将近三千万镑的咖啡以及将近四千一百万镑的食糖；在1808年，只得到一百万镑的咖啡以及四百万镑的食糖；而这些食品主要还是来自英国的殖民地。最后，往常卖给美国的英国货物占英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现在减少了一半以上。

由于开辟了一些新市场，英国却能够对付这种变得严重的情况。葡萄牙和西班牙裨益不大；英国输往这两国的货物大大地增加了，但主要是供养威灵顿的军队。相反地，进入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市场却使它得到重要的弥补。总的说来，向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地中海一些国家的出口，从1805年的四百万镑增加到1811年的一千六百多万镑。但事关重大的是巴西和西班牙的殖民地市场的开放。我们还没有掌握它们的贸易的准确数字，但可通过英国在美洲（不包括美国在内）销售量的突然增加而得到说明：这个销售量是从1805年的八百万镑增为1806年和1807年的一千一百万镑的，而到1808年和1809年则增加到将近二千万镑。因此，从英国人看来，危机的持久的结果之一，就是欧洲市场的重要性减少了，而使他们把目光转向海外市场。除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353 当时亚洲和非洲在这个演变中并没起到任何作用：英国对亚非两洲的出口，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时期里反而减少了。拿破仑在西班牙进行军事冒险的重要性在这里可以看得更清楚。

海外贸易的增加使英国得到帮助，这样，英国就可以期待美国人的回心转意，果然美国人很快就回心转意了。不出口它的粮食、

木材、烟草和棉花，美国就无法活下去；在这一点上，新英格兰与南部是一致的；此外，北部的船主也表示了抗议。这种骚动有很快引起内战的危险；至少，禁运给联邦党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竞选纲领，他们指责杰佛逊讨好法国人。1808年，麦迪逊还是被选上了①，但讲好他要取消"禁运法"。1809年3月4日，通过了禁止与交战国进行一切贸易的"禁交往法"来代替它。但这个法案并不适用于西班牙、葡萄牙、丹麦和瑞典，此外，美国商船一旦开出港口，就设法开到它们所要去的地方，尤其是到荷兰和英国。例如吉拉尔供给葡萄牙粮食，他的船就从葡萄牙运酒到英国去，再从英国满载而归。另外，英国驻美大使答应很快取消枢密院令；英国政府却加以否认，但是在这期间，麦迪逊已经取消了"禁交往法"，于是大量的商品便涌进欧洲。在1809年，英国向美国的出口上升到将近七百五十万镑，美国人的船队又重新开始供英国人使用。在1809年这一年内，从英国各港口开出的船舶中，挂外国旗的从百分之四十五上升到百分之七十。

因此，英国取得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和拉丁美洲的市场，其结果是拿破仑的计划完全失败；只是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在这些新的市场上，价格的波动很大，也就是利润的多寡不定，并且付款要靠运气。事实上，以1805年为100，只有1808年的出口指数下降到91；由于大陆体系的动荡不安以及与美国的和解，1809年的出口又明显地繁荣起来，这一年的指数是125，1810年的指数甚至还超过126。海关的这些估计数字从棉织工业方面的份量也可得到证明：从1801年到1805年，英国平均每年进口五千六百五十万镑的棉花包；从1807年到1812年，英国又购买七千九百七十万镑的

---

① 1808年的美国总统竞选是在联邦党和当时的共和党之间展开的。共和党领袖杰佛逊已任两届(1801—1809年)总统，不能参加竞选，由他的国务卿麦迪逊参加竞选。——译者

棉花包，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点七。棉织品的销售从1805年的八百354六十万英镑增加到1808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万英镑和1809年的一千四百四十万英镑。煤炭和铁的生产同样也增加了；技术也继续在改进；人口从1801年的一千零九十四万三千人增加到1811年的一千二百五十九万七千人。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英国的经济结构在大陆封锁的最初几年里胜利地经受住了考验。这要归功于英国使用举世无敌的机器，以及对殖民地物产的垄断。英国御用的政论家也嘲笑拿破仑，尤其是伊韦尔努瓦在1809年7月出版的《大陆封锁的效果》一书中写道：

> 你们的封锁顶不了什么事！
> 你们的巧安排真是了不起，
> 你们一心要把人家饿死，
> 人家却吃得胀破了肚皮。

然而，欢呼胜利未免过早。法国打败奥地利之后，大陆体系又巩固下来；没有什么能阻止拿破仑结束西班牙的战争；在亚历山大的支持下，或在把他打败之后，难道拿破仑还不能够把英国人从地中海东部诸国赶走吗？此外，大陆封锁还能够与美洲的市场关闭配合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拉丁美洲对于付款感到失望，而且陷于内战，因而使销路缩减；英美冲突行将再启。甚至在繁荣的年代里，某些进口也引起了严重的忧虑。索马雷诚然能控制波罗的海，但随着波罗的海各港口的封闭，要象以前那样从那里得到木材、粮食、大麻、亚麻这些不宜走私的商品就变得困难了。对于纺织工业，英国可求助于爱尔兰。至于木材，那是另一回事了。在1808年，共消费了六万车木材，每车以一吨重来算，差不多相当于一立方米又十分之一。尽管英国的树林都砍光了，同时自1804年以来从加拿大运来很多木材，但在那一年，还是要从国外购买二万六千车木材。但泽的佐利公司总是能设法运出木材，但是以后就很少

了，在1811年只运出三千三百一十九条桅杆和二千五百车木材，而加拿大运出二万三千条桅杆、二万四千车橡木和十四万五千车枞木。以前，从瑞典，尤其是从美国运出的更多，但在1810年，美国就什么也不提供了。英国人到处寻找资源；可是，沒有一个地方的木材贸易组织得象波罗的海的那样好，同时租船费往往过高。尽管英国人与阜姆的阿达米克签订了购买木材的合同，后来从1809年起又与阿里-泰布兰订了约，但仍很难满足马耳他岛船坞的需要。英国必须再一次破坏航海条例，才能在哈利法克斯和印度建造船舶，甚至是建造战舰。结果是商船队受到损害：1804年增加的商船是九万五千吨，而1810年只有五万四千吨。1810年是很艰难的一年，因为只有四万七千车木材用于造船上，其中一万车来自国外。 355

粮食问题更值得我们认眞加以探讨。英国的粮食产量由于价格提高而增产了很多：在这个时期，英国人开垦荒地大约七十五万英亩，主要是开垦村社公有土地。爱尔兰同样地提供了一个可观的数目。在与拿破仑的决死战斗中，英国的王牌是：资本主义发展最先进，保证了它的工业具有一个不可战胜的优势，但还沒有发展到促使放弃本国粮食生产的程度。然而，根据杨格的估计，1810年英国消费的粮食中，进口的仍占六分之一。尽管英国小麦价格沒有涨到1801年的水平，还是比大陆上的贵：在1805年，一夸特小麦涨到一百先令，在1807年是六十六先令，在1808年到1809年间是九十四先令，在1810年竟达一百一十七先令。由于这两个理由，英国人对可能威胁到粮食的输入的危险总是很敏感的。进口小麦的四分之三来自波罗的海，其余的来自美国和加拿大。但是波罗的海的各港口都在拿破仑手中；尽管可以走私，但在1808年只能从大陆得到六万五千夸特小麦，而在1807年曾得到五十一万四千夸特。另一方面，1808年从美国运来的小麦只占整个进口额

的百分之六，而上一年是百分之十四。收成并不错，因此并沒有造成什么严重的破坏性后果；但是，可能会突然遭到歉收。此外，英国还要供养葡萄牙和西班牙：美国赶快来援助葡、西两国，这样就间接地帮了英国的忙；然而，美国是否会向英国开战呢？最后应考虑到安的列斯群岛：1808 年，宗主国要向各岛供应粮食。万一波罗的海与美国同时不供应英国粮食的话，那么每年大概至少缺粮两个月，万一碰到收成不好，缺粮就更严重了。有人认为，英国一面定量配给粮食，一面提高粮食的加工成率，并采取其它措施，本来是可以向这些国家供应粮食的。然而，心理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由此可见，在 1809 年，拿破仑的大陆封锁的成败尚有待分晓；356 但是英国人由于过分自鸣得意而往往低估了封锁成功的可能性。单靠大陆封锁诚然是不能降服英国的；然而，封锁如果是在整个欧洲严格执行，是可以把英国削弱到总有一天英国自己也认为经受不了这样的危机的，这一危机是不以拿破仑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却是拿破仑胜利的保证。对于拿破仑来讲，首要的是扩大他对大陆的统治，同时要保持严格的封锁。但相反地，拿破仑却放松了大陆封锁。

二、大陆封锁的演进

如果严格地执行的话，推行极端重商主义政策的大陆封锁会使得欧洲不得不依靠自己过活。由于欧洲绝大多数居民还是从事农业生产，所以不用担心衣食问题；由于同样的原因，除了棉花以外，还可以找到油料和纺织品原料；欧洲大陆的燃料和矿产也能自给自足。另一方面，沒有殖民地的消费品对欧洲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人们不得不寻找一些代用品；用菊萵苣代替咖啡；用蜂蜜和

葡萄汁代替食糖，在1811年前后，法国就用这些东西生产了二千吨糖；更重要的结果是，至少在那以后，人们重视到用甜菜制糖，这种糖是马格拉夫在1757年提炼出来的，十九世纪初，另一个德意志人阿查尔德在西里西亚大量投入工业生产。由于缺乏靛青和红颜料，人们就采用菘蓝和茜草。也有人试种能提炼苏打的植物，例如在罗马教皇各属邦；化学工业很快就推广了尼古拉·勒布朗从海盐里提取的产品。人们尽力把棉花移植到那不勒斯和马拉加的近郊，这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因为这提供了法国棉花消耗量的六分之一，法国也通过伊利里亚从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进口棉花。然而就棉花来说，困难仍然是难以克服的：沒有走私货，纺织厂就不得不关门，尤其是在萨克森和瑞士。拿破仑对棉织工业的态度最明显地表明了他要迫使欧洲大陆能自给自足的愿望。拿破仑对棉织工业从不感兴趣，因为原料依靠外国，道格拉斯在法国建立了毛纺机械厂，拿破仑很早就加以保护；他答应贷款给那些愿意改装机器采用别的原料进行生产的纺织工业主；他准备发给发明纺麻机的人一百万法郎奖金；1811年，在皇宫里禁止用棉织品。

357

即使欧洲得到原料供应，它也不会解决一切困难，因为它的制造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它的需要。人们可以期望一旦大陆封锁彻底实现而成为保护贸易制，制造能力将取得必要的进展。但这就需要时间，因为机器和熟练工人直到那时都是来自英国；此外，欧洲任何地方的资本都不充裕，而局势也无从鼓起投资的信心。再说，工业中心为数不多、海洋被封闭，要自给自足就必须全面调整分配与运输。因此，大陆封锁打乱了人们的习惯，干扰了所有的常规，侵犯了数不尽方面的利益。船主、商人、海港的工业家都知道他们注定了要蒙受损失。最糟糕的是，消费者，也即所有的人都感到要为封锁而付出代价。他们不喜欢菊莴苣和葡萄汁；毛织品和麻布比棉织品要贵得多；一般说来，企业主和拿破仑本人都想供应市场

而不计成本。自给自足的目标从很多方面伤害了生产者与消费者建立在个人自由和劳动自由基础上的独立性，拿破仑自己就曾经到处宣扬过这种自由是新社会的原则之一。反对大陆封锁的阴谋于是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只有军事和警察的专制统治才能使大陆封锁受到尊重。

358

被拿破仑阻止出口农产品的盟国，由于没有工业，不能从封锁中得到好处，或者象汉撒各城市，由于海上贸易被禁而受到致命打击，这些盟国都或多或少地公然规避它们应负的义务，其程度要看它们还保留着多少独立性。它们只要不执行针对中立国的措施就够了。因此，随着拿破仑的军事统治的波动，大陆封锁政策也时紧时松；开始时它是大帝国的象征，后来它就成为扩张大帝国领土的理由。它也影响了大帝国的组织，因为它的附庸国并不比它的盟国听话。

荷兰的例子是最能说明问题的。路易在他哥哥的威胁下，于1807年9月4日封闭了他的港口。但是，从1808年开始，拉罗什富科大使就指出走私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最近归并的东弗里西亚和通往安特卫普的瓦耳赫仑岛，他建议法国合并至少到马斯河的那些地方。国王在一项命令中准许了出口黄油和乳酪。9月16日，拿破仑决定对荷兰人封锁边界。于是，路易便在10月23日禁止出口，禁止所有商船进港。从法国人看来，这样极端的措施表明了大陆封锁是荒谬的；况且，这些措施刚一执行就被一些例外推翻了。1809年6月，路易重新准许美国船舶进港，条件是这些船上的货物在恢复和平以前应交给国家仓库保存，其实从仓库再把货物运出是很容易的。7月18日，拿破仑设立了从来因河到特拉弗河的海关警戒线予以回击，这样，国王又再次退却了。荷兰一再试图采取一些措施，最后导致拿破仑在1810年合并了这个王国。

缪拉早就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象萨克森国王或法兰克福大公

这样的君主，与海洋没有接触，更有理由对于走私漠不关心。自从德意志西部重现和平以来，法兰克福作为一个靠法国边境的仓库贮藏所在，便又兴旺起来，1810年，据普鲁士的代表说，他在那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来自殖民地的消费品。来比锡仍是英国供应中欧和东欧的一个大市场。1810年，在圣米歇尔①博览会上，人们运来了六千五百五十万盾的殖民地消费品；瑞士总是在那里买到它所需要的纺织品：在1807年至1808年达十九万利弗，在1808年至1809年，达四十三万利弗，在1809年至1810年，达九十五万利弗；通过瑞士的领土，英国的出口货到达意大利。这样，大陆封锁就成为强烈要求建立单一制帝国以取代联邦制帝国的原因之一。 359

甚至在拿破仑独自统治的地方，要禁绝走私也不是一个小问题。由于巨额的利润和普遍的纵容，这一时期走私活动的猖獗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从来没有过的。在1810年，皇帝亲自点出走私的人马而列出了它的严密组织：计有承包商、保险商、货主、走私帮的头子、搬运夫。就对法国的走私而言，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成了最活跃的走私中心，在这两地走私都可以大发横财。要监视这么长的海岸线，尤其是陆地上的边境，单靠海关人员是不够的，必须实行军事占领；当拿破仑需要调用他的军队时，如1809年的情况，到处都打开了缺口；1811年，由于不能保证监视，他把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排除在帝国的海关管辖之外。他甚至不能绝对信赖自己的官员。法国驻汉堡领事布尔里埃纳和驻科尼希贝克领事克莱朗博都曾受贿；马塞纳曾在意大利出卖特许证。根据当时斯特拉斯堡的传闻，海关职员也会被人收买，其中包括他们的督导官。对于这些弊病，最好的灵丹妙药就是缩短检查的距离；而从中得出的结论总是：应把整个欧洲并入帝国。这并不是拿破仑所不喜欢的。

① 圣米歇尔当指法国东北部埃纳郡的圣米歇尔。——译者

除非大陆封锁引起一些使他认为将给自己带来危险的后果，什么也不能使拿破仑改变他的政策。德克雷公爵很快就抱怨说，海军得不到来自波罗的海的不可或缺的器材供应。棉纺织业主在由于排斥英国纺织品和扩充自己的企业而感到非常高兴之后，开始面临困境了，因为缺少原料：如果这样，大陆封锁就不利于他们的事业。不论皇帝对他们的抱怨多么不耐烦，他不得不重视这些问题，因为他最害怕的就是失业。另一方面，帝国的出口减少了。尽管发生了战争，直到 1806 年，出口总是不断地增加的：据估计当时出口总值是四亿五千六百万法郎；1807 年，下降到三亿七千六百万；在 1808 年和 1809 年，还不到三亿三千三百万。有一些工业，尤其是丝绸业，在西部是麻织业，都衰落了，以致又间接地引起失业的严重威胁。海边的盐工、种葡萄的人、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沿岸诸省的农民，同样地怨声载道。黄油、乳酪、水果、蔬菜，以及影响更为重大的商品如葡萄酒和白酒等都难于出售。当小麦充斥市场时，情况就变得更为严重了。在执政府时代小麦一度很贵，这在不少的程度上使得小业主和大农场主都对拿破仑很有好感。在共和十年和十一年，每公石小麦的平均价格超过二十四法郎。从1804年开始，由于连年的丰收，价格降到二十法郎以下；1809 年，下跌到十五法郎，在巴黎盆地和布列塔尼，实际上下跌到十一或十二法郎，在旺代郡，还不到十法郎。拿破仑感到很伤脑筋。虽然他不愿面包贵，但也不愿小麦滞销而激起种植者的不满情绪，并使税收发生困难。遇到这一类情况，他从前就曾暂时准许出口，象在旧制度下所做的那样。1808 年 11 月 23 日，勒阿弗尔的一个商人曾经请求允许恢复出口；对此，英国是求之不得要想收购的。

此外，出口问题带有更普遍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贸易的平衡。拿破仑可能比科尔贝尔更容易把贸易平衡和收支平衡区别开来。因为，尽管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也还没有海运和旅游事业的收

入，法国资本家当时至少在被征服的国度里进行了某些投机活动，而战争还给法国取得了大量的硬币。然而，拿破仑的观念还是过于传统主义的，所以他仍坚持要不惜代价地保证出口的优势。直到1808年，他并没有成功，尽管贸易逆差已从1803年的八千三百万法郎下降到1807年的一千七百万。在大陆封锁的其他好处中，拿破仑看重它具有扭转这种局势的功用。1809年的进口从1806年的四亿七千七百万下降到二亿八千九百万；从1808年开始，出现了贸易顺差，在1809年的余额是四千三百万。对皇帝来说，这是主要的；但是，如果出口不是减少而是保持原来的水平，结果岂不是更令人满意。他认为既然战争封锁的目的是针对英国的货币，封锁就不会与他的重商主义理论相矛盾：必须继续向英国人推销而 361 停止向它购买，从而吸收他们的硬币。1808年，拿破仑得知路易颁发了一些向英国出口的特许证，他宽恕了他，条件是，什么也不买英国的："要他们付现款，决不容许以商品交换，绝对不能，明白了吗？"

然而，拿破仑绝不放松对中立国的严厉控制；当他知道杰佛逊的禁运令时，他在1808年4月17日的巴荣纳敕令中宣布，美国此项措施意味着完全取消美国的航运，因此一切自称来自美国的船舶都应视作为假冒，并应宣告为合法的捕获品；他没收了这些船舶，1810年3月23日，朗布依埃敕令规定把这些船舶连同船上货物一起卖掉。中立国的船舶被排斥后，法国的出口商缺少船舶：他们的出口货必然减少了。可能最初这个矛盾并没引起他的重视，他的目光首先注视着法国，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比如，波罗的海的农业国的出口问题怎么解决；即令整个欧洲都被征服了，法国还是帝国的主要部分，而硬币正是应汇集到法国来；大陆封锁使法国得到了大陆的市场，因此，只要控制住这个市场，法国就能保持、甚至增加它的销售额。但是，法国资源是否足以在大陆市场上取

代英国商品呢？靠陆地运输和内河运输的货物供应能否增加到使海上运输成为多余的程度呢？事实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而且，如何处理小麦的问题还无从解决。

实际上皇帝的大部分亲信并不赞同他赋予大陆封锁的那种性质，他们都希望恢复1806年以前的制度。夏普塔尔的意见是众所周知的；先后出任内政大臣的克雷特和蒙塔利韦都同棉织业主和港口商人有联系，愿意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些人并不打算要求取消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但是他们暗示，仿效英国人颁发出口特许证是有利的，让中立国也可以得到特许证，而无需还给它们贸易自由也是合宜的。为满足海军和陆军的需要，政府要求在回程时运来某些商品，其他的出港船货只能以硬币付款，这样就可保证获得一个可观的现金顺差。难道科克贝尔·德·蒙布雷在1802年不曾建议在补偿的基础上进行交易吗？难道拿破仑在1807年不曾一度考虑颁发以等量的再出口作为条件的进口特许证吗？与他的《回忆录》所叙述的相反，莫利昂反对这种计划，他指出，即使拒绝准许出口商以实物偿付，他们——或许用欺骗的方式——也会满载而归，而且英国人还会迫使他们这样做；他由此得出结论，英国人的交易可能会收支相符。科克贝尔·德·蒙布雷同样也警告说，如果把小麦运给英国人，那就失去了使他们挨饿的机会。这些后果与一个进攻性的封锁概念是不吻合的。

362

他们是正确的，但是，大臣戈丹和海关总裁科兰·德·絮西所提出的另一论据使拿破仑让步了。他们说，减少进口，也就会减少海关的收入，这项收入已经从1808年的六千万法郎降到了1809年的一千一百五十万。在对奥地利开战的前夕，恢复税收原来的水平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粮食的出口将使得农民能交纳土地税。事实上，正是在1809年3月，拿破仑指令拟定一个有关特许证的方案。克雷特的秘密通告在4月14日透露，这是有关一个特

殊的和暂时的权宜措施，是不公开宣布的。这些后来被称为“旧式”的特许证，允许出口葡萄酒、白酒、水果、蔬菜、粮食和食盐，条件是再进口木材、大麻、铁和金鸡纳酒，或者是以硬币付款，外加关税，和为每个特许证缴税三十至四十个金路易。克雷特发了四十张特许证；但是，代理他的职务的富歇，却宽大得多，到了10月5日，他已发了二百张。然而，戈丹和蒙塔利韦坚决主张也要考虑到工业需要。这样，第二种类型的特许证便在1809年12月4日出现了，后来还在1810年2月14日的法令中加以具体化：每艘船上的出口货的四分之三应是农产品，农产品中又加添了油料和纺织原料；其余四分之一则出口工业产品。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再进口和以硬币付款的条件违反了英国人的要求，请求领取特许证的人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多；1810年6月，皇帝收到报告说，已发出了三百五十一个特许证，出口了一千万法郎的货物，进口则为六百万法郎。然而，粮食出口的数量现在 363 仍然不很清楚。根据英国的统计数字，帝国及其盟国在1809年和1810年，运给英国的粮食大约是一百五十万夸特，即使这些都是以黄金付款的，可以肯定说它们也只吸取了英国一百四十万英镑。但是事实上，英国进口额在1809年达到七千五百五十万镑，在1810年，达到八千九百七十万，而1801年的歉收也仅仅把进口额提高到七千三百七十万镑。看来，法国出口粮食可能不限于使用帝国的特许证；从1809年9月底开始，英国发放了允许到大陆运输粮食的特许证，甚至允许空船去运，拿破仑可能装作没看见，让敌国的商船自由装运，直到1810年夏末他才停止出口，因为这年的收成不好。小麦的销售问题是解决了；相反，葡萄种植者、工业家和国库没有理由感到满意。在1810年上半年，皇帝认识到这个初步尝试是不够的；他在北部巡视期间，制造业主纷纷向他诉苦请愿。1811年1月12日，拿破仑不管禁律，准许缴税百分之四十就可

以出卖捕获的货物(只有某些棉织品不在此例):这就是所谓"特准产地"的产品。换句话说，拿破仑准许了某些进口。在出口方面，他在敦刻尔克正式地与英国的走私贩建立了联系；1811年，这个基地移到了格拉夫利纳①。6月6日，他设立了商业和制造业公会，在6月底，他着手同该公会一起准备对封锁进行一次总的调整。

此外，一个新的动机促使他走这一步。1810年5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马科恩法案"②，宣布如果交战国在1811年3月3日以前不取消它们针对中立国的措施的话，就授权总统禁止从交战国进口。要是英国坚持那些措施，拿破仑就可以优待照顾美国，促使它与英国决裂；根据米兰敕令，凡是维护自己中立权利的中立国可不受敕令规定的限制；通过外交手段，法国可以抢先推动这一事件的进展，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因为它会加强封锁的效能。

1810年7月3日，通过圣克卢敕令，颁发特许证成了正式的制度；后来，特许证发给意大利和汉撒各城市，同时为了照顾波兰人，也发给了但泽。7月25日，另一个敕令把法兰西帝国的海上贸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从8月1日开始，如果没有皇帝本人签署的特许证，就禁止进出帝国的港口；这些所谓"正规化"的特许证是只发给法国人的。因此，拿破仑仿照国民公会，颁布了那种真正的航海条例。既然法国船舶不能出海航行，所以这个文件只是一纸空文。同时美国人被当作一个例外加以优待，这个例外是商业公会于6月25日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研究过的：7月5日，法国发布

364

① 格拉夫利纳就在敦刻尔克西边，属诺尔郡敦刻尔克县。——译者

② 这是美国的第二号马科恩法案，目的在广泛开展对外贸易，其中规定，如果法国对美国撤销限制中立国贸易的各项敕令，美国总统就有权停止对英贸易；如果英国对美国撤销其历次有关的"枢密院令"，则总统有权停止对法贸易。拿破仑善于利用此法案提供的机会，而英国迟迟不决，这成为导致1812—1814年英美战争的原因之一。——译者

法令准许美国人进口，条件是要再出口等量货品。因为麦迪逊禁止他的国民申请特许证——在他看来，特许证意味着损害海洋自由和美国主权——所以法国要把特许证发给美国船主时，就改称为“许可证”，从而规避了麦迪逊的禁令。其实，法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但是，在外交上却大肆宣传这一让步，8月5日，尙帕尼通知说，如果英国那一方面取消各项“枢密院令”的话，皇帝就将在11月取消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蒙塔利韦建议立刻就给所有的盟国或中立国的商船发放“许可证”；皇帝予以拒绝，甚至扣押了一些丹麦船。由此可见，应该承认，皇帝很巧妙地把急需中立国船舶这一事实变成使美国与英国不睦的外交手段。

7月25日的敕令规定，所有的进口必须以出口等量的指定商品作为平衡，这些商品因港口而异，但总是要有三分之一或者一半是丝织品。如果对一般的货物和英国工业品的进口禁令维持不变，那么进口的只能是来自美国或大陆的食品和原料：实际上，法国又准许殖民地食品进口，虽然明知是来自敌国的。因此，这就是采取了科克贝尔·德·蒙布雷在1802年所设想的方法：国家管制海上贸易，出口最低限度应与进口保持均衡。为了要重新活跃出口，尤其是为了向工业提供原料和向消费者提供食糖和咖啡，拿破仑放弃了出口要用硬币付款的要求。这一巧妙的想法也和救国委员会的指导思想相同；然而，在共和二年，迫不得已而不惜任何代价来进口的法国，同意在必要时以硬币付款；而在拿破仑时代，法国的地位却改变了，它只要求外国人以硬币付款。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皇帝由于同意购买货物，这些购买部分地对敌国有利，从而放松了大陆封锁。 365

国库与此也有关系。因为每张特许证值一千法郎；海关税则也重新调整，8月1日，公布了特里亚农敕令，把殖民地商品的税率提高到了惊人的程度。美国棉花，在1804年是每一公担纳税一

法郎，自1806年开始，纳六十法郎，调整后要付八百法郎；靛青的关税从十五法郎提高到九百法郎，咖啡的关税从一百五十法郎提高到四百法郎。一边要向工厂主供应原料，一边又这样加重他们的负担，这显得好象是矛盾的；但是，拿破仑不但想通过打击进口棉花来促进民族的纺织工业，而且他还设想英国人不得不考虑到关税而降低他们的价格，使得他们不能再有利可图，而正规的进口将使得购买者不再依靠走私商人。这是太乐观了。英国人控制着市场，能够坚持他们的价格，而过高课税也不会减少走私漏税。因此，取缔走私的措施很快地也就加强了。根据10月18日颁布的枫丹白露敕令，走私犯要判十年苦役，更不用说要打烙印，而且要提交新的司法机关"海关法庭"审理，这些法庭是以特别法庭的程序来行使职权的；1812年，汉堡的法庭在十五天内就判决了一百二十七个案件，其中有些人由于情节严重而被判处死刑。走私的殖民地物品予以没收和出卖，工业品则予以销毁。为了清理市场和开辟财源，还要搜查不顾封锁而已输入的商品。因此，特里亚农敕令便要大举出动警察。在整个帝国，普遍进行了搜查；因为附庸国并不那么愿意贯彻敕令，拿破仑便杀一儆百：在10月17日至18日的深夜，法兰克福被一营兵包围，第二天便被占领了；二百三十四个商人——其中包括贝特曼和罗思柴尔德——眼看着他们未能藏起来的东西都被没收了。来因邦联各王侯、普鲁士和瑞士都受到要被入侵的威胁并看到他们的德意志边境已被封锁，于是他们才决定服从拿破仑的命令。

1810年几个敕令并没有全部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不断地产生了严重的弊病。新特许证并不比旧特许证更受到欢迎；根据蒙塔利韦的报告，皇帝到1811年11月25日共签署了一千一百五十三张特许证，但只发出了四百九十四张。这些特许证包括四千五百万法郎的出口以及将近二千七百万法郎的进口。至于美国人，

366

他们只领了一百张左右的"许可证"，他们运来了不到三百万法郎的货物，从法国购买了三百五十万法郎的东西。在拿破仑看来，这个顺差证明了这项新办法是行之有效的。实际上，是否获利还是一个问题；考虑到法国商人的利益，官方对出口估计提高了一半，而对进口的估计减少了四分之一；此外，英国人拒绝购买，在伊利里亚，因为要求再出口，英国人便不肯出售食盐，所以皇帝就不得不破例准许他们不必再出口；结果，出口常常是虚构的，其目的无非是要给进口寻找借口。人们设法欺骗海关，将不值钱的商品装上船，然后抛入海中。不管怎样，虽然工业方面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这还不足以使商人消除敌意。萨瓦里为我们记下了拉菲特很严厉的话；日内瓦商会通过它的秘书西斯蒙第之笔对封锁公开进行了批评，使政府各部门都大吃一惊。既然拿破仑不愿象英国人那样随机应变地颁发特许证——这是与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不相容的——那么他最好是一张也不发。

另一方面，清理市场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通过向法国的驻外官员行贿或者由于地方官员的共谋，人们得以隐藏很多非法商品，或者把这些商品申报为来源合法。对于殖民地物品，皇帝采取了各种权宜之计：他允许以实物交付关税，允许荷兰将没收的货物运入帝国按半价折算，同意丹麦放宽期限把荷尔斯泰因的存货进口到汉堡，后来又接受普鲁士所没收的货物作为支付一部分战争赔款；让所有这些商品都在市场流通，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这一套方法引起了激烈的动荡。销毁没收的工业品，使这些商品的拥有者陷于破产；为了重新获得这些殖民地物品，就得缴纳巨款——在法兰克福达九百多万——其中很多是不能预先付款的； 367 每个国家都坚持按本国利益来执行特里亚农敕令，这使得商品流通阻滞，直到大家同意只征收一次关税为止；即令是这样，还是发生了由于普鲁士接受以其贬值的纸币付款，因而它的纳税证书终

于被其它国家拒绝的情况。这个打击引起了1811年的经济大危机,因此,过高的关税制加重了原想用特许证来防止的弊害。

精神上的影响也不好。特许证和特里亚农敕令引起了思想混乱,使得人们以为皇帝承认了错误而将放弃大陆封锁;8月,在给予美国保证以后,蒙塔利韦一时也有这样的错觉。枫丹白露敕令以及大张旗鼓地加以实施使人们大为失望;他们自认为所受的打击比英国人所受到的还要严厉,他们认为,把他们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在广场上焚毁或者扔到河里去是令人愤慨的;十分必要时,政府可以设法说服法国人相信,这样做是出于民族利益的需要,但这并不能说服其他国家人民。在彼得堡的美国使节曾称之为"一种汪达尔人①的政策",这是普遍的呼声。另一方面,只给法国人发放特许证,拿破仑就证明了那些把大陆封锁看作仅仅是有利于统治国法国的意见是正确的,而破格优待美国人,则又引起了附庸国及盟国的愤慨。自1809年底开始,缪拉也勾结了富歇、乌弗拉尔以及拉布谢尔颁发特许证,俄国看到粮食从帝国运出,便要法国作出解释。俄国沒有执行特里亚农敕令,奥地利也是如此。最后,亚历山大又采取自由行动:既然法国与敌国做买卖,又允许美国船舶进港,于是他在1810年12月31日便又对中立国开放了俄国的港口。这样,新措施既危害了大陆封锁,同时也动摇了大陆体系。法国与俄国决裂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如果按照大陆联合的精神,给附庸国及盟国象给法国一样地发放特许证,使它们能在帝国各港口作买卖的话,那就可以避免给俄国提供借口,而这也无损于照顾美国人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1810年的航海条例是毫无用处的,它是拿破仑顽固地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的既不合时宜而又

① 汪达尔人是古代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原住今波兰境内。公元五世纪西迁经今法国和西班牙而到北非,建立汪达尔王国。据说他们所到之地,破坏艺术文物,故欧洲人往往称野蛮破坏文物,故意毁坏他人财产者为汪达尔人。——译者

危险的一种表现。 368

撇开这个错误不谈，当代人的谴责也不能抹杀拿破仑政策的精明的一面。他一刻也不打算放弃大陆封锁，在改进大陆封锁时，工业的困难在他的心目中仍处于次要的地位。他立意要解决的主要是财政问题。要发动对奥地利的战争，他必须有钱：允许农民出卖自己的粮食，他就能够取得税收，这一点英国人也注意到了。1810年，他预见到，要准备对俄国战争，就需要更多的钱：在这一年年底，据估计，特里亚农敕令和枫丹白露敕令给他提供了一亿五千万法郎，而且还不包括没收商品的销售。他始终都按照眼前的需要来制定政策，得到他所想得到的东西。同时，他把争取美国的外交手段与这项财政措施巧妙地结合了起来，在这方面，他也取得了成功。麦迪逊认真对待拿破仑的诺言，在1810年11月2日，恢复了与帝国的自由贸易，而仍禁止英国的进口。

至于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它们还是不可动摇的，毫无疑问，如果拿破仑认为发放特许证可能会损害这两个敕令的效能的话，那末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取消这种制度：因为正如在1809年那样，特许证只不过是一个临时的措施。在拿破仑的心目中，如果美国不是注定要对英国宣战，他也不会继续给美国发放"许可证"。他在1811年3月24日斩钉截铁地向巴黎商人宣告：

"我把中立国的船舶看作是领土的延长。任何国家如果听任其船舶被侵犯，就不能被视为中立国的。美国贸易的命运很快就会决定了。如果美国遵从这些敕令的话，我就厚待它。否则，就不准美国商船进入我的帝国港口。大陆必将屏绝来自英国的进口。一定要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执行我的各项敕令。"

果然，1811年，英国又回到1808年的苦日子了。瑞典刚刚加入大陆封锁，在波罗的海，英国的船队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自由靠岸的港口。1810年9月，英国船队受到沉重打击。当六百艘商船在海峡里被大风所阻试图在海峡南岸靠岸时，有一百四十艘被拿

369 捕了，据估计，这些船上的货物值一百五十万英镑；瑞典也就参与沒收了另外一百艘商船的货物，价值五十万英镑。荷兰和北海的德意志海岸现在都被并入了帝国，向俄罗斯进军的大军涌入德意志，加强了监视。英国的出口从未受到过这样沉重的打击。1810年，英国向北欧的出口，包括法国在内，已提高到七百七十万英镑，再出口也达到九百一十六万英镑。1811 年，这些数字却分别下跌到一百五十万英镑和一百九十六万英镑，即仅等于 1805 年的价值的百分之十四点五和百分之三十二点二。同一年，英国只向美国销售了一百八十七万英镑货物，而不象 1810 年那样是一千一百三十万英镑；与此同时，在西属美洲所开始的骚乱使英国对新大陆(美国除外)的输出总值下降到一千三百万英镑以下，而 1810 年却是一千七百五十万多。1811 年，英国的出口总共下降到三千九百五十万英镑，即相当于 1805 年的百分之八十二，相当于 1810 年的百分之六十五。

或许有人辩解说，这是由于英国在 1811 年遭受到一次严重的工业危机；但是，工业危机的后果是价格惊人下降和库存大量增加；如果英国的销售额有所减少，那是因为人们拒绝买英国商品，而并不是英国缺乏商品的缘故。因此，大陆封锁是进行得很顺利的；从前有些拿破仑不能控制的因素是不利于他的，现在却变得对他有利了，而且正如对 1811 年危机的研究所表明的，还存在着其他有利的因素。因此，拿破仑那么自信是容易理解的："我知道有人公然谴责我的措施，"他在 1811 年 3 月 24 日还这样说："然而，最近从英国来的人，看到中断大陆贸易后所开始产生的后果，不得不说，可能皇帝是对的……，或许他会完成他的计划。"

可是，他并沒有利用他所有的这些有利因素。当他看到英国继续在大陆推销货物、带回现金或以补助金的名义将这些钱交给反法同盟各国时，他很生气：但是，这只能怪他自己。因为，他尊重

国际间银行的结构，这个结构既支持了英国的贸易，也保证了在支付中和商业纸币的流通中还起着重大作用的硬币的周转，而商业纸币至少在西欧对于贸易往来是必不可少的。正如荷兰的大臣瓦尔肯纳尔于 1808 年 1 月 25 日上奏国王路易所写的： 370

"大陆上流通的英国制造的产品中，对英国人最有利可图或最重要的是银行的纸币。……靠了它的魔力，支持着遍布世界各地的巨大的英国贸易网……。这就是所有欧洲大陆市场上直接向英国提款的，或者间接地向英国人的帐户提款的汇票与证书制度的强大作用。"

此外，黑森的选侯和荷兰的资本家要向英国人推销公债，甚至罗思柴尔德要获得法国票据来汇款给威灵顿，银行都起着中间人的作用。银行的中心是阿姆斯特丹、汉堡和法兰克福。荷兰的赫普—拉布谢尔银行同汉堡的帕里什银行彼此都有交往，也同伦敦的巴林银行和巴黎的金融家保持着联系；大陆上的罗思柴尔德家族与居住在伦敦的他们的兄弟内森保持着联系，在 1811 年，他们中的三个人，詹姆士、查理和萨洛门到巴黎来做生意，詹姆士就留下来创办了他们家族在法国的支行。当时大陆上的大银行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然而，尽管硬币的出口在帝国还是被禁止的，但在其他地方并不是这样，荷兰甚至在被合并后也还没有中断硬币的出口。至于商业贴现，各地从未中断过，尽管《政府通报》在1807年停止公布伦敦的汇兑牌价。谁都认识到这是个最棘手的问题。瓦尔肯纳尔说，商业证券是唯一的不被禁止的商品："要打击的正是这个东西"；因此，他建议把所有的与任何英国人的利益或信用或帐户有关的任何汇票的发行、承兑、背书、贴现、运送或支付都视为重大叛国罪。毫无疑问，路易设法使这个意见不给他的哥哥知道；但是，这个政策上的漏洞还是被莫利昂和拿破仑注意到了。拿破仑在 1811 年对"英国商业的贴现者"大发雷霆。然而，他并没打击他们。这一疏忽只能用他的重商主义观点来解释。尽管他要阻

止英国人销售，他却不放弃向英国人出口，并向英国人赚取硬币。荷兰继续从国外投资取得巨额收入，拿破仑不打算放弃这样做；打371 击国际银行界，就是打击自己。曾导致他制定柏林敕令和米兰敕令的那种好战的狂热，是不容许有类似的宽容的：因此，尽管他自己也许不承认，他还是抑制了这种狂热。

黄金的诱惑和财政的考虑也使得他不去利用给英国造成饥饿的机会，反而给英国提供了英国所缺乏的粮食。看来，起初在好战的狂热中，他似乎不是这样推论的，因为在 1807 年，法国完全停止出口生活必需品，1808 年，在荷兰也被禁止了，同年，在德意志也停止了。但是，在 1809 年，他不顾科克贝尔·德·蒙布雷提出的意见，又准许了出口，而正是通过出口，他的新政策证明是大有实惠的。1810 年英国共进口了一百五十六万七千夸特粮食，其中从帝国及其盟国进口的就达一百三十万六千夸特；正象拿破仑所希望的，英镑的汇兑率下降了，英国的黄金外流了；但是，英国却积存起储备粮；其证据是，尽管 1810 年歉收，它在 1811 年也只不过进口了三十三万六千一百三十夸特小麦，而且其中三分之一却来自普鲁士，同时，在 1810 年每夸特的平均售价是一百零三先令（大约相当于四十四法郎一公石），现在却下降到九十二先令（即三十三点五法郎一公石）。毫无疑问，沒有大陆的援助，英国会缺少几星期的粮食，即使英国能设法度过难关，价格也一定会惊人地暴涨。正在这个时候，英国遭受到一次空前的经济危机：拿破仑却预先断送了可能是达到其目的的唯一机会。

三、1811 年的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特里亚农敕令和枫丹白露敕令起了重要的作372 用；然而，不管有沒有这些敕令，危机总是会爆发的，而且，还应指

出的是，拿破仑可以得到一些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的帮助，这又是一例。从本质上讲，资本主义生产包含有周期性的混乱；战争和封锁创造了一些加速周期性混乱的不利条件。欧洲大陆也不免遭受其害；当然，正由于英国经济是先进的，所以它受到的损失要严重得不可估量。

从1807年以来，价格已人为地上涨了；比如在英国，波罗的海的供应品、丝绸和棉花的价格从1808年起就不止翻了一番；加拿大的租船费涨了两倍，里加的涨了三倍还要多；1810年，人们计算过，一艘一百吨的船，从加来到伦敦的来回航程，要花费五万镑；从波尔多到伦敦的来回航程要花费八万镑。其结果是，海上贸易冻结了越来越多的大量资本。同时，危险不断增加，这不仅仅是由于拿捕和没收，而且也由于价格的过分的和突然的改变。因此，在巴黎，来自巴西伯南布哥的棉花在1806年是每磅值七法郎，在1807年，每磅值十五法郎，在1808年，每磅值二十四法郎；在1810年，每磅保持在十二至十四法郎之间。在汉堡，1808年年初，一袋棉花的标价是七十五盾，在年中是二百六十盾，在年底，是一百七十五盾；在伦敦，价格摆动稍微小一点，但仍给投机活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在汉堡，帕里什的父亲在1800年已经慨叹定期的投机活动的风尚吸引了商人：这种风尚最后占了优势。在英国，人们对一切商品进行投机买卖，并为这一目的而组成了一些公司。

在大陆上，人们主要是对殖民地产品感兴趣；在法国，人们在大城市里可以找到这种机会；然而，到达法国各大城市的商品较为稀少，人们在阿姆斯特丹或在汉撒各城市则更活跃得多；巴黎的银行在那些地方进行了大量投资，他们或者是为了自己，或者是为了 373
他们的顾客；在1810年，人们引证卡沃咖啡馆① 老板在安特卫普

① 卡沃咖啡馆是1729年创办的，发起人都是当代作家，成为文人名士聚会之地。以后两度改组。1805年重建，称为“现代卡沃”。——译者

大量投资于殖民地消费品。正是交易所看涨的投机商在进行操纵，他们总是玩弄手段，特别是捏造假消息；1807年4月，为了要使棉花涨价，人们在巴黎散布说，英国封锁了里斯本。在荷兰，大银行为了控制市场，便购买仓库的存货。在英国，政府不断地借款，其注意力也是放在有价证券上。在这一方面，优势则是掌握在证券看跌的投机商手里；交易所的经纪人更是不断地把英国统一公债贬值，因为银行家不肯——除了一个例外——提供贷款给远期交易；这些银行家贷款给别人时收百分之五的最高的合法利率，而他们自己借款时，条件却要好得多。英格兰银行通过戈德史密斯银行来迎击这些投机商人。在巴黎，有价证券的投机活动远远没有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然而也没有被忽视，政治的不稳定引起了证券的剧烈波动。当塔列朗主持外交时，他利用职权取得情报来进行投机买卖，大发横财。莫利昂大臣竭力提高公债价格；但是卖空的投机商总是不断地证明拿破仑抨击是有理由的。投机的风气侵入了商业和工业。英国市场出现过两次大景气：一次是在1807年和1808年，当时波帕姆宣布英国攻占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同时人们也得知西班牙的属地已宣布费迪南七世为君主，从此就把英国当作它们的盟国；另一次是在1810年，当时法国最后的殖民地都被英国攻占了，美国人又在欧洲出现。为了满足定货，工厂增加了，家庭手工业者由于租借或者赊购织机而改进了工具。在法国、萨克森、瑞士，由于禁止英国的棉织品，也引起了类似的后果；人们同样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其结果是雇用人员的薪给工资大大地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使这些企业随时会受到危机的打击。

尽管以上的一些情况说明了为什么生产的投资高度活跃，但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和信贷膨胀，这种活跃也不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这一点上，英国的情形与法国的大不一样。使钞票与黄金割断关系之后，英国政府努力保持健全的财政制度，以此避免滥发

374

纸币，总之，这种努力是成功了，这无疑的是由于增加了税收，因为，从 1804 年至 1811 年，税收几乎总是弥补了开支的一半以上；而且还由于资本充足，由于政府按期还本和干预交易所的活动而努力维持统一公债的信誉，所以政府总是能够设法获得长期或短期的借款。尽管这样，政府还迫使英格兰银行手头保持巨额的财政部证券，从 1808 年开始是四千多万英镑，结果纸币发行量得以增加。人们不知道增加的实际数字，但是，从 1805 年的一千七百万已增加到 1811 年的二千三百五十万。那一年，一个调查委员会证明，最近发行了二百万英镑钞票。另外，现在地方银行已增加到八百家，可能已发行了四百万至五百万的纸币。最后，银行经营的方法大有改进：四十六家银行参加了银行间的票据交换结算，资金的流通得以加快。物价也在继续高涨：与 1790 年相比，1809 年的指数是 176 。它是逐步增加的，由于工资的提高总是落后于物价的上涨，而货币的大量供应减低了利息，所以，毫无疑问，通货膨胀可能有助于鼓舞创办企业的精神。然而，当代一部分评论家确信，私人银行——如果不是英格兰银行——提供了过多的信贷，我们对这一点是可以相信的。最后，为了招徕顾客，商人自己也同意延长付款期限——十二至十五个月，在拉丁美洲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还不要充分的抵押品。

在大陆上，大多数的国家也发行了纸币；由于大陆各国经济还是落后的，所以生产并没有受到刺激。相反地，拿破仑断然地取消了纸币；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设法增加金币的储备，战争使他获得了大量赔款，其中大部分被运回帝国；因此，在那里资金流通也同样地增加了。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帝国里信贷膨胀了，尤其是通过一些不健全的手续，象在执政府时期那样。银行还是不多，外省银行尤其很少，商人、工业家以及投机商都通过抵押他们的不动产或者通过金融汇票，而继续获得信贷；尽管法兰西银行进行了改

375 革，但还不能肯定它不继续接受通融汇票，因为有人证明马丹的儿子，一个日内瓦人，他是法兰西银行查帐员之一，却在1811年由于经营投机事业以及被认为是牵涉到一宗走私案件而破产了。

因此，沒有1810年的各项敕令，危机也必然会爆发的。事实上，至少在英国，危机是发生在这些敕令之前。在英国尽管经济比以往更活跃，但是由于货币虛弱，所以从1809年起，经济就开始显得萎靡不振。自1806年以来，金银的价格并沒有提高，但英格兰银行的现金储备，从1808年的六百多万镑，一下子降到四百万镑，在上一年，一英镑在巴黎还值二十三法郎，在汉堡还值三十五先令，这一年突然下降到二十法郎和二十八先令。从1809年8月开始，李嘉图就发出了警报，并开始了一场在货币学说史上一直很著名的爭论：他把危机归罪于通货膨胀，并把责任推给英格兰银行；赫斯金森出来为英格兰银行辩护；1810年2月，英国众议院任命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1811年发表的报告支持李嘉图；这个爭论直到今天还沒有结束。贵金属的溢价必然要引起一定程度的贮藏；但是，资本并沒移往国外，因为政府能轻易地借款，此外，资本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所以，兑换率的下降以及黃金从市面消失的原因在于国家对外的支付，而不在于通货膨胀。对外支付由于伊比利亚半岛的战爭，由于给予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奥地利补助金，最后，还由于购买粮食——在1809年就增加了大约六百万镑，而大大地增加了；简而言之，从1805年至1807年，英国在大陆上平均每年支付了约三百万镑左右；在1808年，总数超过了六百五十万镑，在1809年，超过了九百万镑，在1810年，超过了一千四百万镑。还应该指出，英国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要付款来维持其驻军、船舶和机构，以及支付外国人在英国投资的利息：这后一项，仅荷兰就从伦敦拿走了三千二百万盾。最后，贸易收支的逆差在1809年是一千五百五十万英镑，在1810年是八百九十万英

镑，在 1811 年达到一千一百一十万英镑。

即使收支平衡，毫无疑问，内阁还是不得不把硬币送到大陆上去，而且数量很大：其中一部分是由英格兰银行提供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财政部的玩忽职守或者无能。据内森·罗思柴尔德说，有一天，在知道东印度公司力图售出大量银币后，他赶快买了下来又马上转卖给未能找到银币的财政部主计长；接着他又负责将此款送给威灵顿，为此，他把款先送到法国，在那里买了到西西里、马耳他、甚至到西班牙支取的汇票。然而，英国政府的收支总不能正常地得到平衡，因为战争、封锁、开辟遥远的新市场给贸易造成的种种条件，使得外国的付款既迟缓而又不正规，而政府若拖延偿付国内债务势必造成损失；鉴于同样原因，票据换兑常常不可能实现：例如，政府不能够用在德意志支取的票据来供应威灵顿的需要。因此，垫款和运送贵金属是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汇兑率，因为不可能为这些汇划提供确切可靠的保证；在1812年 4 月底，威灵顿发现自己缺少五百万比塞塔。拿破仑对英国出口的打击，也给英国制造了一些军事上的困难。 376

如果李嘉图的主张占优势的话，皇帝的成功就可能更大，因为李嘉图的结论是恢复金本位。如果是那样，英格兰银行就再也不能垫付硬币，英国政府就难于维持驻扎在半岛上的威灵顿的军队。此外，还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的危机，从而限制生产活动，并使资本市场紧缩；财政部也会难于筹款。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能为战争筹款呢？很奇怪的是，英格兰银行的反对者们竟丝毫没有觉察到这些后果。在学理的论证下面，无疑的隐藏着私人利益：因为金本位的恢复就阻止英格兰银行去维持统一公债，卖空的投机商就会得胜。同样可能的是，支持李嘉图的人并不缺乏卓识远见，他们明确地认识到，他的论点会导致与法国媾和。政府却痛斥这一危险的步骤。首相帕西瓦尔写道："我不得不把所建议的措施视同议会正

式的宣言，它要表明我们不论在哪一种和平条件下都必须屈服，而不愿继续作战。”因此，恢复金本位的建议在 1811 年 5 月 10 日便被议会否决了。贬值持续下去；1811 年，储备金降到三百万；黄金的溢价现在达到四分之一；法郎价值超过英镑的百分之三十九，汉堡先令超过百分之四十四。在国内，靠收租息过日子的人闹起来了，金勋爵向其佃户要求相当于钞票价值损失的额外加息。结果，议会只得决定钞票应成为具有票面价值的合法货币：于是英国在无准备金的条件下，实行强迫规定纸币牌价的制度，这种情况总是给靠固定收入的人带来一定的损失。

377

在 1810 年上半年期间，货币危机有如封锁一样，并没有引起工商业者的不安。相反地，英镑的跌价有利于出口。但是，在耗尽他们的贷款或者把他们的流动资金完全变为固定资本后，国外付款的不足终于使他们陷入了困境。人们主要是归罪于拉丁美洲。1810 年 8 月初，曼彻斯特的五家商行负债二百万而破产了，从此掀起了破产的旋风。受到这些破产打击的各银行中止了信贷，从而引起了更多的破产，或者迫使制造商放慢生产速度，继而停止生产。物价暴跌：1811 年的指数是 158 而 1810 年则是 176；殖民地物品跌价一半；咖啡跌价将近三分之二。拿破仑再也不能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来加强大陆封锁了；他的种种严厉措施，波罗的海的扣押英船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英国出口的惊人的减少，都使危机加重并持续更久。1811 年这一年的突出特征是工业一蹶不振，主要标志是生产速度放慢、制造品价格下跌和普遍失业。英国全部工业生产的指数是六十四，而在 1810 年是七十四点八。在生产出口品的大工业中，产量下降无疑地是更为显著：1811 年的产量只有 1809 至 1810 年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当时有些工业家在指望各项枢密院令即将撤销，美国市场即可重新开放，因而为了美国市场而继续生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产量就会更大幅度下降，造成的

失业现象就会更加严重。在1812年，直到6月23日撤销枢密院令之前，萧条现象继续存在。撤销后各出口工业立即调出全部库存，准备尽快运往美国：无可置疑这有助于恢复生产，然而好景不长。美国宣战的消息传来后，又使工业萎缩不振，直到英国得知俄国遭到拿破仑攻入的不幸消息后才又得恢复①。就1812年全年而论，英国全部工业生产的指数只恢复到比1811年稍为高一点：378 1811年是六十四，1812年只是六十五点三。如果说，由于大陆封锁和麦迪逊的政策加在一起就使英国工业陷于瘫痪，这无疑是过甚其词，但英国工业受到了严重打击，这是可以肯定的。

社会的反响是激烈的。1811年5月，纺织厂每星期只开工三天；在波尔顿，每周的工资降到五先令，三分之二的织布机停了下来。既然长期以来工人把他们的苦难归咎于采用机器，所以机器就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3月，诺丁汉地区开始发生骚乱，到11月就变得极其严重了；1812年，骚乱蔓延到约克郡，德尔比郡以及累斯特郡等地。兰开夏和柴郡也爆发了起义。在这些地区，市场上的骚乱与破坏机器混杂在一起，因为面包价格仍然昂贵。自从十七世纪以来，英国还没有发生过象1812年这样持续最久，蔓延最广的极其严重的骚乱；某些地区曾经有几个星期实际上落在造反者的手里。英国政府不得不出动正规军队一万二千人来镇压这些骚乱。1812年的事件无情地暴露出英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缺陷（即使不说是罪恶的话），暴露出英国地方政府陈腐过时的管理制度的无能。

拿破仑出卖粮食所造成的错误明显地呈现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说，如果再加上饥荒，使这次危机更为严重的话，将会发生什

① 美国国会在6月19日已通过对英宣战，英国迟到6月23日宣布撤销枢密院令，拿破仑在6月24日越过涅曼河，因当时尚无电讯，消息要过几天才到达，以致有此一段曲折。——译者

么情况。尽管危机严重，它还沒有使英国惊惶失措；贵族和资产阶级虽然感到不安，却都能保持沉着镇定。财政也顶住了这场风暴，尽管支出增加，从1810年的一亿二千八百万镑增加到1812年的一亿四千七百万镑，而收入却稍有减少，其中海关收入因价格降低在1811年和1812年减少了二百万。政府在1809年曾举债二千二百五十万镑；1810年，减少了一百万；但是在1811年，又借到二千三百五十万，在1812年达到约三千五百万；由于这样举债仍感不敷，政府在1810年另外又获得短期借款三千七百万镑，在1811年获得四千一百万镑，在1812年获得四千五百万镑。要耗尽英国的储备金，还需要有一个更长时间的动乱。

虽然英国的种种困难增加了皇帝的自信心，但是他也不能免379受他在1810年所采取的措施的副作用的影响。这一年的5月，布列塔尼所发生的一些宣告破产事件已引起了巴黎一定程度的不安；然而引起大陆上危机的却是特里亚农敕令。危机是从汉撒各城市和荷兰开始的：人们在这些地方比在其他地方更肆无忌惮地在殖民地物品方面进行投机活动，以致在实施这一敕令时蒙受损失最大。在9月份，卢卑克的罗达银行由于亏本二百五十万马克而破产了；不久，阿姆斯特丹的德斯梅特银行停止了付款。由于巴黎各银行同这两家银行都有密切联系，商人的惊慌在11月份的商业公会里充分表现出来，十二日，富尔德银行、西蒙斯银行——老板是朗热小姐的丈夫——和其他三十七个公司相继倒闭。结果，到处人心惶惶，塔列朗甚至建议一切都延期偿付；1811年1月，那个自旧制度末期以来都未曾停止过投机活动的比德尔曼，和其他六十个商人也一起垮台了。倒闭之风逐渐波及全国各地，各制造行业都发生严重的失业现象。由于拿破仑的粮仓已经全部出清，小麦每公石的平均价格在1810年重新超过二十法郎，收成不好又使麦价上涨，一直持续到1811年。在法国并沒有象在英国那样发

生骚乱；但是，我们知道拿破仑对类似情况下的这种骚乱是多么的恐惧。

不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人们都不喜欢政府的干涉；英国内阁和议会日益倾向于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尽管拿破仑倾向执行相反的政策，但他对工业家，尤其是对银行家和商人并沒有好感，他严厉地斥责他们进行疯狂的投机活动而自陷困境。然而，英国和法国都不得不为失业问题采取补救的办法。英国议会象在 1793 年那样，拨款二百万镑来提供贷款，但须以商品为担保。在法国，皇帝首先尽力向法兰西银行购买一定数目的股票，并责成它在外省开设分行以便获得更多的商业贴现；他也打算创立一个以商品为担保进行放款的银行。最终，他只能象 1807 年那样对个别地方或个别人提供援助。亚眠商会获得了一笔政府贷款来创立一项紧急救助基金；象图尔东—拉韦尔银行或者鲁昂的杜瓦扬银行这些大银行，以及象巴黎的里夏尔与勒努瓦和阿尔萨斯的格罗—达维利埃这样一些重要的制造商也获得了政府的贷款；据莫利昂大 380 臣估计政府发放的贷款共有一千二百万或者一千三百万法郎。另外，国家购买的货物增加了。在里昂，拿破仑买了价值二百万的丝织品和六百万的其他商品交给领有特许证的出口商；他不是自己出面，而是通过奥坦热银行在各地发放二百万贷款进行定货，在鲁昂发放的款子最多。

1811 年的危机对这两个交战国都是严重的考验，其最奇怪的结果是使它们彼此更加迁就，使它们协调各自的特许证制度以便更容易交易。在英国，商人们的意见能够引起注意；他们对商务部施加强大的压力。但是，似乎他们从大陆得到了一些许诺或鼓励，大概是在富歇、乌弗拉尔同拉布谢尔的谈判中，从荷兰得到的，同时也从比利时得到了许诺和赞助，因为根特的商人兼郡政务官范阿肯把从英国寄给他的信件转给了蒙塔利韦，这些信提出一些试

探性建议。1810年8月，英国商务部准备接收拿破仑同意通过特许证而出口的商品，条件是拿破仑要接受英国产品及殖民地物品作为交换；11月，商务部取消了它的诺言。由于危机的不断加深，商人又对商务部进行非难；例如，1811年4月14日，格拉斯哥商会要求与敌国签订协定。11月15日，英国报刊报导，今后在互惠的条件下将准许对法国贸易；其实，14日的一个通告已准许法国酒进口；1812年2月，莫利昂宣称，英国将为此提供仓库："这样一件大事将被视为这个时代的奇迹之一。"

英国商务部幷沒做到这一步；但是它给法国商船提供了一些方便，取消了对金鸡纳酒及大包棉花的禁运，允许敌国的臣民在英国定居以便通过特许证来组织贸易，幷表示它的意见，愿使保险商能够对运到法国去的船货报价。这似乎使拿破仑惊奇不已。蒙塔利韦却抓住了这个机会，在11月25日，建议使特许证符合英国的条件：以酒和丝织品来换取食糖。他似乎取得了胜利，因为，在12月为此颁发了大量的特许证；在31日，还决定接受咖啡、染料、皮革和药品，1812年1月13日，皇帝在大臣会议上谈到要进口四十五万公担食糖的事。直到2月份，他还在签署特许证；从3月至7月，特许证发得很少了；但是，莫利昂的报告在从俄国撤退中被丢失了，所以很难准确地知道经过的情况；无论如何，从7月至10月，拿破仑颁发了二百九十九张特许证，主要是为了把棉花运到鲁昂。在1812年，拿破仑可能总共签署了七百九十九张特许证。英国人越来越显得态度和好，从1812年3月25日起，英国人颁发了符合法国所采用的制度的那种特许证。

381

这项默契有利于国际金融界，只有国际金融界才能够非正式地出面调整英法两国的特许证制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罗思柴尔德家族的人在巴黎开业了，象我们在上面说过的那样，他们得以给英国财政部帮了大忙。根据蒙塔利韦在1813年1月6日的一

个报告，帝国大约出口了五千八百万法郎的货物，进口了二千二百万。在英国，大家知道这个差额是对法国有利的，但还是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销售。不过我们沒有理由夸大这项贸易的重要性。如果英国的出口在 1812 年又增加起来的话，那主要应归功于俄国和瑞典的市场的重新开放，以及在大军撤离了德意志之后恢复了走私活动。帝国所受的影响要少得多，似乎相当迅速地复原了。1812 年的最后三个月中，在根特，转动的锭子差不多达到1810年的数目，织布机比 1810 年还多一点。在意大利王国，丝绸及丝织品的出口又超过 1809 年，贸易总额差不多等于 1810 年的；里昂及鲁昂也开始生产了。在冬春两季中，已出现了歉收情况。但在拿破仑看来，这只是暂时麻烦。无论如何，大陆经济经受住了封锁不可避免地所引起的烦扰。拿破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想放弃封锁。1812 年发放的特许证与以前的完全一样：这个权宜之计对英国人而不是对法国有害，因为贸易的差额对英国人是不利的；在出口粮食方面作出让步之后，拿破仑幷沒有充分利用这一危机；但是，如果从俄国凯旋归来，他就有可能更好地、更有效地实施他的各项敕令，因为他统治的范围还会扩大。

对于他的敌人来讲，情况幷不利。在危机使市场得到改善幷降低了价格之后，英国工商业又恢复了；破产的数目在减少，但和 1810 年的一样多；英国的出口又回升到五千多万镑，超过了 1811 年的价值的百分之二十八。但与 1810 年的相比，还少百分之十七；尽管进口总的来说是恢复了，但食糖及咖啡的进口又减少了，这证明了殖民地物品市场存货还是过多；同样，成包的棉花降到六万三千镑，而 1811 年和 1810 年却分别为九万一千镑和十三万二千镑，从这个衰弱的迹象就可以断定，出口主要是利用了清理破产者以最低的价格出售的库存货。英格兰银行的黄金继续地外流，汇兑率也沒有明显的好转。小麦的价格老是上涨，到 1812 年 8 月，达 382

到了一百五十四先令。工人的骚乱比以前更激烈地又爆发了。另一方面，皇帝要是在俄国打了胜仗的话，毫无疑问地会封闭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市场，美国的市场又已经失掉了。麦迪逊援用拿破仑的诺言，曾于1811年2月2日要求英国取消"枢密院令"。在舆论的压力下，伦敦的内阁于1812年4月21日同意了这个要求，只要证明皇帝已经废除了他的各项敕令。于是马雷作出了一个相应的决定，并把这一决定的日期倒填成1811年4月28日，惊讶不止的英国人便决定于6月23日实行。然而这太晚了。6月19日，麦迪逊借口"强迫征募"问题总是悬而不决，已对英宣战。

封锁总是可以用来达到好几种目的。在十八世纪，英国人主要是用封锁来发财致富；在今天，封锁的目的主要是摧毁敌方的军事力量。拿破仑的封锁是处在这两者之间的过渡阶段。它预示了封锁的发展前途，因为它力图粉碎英国的抵抗。但是它也保留着许多过去的东西。因为它企图通过重商主义的曲折道路来达到目的，即想要榨取敌人的黄金，而不是想饿死敌人。这样减轻了封锁的作用，使它不能立即见效，何况英国舰队控制了海洋，要使封锁取得决定性的效果，就需要或多或少不以皇帝意志为转移的那些情况的配合。然而，封锁也不是完全无用的，归根结蒂，它的成功要靠大军，而沒有人能预见到大军的覆灭指日可待。拯救英国的不是自由经济的"自然规律"，而是俄国的冬天。

第五章　俄罗斯战役的准备过程 (1811—1812年)

383

亚历山大知道，从提尔西特会晤以来，尤其是从1809年的战役以来，他的态度总有一天必然将引起同拿破仑的冲突，因为他切望同拿破仑争夺大陆霸权，至少想争夺东方霸权。皇帝则经过一定时间才相信竟然有人敢藐视他。1810年12月31日沙皇颁布诏令以后，皇帝决心了结这种情况；沙皇应该被降到附庸的地位；如果沙皇抗拒，就把他赶到亚洲去，他在欧洲的最富庶各省应并入大帝国。

有人曾责备拿破仑从事这项冒险危害了法国真正的民族利益；可是，至少从1803年以来，民族利益问题已经不在他心上；他心目中只有大陆的和世界的霸权问题。大陆体系可以容许有一些"同盟国"，但并不赋予它们真实的独立地位，更不容忍它们"造反"。在罗马被征服以后，皇帝的帝国之梦势必转向君士坦丁堡，而要想夺取君士坦丁堡，首先就要消灭沙皇的实力；大陆封锁为这个新方案提供了具体的理由：亚历山大既然破坏了封锁，这个新方案就势在必行，而亚历山大的失败将使法国能从英国手中夺回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国的市场。拿破仑毫不掩饰，这是他所筹划过的最危险的战役：怎么可能忘却查理十二①曾经冒过这个危险，并且在俄罗斯遭到失败？据说，在他下定决心以前，他曾有三天彻夜不眠。既然他自己的意志本身就是目的，那么他就不能后退；正如他 384

① 查理十二(1682—1718年)从1697年起继位为瑞典国王，称雄北欧，进攻俄国，于1709年被沙皇彼得一世战败于乌克兰的波尔塔瓦。——译者

在离开巴黎时直截了当地说过，他要“干开了，就一干到底”。

一、1811年的警报

在若干月的长时间里，拿破仑专心致力于解决把五十万军队调到俄国边境的困难，这就需要拥有大规模的运输工具、大量的给养和相应数量的经费。1811年适龄应征入伍的新兵已经征召完毕，并且已经到新兵训练站；从一月底开始，拿破仑着手加强德意志各邦的军队，陆续扩充这些部队，使一个兵团扩成两个兵团，组成了一些新的兵团，运送去了武器和装备，修建了一些辎重仓库。尽管他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他一点也不能瞒过车尔尼舍夫和涅谢尔罗杰的间谍。亚历山大如果抢先发动进攻，他就能突然袭击正在集中的法军，把战争推进到德意志去，而掩护俄国的安全。但是，亚历山大敢不敢这样做？

在1811年年初，亚历山大曾有此意。他的财政陷于窘境，赤字高达一亿卢布，纸币贬值了六分之五；但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从来没有由于类似的困难而迟疑不决过。二十四万俄军编成两个方面军，他们对抗的只有五万六千华沙大公国的军队和四万六千法国军队，这些法国部队距俄国边境相当遥远而且分散；在三月间，俄国多瑙河方面军的九个师有五个师被调过来；处处可以看到部队逐日开向华沙大公国的边境。但是，如果说波尼亚托夫斯基为拿破仑提供了赶紧调兵遣将的时间的话，亚历山大却并未感到对自己的打算确有把握。因此，在1月8日他又对恰尔托雷斯基（他由于需要金钱而对亚历山大感恩戴德）提出要求：恰尔托雷斯基应把波兰人拉到俄国一边，俄国军队就可以不打一枪地进驻奥得河畔，这样就可以决定普鲁士人投入反法战争。这位亲王于是又一次指出：如果要想赢得他的同胞们的拥护，沙皇至少应该正式

承诺重建波兰王国，明确规定王国的边界，并且接受1791年的宪法。亚历山大只答应把俄占波兰各省，如果可能的话，再加上加里西亚，给波兰王国；至于王国的内部制度，亚历山大只允许自治，而不提宪法。

在这期间，亚历山大瞒着鲁缅佐夫（因为他反对战争并且总是倾向同拿破仑和解），而展开秘密外交，对瑞典、普鲁士特别是对奥地利进行了试探；2月13日，他向梅特涅建议把多瑙河两公国给奥地利。这些试探都沒有取得成果。恰尔托雷斯基不得不承认波兰人不愿背叛法国皇帝；梅特涅拒绝了沙皇许诺的礼物。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买到一份由艾斯曼纳尔伪造的尚帕尼的备忘录，其中的结论是要消灭普鲁士的存在，这位国王惶恐不安，以致在5月间哈登堡向法国提议结成联盟。变成了瑞典摄政王的贝尔纳多特正在寻求补助金，他指望从他的祖国获得一笔钱；他向拿破仑新派来的大使阿尔基埃提出，他准备派出五万人组成的一支部队参加对俄作战，条件是把挪威让给瑞典。此外，来自许多不同国度的法国皇帝的敌人也开始向沙皇左右汇集，如果说，其中主张先发制人采取进攻者大有人在的话，尤其是阿姆费尔特，但是反对发动进攻者也不乏其人。普鲁士人法尔建议，在德维纳河① 与第聂伯河之间深挖战壕，以便从侧翼攻击向莫斯科挺进的法国大军。当时还沒有决定实行有秩序的撤退；但是已经决定放弃采取攻势，军队都就地据守。 385

科兰古什么也沒有察觉出来。相反地，波兰人感到惊恐不安：波尼亚托夫斯基派了一个副官去见拿破仑，继之在去参加罗马王的洗礼途中，他向德累斯顿政府发出了警报。达武起初还不相信，后来在事实面前就相信了。在整个4月里，皇帝经常保持警惕状态；从15日到17日，在罗马王诞生之后的庆祝活动中，他采取了

① 德维纳河即今拉脱维亚的道格瓦河。——译者

很多项军事措施：已经动员的波兰军在一得到战争警报信号时，应立即撤出大公国，而在奥得河上同达武与萨克森军汇集起来。尚帕尼可能是要对这次意外事件负责而被撤职，由马雷接替他；拿破仑下令同普鲁士、瑞典、土耳其进行谈判；他本人亲自同施瓦岑贝格谈判结成联盟的问题。五月间，消息又变成都是令人安心的。鲁缅佐夫确曾获准重开谈判，以便为奥耳登堡公爵取得补偿，希望能将华沙大公国的部分土地割让给他；他本人和他的主上都不曾明白说出，但是皇帝一听就明白，于是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然而，彼此仍在继续争论，又一次建议把埃尔富特给这位公爵，而给俄国的是上一年提议的关于波兰的条约；沙皇的回答是一些不满的怨言，而没有具体摆出自己的要求。6月5日科兰古回到巴黎，立即386受到拿破仑的接见；科兰古愿意保证亚历山大的忠诚，要求对亚历山大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接替科兰古大使职务的洛里斯顿也使拿破仑确信亚历山大仍然是爱好和平的。然而，科兰古也指出，亚历山大一旦受到攻击而决定把俄军向后撤退，把法国大军吸引到无边无际的大平原上，在那里严冬就会消灭大军。皇帝回答说："打一场漂亮的胜仗就会使你的朋友亚历山大清醒过来。"这两个敌手在争取时间这一点上似乎取得了一致看法，一个是要完成准备工作，另一个是要争取同盟国，这些国家到现在为止仍采取回避态度；这两个人都同样坚决要迫使对手投降。拿破仑并不排除对手有不战而降的可能，但是他迫不及待；8月15日，他对库里亚金大发雷霆，过了不久，他就确定到1812年6月发动战争。

亚历山大的消息比较灵通。涅谢尔罗杰和车尔尼舍夫长时期以来已经收买了法国陆军部的一些雇员。塔列朗向此二人的君主沙皇要钱，对此二人频频出谋献策；正是塔列朗提示了把多瑙河两公国送给奥地利；塔列朗一再坚持认为俄国必须同土耳其媾和，并且应同贝尔纳多特取得协议。科兰古本人也不拒绝塔列朗的意

见，而涅谢尔罗杰写道，塔列朗的所作所为“足以证实他不负路易斯（即指亚历山大）对他的信任”。塔列朗还向俄国人建议采取守势，而避免先把战争推进到德意志，以便能以被压迫、奴役的欧洲的捍卫者的姿态出现。亚历山大的奸诈狡猾使他扮演这样的角色非常合适，而在外交竞技中，拿破仑或许由于冲昏头脑，或许由于漫不经心，以致让亚历山大连赢数局，占了上风。

二、外交活动与大军的推进

普鲁士起初给俄国一些希望。拿破仑对普鲁士国王的善意置之不理，7 月 16 日国王决心谋求沙皇的援助；他派遣了沙恩霍斯特到沙皇那里去，10 月 17 日签订了军事协定；在这段时间里，普鲁士尽其所能地动员军队。主战派又活跃起来。格奈森诺当时担任代理总参谋长，编写了一份备忘录再次鼓吹举行一次全民起义。在布拉格，施泰因和前任柏林警察总长格吕纳同“道德协会”的一些分会取得联系，而“道德协会”原是普鲁士国王已经宣布解散了的；在柏林，他们也利用昂普蒂达以及明斯特伯爵和哈登堡男爵（普鲁士大臣哈登堡的亲族）的其他代理人充当中间人，这位男爵是英国选派作为汉诺威的代表而驻在维也纳的。 387

可是，普鲁士国王又一次使施泰因和格吕纳陷于失望。沙恩霍斯特带回来的军事协定规定，如果法军侵入普鲁士王国，普鲁士军队就撤退，或撤到维斯杜拉河上同俄军汇合在一起，或者据守在各堡垒里面；如果柏林只简单提出请求，亚历山大甚至不愿就下令俄国将军率军深入东普鲁士。弗里德里希-威廉认为这样冒的风险过大；他又派遣沙恩霍斯特到维也纳进行试探，这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正如可以预料到的，12 月 26 日，梅特涅毫不迟疑地予以谢绝。从这时起，除了向拿破仑屈服而外，别无他法。而在拿破仑

这一方面，他的驻柏林大使、原籍皮埃蒙特的圣马桑使他消息很不灵通；但不管怎样，最低限度他在普鲁士的警探要他警惕，9月4日，拿破仑下令哈登堡解除武装。这位大臣当时正在等待沙皇的答复，于是满口承诺，而并不履行诺言；10月间，他不得不接受法国的一次检查。最后，12月29日，他只好服从，并宣称准备同法国结成联盟。这时皇帝并不急于结盟；到2月23日，普鲁士大使克吕斯马克终于被突然召去签订条约，他立即遵命办理。他签得正是时候，因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要去占领他的国家，3月2日，居丹越过了边界，这时普鲁士国王还不知道联盟条约已经签订。他在3月5日批准了这个条约：普鲁士应听任法国大军驻扎该国，为大军提供各种给养，所有费用在战争赔款中扣除(赔款还远未付清)，并派遣一支两万人的军队到俄国去。从此法国第九军团司令维克托成为柏林的唯一主宰，普鲁士国王的部队应从柏林撤出。这对施泰因的朋友们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看来王朝的威信扫地以尽。沙恩霍斯特获准引退；格奈森诺出使伦敦；博于恩、克劳塞维茨以及许多人士亡命俄国；5月间，施泰因离开布拉格，应亚历山388大的邀请去了俄国。

虽然梅特涅曾不吝进言，多次劝告沙皇避免对法战争，梅特涅对战争的结局总是提心吊胆的，因为战争的结局不论谁胜谁败，势必把他置于战胜者的摆布之下；当时，奥地利毫不犹豫地也倒向法国这一边。12月17日，施瓦岑贝格被召去缔约，双方立即达成协议：拿破仑用伊利里亚各省去换加里西亚，他并保证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奥地利答应提供一支三万人的军队；1812年3月14日，双方签订了条约。然而，在维也纳主战派又在恢复活动，梅特涅的朋友和秘书根茨自从1809年9月主和以后已经被英国打发走了，他草拟了几份反对大陆封锁的备忘录，以此力图再得到英国的财政援助，这些备忘录中，有一份是送给沙皇本人的。但是梅特涅是不

愿让人牵着鼻子走的。他甚至利用这种情势彻底搞垮普鲁士民族主义派，他把这些人看成是革命的先头部队。虽然哈登堡慎重对待他的政敌，当5月底他在德累斯顿会见梅特涅时，他答应助梅特涅一臂之力；8月，格吕纳在布拉格被逮捕。

因此，亚历山大对德意志人的态度无从感到庆幸。既然从前他自己也曾迫于形势而屈从法国，他也就不能责怪德意志人。亚历山大知道，只要局势一有转机他们就会抛弃拿破仑。何况梅特涅(在亚历山大眼里此人最值得怀疑)由于相信俄国保不住多瑙河两公国，正迫不及待地想取得双重保险，因为齐查戈夫对多瑙河方面军谈过想同土耳其人结成联盟，并发动斯拉夫人和匈牙利人从背后攻击奥地利。圣朱利安伯爵通知沙皇，奥地利对他作战只是形式上的，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增派援军；6月2日，奥、俄签订了秘密协定。在与法国皇朝联盟为烟幕的背后，梅特涅在玩弄两面手法，这种手法保证了奥地利的安全，同时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到来。

由于拿破仑的过失，亚历山大从瑞典人和土耳其人那里取得更多的成功。法国皇帝似曾深信，无论瑞典人或是土耳其人必然会自动投向他这一边来；也许他只想到最后关头才同他们谈判，正如他对待普鲁士和奥地利一样，以免促使俄国人采取攻势。但是，亚历山大抢到了前头。在1811年，法国和贝尔纳多特的关系恶化起来，阿尔基埃大使个人在其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知道瑞典不顾他 389 多次抗议仍公然破坏大陆封锁时，阿尔基埃擅自决定断绝外交关系，并且在8月25日竟对瑞典摄政王大发雷霆。皇帝召回了他，但是也没有设法争取贝尔纳多特，从此贝尔纳多特决定倒向俄国一边。1812年1月，达武接到命令去占领属于瑞典的波美拉尼亚以杜绝英国的贸易，这是致命的打击。2月18日，勒温海尔姆伯爵向彼得堡建议结成同盟。贝尔纳多特愿意派兵到拿破仑的后方，

在德意志登陆，条件是俄国部队必须先帮助他征服挪威。亚历山大接受了建议，交换条件是首先向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六世征求同意，并让他得到补偿，例如给他奥耳登堡。亚历山大派遣苏什捷连到斯德哥尔摩，双方在两国首都讨论有关的细节问题，每一位全权使节都力争取得先达成协议的荣誉。他们几乎同时签订了协议，一个在4月5日，一个在4月9日。

至于土耳其苏丹，亚历山大从1811年起就跟他进行谈判。在1809年巴格拉吉昂取得胜利以后，俄土战争打打停停地拖延着。土耳其人从塞尔维亚撤退，塞尔维亚曾一度转向法国，在卡拉-格奥尔吉发动政变清除了奥地利势力和他的政敌奥勃雷诺维奇以后，又回到了同俄国结盟的政策。卡明斯基在1810年的一次胜仗中攻下了多瑙河上的那些要塞，而向苏姆拉推进；在高加索，俄军攻下了伊美雷提亚和明格雷利亚；苏呼米-加来和阿哈耳卡拉基都被俄军征服。① 最后，在1811年，库图佐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把已经在鲁斯丘克附近渡过多瑙河的土耳其军队分割成两部分，包围了三万六千敌人，除非以让俄国并吞直到塞列特河的比萨拉比亚这一条件作为谈判基础来缔结和约，否则他不肯签订停战协定。10月25日，在朱尔朱开始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因为土耳其人最大限度只能让俄国并吞比萨拉比亚直到普鲁特河为止，并且拒绝授予塞尔维亚自治权。1812年1月12日，两国在布加勒斯特重开和谈。斯特拉福德·坎宁尽了最大努力促使苏丹马赫穆德议和，但也无效。最后，当法国入侵已迫在眉睫时，亚历山大才下令让步，5月28日和约签字。库图佐夫的后任齐查戈夫得以挥师北上，而俄国在亚洲的军队则转而对波斯作战。

① 伊美雷提亚在今苏联格鲁吉亚西部沿黑海地区；明格雷利亚在格鲁吉亚西南部；苏呼米-加来即今格鲁吉亚西北部的苏呼米；阿哈耳卡拉基即今格鲁吉亚南部的阿哈耳齐赫。——译者

自从1811年夏季以来，拿破仑的各路军队云集德意志，到1812年年初，随时皆可集中并进驻涅曼河上。但泽已变为一个储 390 备丰富的基地，拉普统率二万五千人据守其地。波尼亚托夫斯基以六万人屏障维斯杜拉河；达武指挥十万人部署于奥得河上，其前卫且已渡过奥得河；乌迪诺率军穿越威斯特法利亚，而于3月28日进入柏林；内伊率领布伦大营部队抵达美因兹；德意志各邦军队纷纷开往易北河；驻守于法国本土东部的近卫军整装待发。意大利驻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前来，困难独多；2月初拿破仑颁布最后军令，23日欧仁开始上路，全军齐出发。为了阻挠俄国的间谍活动，萨瓦里故意给车尔尼舍夫制造麻烦，成功地激使他于2月26日离任，警察在他的寓所发现一张便条，它提供足够证据枪决了陆军部里的一个叛国犯，此举在公共舆论面前大损俄国的声誉。

在5月底以前，法国军队还不能密集到涅曼河上。可是亚历山大现在已经知道贝尔纳多特很可靠，在4月8日终于决定开列他的要求：拿破仑应首先撤出普鲁士和瑞典的波美拉尼亚，把军队撤退到易北河以西；然后再谈判缔结贸易条约，并解决已经答应过的给奥耳登堡公爵补偿的问题；但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中立国的贸易自由应予尊重。拿破仑一再拖延同库里亚金的谈判，一直拖到5月7日；在这期间他试图先摆脱西班牙事件，4月18日，他向坎宁建议签订以"实际占有"为基础的和约，唯一例外是葡萄牙应归还其王朝；西西里仍为费迪南所有，而西班牙仍归约瑟夫；英、法两国应同时从这三国撤军。英国拒绝让约瑟夫仍留在马德里。当库里亚金要求最后给一个答复时，皇帝一句话也沒说，在5月9日离开了圣克卢，翌日，马雷跟踪而去，也未作答复。纳博纳已经出发去同亚历山大谈判：他在维尔纽斯找到了沙皇，但沒有谈判就被沙皇辞退。5月25日，皇帝到达德累斯顿；他在那里接见了奥地利皇帝、普鲁士国王和许多附庸国君主。28日他出发去涅

曼河。

大冒险开始了。从这场冒险中，拿破仑或是将变成整个欧洲的统治者，或是彻底垮台。他又一次在孤注一掷了。

第五编　1812 年的世界

391

第一章　帝国的法兰西

1812 年，法兰西帝国面积约七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四千四百万，全国划分为一百三十个郡。拿破仑在共和国为他遗留在自然疆界內的一百零二个郡之外已经逐渐增添了领土，这些增添的领土形成两只向东北和东南方向延伸的触角；东北边是荷兰组成九个郡，还有北海沿岸德意志各邦组成另外四个郡：帝国的版图从这里通过以卢卑克为首府的特拉弗河口郡直达波罗的海；东南边是伐累、皮埃蒙特、利古里亚、巴马、托斯卡纳和教皇属邦西部，共十五个郡。这些新近合并的地区大多数远沒有完全同化，还更多地具有附庸国的面貌；此外，荷兰有一名总督，托斯卡纳也有一名；德意志各邦组成第二十二军区，仍然受一个特别委员会的统治；至于伊利里亚，尽管已并入帝国，但一直是单独管理，而且其领土的划分根本不列入一百三十个郡之內。总之，除了较早合并的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以外，拿破仑的治理“体制”只能在自然疆界的范围內正常推行。

这个体制从来沒有一成不变过。从 1804 年至 1811 年，拿破仑不断地修订各项制度。从他在不感到受革命传统约束的附庸国里所进行的试验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逐步完善”的阶段并未结束；尤其是法国的社会还未形成拿破仑所期望的形态。尽管拿破仑的工作还沒有完成，然而到了 1812 年法国的社会已进展到相 392

当程度，使人足以看出它的精神。

一、专制政府

胜利已经逐渐改变了皇帝其人及其习惯。提尔西特和约之后就很难辨认出那个颧骨突起，面色阴沉，完全象戴了罗马面具一样的雾月政变人物；现在面色温和；安详使其面貌舒展。活动并未减轻，但是变得井然有序。最迟八点钟他就到办公室工作，仅为午餐才稍有中断，通常是单独进午膳，每周散步或狩猎一二次；六点钟与其家人共进晚餐；谈话片刻之后又回到处理他的公务中去，九、十点钟就寝。星期日是举行隆重典礼的日子：弥撒和阅兵之后接见廷臣，根据宫廷的繁文缛节，严格按官阶排列并穿戴华丽服装的廷臣在各厅殿内肃然伫立等候着皇帝；晚上是盛大的家庭宴会，宴后皇帝和皇后举办音乐会或戏剧演出，并接见谈话。

393 到了 1810 年，年岁变老的征象在他身上开始略微有所显露：面容丰润，肤色微灰，身体微弱并发胖；某些迹象不禁令人猜想到帝国过分广大的面积使他操劳过度，他写道：“我难道没有颁发过这个命令吗？”这并算不了什么；直到最后，他仍是惊人地精力充沛，神智明敏。更明显的是无限的权力对他的精神面貌的影响；自信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自满自负，头脑昏昏然：“我的意大利臣民对我有足够的了解，该不会忘记我小手指头知道的东西比他们所有脑袋加在一起知道的还要多。”悲观的思想使他变得粗暴：“我一直注意到老实人无用。”他崇拜强力和成功到了玩世不恭的地步：“要主宰世界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要强大，因为力量强大就无所谓错误，也没有幻想可言；这是赤裸裸的真理。”“争取成功吧；我只以行动的结果来判断人。”因此自然而然地使他感到日益孤立，他日益清醒地意识到他的事业持久性问题。他对夏普塔尔说：“里里

外外我都是用我所引起的恐惧来统治的；”稍后又对莫利昂说："他们为了享有安全才投靠我；如果一切又成了问题，那么他们明天就会离开我。”他的末日将会引起人们什么样的感情呢？他说："人们将会说：谢天谢地！”

他的意志愈是无人敢于违抗，他就愈加变得固执己见和猜忌、易怒；他同弗里德里希二世一样，不断地加强政府的个人独断特性。从他颁发给那不勒斯王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的宪法看来，他的意图是最终取消选举原则。其实无论是选民或是议会都不会对他有所掣肘。体现普选权的乡区议会选举只是到1813年才举行，而且只是在几个郡举行。选举人团是在选举前通过私人关系遴选产生的，而且选举人参加选举者寥寥无几。1810年科多尔郡未能补足郡议会候选人名单，该郡的塞纳河上的夏提荣县县长亲自任命县议会；在立法职务方面，所有提名都是有利于官吏和军人的，只有一个人例外，而这个人就是贝利埃的岳父。官吏和军人在各级议会中逐渐占了优势。保民院于1807年被取消了，立法院的会期变得越来越短。拿破仑立法或者是采取元老院议决案的方式，如 394 征兵和领土的合并，或者是通过敕令的方式，象恢复烟草专卖那样。在各项法典尚未完成时，参政院保持有一定的活动；此后，参政院就剩下审理行政诉讼的职务，而只讨论执行方法的行政会议则保留了它们的重要性。

各部大臣的作用愈来愈遭削弱，他们的职权也在不断分散；“大军”设有兵站总监，“特别财务署”另设总管；征兵和粮食都另立机构领导。这个政权的高级行政大员相继见斥，首先是夏普塔尔，然后是塔列朗，最后是富歇；皇帝宁愿起用那些可以当雇员对待的克雷特、尚帕尼、比戈·德·普雷亚梅纽、萨瓦里、马雷等二流人物。在旧制度下曾任官吏转而归附拿破仑的人，在帝国政府中占有愈来愈多的职位。拿破仑相信他们是先已效忠新法统的，并认为

他们较为驯服："只有这些人才懂得伺候。"其中许多人缺乏才干或经验；因此他所看中的人很快就青云直上；比如莫莱，1806 年任查案官，1807 年擢升为郡守，1809 年升任参政官和公共工程局局长，1813 年晋升大臣；由此还担任了许多兼职。正是为了组成一批出身显赫，家道富有（故此官俸极为微薄），但是由他自己培养的后备官员，拿破仑才于 1806 年恢复了参政院的查案官——他一共任命了七十二名——并在外省和巴黎都增加了各级议会及行政部门的协理专员；1811 年，其中有三百五十人担任一般的职务。至于参政院，不能说拿破仑已将其构成的性质作根本的改变；1813 年，他还任命前国民公会议员赞吉阿科米（诚然他并没有投票赞成判处路易十六死刑）以及科芬纳尔[①]的兄弟担任查案官。拿破仑只清除了十二名参政官，只宣布革职两名，其原因和参政院的工作无关。但是事态演变的趋向还是明显可辨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帝国持续下去，将会演变到什么地步。此外，许多雾月党人随遇而安：他们接受了荣誉勋章并挤身于新贵族之列；其中某些人甚至建立了贵族长子世袭财产。

395 郡守人选更换的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科多尔郡的郡守最先是一位前制宪议会议员，接着是一名保民院成员，以后是莫莱，最后于 1812 年这个职位移交给科塞-布里萨克公爵。[②] 此外，大革命的幸存者象让邦·圣安德烈那样对过去的革命事业矢志不移的诚属凤毛麟角。在马赛，蒂博多出于明哲保身和利禄熏心，并在他 (43)

---

① 科芬纳尔-迪巴伊是罗伯斯庇尔派的雅各宾党人，1794 年为巴黎公社（革命市府）的领导人之一，热月政变之夜，曾率一队炮兵营救罗伯斯庇尔派的国民自卫军司令安里奥，但未能挫败热月反动。拿破仑在参政院仍重用大革命时期的活跃人物，可见参政院的构成未变。——译者

② 科塞-布里萨克是法国旧制度时期的世家豪门，十六至十七世纪出过三个元帅。拿破仑重用旧王朝归附人员的趋势，举出这个姓就是有代表性的。——译者

妻子的影响下，变成了反动措施的主谋。[1] 这些郡守跟着主子亦步亦趋。起初，郡各级议会还否决某项支出，检查帐目，提出各项建议；但是由于否决的经费被官方强行通过，提供作证的文件遭到拒绝，提出的建议无人理睬，各级议会也就意气消沉了。通过填补空额对议员陆续进行清洗；1809 年，在罗纳河口郡，郡议会出缺七名，一下子就补进了六个贵族或官员；在加来海峡郡，阿图瓦贵族纷纷进入了郡议会。[2] 郡政务厅人员和县长的更换也是如此。从北滨海郡看来，革命人士在西部能够坚持保住职位，因为西部的舒安分子依然十分猖獗。至于公社一级的市政府，困难始终是难于找到能力相当的人充任公职；市议会的成员经常不能满额，或是不足法定人数，难以召集会议；至少应该有一个市长，结果郡守不得不起用大地主，即使他们是敌视现政权的。关于小职员、秘书、乡警等情况就更糟糕，所有的行政机关大抵如是。人民当时还不能提供受过相当教育，并能廉洁奉公、称职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官吏。某些郡守试图通过派出巡回秘书或视察员来实现直接管理，如下来因郡、加来海峡郡、默尔特郡都曾试行；但是他们不得不要各个已经负债累累的公社来偿付这些人员的薪俸。因此我们不能无视当时地方行政机构中种种不够完备之处；地方行政机构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改善。但尽管如此，它们为拿破仑提供了他所要的一切：金钱、人员、维持秩序。

要知道中央集权实现到什么程度，这却是一个问题。自共和十一年起，郡守为没有留给他们较多的主动权而发牢骚，他们指出，由于必须和中央各部通信联络，他们有时接到相互矛盾的命

---

① 让邦·圣安德烈和蒂博多都是前国民公会议员，后在执政府和帝国出任郡守，但前者不改初衷，后者晚节不终。——译者

② 阿图瓦为法国旧省区之一，路易十四时并入法国，以阿腊斯为首府，1790 年废省改郡后大部划入加来海峡郡。——译者

令；他们的部下也抱怨，由于事事要向巴黎请示汇报，以致许多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然而，某些郡守相当大胆放手行使他们的职权，包括发出即刻逮捕的“密札”；1805年，德·布里在杜郡擅自发行一次强制公债。皇帝指责他们扮演了暴君的角色，这个指责眞是好笑，而各部大臣有时也对这些郡守表示不满。内政大臣蒙塔利韦于1812年写道：“一般地说来，各郡守愿意怎么说就向我怎么 396 说，愿意说多少就说多少。但是我看得更清楚的是：我们对下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当拿破仑眞正想了解情况，或是“重新发动机器”的时候，他就象救国委员会那样派出一些特派专员；1812年就是这样。此外，中央权力在各郡还受到当地的或不是出生当地的重要军政人物的潜势力，尤其是主教的势力的抵制，主教虽然不公开对抗中央权力，然而却干预地方官员的遴选和行政管理的细节。总的说来，可以说中央集权比1789年以前推行得更严厉，但是由于交通缓慢，郡守还能保有独立性，所以中央集权的程度根据距离远近、情况不同和郡守个人性格而有所不同；随着执政府时期各郡守的相继去职和国家的安定，中央集权取得了进展。

司法部门的改组一直坚持不懈地继续进行。人们很快就对共和八年比较仓促挑选出的人员啧有烦言。拿破仑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改进招聘人员的办法：共和十二年，他创办了法律学校，1808年增设了具有咨询权的见习法官。从1807年起他就认为清洗司法人员的时机已到，一项元老院决议案把这项工作交给一个委员会办理；在一百九十四名被揭发的法官中，该委员会建议撤换一百七十四名；事实上，1808年3月24日的敕令撤了六十八人的职，批准了九十四人辞职。与此同时，法典的编纂工作正在完成。民事诉讼法是在1806年完成的；商法于1807年，刑事诉讼法于1808年，刑法于1810年完成；农法也已编纂，但是沒有颁布。在这些法典中，1789年的精神沒有完全消失。参政院保持了大革命的社会

成果，丝毫未予削弱；参政院尽力把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分开，确保法官的独立性，坚决维持判决陪审团制度。但是同时资产阶级也可以信赖参政院保护他们的财产权和势力，只要它们不损害参政院视为公益的国家权力；参政院所有成员，不论是革命人士还是旧政府的人员都出于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或是阶级利益，毫不犹豫地愿意牺牲他们的原则。波塔利斯说：需要就是法律；贝利埃证实道：沒有任何一条理论不向需要让步。这些特点已经表现在《民法典》上；以后的几个法典更为显出这一反应。

397 最初的两部法典很近似科尔贝尔的各项法令。特别是《商法典》不很适应经济发展的情况，譬如有关保险和公司这两方面就不很适应：虽然《商法典》仍然把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批准范围只限于承认合名公司与合资公司，但是《商法典》至少已认可合股者的责任以所投入股份为限，而在此法典颁布以前的判例对这点是不明确的，某些判决强制合股者以其本人全部财产承担公司的责任。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期票的讨论。由于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信贷的发展，也就是取决于银行的安全，有些人主张一个私人在拒绝清偿本票的情况下应视同商人，因而得受拘留处分，责令清偿。莫莱却成为反对派的热烈的代言人，他认为：这样做是仿效英国，是为了对少数自私的商人和银行家有利而牺牲了人身自由，因而是背离了普通法；法国无疑应该经营商业，但是首先应该基本上还是农业国。这些反对派明确地指出：如果受贸易和金融方式的支配，公民们就会把积蓄作为终身年金存入这些机构，把总是不稳定的动产财富放在首位：这就不会再有大家族和阶级，从而势必慢慢地破坏君主制度的基础。这是一些能够诱惑拿破仑的理由，尤其是在这个时候。然而拿破仑的睿智豁达占了上风，他主张折中的办法：决定私人如果进行商业交易而签署了期票，那么他就可被视为商人处理。

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主要是最后两部。这两部法典于1810年开始实施，就在这个时刻，4月28日的法律又一次改组了司法机关，赋予它以后保持很久的形式，唯一的例外是这个法律所赋予区首府以外各市长的违警管辖权，不久就被剥夺了。这一法律规定了任命法官的方式和条件，以及有关他们的纪律；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又进行了一次清洗：巴黎上诉法院的三十一名法官被清洗了八名。这些变动似乎并非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但是司法部门人事构成的变动也和其它部门一样，朝同一趋向演变；在贝藏松，旧高等法院的两个院长和五个法官又进入了法院。不管怎样，革命人士在司法部门更好地保持了他们的权力，因为司法人员是终身任职的，只有几次清洗是例外的情况。

398 镇压机构还在加强。检察院得到确定的组织形式；预审完全是秘密进行的；保安法官没有了，起诉事务集中在检察长、总辩护官和预审法官的手里；郡守又取得了任命判决陪审团的权力；起诉陪审团取消后，它的职能转移给上诉法院中的一个法庭。特别法庭以"普通特别法院"名义保留了下来；但是只有军人充当法官了；此外，在陪审团暂停时或镇压某些重大罪犯时，还设有"非常特别法院"；在1810年这一年出现了"海关特别法庭"。按照宪法规定，元老院还能以有损国家安全为理由而撤销陪审团的判决；1813年，元老院把刑事罪法院已经释放的，被控告走私的安特卫普市长移送到一个特别法院。至于刑法，虽然不恢复拷打酷刑，但恢复了烙面、枷刑、对弑父母罪犯的砍手刑，以及剥夺全部公民权。

尽管加强了刑事制裁，帝国和执政府一样并不单独依靠它，而是更依靠行政镇压措施，也就是说依靠警察。先是在大臣富歇，以后到1810年在大臣萨瓦里的领导下，由负责各"警务区"的参政官执行；自1808年起，还在都灵、佛罗伦萨、罗马和阿姆斯特丹等地派驻总督导官。中央集权化没有向前推进得很远。各郡守因为并

不只是听命于富歇，所以能保留自己的职权。各参政官和督导官都直接与皇帝通信联系，巴黎警察厅长杜布瓦（1811 年由帕斯基埃继任)也都如此。宪兵队有自己的长官，和警察相互竞争；1808 年下卢瓦尔郡的郡守指出：他们自命“是武装的法官，负责监视所有的文官”。在皇帝的心目中，理想的制度是对任何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都有一份包括最近情况的案卷。富歇已经编制了一份舒安分子的名单；拿破仑想制订一份全帝国的“个人表现和德行的统计资料”。他了解很多情况，但并非能洞察一切；郡守们本来最可以向他提供有关私人生活的情况，可是他们一般都很谨慎。告密者和拉瓦莱特的书信检查局依然是收集情报的主要手段。

警察局更为可怕，因为他们可以任意拘留，私设公堂；除了监狱之外，警察局还利用疯人院。诗人德索盖斯因为在 1804 年曾擅自发表了一首著名的讽刺短诗(“是的，伟大的拿破仑———一条伟大的变色龙”)，圣路易的一名住院实习医生富尔因为在 1804 年12 月 5 日颁发鹰徽时曾高呼：“不自由，毋宁死！”两人都被当作疯子而监禁起来。全国人人自危，而军需供应商拉萨尔不但已被皇帝取缔买卖，而且还不经审判就被捕下狱。即使一旦被释放，事情也并未了结：很多人被指定住所并受到监视。最后，1810 年 3 月 3 日的一个敕令恢复了“国家监狱”，并规定监禁必须根据大法官，即司法大臣和警务大臣的提议，由枢密委员会下令执行；但实际上是很少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在拿破仑的眼里，行政拘留不仅是用来扼杀反抗力量，而且当陪审团受到恫吓或缺少法律上的证据时，还要用来惩罚违反普通法的罪行。难怪人们说到“政治犯”，无不谈虎色变，对于警察无法无天、滥用职权，也是看得清楚无误的。下卢瓦尔郡郡守指责宪兵进行欺诈、勒索甚至谋杀的行为，他宣称：人们对宪兵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很难提出证据来反对他们”。郡守们自己对有势力人物的要求也只得让步，1808 年，旧军官德斯

399

皮努瓦·德·圣吕克准将只根据市长，即他自己的债务人的口头命令就在索姆郡被捕。因此，1810年的敕令指令对各监狱每年进行一次检查。但并不是所有的监狱都受到检查，而皇帝也只审阅一部分案卷；1811年，在被提出审核的八百一十个犯人中，皇帝释放了一百四十五人；1812年，在三百一十四人中释放了二十九人；1814年估计有二千五百名囚犯。至于元老院负责维护个人自由的委员会，它并不主动要求调阅囚犯的名单，而只是在接到请愿书后才进行干预；1804年，委员会在一百一十六名请愿者中使四十四人获得了释放；富歇的消极抵抗很快就使委员会感到沮丧。总之，从1800年到1814年法国生活在嫌疑犯法律①的制度下；但是拿破仑注意在执行时不要扩大化，他明白恐怖如果只打击一小部分人就不会引起反对，而且也不会因此而影响其效果。

400 能说会写的人特别引起注意。法兰西科学总院曾如此信赖拿破仑，也未能得到宽待；自1803年起取消了政治和伦理学部；1805年拉朗德重印了马雷夏尔②的《无神论者字典》之后，皇帝谴责他"老迈昏庸"，并且禁止他出版任何作品；夏托勃里昂就任法兰西科学总院院士的演说词（其实已禁止他宣读）激怒了拿破仑，拿破仑威胁要取缔语言和文学学部（即革命前的法兰西科学院），斥之为"一个讨厌的俱乐部"。每个沙龙里都有警察局的密探，院士艾斯曼纳尔也是其中之一。至于律师，拿破仑憎恨他们："这是一伙肇事分子，是罪恶与叛逆的祸首……我想把那用来反对政府的律师舌头割下来。"1804年，他强制律师向法庭申请注册；直到1810年12月14日他才又准许他们选出律师公会会长和一个纪律管理委

① 嫌疑犯法律是1793年9月17日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律，是雅各宾专政的重要恐怖措施之一。——译者

② 西尔万·马雷夏尔（1750—1803年）在1789年革命前已是有名的无神论者、诗人、政论家，大革命期间先后加入过"社会小组"、艾贝尔派，反对过罗伯斯庇尔；1795年加入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运动，《无神论者字典》是他主要著作之一。——译者

员会；即使那样，他们还是只能向检察长提出候选人，法庭也还是有权惩处他们。

拿破仑同样地讨厌"印刷品，因为它诉诸舆论而不诉诸当局"。他写信给欧仁说："必须印刷得很少，越少越好。"从1805年开始，各报必须向警察局呈报帐目，并缴出三分之一的收益，以支付负责监视它们的政府代表的薪俸；1807年夏托勃里昂的一篇文章使得《信使报》遭到取缔；1810年8月决定每郡只许有一种报纸，因此一百多种报纸停刊了；10月，萨瓦里迫使巴黎的报刊减少到四种，其中还包括《政府通报》；1811年2月，这四报之一的原《论辩报》从贝尔坦兄弟的手中夺了过来，因为他们有私通英国的嫌疑，该报改组为合股经营，警察当局取得了三分之一股份，改名为《帝国报》；9月，《巴黎日报》和《法兰西报》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为了控制书籍的出版，1805年再次强制印刷商领取可撤销的个人执照并宣誓效忠；警察当局可以随意决定沒收他们的印刷品；富歇在他原有的新闻局外，又增设了一个咨询局，进入该局的有勒蒙泰、拉克雷泰尔和艾斯曼纳尔。

正式的书报检查可能比警察专断的行为较为可取；1810年2月5日，皇帝终于决定建立正式的书报检查制度；他成立了出版管理署，首先委派波塔利斯的儿子主持，然后是前郡守波默勒尔，并设立了一些"帝国检查官"，其中包括一个神学家；在外省则郡守仍有检查书报的权力。与此同时，巴黎的一百五十七间印刷所关闭了九十七间；最后，书商也得领取执照并宣誓效忠。正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书报检查当局利用职权来掩护自己的武断行为，并恣意滥用职权：它不仅表现在维护"高卢主义教会"、反英和多疑时达到荒谬的程度，而且竭力假装正派，深恶痛绝它所不喜欢的文体，例如历史小说之类。1811年12月，拿破仑为此大为生气：书报检查应只限于取缔诽谤文字，"在其它方面应准许自由议论"。这个训斥

401

产生了效果：1811 年将近百分之十二的手稿被禁止出版；1812 年这个比例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在这一点上，拿破仑又比他的属下人员显得更为开明些，事实上这对他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保持了开明专制的最优良的传统。但是，政府依然反对阅览室、租书店，尤其是反对卖书的小摊贩：因为它认识到历书和通俗彩画的重要性，并且也不放过识字课本。元老院也设有一个维护出版自由的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毫不起作用。至于戏剧界是各派常易发生冲突的场所，也不能幸免。1805 年拿破仑要求富歇"从公众道德上"对莫扎特的《唐璜》发表意见，而布里福写的《唐桑切》由于西班牙战争而不得不把剧名改为《亚述的尼纳斯》。

总而言之，帝国政府发展并改善了执政府工作，同时也加强了执政府的专断性。公众的任何自由权利不复存在，但信仰自由除外，因为宗教的不容忍势必使国家失去优秀的公职人员，从而会有损于国家；而且还不应该攻击众所共奉的宗教，不应该公开主张无神论或参加分裂的"小教会"。帝国政府的专制并不使刚刚经历过旧制度和革命风暴的法国人感到十分惊讶；再者他们知道其它国家处境几乎相同。帝国政府所独具的特色就在于机构简单，能迅速调整机器：这种特色要归功于大革命，因为大革命扫清了旧制度的各种混乱的机构和种种特权，才有可能建立新的机构。

402

二、财政与国民经济

金钱是战争的命脉，何况路易十六的先例已经证明，国家财政的一次危机可能对政权是个致命的打击。开明专制君主的模范弗里德里希二世对财政就一直非常小心；他比较喜欢间接税，因为间接税较易征收，能提供更正规的收入，也更受统治阶级的欢迎。拿破仑也是这样干的。从 1804 年到 1812 年他减少了土地税和动产

403

税，这样做对他有利之处是把立法院的同意权沦为纯粹形式。此外他准备合理地分派土地税，最后于1807年着手编制地籍册，这就满足了1789年陈情书中的主要要求之一；拿破仑为此项工作花费了五千五百万法郎，但能完成此项工作者不超过五至六千个公社。

一开始，戈丹就曾向拿破仑建议恢复消费税；但是这种税收是如此不得民心，以致拿破仑在1804年以前不敢冒险恢复它。共和十二年风月五日(1804年2月25日)，设立了"综合消费税局"，由南特的弗朗塞任局长。首先开征饮料税，税率不高，但必须要有库存清单；在国家的许可下，大革命前承包捐税的"酒窖耗子"恢复了他们的职能；征税方法有所改变，税率于1806年和1808年有所增加。1806年又增征盐税以弥补取消了的中途转运税。在增加了烟草税之后，1810年终于恢复了烟草专卖。这一年，"综合消费税"的收入似乎明显地超过直接税的收入，关税还不计算在内。人民的不满情绪十分强烈，激起了不止一次的骚动。另一方面，有产者可以察觉到直接税的减轻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国家的一部分支出转移到了地方预算的项目上，譬如一部分的宗教经费、土地清查、运河、乞丐收容所等费用；1810年郡守的一半薪俸也转由地方负担。把百分之一附加税加起来，北滨海郡在共和九年缴纳了二百四十八万九千法郎，在1813年付出了三百四十二万三千法郎。为了使各公社的市政府能生存下去，还必须增加入市税。另一方面，大量部队来往调动需要安排住宿，不止一个郡守——例如莫莱——恢复了修路徭役。尽管拿破仑表现得十分节省，总的说来他还是增加了法国人的负担。负担增加的原因很少是由于民政支出；各郡公用事业领到的经费是这样少，以致公路、学校和救济事业均进展很少；北滨海郡由于缺少经费不得不削减开支，因而把大量纸张都费在一再抄写缩减各项计划方面。从1807年开始，大约 404

有三千五百万法郎用于公共工程；但是受益地区很少。法国人负担增加主要是由于皇室经费、宗教经费、国债，而最主要是由于战争，因为尽管敌国分担了颇大一部分战费，战争始终要耗费至少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收入。

虽然说国库由于1806年的改革而避免了以前历届政府的危险，然而国库从来都不是宽裕的，因为无力举债：这就是法国的财政与英国的财政的主要区别，这个区别比1789年以前更明显。惟有还债金库得以发行几百万公债券。虽然还债金库有很可靠的收入，虽然拿破仑为荣誉军团，为了购置元老院议员庄园，以及为了他所赏赐的那些不得出让的世袭恩赏等而购买了这种公债的一大部分——以致1809年在五千八百万公债中只有三千三百万留在私人手里，而公债市场也一直在受限制，——但是这项公债的行市依然很低，销售势头疲软。因此，只好采取各种临时办法：增发证券；铸造了一些货币；1807年和1810年为军费先是提供了八千四百万，后来却提供了四千五百万。最受欢迎的办法依然是把供应商预付的款项作为专款使用，而让他们等待一个时期才能获得收益，这是旧制度的老方法了，它引起高利贷投机活动和贪污行为，或引起以清查为借口而推迟核算帐目。政府不时地通过分发还债金库库券或公债证券来清偿一部分尾欠，这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强制公债：1813年就这样分发了一百万法郎债券来偿清从1801年到1808年的结欠。到拿破仑的统治末年，永久公债已达六千三百万，主要由于教会的津贴而产生的流动债务已达五千七百万。尽管如此，供应商还是势力很大，因为政府没有他们的预付款就不行。

如果考虑到当时种种情况的话，那么拿破仑的财政也算是尽可能好的了；但是显然从来没有平衡过。在公众舆论中，对财政最为不满的是不知道（并且以后也永远不会知道）实际情况，因为无

限制地延期支付就否定了预算;此外1807年恢复的审计院没有权力审查开支的合法性。如果皇帝竟告贷无门,那肯定是因为在多次宣告破产以后,投资者怀有戒心,还因为拿破仑的政策不能使任何人相信这个政权能持续下去;但是也因为他的财政管理总是秘而不宣的。与其要受资产阶级的控制,拿破仑宁愿不要他们的帮助。 405

再者,他面前还有更好的办法。正如弗里德里希二世曾为自己保留了西里西亚的收入并重新设立了"班长国王"① 的战争军费金库那样,拿破仑有他独自支配的财源:皇室经费,皇室地产,私有产业。他要保证自己有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至少是一亿法郎资金,他说一个君主有这样一笔钱就能对付一切意外。另外,由于不想单独用帝国的财力为战争筹款致使民穷财尽激起民怨,他必须在被征服的国家有一个财务部门,这个部门要由他一人作主。1805年10月28日,他创设了"军队财库"以征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赔款;据他的出纳官拉布伊雷利说,从1805年至1810年,战争赔款总共收入七亿四千三百万,其中三亿一千一百万是用来满足部队需要的。1810年1月30日,皇帝设立了"特别财务署",其总管是德费尔蒙;他接收"军队财库"向他上缴的余款,以及保管皇帝在附庸国为自己保留的领地和收入,当时估计共值二十亿,每年收入三、四千万。拿破仑利用这笔钱购买公债息票或法兰西银行和其它大企业的股票,以控制货币流通;1811年也用来发放工业贷款,而主要是用来犒赏部属或作为他们的年金。所以战争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财源;据说他在俄罗斯战役前夕曾经说过:"这也会有

---

① "班长国王"(Roi-Sergent)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688—1740年,1713年即位为普鲁士国王)的绰号,因为他虽身为国王,却亲自抓军队工作,事无大小,都要过问,象一个班长带一班兵一样。他节省其它一切开支,充实军费,扩充军队,成为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的奠基人。——译者

利于我国财政。难道不是通过战争我才恢复了财政的吗？古罗马不正是这样获得了世界财富的吗？”

对于法国来说，这是否有好处更是一个疑问。一部分人靠战利品发了财；黄金储备的增加是很有利的，预算暂时减轻。但战争对于纳税人来说并未因此减轻负担；尽管西班牙据说已经提供了三亿五千万，但是必须运送去至少同样多的供应品，这还不算每月二千四百万至三千万的军饷和被废黜的王公们的生活费，所有这一切都由法国开支，因为“军队财库”和“特别财务署”连一个小钱都不给。总之，如果说拿破仑就这样加强了他的个人权力，那么他的现金储备从来没有达到他自己所预期的数字，因为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花费掉一大部分自己的产业的收入。

406

不管他从战争中获得了多大的利益，主要问题还是要提高国内纳税的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点，开明专制君主都遵循重商主义的原理鼓励生产。拿破仑也是如此。一个独断专行的政府必然实行管制经济，各个方面继续要求恢复行会和商标。上层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仍坚持劳动自由，拿破仑比人们所说的更为尊重这种自由。在里昂，他只限于要家庭手工业者领取记帐手册。共和十二年恢复了织锦业和天鹅绒业的商标； 1807 年恢复了运往地中海东岸各国的呢绒的商标； 1810 年恢复了卢维埃的呢绒的商标； 1811 年恢复了肥皂的商标； 1812 年整个呢绒制造业的商标都恢复了；但商标仍然不是强制性的。对战争武器、火药、货币铸造和烟草实行专卖，这是出于治安或财政上的考虑。关于为了公用事业而征收土地，关于有害健康的企业以及关于矿业等的法律也是出于同样考虑：至于矿业，1810 年的法律已收归国有；但是还让私人开采，只有萨尔地区的矿产除外。为了同样的考虑，对面包业和屠宰业实行管制，这是回复到旧制度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执政府时期在巴黎恢复的面包商行会组织扩展到外省好几个城市；

1811 年巴黎肉商同业公会储蓄银行重新变为“普瓦西银行”，负责替本市提供预付给牧人的必需金额。根据酒商的请求，对酒商在首都的人数加以限制，酒商开业要得到警察当局的批准；酒的推销商和试味员的职业转为官方职务，由政府任命。

对于农业，则几乎放任自流。森林重新受到保护。但是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取消森林的集体使用权，也沒有利用地籍清查来强制或促进土地的重新调整：这是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必然要反对的方法。实行大陆封锁不过使皇帝要求种植某些作物，特别是要求用三万二千公顷，后来是十万公顷的土地来种植甜菜。出于对公共秩序的关心，使他正如在旧制度统治下那样，不得不在一定限度內在农民与消费者之间对小麦价格进行仲裁，或者是批准出口以提高小麦价格，或者是在 1812 年强制规定一个最高价格。 407

但是法律主要是用来对付工人的。这幷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因为 1791 年的法律已经重新规定禁止罢工和组织帮工联合会①。共和十一年的法律和刑法典只不过是确认了这些禁令；但是也恢复了工人手册和“雇主和工人”的条款。某些行政官员就走得更远了：在巴黎，警察厅长于 1806 年为建筑业规定了工作时数，在荣纳郡，郡守把木排工人重新编组起来，对他们强行规定了运费标准。但是参政院否决了关于学徒年限和工场章程的草案；大臣拒绝干预以批准曼恩-卢瓦尔郡青石矿的规章，以及巴黎地区造纸业和根特的鲍文斯纺织厂的规章。1806 年 3 月 18 日为解决雇主和工人间之纠纷创设了劳资纠纷调解委员会，但是工人却沒有代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仅仅是由于普通的法官根据法律是无权

---

① 指 1791 年 6 月 14 日制宪议会通过的“勒·沙白里埃法”，直到 1864 年才废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第二卷，第 246—247 页）——译者

过问的。作为不受政府控制的独立力量，新生的资本主义除了在某些方面还有所保留以外，可以独断独行：他们保持了对付工人的各种管制规定，并防止有碍资本主义的行会复活。

因此，在重商主义两项原则中，保护政策提到了首要地位。战争和大陆封锁关闭了国内市场，并使附庸国或盟国完全受法国人控制，因而比任何特定的措施都更为有力得多。农业丝毫没有从战争和封锁中获得利益，因为拿破仑坚持要控制小麦价格；相反地，农业更难出售其葡萄酒和烧酒。拿破仑和科尔贝尔一样，主要是奖励工业。他使用了各种办法，如举行博览会，政府订货，嘉奖有发明创造的人，有时也拨给厂房或贷款等等，但是他决不给予特权，而对金钱抓得很紧，只在危机期间才允予借贷，这与其说是为了工业家的利益还不如说是为了避免失业；他认为，对工业家最大的帮助就在于增加法兰西银行贴现来降低利息。他关心产量有过于关心成本；可是由于机器使英国获得了好处，所以他为技术发展做了很多工作，他帮助道格拉斯在巴黎建造了一所毛纺机械厂，设置奖金征求几项发明，如1807年的一台小型蒸汽机，1810年的一台麻纺机。除了夏龙工艺学校以外，他增设了翁热工艺学校，开设了一些矿业学校，恢复了戈伯兰工场的印染学校，在工艺学校增设了实用学科，并且象救国委员会那样通过官方的宣传来推广新方法和新工具的使用。运河和公路对统一国内市场并把它和附庸国连接起来能起很大的作用：拿破仑就下令修建布尔戈尼厄运河、从罗讷河到来因河之间的运河、从伊尔河到兰斯河之间的运河、从南特到布勒斯特之间的运河，完成了中央运河和圣康坦运河，修复了大部分国内公路，并开辟了对同意大利和地中海东岸各地贸易极为重要的阿尔卑斯山一些公路。如果拿破仑有更多的时间和金钱的话，那么他做的事情就会更多一些。

然而在他的各项工作的计划中，经济比之军事上的考虑和对

个人威望问题的关心只占次要的地位；由于军事上的考虑，才要求首先修筑阿尔卑斯山公路、通往来因河的和西部的公路，延长瑟堡港的堤坝，修筑安特卫普的工程；对个人威望问题的关心表现在美化巴黎市容方面，他在巴黎扩展了沿岸街道，修起了一些桥梁，维修了巴黎圣母院，清理圣母院周围环境，扩建了沙特莱广场和卡鲁塞尔广场，开辟了利沃里大街、和平大街和斯蒂维耶雷大街①，修建了交易所。竖立起旺多姆圆柱，着手建造凯旋门幷计划盖一间“光荣祠”，为了首都的粮食和必需品供应方面，他修建了“粮食市场”和“大市场”、“备荒粮仓”、屠宰场、乌尔克河的运河。最后我们要指出：如果说拿破仑是个伟大的建设者，那么他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雇用劳动力。所有象恺撒之流的统治者，其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总是为人民提供工作机会和廉价面包。

农业沿着督政府时期同样方向继续发展，但是速度极为缓慢。工业的发展要明显得多。奢侈品的生产，尤其是丝织品，已经恢复；封锁促进了冶金业、铁器制造业、刀剪业、机器制造业，以及工具、钢铁板、白铁和黄铜、缝针和别针等的制造；封锁也对化学品和纺织品的制造有利；棉纺业和纺织品印染业仍是最活跃和最富于革新精神的；将近 1812 年的时候，棉纺厂有一百万纱绽在运转，幷生产了一千万公斤纱线。帝国末期，一个新的、大有前途的工业正在蓬勃发展：1811 年里尔和奥比的工厂第一次从甜菜提炼出糖 409 块，阿拉尔和德莱塞尔分别在夏约和巴黎创办了炼糖厂，拿破仑在他自己的郎布依埃领地内开设了四所技术学校和一个糖厂；1813 年计划在三百三十四个工厂生产三百五十万公斤糖，而实际产量似乎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

---

① 这三条大街的命名都是为了宣扬拿破仑的武功，斯蒂维耶雷镇战役是 1796 年 8 月发生的，利沃里村战役是 1797 年 1 月发生的，都是波拿巴战败奥军的有名战役，因此迫使奥国停战，实现和平。——译者

实行大陆封锁的结果，既很有利，也大有害处：沿海各港口完全衰落。1807年马赛还拥有三百三十艘远洋轮船；1811年只剩下九艘；它的工业产值从1789年的五千万法郎下降到一千二百万；同期内人口从十二万减少到九万；波尔多在1789年据估计也有十二万人，此时只有七万；因此这两座城市便成了保王党的堡垒。相反地，斯特拉斯堡和里昂则利用了这两座同它们竞争的城市所遭遇的不幸，而确保对德意志和意大利贸易的垄断，所以对拿破仑的覆灭深感痛惜。尽管合并了一些地区，法国对外贸易依然低于1789年所达到的总值，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法国丧失了它的殖民地。不言而喻，实现和平并与英国缔结一项贸易协定会比封锁更有利于国民生产。拿破仑奉行的政策尽管是这样，帝国的确也还是得以生存下来了，甚至享有一定程度的繁荣。

总而言之，皇帝在对事方面远远沒有在对人方面那么专制；关于经济方面，人们夸大了他的国家管制主义。他在这方面虽然沒有进行很多革新，却成功地把各种很不相同的动机和利益协调起来。最后，他在他统治下的各国里保持着充分活跃的经济，使各国都能支持战争；我们必须牢记，对于他来说，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三、思想控制

拿破仑体制并不限于以禁止任何批评，和满足各利益集团的要求来安抚各种思想。虽然拿破仑通常是假装蔑视各种思想的，但是他有时也承认思想的影响："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故此必须把思想和刀枪的控制结合起来，使臣民心甘情愿地，并尽可能心悦诚服地俯首听命。以往开明专制君主之所以要控制教会，就是为了使教会在向人民说教时教导他们唯命是从；这也是波拿巴从与罗马

410

教皇签订的教务专约中获得的好处之一。他使天主教僧侣的要求得到满足，打算诱以利益来控制他们，好为他培养一些驯服的臣民。由于他害怕那些并非他属下官员的神甫，所以他到处安插自己的神甫，尤其是在国立学校里：这是出于小心谨慎和防止发生更坏的事。在他的周围，罗马教会的朋友和敌人一直在暗中互相斗争着；教会的朋友，即波塔利斯、丰塔内等最终战胜了富歇；红衣主教 411 费什既有许多东西需要教会的宽恕①，因此非常积极帮教会说话；皇帝不止一次断然顶撞他，认为他的担心害怕是"想入非非"，劝他"洗个冷水浴"；但是如符合他的目的他还是常向费什让步的。

首先要保证低级教士的衣食住行和维持教堂做礼拜的费用，因为对各公社市府施加的压力，促使它们慷慨解囊成效不大。一个神甫写道："农民对宗教有好感，对神甫也有好感，只要不使他花钱。"拿破仑很快就决定自己负担一部分费用。自 1803 年起，他同意给司教会成员付报酬；后来在 1804 年将近全民投票和加冕的时候，他同意给二万四千名低级神职人员每年每人五百法郎；1807 年领他津贴的低级神职人员增加到三万名。1804 年，他已经把葬仪的垄断权交给教区财务委员会，并保证在每个主教管区内资助一所大的修道院。1807 年，他拨了六十万法郎作为修道院学生的奖学金。他把其余的教会开支强加在地方的预算上：诸如不是由国家支付的低级神职人员的薪金(1804 年 12 月 26 日)，教区神甫的膳宿费和礼拜的费用(1805 年 2 月 2 日)。为了管理做礼拜方面的补助金，1807 年组织了教区"对外"委员会；1809 年教区资金由

---

① 拿破仑的舅父费什在法国革命前在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当副主教，革命后不久还俗，与波拿巴一家患难与共。到 1796 年拿破仑独当一面出征意大利时，费什随军办军需，发了不小的财。雾月政变后，拿破仑取得政权要同教会打交道，费什又回到教会，不到三年就从主教、大主教升到红衣主教。但他的这段经历使他得不到教会的敬重，因此他竭力两面讨好。——译者

教区财务委员会理事会集中管理，其成员现在第一次由郡守任命，以后出缺则由原有成员推荐加以补充，这个教区财务委员会理事会还必须选出一个执事会。此外，郡守继续要公社议决给予补充俸给并由公社负责副神甫的生活费。最后，1810年2月14日的法律明确地规定了公社应负担的费用：副神甫的俸给，建筑物的维修费，万一教区财务委员会的收入无法支付，也得由公社负担；但补充俸给还是可给可不给。教会预算这样的分担继续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① 1811年，罗讷河口郡各公社总共要付出十万法郎；而国家除了支付三千一百万各种年金以外，还要开支一千六百多万。

教会也非常重视使人民尊敬它，以及为了帮助它招募神职人员和扩大宣传所给予的恩惠。修道院的修士得免服兵役；教会的显要人物在共和十二年关于名次排列的敕令中获得了很好的地位；几乎到处都恢复了敬神游行的仪式；一些“内地传教团”得到了补助，红衣主教费什还创设了组织这些传教团的机构；一些郡守下令在星期日举行礼拜时关闭酒馆；波塔利斯赞同这种做法，甚至取得参政院同意，惩罚那些在敬神游行队伍经过时站立或不脱帽的人。自1803年起，国立中学和市立中学都派进了驻校神甫，并规定在校师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波塔利斯要求各主教报告有关人事情况；1805年，凡尔赛主教提出了任命小学教师的要求，波塔利斯表示赞同；1807年，颁发了法令批准各主教掌管各学校的宗教教育，1809年，丰塔内发出通告要求他们派本堂神甫监督教师，答应由各主教推荐的人去取代那些评价不好的教师。另外，主教团组织了一套宗教教育，因为要准备建立大修道院，主教团获准建立一些初级修道院，这些初级修道院实际上都变成了地方中学。教士也进入了救济事业委员会和慈善事业局；修女重新主持医院。最

412

① 到1905年12月“政教分离法”通过为止。——译者

后，天主教会的统一得到保障以反对“小教会”，其教规至少有一点是被认可了的，即通过行政措施禁止神甫结婚。如果说国家的世俗化没有受到更多的阻挠，那就该归功于拿破仑：在遵行星期日的仪式方面，在对敬神游行行列表示敬意方面，在任命小学教师方面，他都拒绝采纳波塔利斯的做法，并且谴责丰塔内把监督小学教师的工作交给了主教。

在约制正规僧侣扩充人数方面，也同样应归功于拿破仑。他原则上反对男修道会：“不要修士”；“修士的苦修行败坏一切道德，破坏一切活力，摧毁一切政府。”但是在执政府时期，他曾经准许恢复了几个男修道会，特别是“忠信神甫会”或称帕卡那利修士会，警察局很有理由把它看作耶稣会的继承者。富歇最终占了上风：共和十二年获月3日（1804年6月22日）的法令规定，正规修道会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才能建立。味增爵修士会、圣灵神甫会和“外方传教会”的神甫尽管在原则上合并在一起，却继续保存了下来，因为他们能在国外扩大法国的影响；基督教义兄弟会和圣絮尔皮斯修道会获得了同样的优待；有几家“练心会”得到宽容，因为他们负责阿尔卑斯山的山间旅舍。其它的僧团均被取消，包括“忠信神甫会”在内，因为他们的会长帕卡纳里是一个外国人。① 然而该会神甫自称已重获自主，不再依附耶稣会，因此却能不再受政府干涉，费什甚至把拉让蒂埃的修道院交给他们管理；他们只是到1807年12月15日才确实地被禁止了。拿破仑对修女比较优待，因为他认为把医院委托给她们能节省费用；他批准了她们所建立的大量女修道会，还容许其它一些女修道会存在。他很想将她们组织起来，以便更好地监督她们，可能他很想把她们统一起来。至少，

413

① 帕卡纳里是意大利神甫，1797年创“忠信神甫会”，搜罗已被解散的耶稣会士，所以帕卡纳里派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耶稣会士，1814年后纷纷回到耶稣会。——译者

他在1807年组织了"慈惠修女和仁爱会① 教务总会",由指定为修女保护人的皇太后主持,他在1808年颁布了一道敕令,给修女制订了一定的法律地位。事实上,这些医院修女经常也兼办学校,原以忏悔祈祷为宗旨的两个新建立的修道会,一个是女会长波斯泰尔的"慈悲修女会",一个是女会长巴拉的"圣心圣母会",也同样在兼办学校。专以教学为业的女修道会为数也不少。据1808年的调查,共有二千多个学校和一万六千多名修女。至于不属于隐修院的修道会和慈善会,波塔利斯决定,共和十二年的法令不涉及它们。譬如苦修会在整个南方都重新出现了;圣母会在巴黎有了发展,并在外省设立了分会:波尔多和里昂便是如此,安培② 在那里成了一名热忱的新皈依者。

总的说来,主教们是感恩戴德的。1806年,他们甚至甘心接受由贝尼埃和波塔利斯的秘书达斯特罗方丈编写的《教义问答》,拿破仑曾亲自参予此书的编写工作:书中关于基督教徒的义务有很长的一章,载明对皇帝应服从、纳税和服兵役。有些人,象贝尼埃积极效忠到这种地步,竟要成为警察的助手,因为富歇曾写信给他们说:"你们的职责和我的职责之间有很多联系。"另外一些人则相反,象在鲁昂的康巴塞雷斯的兄弟和圣布里厄的卡法雷利那样,对他们的过分的要求,显得令人难以忍受。大多数主教利用了他们谨小慎微的态度,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各郡守知道自己最后难以抗衡,所以他们看成是大势所趋,只得如此:在马赛,蒂博多向尚皮翁·德·西塞征询关于官员人选的意见。主教的权力由于得到官方的"高卢主义"的保护,不再事事听命罗马教皇而加强起来,又

① "仁爱会"是十七世纪由味增爵(1576—1600年)创办的女修会,以办理慈善事业为标榜。——译者

② 安培(1775—1836年)物理学家,为了纪念他的贡献,电流强度的单位就命名为安培。象这样的科学家,在宗教信仰上却表现如此,可见当时修道会的影响。——译者

由于教务专约规定低级教士(只有所谓本堂神甫例外)应无保留地服从主教,而更为加强。然而思想上的统一远未实现,而且宪政派 414 教士仍然受到歧视。在贝藏松,大主教勒科兹经常和他那些受到过去顽抗派教士挑唆的神甫和修士们争吵;起初有些本堂神甫也不甘心世俗化,事故不断发生;最后,绝大部分的教士还是忠于波旁王朝,而这一点往后也能看得很清楚。至于他们对人民的影响是不能以教会在物质上的改进来衡量的;在很多地区,人们对宗教依然表示冷淡,而在城市里,总是有一批观众为《哀狄普》或《伪君子》鼓掌喝采。①何况有理由相信拿破仑并不一定要法国重新深信基督教;他作出了这些安排是为了掌握臣民中最听神甫的话的那些人:他所需要的无非如此而已。

与教皇的冲突使这项政策没有完全成功。冲突的起源不是宗教的原因,尽管庇护七世在"组织条款"问题上,尤其是对在意大利王国里的僧侣所实行的政策问题上,指责皇帝,但如果教皇不同时也是一个世俗的君主,那么双方就可能永远不会破裂。但是破裂使拿破仑再次产生象罗马皇帝那样统治全部神职人员,并把罗马主教沦为附庸的奢望;这样,1810年2月17日元老院决议案把四项条款的声明立为帝国法律,拿破仑在参政院中也宣称,他将"恢复历代皇帝一直拥有的批准对教皇的任命的权利",并要求"教皇登位前须在法国人的皇帝面前宣誓服从四项条款"。"教皇们不得再提出蓄意反叛的荒谬要求;这些要求过去曾经为人民带来不幸,为教会带来耻辱。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肯放弃,而且今天还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主宰。"

庇护七世被囚禁在萨沃纳;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们已被带往

---

① 《哀狄普》是1718年出版的伏尔泰的第一部悲剧,这部戏攻击了教会人士,并批判了专制政体。《伪君子》(汉译或作《达尔杜弗》)是1664年出版的莫里哀最富有讽刺性的喜剧,揭露了天主教徒和当时"上流社会"的假冒伪善。——译者

巴黎，由于二十七名红衣主教中有十三名拒绝参加皇帝的婚礼，皇帝把这些“卑劣的”红衣主教流放了。这样就不可能圆满执行教务专约。自1808年起，教皇为新任主教授职的祝圣通谕已不完全符合教务专约规定的程式，甚至参政院也拒不认可。随后变得完全无法填补主教的空缺；皇帝命令被任命的主教径自去管理他们的教区；红衣主教莫里接受了巴黎教区，多斯蒙接受了佛罗伦萨教区。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权宜办法。1809年，一个教会的委员会发表了意见：如果教皇由于一些世俗的理由推迟任命一名主教，那么大主教就可以任命一名主教；但是这个委员会拒绝作出任何决定，而建议召开一次全国主教会议。1811年，第二个教会委员会同样得出必须召开全国主教会议的结论。随着世俗政权对僧侣的压力愈来愈沉重，埃梅里方丈的“高卢主义”倾向日趋缓和，他一个人大胆地，而且当着拿破仑本人的面，捍卫罗马教廷的权力。但是他在定于1811年6月17日召开的全国主教会议开幕前去世了。胆战心惊的主教们直到那时一直噤若寒蝉，怕得不敢打破缄默；如同在路易十四时代和制宪议会时代一样，他们感到被夹在国家元首和天主教首领争执之间的法兰西教会有成为争执的主题的危险。拿破仑不得不一个个地施加影响，争取主教们赞同他的计划；然而他们还是有所保留，一定要得到罗马教皇的认可。如果教皇在六个月的期限内没有授职，那么就由大主教或资格最老的主教授职，结果就又回到了1790年《教士法》的办法。庇护七世接受了此议，只要授职是“明确地以罗马教皇的名义”进行即可，这样他就能随意禁止授职。1812年2月23日，拿破仑宣称罗马教皇的教谕不能采纳，并且认为教务专约已然失效。

与教皇的破裂使教士们对拿破仑政权的感情恶化了。一部分神甫逐渐又公开表示反抗。一些主教被迫辞职或遭到流放；一些神甫被取消了年金或俸给；反叛的修道院学生失去了奖学金，并被

迫入伍当兵；政府宣布解散男修道会；对忠信神甫会最终也应用了1807年命令；味增爵修士会、圣灵神甫会以及"外方传教会"也都被取缔了，而"外方传教会"会长阿农则被逮捕；1810年轮到了圣絮尔皮斯修道会被取缔。自1809年起，圣母修道会早已受打击，因为其成员在法国散布教皇革除拿破仑出教的通谕，并且保持与庇护七世秘密通讯。接着轮到了大量的慈善会。最后，1811年综合教育团的改革导致了关闭大部分教会学校或初级修道院。教务专约曾使保王党和反革命失去僧侣的支持；拿破仑和教皇的决裂又使它们再得到了这种支持；在被合并的各国，他也重新激起了敌视法国的情绪。然而他所争取到的几年已见成效。大多数教士都迟疑不决，怕再次要尖锐对抗和失去既得利益；只要宗教仪式没有中止，只要本堂神甫没被赶走，人民是不会怎么骚动的。拿破仑同教皇的冲突重新燃起了保王党的希望，并有利于他们的阴谋；但是就冲突本身而言，还不足以动摇拿破仑的统治。 416

新教徒并没有给政府制造任何困难；但是犹太人则迥然不同。如果问题纯属宗教性质，那就容易解决了，因为是犹太教法师自己要求颁发"组织条款"的。困难在于要知道他们是否会认为摩西法律能同民法和法兰西公民的义务相容；人们以为法国南部的和意大利的"塞法尔第人"① 久已适应当地风俗，而东部的"阿斯肯纳齐姆人"② 则被视作是固守旧教规的，1805年博纳尔曾认为犹太人是同化不了的。最后，有些犹太人在阿尔萨斯和洛林放高利贷，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因为高利贷常常剥夺了农民的产业；皇帝早已反对高利贷，他不顾参政院的反对，于1806年5月30日同意犹太人

---

① 塞法尔第人(Sefardi)即中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因希伯来语称西班牙为 Sefarad 而得名，以后用来称他们的后裔，即使已远离西班牙者仍用此称。——译者

② "阿斯肯纳齐姆人"(Askenazim)，中世纪指来自日耳曼的犹太人，因一个犹太先知的后裔的名字而得名，现专指在法国东部的犹太人。——译者

的债务人延期偿付债款。问题因此呈现了三重性。1806年7月20日，在巴黎召开了一次犹太人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九十五名代表均由郡守指定，他们与皇帝的特派员们达成了协议；然后大会决定戏剧性地重新组织"最高评议会"，其中包括二十六名俗界人士和四十五名犹太法师；"最高评议会"向欧洲的犹太人发表了一个声明，并于1807年2月9日同意废除一夫多妻制，承认民事婚姻，同意服兵役，不得顶替，以及看来是必要的一些经济措施。皇帝的决定直到1808年3月18日才宣布。礼拜在犹太教堂内进行，每郡至多只有一个犹太法师的大教堂，巴黎有一个犹太法师总会；宗教费用向信徒摊派来维持。另外一道有效期为十年的敕令废除了矿工、妇女和军人的债务，强制犹太债权人证明他借出的钱是给足十成的，除非债务人是商人，敕令还授权法庭可以减少或取消拖欠的利息，也可以规定延期偿还，这个敕令规定不适用于吉伦特郡，但实际上也只在阿尔萨斯和洛林得以贯彻。对犹太人课一种特别税，并对其典当业制定了一些规章；犹太人被禁止移入阿尔萨斯，而在其它地方则要求移入的犹太人必须在乡村购买一项产业。最后，1808年7月20日的法令强制犹太人选择一个姓氏。我们可以看出，拿破仑大概认为必须制止高利贷，高利贷会激起骚乱并迫使农民外迁；但是他的措施是否有助于犹太人的同化，这一点值得怀疑，而且他任凭其自由选择姓氏，这就推迟了这种同化。尽管如此，他的同时代的人并不认为他的政策于犹太人不利；他这种政策曾在欧洲轰动一时，并且同其他国家政策相比，曾使他获得各地犹太人团体的同情，但是也遭到他们的敌人的诅咒。

417

皇帝也插手到共济会，这是在督政府时期，尤其是执政府时期就已恢复的组织；1805年他派约瑟夫为共济会总会的会长，而当已于1804年成立的苏格兰典仪派完全退出之后，克勒曼和康巴塞雷斯便掌握了领导权。皇帝的保护有助于共济会的统一和等级制的

发展，并促进了共济会支会的增加；共济会总会在罗蒂埃·德·蒙塔劳的效率卓著的管理下，1804年支配、管理着三百个分会，1814年发展到一千个。共济会会员在高级文武官员中为数众多，而且这个团体对帝国是十分忠诚的。但是它仍然忠实于十八世纪的思想，以致某些郡守最后认为共济会的一些支会影响不好。在勒芒郡，卡佩尔写道，“总是平等，总是‘博爱’，总是哲学，总是些共和思想”。拿破仑却从来不曾为此而生气。

培养青年的问题使拿破仑更为操心；尽管他愿在这方面给宗教一席之地，但是他并不打算把青年完全交给教会，因为他的目的主要是培养臣民，而不是信徒，要培养通达时务的人材，而不是神学家。这便是过去所有开明专制君主的意图。这个政权的精神当然要求国家垄断教育；但是这样做就需要大量金钱，所以支配着拿破仑的学校政策的是财政问题。首先，他创设了国立中学，设置了国家奖学金，共和十一年创办了一所军校，共和十二年创办了法律学校和医学院，为的是要补充军官、公务员、法学家和医务人员。而且还要各公社市政府来负担已批准成立的“中等学校”的费用，还要让大量私立学校和初级修道院的宗教教育继续存在。然而国立中学并没有很快开办，因为财力不足；在计划开办的四十五所中学中，到1808年还只开设了三十七所。这三十七所学校也没有办得象拿破仑所期望的那样成功，因为他原以为，由于学生缴纳学费，这些学校是不用他花钱的。共和十一年的条例规定学校建立军纪，这使资产阶级感到不悦；僧侣们则认为，那些学校只是亵渎神明的渊薮，因为教职员中有一些还俗的神甫和不加入任何教会的人；最后，私立学校又降价收费。于是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采取：为了节省费用而关闭国立中学，或者取缔私立学校。领导教育工作的富尔克鲁瓦和哲学派可能比较喜欢第二个办法，而波塔利斯则以家长的自由选择权为名和为了教会的利益而加以反对。皇帝最

418

终决定了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因为他没有国家垄断教育所必需的金钱和人员。1806年5月10日法律宣布，将组织一个称为"综合教育团"的团体，唯有此团才有权进行教学；然而私立学校在其监督之下可以继续存在，条件是定期向它缴纳一笔税款，以减轻国家预算负担并限制竞争。7月14日批准，但由于战争而延期成立的"综合教育团"，直到1808年9月17日才公布。在此期间，由于费什和丰塔内的努力，教会得以稳固其地位；这个敕令，尤其是其执行方式被视作哲学派的一个失败。打算当"综合教育团"首长的富尔克鲁瓦被排挤了，而丰塔内得到了这个职位。

这个首长的官衔是"教育总长"，虽然没有大臣的级别，但是可以直接与皇帝联系；辅佐他的有一名总教务长，一名财务官，一个由三十个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和一些督学长。帝国被划分为若干"学校管理区"，由"学校管理区区长"管理，他有一些督学和学术委员会协助工作。教育分成三个等级：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国家第一次管辖小学：迄今为止一直任命小学教师的市议会不得不只限于提出它的候选人，而教育总长颁发教师证书。国立中学依然照旧，但是其它中等学校称为公立中学。最后决定创办理学院和文学院，其教师还是兼教国立中学，此外还增设了神学院。法国公学和大革命时期创办的各高等院校继续存在，并没有419 并入"综合教育团"。全体工作人员由皇帝或教育总长任命；国立中学和大学院系的教师接受了规定学位、职衔、服饰、待遇——包括退休金的扣除——和纪律惩戒等的章程；在国立中学里，只有教师获准结婚。

私立学校只有在得到"综合教育团"的批准（批准是可撤回的），并拥有获得其学位，服从其督学和纪律管辖的教学人员的情况下才能开办。这样，公办教育便没有掌握有效的垄断，因为竞争的学校继续存在，甚至大量增加。此外，"综合教育团"的治理权也

徒有虚名：要等到1815年起才要求教师具有学位，而且任教十年的私立学校教师可以免除学位的要求；也没有足够的督学来有效地进行监督。最后，修道院无条件地豁免了这些隶属关系。另一方面，天主教会在国立学校中拥有一部分影响：天主教教义明确地成为教学基础之一；丰塔内对天主教会忠诚到写信给他的朋友吉亚尔说："就把你亲爱的儿子留在朱伊吧，"朱伊即那所著名的祈祷学校；一名主教曾被任命为"综合教育团"的总教务长；在综合教育团的委员会里有埃梅里方丈，还有博纳尔和昂布鲁瓦兹·朗迪，后两人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儒贝尔和新教徒居维叶在公立学校的改组中都起过很大作用，他们都是很赞同宗教教育的督学；圣母会的成员，弗雷西努斯方丈当上了巴黎学校管理区的督学；有些神甫领导着国立中学和公立中学，或是在这些中学任教师。尽管如此，皇帝确实已经确定地组织起公共教育，所以教会对所谓"综合教育团"的垄断丝毫不予以原谅：因为教会曾打算恢复自己的垄断。

此外，当时世俗的或教会的私立寄宿学校的怨言更是个现实问题。关于组织"综合教育团"的敕令事实上迫使寄宿学校的校长出钱购买办学执照，并要为每个学生甚至连走读生在内，上缴膳宿费总额的二十分之一。由于监督不容易，这笔应付的款子未能全部征收到，再者修道院是免除这项税款的。所以1810年萨瓦里受命进行一次调查，尤其是因为拿破仑和教皇闹翻后，对修道院更有所怀疑。1811年11月15日，一道新的敕令加强了垄断。在设有一所国立中学或公立中学的所有城市里，新的条文规定，私立学校的学生去国立中学或公立中学上课，每个郡只批准办一所初级修道院或教会小学。效果很明显：国立中学和公立中学的学生由1810年的三万八千名增至1813年的四万四千名；自1811年起，私立学校减少了五千学生。敕令并没有彻底执行，丰塔内及其同 420

事的巧妙应付是颇有关系的；1814年，这个“教育总长”与路易十八谈话时自夸曾“抵制了某些不好的东西”。

皇帝达到了其预定的直接目的：中等教育和高等院校为他培养了能干的行政人员。中央学校的课程大大地删繁就简，加强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学，哲学课只读逻辑学，历史、现代外语和实验科学则不受重视。但是本国文学和数学保留了大革命时期所取得的重要地位；在高等教育方面，则保持了法国科学在大革命中所形成的新的特点，学者们继续使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然而，拿破仑梦想要完全控制对青年的教育，他却远远沒有实现这一目标。对于人民，他并不怎么关心，他让公社市政府负责初等教育，自己却什么也不管；除了几个地区，如阿尔萨斯以外，小学并沒有什么发展；至多是使它们恢复到旧制度末期的那种状态。他更不想教育妇女。但是他很重视培养资产阶级的后代，在这方面，他也沒有成功；很大一部分人并不在他的学校中受教育，他并沒有在综合教育团向年轻的一代提出一个他所特有的，能使年轻一代和他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理想。

对他在思想文化和艺术方面的活动，我们也可以作出同样的评价。他想成为文艺的庇护者，因为普遍认为一个君主只有创立了他的“时代”才真正是伟大的。1804年，他创设了“十年奖”，预定在1810年第一次颁发。他主张通过书报检查、科学院、“罗马法兰西科学院”来领导文艺创作。他以奇特的方式来统治戏剧界，并把雷米扎安插为总监督。1807年，他限制了剧院的数目：巴黎有四个大剧院和四个中等剧院；另外五个城市获准组织两个剧团，有十四个城市只获准组织一个；帝国其余的地方，包括二十五个县，却只有一个或两个巡回演出剧团；在巴黎，每个剧院只准演出一种类型的戏剧，所有的剧院都必须向“巴黎歌剧院”定期缴纳捐税；1812年，他在莫斯科时签发了一道敕令组织法兰西大剧院。他特

别乐于保护艺术，主要是建筑艺术，因为他购买和兴建了许多建筑物。① 要是说他在艺术作品上留下了他个人的标志，那就言过其实了，因为“帝国风”并不是从他而来，但是他聚集并重用了许多大艺术家。在文学上则相反，他完全失败了：他只拉拢到一些平庸的作家，而大作家他都沒有抓到手。他似乎并不象救国委员会那样曾经设想过使用作家和艺术家来培养公众的革命精神；他顶多只想到在学校里讲授他历次战役的历史，通过利用《大军通报》，利用《政府通报》的文章来编造他的“传说”，以及命令画家达维德绘几幅时事画。当然，他缺乏后来的一些独裁政府为组织宣传所拥有的可靠的财政资源和技术能力。而且尽管他妄图建立一个朝代和一个世界帝国，他却沒有提出任何特殊使命来教育法国人；那些忠心耿耿，毫无私心地追随他到底的人是捍卫他所代表的法国民族和大革命的；其他人则不可能认眞看待葡月将军② 的皇朝合法性，即使他是被教皇涂过圣油的。他能够麻痹和压制思想，他却未能征服它；思想的两极依然是旧传统和大革命。

四、社会演进和舆论

拿破仑并非不知道控制思想的工作依然尚未完成；所以他继续象执政府时期那样恢复社会等级制。他必须通过人们的切身利 422 益或虚荣心来争取所有那些掌有权力的人，并巩固他们的权力，以使之隶属于他自己。他继续联合“新贵名流”，这些人是佃农、雇农、工人、佣仆和供应商等广大人民的主人，他把“新贵名流”拉进

---

① 参看上文，第 408 页（原著页码——译者）。

② 拿破仑·波拿巴因在共和四年葡月 13 日（1795 年 10 月 5 日）在巴黎无情镇压王党暴乱，而被王党分子称为“葡月将军”。——译者

各级议会和行政机关，拉进各部机关和国立学校。他增加了官员的数量，这不仅是因为他扩大了国家的职能，而且也是因为他从中发现了组成一个社会集团的益处，这个社会集团的成员，由于他给了他们高官厚禄，所以将会致力于维护他的政权，更不用说他们的亲属和社会关系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战争增加了军官的数目，也为他提供了一大批忠心耿耿的臣仆。

423

他使他们彼此进行集团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竞争，从而在分化他们的同时，使他们尽忠职守，并倾向他这位金钱和荣誉的颁发者。因此他十分重视各种勋章，认为他们对此是很贪婪的。1805年，他已经完全改变了荣誉军团勋章的形式，此后勋章的徽号是最重要的；他在意大利王国创立"铁冕勋章"，很多法国人曾荣获此项勋章；1809年创立"三条金羊毛勋章"，1811年创立"联合勋章"①。他还不断地以岁入和土地的方式颁发赏金、养老金和赏赠。军队获得其中绝大部分。因为他曾经许过诺言，所以他并不拒绝向平民颁发勋章，甚至向塔尔马颁发了荣誉勋章；然而十分之九的勋章到了军人手里。法国人在旧制度下久已惯于领赏受奖，所以对拿破仑这项政策安之若素，因为这项勋章不包含有任何特权，人人可得，而又不世袭，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似乎并不违反论功行赏的公民平等思想。正如大革命所许可的那样，人们仍有可能在社会上平步青云；战争和晋级有利于步步高升；公职的扩增和奖学金在人民中分离出一个小资产阶级。

⑦⓪

由于拿破仑梦寐以求要建立一个正统皇朝，并渴望把旧贵族完全争取过来归附新朝，却又不愿承认其原有爵位，所以他又进了一步，另立一个贵族阶层，即一个由他赐封的，但是世袭的，并且拥

---

① "联合勋章"发给有功于法国向欧洲扩张的人，用拿破仑自己的话说，它象征着"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和大西洋间的联合"。——译者

有足以维持其地位的财产的公职贵族阶层。帝国宫廷的组成，附庸国和大领地的创设乃是前奏；1806 年 8 月 14 日，元老院的一项决议案批准拿破仑把世袭大领地推广到整个帝国，这种领地由长子继承，并恢复"补充继承人(或受赠人)的指定"①。1808 年 3 月 1 日，最终组成了帝国的贵族阶层。这个贵族阶层当然是属于那些帝国大勋爵，他们都封为亲王，属于各部大臣、元老院议员、大主教、终身的参政官、立法院议长等，他们都封为伯爵；其他官员，象各"大城市"的市长皆封为男爵，荣誉军团的成员则皆称骑士。皇帝也能够以赐封状授予贵族头衔。贵族头衔是可世袭的，条件是要为后嗣建立长子世袭财产，而拿破仑经常赐赠以建立此项产业。与此同时，宫廷的廷臣越来越多，与奥地利联姻后，帝国宫廷又变成旧制度时期的宫廷体制。1812 年，宫廷里有十六名御马官和八十五名侍从官；1811 年，恢复按地位高低而定的先后次序，这种位次是由所坐的圈椅、凳子，以及马车的马数、朝服、行礼、觐见时列队先后等不同待遇标明的。宫廷里任用前朝旧人的现象更加明显；德·塞居尔先生任典礼官，掌管皇后服饰的贵妇人和内廷侍从绝大多数来自旧贵族。大革命似乎只是一场噩梦。拿破仑不久以后对莫莱说："这些所谓 1789 年原则的学说将永远成为任何时代的不满分子、野心家和空论家手中的一种威胁性武器"，他还同莫

424

① "补充继承人（或受赠人）的指定"(substitution) 是封建继承法的一种制度。按照此制，甲将财产以遗嘱遗赠给乙，或在生前赠与给乙，但订定在乙死亡时，该项财产须转归丙所有(丙即甲所指定的补充继承人)。乙生前对该项财产有所有权，可以使用收益，但有予以保存的义务，所以虽然他可以暂时把它出让或抵押给他人，但这种出让和抵押是可以解除的，因为在他死亡时，丙依法确定取得对它的所有权。《民法典》之所以废除此制，主要是由于：(1)它妨害财产的自由流动；(2) 它在通常的继承制度之外，造成一种特殊的继承制度；(3) 对该项财产有权利主张的债权人可能受到损害；(4) 乙生前在经营此项财产上易发生滥用权利的情况。——译者

莱谈到那些憎恨新皇后的"织毛线的娘儿们"①。对他的权威有任何反抗就使他暴跳如雷，以致他对这些"无套裤汉"的妇女和反对国民公会的保王派资产阶级不再加以区别："只要我活着，这些渣滓便再也浮不起来，因为他们在葡月13日已经认识到我是怎样一个人，他们知道，只要我抓住他们的错误，我随时准备消灭他们。"他的群臣随声附和；曾任肖梅特②的副手的雷阿尔于1812年大声疾呼："这些老百姓从未被狠狠地制服过！"

如果拿破仑有时间的话，可能他会走得更远一些。某些迹象令人猜测他想根据社会分类来划分臣民：因此各附庸国的宪法允许同业团体的选举法，议席是在地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之间分配；很明显，他们是具有选举权的财产资格的。正是在这方面恢复行会对他才具有吸引力：如果行会在国家控制下重新组织起来，设有救济机构和技术学校，加上禁止罢工和组织帮工会的条例，就有可能提供一个使工人服从工商业"新贵名流"的家长式的绝对权力的组织。拿破仑也倾向于准许永佃权以便恢复地主对农民的监护权利。

425 在他的全部计划中，改建社会的计划是最不可靠的；这是因为这些计划同社会的演进背道而驰。他所实现的很少一部分计划也被社会的演进所推翻，而在民族生活中没有产生丝毫影响。首先，夏普塔尔错误地以为大革命已被遗忘。即使在宫廷里，新旧贵族的融合也只是表面现象；而帝国的门面使这种融合往往也只能做

① "织毛线的娘儿们"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平民妇女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时，纷纷旁听国民公会的会议和革命法庭的审判；在断头台处决国王、王后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时，妇女群众也围观欢呼；她们出席这些场合总是手中边织毛线。有反革命情绪的人因此轻蔑地叫她们"织毛线的娘儿们"。现在以大革命起家的拿破仑也使用这种反革命语言，足见他娶奥国公主后，思想感情进一步蜕化。——译者

② 肖梅特（1763—1794年），巴黎革命市府领导人之一，1794年4月13日被处死。——译者

到貌合神离。尽管波默勒尔自己是旧贵族，每次新任命一个内廷侍从官时，他就嘟囔地说:“这些贵族头上又多了一个便壶。”在颁发联合勋章的典礼之后，杜尔塞·德·蓬泰库朗问道:“您看见了西哀耶斯吗?”因为西哀耶斯伯爵跟其他受勋者一模一样，身穿勋章闪烁的礼袍出现在这次典礼上。“您看见了西哀耶斯吗?《什么是第三等级?》”①

其实拿破仑本人处在旧贵族中间也并不自在，因为他们能够作出那么多的今昔对比，而他又是一直鄙视他们的:“我为他们打开了前厅，他们就急忙冲进来了。”1805年，巴塞尔主教邦君为自己的钱财利益上书拿破仑，拿破仑在他来信上写的批语也证实了这一点:“啊! 卑怯的贵族们，如果你们的祖先看见你们，他们会说些什么啊! 他们曾为自己的德行感到如此自豪!”② 地方上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旧的特权阶级始终在念念不忘他们失去的东西，而帝国的贵族象资产阶级一样，仍然是坚决不归还一丝一毫。归附新朝的前朝旧人在耐心等待。而顽固派则梦想旧制度复辟，某些人甚至竭力把他们组织起来，准备一旦时机成熟采取实际行动复辟正统王朝。为了这个目的，费迪南·德·贝蒂埃在马蒂厄·德·蒙莫朗西的协助下——这两人都是以后复辟王朝时代享有盛名的圣母会的成员——组织了“忠诚骑士”的秘密团体，使人们在波尔多似乎想起了督政府时代曾异常活跃的“慈善学社”。所有其他的贵族一面等待时机，一面尽可能地重振家业，恢复名位; 亡命者回国后廉价购回或强迫人们归还他们的土地（有一半是在北滨海

① 这句俏皮话是旧贵族对西哀耶斯极大的讽刺。《什么是第三等级?》原是西哀耶斯在1789年1月出版的有名小册子，是迎接1789年革命最有鼓动性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汉译参看吴绪、杨人楩选译《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三联书店，1957年，第1—12页）。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权威理论家现在竟然也挤入新的贵族行列。——译者

② 基尔歇森所出版的《拿破仑一世的书信集》第二卷，第336页。

郡);他们依然和大部分僧侣秘密勾结,他们在所有的政府机关和法庭里又有了朋友。他们对"波拿巴"并不表示感恩戴德,而是在盼望着他的垮台。除非他还把国有产业收回来发还给他们;至于那些过去购买了亡命者土地的人则忧心忡忡。1807年,地产管理局为了一点点利益而重新审核积欠的尾数;还调查了国有产业的岁入,并要求债务人提出其封建地位的凭据。某些地方的法庭,如第戎法庭,主张当债权人能够证明封建收入与所让与的土地相符时,就恢复封建赋税;科多尔郡的郡议会表示了相同的意见。社会革命所造成的鸿沟是无法加以填平的;新旧贵族仍然长期相互敌视,拿破仑白费了口舌,白花了气力,而在十九世纪的过程中,民主政治将利用他们的不和又一次获得胜利。①

426

另一方面,如果说拿破仑是最强大的开明专制君主的话,那是因为他登基的时候法国贵族制度已经被摧毁了:要真正恢复贵族制度必然产生矛盾。法国贵族以占有大量地产为基础,得到一群受其保护的永久佃户的支持,就有可能重新取得一种独立的强大势力。拿破仑除了他自己以外,他的继承人会象过去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那样,就会遇到这股势力起来反抗中央政权。而拿破仑所创立并受他摆布的贵族阶层仅仅是一个侍臣和官吏结合起来的小集团,对他毫无帮助,并且一旦他倒台就会云消烟散。最后,还有一个矛盾:一方面自视为以平等名义所进行的一场革命的代表,另一方面又想重建一个符合平等原则的贵族阶层。在当时,个人当上贵族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可以接受的;这不过是一个荣誉称号,和别的勋章是一样的东西,而且平民在已有了一些国王以后,对再有他们的公爵和伯爵并不感到不高兴:这是侮辱旧贵族的

① 著者所指的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第三共和国初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君主派复辟不成,因为君主派分裂为正统王朝派、奥尔良王朝派和波拿巴皇朝派。他们的分裂,使共和制度才得以维持下去。——译者

一种新方式。但是恢复长子继承权，那就过分了；由于皇帝通过继承权固定了一部分财产，因而他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原则之一发生了冲突。

拿破仑对社会起的作用只是在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优势的范围内才确有实效，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活动符合国家的演进。他通过为“新贵名流”规定在政府工作中担任主要角色，不知不觉地为他们在政治上作好了上台的准备。而且他还以下列方式大大扩大了他们的影响，提高了他们的威望和增加了他们的财富：他改组了各部机构，并且在实质上同意他们挪用保证金券来贪污；在财政部系统恢复了财务官和出纳员，他们通过在基金管理上提取一定百分比的佣金而有利可图；增设了各种各样的公职，等等。法兰西银行和若干大公司的创办、公债息票的恢复都开始发展了动产财富；资产阶级无需停止利用其传统的生财之道，如购置地产和供应军需等，工业的发达和几个企业巨头的事业兴隆标志着资本主义的飞跃发展；最后，帝国的立法把工人置于从属地位。然而，资产阶级愈强大，对拿破仑政权就愈是离心离德。 427

的确，拿破仑政府远远不能在一切问题上都满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对财政管理上的黑暗，威胁着供应商的武断专横，冒险的战争和过分的封锁，怎么会表示赞许呢？但是也许这并不是主要的；如果说资产阶级帮助了雾月 18 日政变的话，那是为了在波拿巴的掩护下由他们自己掌握政权：然而拿破仑大权独揽，并剥夺了资产阶级的一切自由。于是他们启发人们思慕君主立宪制，而英国的代议制便又时髦起来。鲁瓦耶-科拉尔甚至谴责旧贵族归附新皇朝，尽管他最终也接受了巴黎大学的教授职位；在立法院里，莱内等待机会摆出反对党的姿态；基佐也被聘为巴黎大学的教授，他拒绝在第一堂课里硬塞进对暴君的歌功颂德。在沙龙里，尤其是在雷卡米埃夫人的家里，传播着流言蜚语；剧院里为影射时事

的情节鼓掌喝采；人们爭阅书报检查机关疏忽轻信而沒有取缔的书籍或文章，传阅一些手抄的抨击性小册子，而且冒着危险在私信中倾诉眞心话。轰动一时的那些风波主要是和文学史有关的。1807年，夏托勃里昂刚从东方旅行归国，就因为在《信使》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而接到命令必须离开巴黎；1811年他被选入法兰西科学院，但未能宣读他的致词。斯塔埃尔夫人的遭遇更坏；她出版了描写"沉默的法兰西"的小说《苔尔芬》① 以后，于1803年回国，她又被要求再度出国。1806年，只容许她住在离巴黎十二法里以外的地方；在科佩，一群崇拜者经常围绕在她身边：其中有尽管当时已经结婚的邦雅曼·贡斯当、西斯蒙第、邦施泰滕、巴朗特夫妇、奥古斯特·施勒格尔；人才之盛不弱于拿破仑的朝廷；自1808年起，人们到她那儿去就有失宠于拿破仑之虞，或者冒比这更大的危险。1810年，她的《论德意志》一书的出版使她彻底垮台：莱芒郡郡守巴朗特被撤职，雷卡米埃夫人被放逐；斯塔埃尔夫人本人于1812年5月23日逃往彼得堡……

428

这些事件只不过与所谓"上流社会"或"社交界"，即为数极少的一些人有关，所以现在只有轶史逸闻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很少为人所知的数以百计的迹象可以说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观望之中：既然每次战役都使帝国的生存成为疑问，那么谁能认为帝国确是巩固了呢？里昂商会在一份大胆的备忘录中表达了每个人的思想："法国无法经受无止境的战爭状态所要求的最大努力；这些努力所引起的极度紧张使社会各个方面都已筋疲力尽。"证券交易所的投机商由于行市一直下跌而不断表达了普遍的悲观情绪。正因为看不清前途，所以不断地引起不满和期待的心情。

---

① 《苔尔芬》是1802年出版的书信体小说，是斯塔埃尔夫人的名著之一。她在书中提出了资产阶级新女性的形象，这部小说显然是在卢梭思想影响下写成的。——译者

这两种感情不论是哪一种在平民各阶级中都沒有引起共鸣；拿破仑的专制沒有使他们发生什么变化；只有捐税、征兵和贫困也许使他们烦恼。直到1812年年底，兵役并沒有引起如传说那样的反抗；只要面包不太贵，失业不很严重，由于封锁而产生的物品短缺和物价昂贵对穷人的影响不大；综合消费税遭到反对，不过它们远不如1789年以前那么苛暴。只要拿破仑打胜仗，他的要求似乎都不超越人民所能忍受的范围，因为人民日常的面包一直得到保障：从1803年到1811年，由于连年丰收和皇帝为提供工作机会而采取的措施，尽可能地保证了人民每天有面包吃。

农村居民的处境趋于固定。在整个帝国期间，国有产业仍在不断出售，不过除了国家保留下来的森林以外，国有产业所剩无几；国有产业主要是被资产阶级买去，而购买了国有产业的农民已经发财致富。共和十二年已经批准，只要按照合法手续，就可以把公有土地分掉；但情况经常都不是这样，所以很多已经分掉的被宣告无效；此外，尽管1793年6月10日的法令①沒有取消，那也已经停止执行了。然而农民的地产似乎在继续扩大，因为地价显著下降，促进了私人购买；同时，农民的地产还通过继承的方式继续迅速地分散。一块块的耕地似乎也变得更小和更多；1814年的调查证明，在芒托瓦地区和下塞纳郡，一些大农庄已经肢解。在阿尔萨斯、伊尔-维兰郡、杜郡和塔尔纳郡，小土地经营有所发展。尽管发生这些轻微变化，但是还很容易看出农村社会结构的原来面貌；大部分自耕农所有的土地仍然太少；地租在增加，佃农的负担在逐渐增多；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农村打零工的无产阶级人数几乎沒有减少；农村仍然仅仅依靠集体使用权利，如公共牧场和通道使用 429

① 即雅各宾派当权后通过的“分配公有土地法令”（汉译参看《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同前引，第100—109页）。——译者

权、拾遗穗权、公地使用权等，而继续维持生活。因此森林的封闭使他们经常深受影响。他们象在旧制度时期一样，仍然要从工业部门、暂时外迁和行乞来寻找生活来源以补不足；在阿尔萨斯、洛林、来因地区，农民借口贫困，相当大量地移居俄国，尤其是在 1808 年和1809 年：结果不得不采取严格措施以制止他们外迁。

至于工人的状况，变化更小。拿破仑只是到 1813 年才为工人，而且还仅仅是为矿工采取了预防工伤事故的措施，禁止十岁以下童工下矿井，并批准在乌尔德郡煤矿创办自由参加的福利救济会。他公开发表了自己曾多次提出过的关于消灭乞丐的主张，但是他并不比他的历届前任取得更大的成功，尽管在 1808 年他曾经认真地着手建立一些乞丐收容所。除了几个城市以外，公共救济事业并无进展；由督政府所创设的救济机构现在还在工作，但是经费不足。只有私人发起的组织有所改善；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①和他的朋友们于共和九年曾在巴黎又创办了"慈善会"，它开设了第一批施药所，其它的慈善会随之在外省纷纷建立。这些慈善会支助了一些储蓄所和互助会，1815 年储蓄所和互助会约达一百多个；"幼儿教育会"也活跃起来。主要之点是，在农村和在城市里一样，工资保持了原状或有所增加；在巴黎，将近 1811 年的时候，工资由二法郎五十生丁增至四法郎二十生丁；因为物价也上涨，所以生活并没有改善很多；但是面包不贵，人民能够维持生活。人口的迅速增长便足以为证。而早婚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促进人口的增长，因为人们想借此逃避征兵：1812 年有二十二万起结婚，1813 年有三十八万七千起；结果 1814 年比 1813 年多出生了十二万二千个婴儿。出生率从 1801 年到 1811 年超过了千分之三十二，法国从

430

① 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1747—1827 年）出身旧制度的大家族，1789 年当选三级议会代表，在政治上属于以拉法叶特为首的自由派贵族，在大革命初期起过一定作用，后以慈善家身份参加社会活动。——译者

来沒有这样生机勃勃。政府为减少死亡率作了一些努力，主要是推广接种牛痘；莱载-马内西亚在下来因郡组织了一个免费医疗站。从1801年至1810年，尽管战事连绵，在法国原有领土内①还是增加了一百七十万人；有很多人为此而慨叹，因为这只能增加贫困和乞丐。

1811年的工业危机中断了接连几年的好年头；但是1812年就迅速地复苏了；这眞是幸运得很，因为1811年曾歉收，而且出口使"库存的麦子"销售一空，所以1811年冬法国大鬧饥荒，与共和十年时一样严重。1812年春达到最高峰，一百公升麦子的平均价格从1809年的十五法郎上升到三十三法郎，而面包在某些地区从每磅两个苏涨至十二个苏。人们又看到了惯常的动乱：乞丐增多并结成匪群，抢劫和焚烧农庄，拦截粮车，扰乱市场，三月初在冈城发生的事就是个例子。强大的国家镇压机关进行了无情的镇压：近卫军的一个分队占领了冈城，军事法庭命令处决了六个人。与此同时，还努力进口粮食。早在1811年8月28日，拿破仑就组织了一个粮食委员会，粮食供应局局长买进了大批粮食。象往常一样，这主要是为巴黎着想的：国家在巴黎出售了四十五万袋小麦，补贴了一千四百五十万法郎，以维持每磅面包为四苏半的价格。然而，皇帝在出发去俄国的前夕已感存货过多，就毫无顾忌地效仿国民公会；5月4日的法律迫使商人把粮食拿到市场出售，规定对粮食出售加以管理，并强制粮商申报其库存；5月8日，重新规定了"最高限价"：小麦的官价在巴黎地区定为三十三法郎，郡守们接到命令要定出每郡的小麦价格。后果却和1793年5月4日的法律颁布以后一样，因为还沒有做到征用粮食：市场上空无所有，而黑市贸易却形成了。收获季节一开始，政府就放弃了最高限价。尽管有这些考验，帝国在人民眼里似乎并沒有失去声望；派去

431

① 即不计入1792年对外战争后合并的地区。——译者

巡视的特派员之一拉斯卡斯送上的报告，丝毫沒有留下拿破仑不如以前那么受到尊敬的印象；无论如何，农民和工人甚至从来沒有想到可能由一个波旁王室的人来取代他。

在1804年以前合并的比利时、来因地区、日内瓦、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等国中，革命的变革已经全盘实施，拿破仑的体制得以正常运行。各国人民领会到这个体制的优点，特别是由于象托纳里山郡的让邦和来因-摩泽尔郡的莱载-马内西亚等郡守勤敏执行和坚定不移的贯彻。另一方面，经济活动蓬勃展开。正是在这个时候，由于开放了法国市场，由于来自巴黎的资本和订货，比利时的大工业产生了；从亚琛到科隆的来因平原和萨尔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比利时和皮埃蒙特的农业似乎并沒有得到改进；但是在来因地区开垦了很多荒地。虽然比利时(安特卫普除外)沒有兴建大的公共工程，但皮埃蒙特却利用了阿尔卑斯山的大公路了；来因地区开辟了一条沿着来因河的公路、摩泽尔公路和一条从巴黎通过威塞尔到达汉堡的公路；一些运河把萨尔和洛林连结了起来。形势不能使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满足：热那亚、安特卫普和来因地区各港口就注定要萧条起来；帕拉蒂纳并沒有在帝国找到它在来因河东面失去的农业市场。象在法国一样，这些地方的负担看起来还是沉重的，租税摊派得较好，但是正好补上甚至超过了所废除的捐税；封锁使消费者深感不便，征兵更使人反感。然而人口还是到处增加；虽然生活福利沒有增加很多，但是居民也确实沒有感到贫困难忍。

在所有这些地区，从这个政府得到最大好处，因而最拥护这个政府的是资产阶级。国有产业的出售、工业、公共职务等产生了暴发戶和小资产阶级，如果旧制度复辟，他们就有丧失一切的危险。但是拿破仑与教皇签订的教务专约也已安抚了天主教徒，甚至贵族在看到拿破仑排斥了雅各宾派和“爱国党”的时候，也有一部分

432

人归附了新政府；皮埃蒙特人圣马桑出任大使，默罗德-韦斯泰洛公爵和于尔塞尔公爵当上布鲁塞尔市长。当地的新贵名流主要是责备皇帝对他们不够信任：郡守、主教、各机关的主要首长均是法国人；有几个合并国的人获得了在帝国内其它地方的类似职位，但是为数很少；在他们的本国，他们担任郡议员、法官、市长、教授，不用说还有更为低级的职务。可能谈不上同意他们在本国垄断公职，但鉴于各国新近才被合并，皇帝把大部分职位都给了他们。新的郡和旧的郡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在新的郡里，人民从大革命时期的法令中得到的好处少得多。废除封建赋税并没有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引起震动，那里当法国统治建立起来的时候，封建赋税似乎已经所剩不多；在来因地区情况则不同；但由于长期要求地租债务人证明其封建地位，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就很不得民心。取消什一税在各地影响很大；然而农民只有当他是土地所有者时才能充分得到这项利益；可是在比利时，国有产业的转让迟到督政府后期才开始；在来因地区和皮埃蒙特，宗教团体只是到 1802 年和 1803 年才被取缔，其地产自 1804 年起才出售。到了这个时期，1793 年的各项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回忆而已。象法国一样，出售的方式是排斥穷人而有利于资产阶级；然而郡守们指出：争取乡下人的最可靠办法是，在拍卖之前把耕地分割成小块，有一个郡守于共和十一年说："农民渴望获得土地"，让邦自夸曾这样做了，并因此产生了一万个自耕农；经营国有产业的商人也把他们买进的土地分成小块，以便出售。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出售国有产业的方式使被合并各国的农民比法国农民更为失望。

同样，在合并的各国里，尤其是比利时和来因地区，也能看出拿破仑与教皇的决裂所产生的影响比在法国更大，因为那里从未成立过民族国家，教皇至上论的思想根深蒂固：在美因兹，科尔马主教为阿尔萨斯和德意志造就一代效忠罗马的教士。此外，皮埃

蒙特对旧王朝的眷念，热那亚港口繁荣的破产，日内瓦地方贵族的心怀不满，他们为失掉了权利而感到创巨痛深，这一切也阻挠了法国的影响在这些国家中进一步扩大。但是在被合并的各国里，尽管有人采取保留态度，却沒有任何人曾敢对拿破仑的统治动一个指头。

第二章　大陆体系

434

不论法兰西帝国变得多么强大，它也只是“大帝国”的核心而已。“大帝国”在1806年出现之后就得到很多附庸国加以扩充，如拿破仑分配给他亲族和僚属的附庸国，或者置于他自己保护之下的附庸国，如瑞士及来因邦联大部分成员国。在提尔西特之后，这个大帝国本身成了“大陆体系”的主要部分，那些还保持着独立的国家以盟国或友邦的名义参加进来。大陆体系从来没有象大帝国那样巩固。1808年初，大陆体系只缺少瑞典一个国家；但很快就分崩离析，从那时起，拿破仑的历史只是不断地努力重建大陆体系的历史。葡萄牙和西班牙首先溜走；前者不再加入大陆体系，后者只是在名义上又结合进来。奥地利跟着退出大陆体系，但几乎立刻再度加入。1810年瑞典降服了。不久，俄国却从中解脱出来，并拉走了它的邻国。此外，这些国家对大陆体系的从属关系也是深浅不同，变化不定的。西班牙直到1808年还是法国友好的盟国；而俄国和丹麦则出于形势所迫自愿接受了同样的地位。普鲁士在1807年，奥地利在1808年，然后又在1809年，瑞典在1810年，都没有取得与法国平等的地位就被迫加入了大陆体系，前两个国家在1812年被法国威势所迫才转变为盟国。最后是土耳其，它在1807年和1808年加入大陆体系，但从来只是一个友邦而已。

这个不断在形成的欧洲联合是以对英国进行斗争为直接的公开目标。在这一意义上，海战和登陆计划的失败是它建立的逻辑前提；但从历史上说，欧洲联合的思想仅仅是在1805年战争之后才以大帝国和封锁的形式体现出来，仅仅是在提尔西特才扩大成为 435

"大陆体系"。这样，形势有助于大陆体系的产生，同时对它的实现施加了沉重的压力，并迫使它以法国为首领和典范。不管怎样，产生于拿破仑政策的这些形势，增加了这一政策从签订吕内维尔和约前夕起就一直表现出来的动力，其第一个征兆可以追溯到1796年建立西沙尔平共和国；亚眠和约的破裂本是能够避免的，即使不能避免，也可能采取另一种对英国斗争的办法。拿破仑采用帝国称号，不断地模仿查理大帝和罗马帝国，选择罗马作为第二首都，又拒绝让沙皇亚历山大占据君士坦丁堡而建立"世界帝国"，这一切都揭示了他的刚强性格及其心理上的权力感所赋予他事业的深刻一致性，这一致性自发地倾向于重建西方世界①的政治统一，和复兴西方世界的文化。拿破仑为了使大陆上的行政和社会结构面貌焕然一新所作出的一贯努力，显然足以证明：他不一定需要在大陆推行《民法典》来对英国斗争。在事态不断的变化中，隐藏着一个逐渐变为自觉的计划——重建罗马帝国。

一、大陆体系的政治机构

然而，提到罗马帝国，我们决不要有所误解；建立"大帝国"并不是以历史的回忆或抽象的概念为基础的。地理上，"大帝国"包括了符合法国可能要征服的三个地区。意大利地区，包括延伸到伊利里亚的部分以及爱奥尼亚群岛，应放在首位，因为它的历史由来已久，领土逐渐集中，各项制度完备。这一地区分为四大部分：法属意大利、意大利王国、伊利里亚诸省和那不勒斯王国；前三个部分掌握在拿破仑手里、第四部分交给了他的亲信党羽。为了对抗英国，意大利半岛为登陆西西里岛和威胁马耳他岛，进而远征东方提供了一个基地；然而，其重要性此时较次于意大利北部和伊利

436

① 此处"西方世界"即指西欧而言。——译者

里亚，这些地方能从背后进攻奥地利，直入匈牙利平原；这条路线也可引向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在这一边，同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经济关系业经恢复。来因邦联是更为重要的地区，因为该地区保护了法国最易受攻击的边界，控制着奥地利和普鲁士，成为攻入俄国本土作战的练兵场；占据了德意志就能杜绝中欧对英国的贸易，而为法国的贸易打开大陆的主要市场。第三个地区是伊比利亚半岛，控制了这个半岛就有可能为恢复地中海和大西洋的斗争提供美好的前景，如果这能导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投降的话，其意义将更为重大；事实上，这个地区却只不过成了沉重的负担。

形势对于大帝国的组织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无论是为了从被征服的国家取得强大的辅助军队，或是为了加速社会和行政的统一，把这些国家组成广大的领土单位对拿破仑来说都是重要的。统一工作在意大利取得充分的进展；如果考虑到德意志原是小邦林立，则德意志的集中也有极大进展，但是只要普鲁士和奥地利继续存在，只要俄国沒有屈服，那就必须慎重对待那些忠实于法国的德意志各邦君主：拿破仑促进德意志统一的事业因此未能完成。 437

另一方面，必须对习惯于自治或者有民族传统的居民进行安抚。从前，卡佩王朝① 的历代国王为法国的统一作准备时，沒有立即把刚获得的省份并入王室领地；而是把这些省份建立为他们亲族的封邑；吉伦特党关于围绕法国建立起一系列保护国的思想，向拿破仑提供了类似的折衷办法；此外，拿破仑非常关心他的家族，又很想报赏他的某些僚属，增加附庸国对他来说是合宜的；所以在

① 卡佩王朝是从公元987年到1328年统治法国的王朝，最初只领有巴黎和奥尔良两城及附近地区，以后逐渐消灭封建割据，扩大王室领地，加强中央权力，为法国领土统一奠定基础。——译者

拿破仑思想上，大帝国最初是以联邦的形式出现的。在意大利王国，他是国君，同时，他让它在欧仁副王统治下保持独立的地位；后来，合并于法兰西帝国的国家以任命总督的方法在表面上享有自治权：如博尔盖泽任皮埃蒙特和利古里亚的总督，埃利兹任托斯卡纳的总督，马尔蒙在伊利里亚，勒布伦在荷兰。在帝国之外，某些地区如汉诺威、拜罗伊特、富耳达和哈瑙等好多年处在帝国行政大臣统治之下；埃尔富特也从未摆脱这种地位。皇帝以世袭头衔授予他的弟兄及妹夫等的国家似乎享有更多的实权，如约瑟夫先是在那不勒斯，后来在西班牙，路易在荷兰，缪拉先在贝格大公国，接着在那不勒斯，热罗姆在威斯特法利亚等，虽然他们作为法国皇族的成员和帝国大勋爵，依然处于拿破仑的监护之下。如果罗马教皇同意的话，他也可以在这些附庸君主之中独自成为一个特殊类型的国家。同这些人在一起的，但等级较低的有皮昂比诺的埃利兹，卢卡的巴乔基和纳沙泰尔的贝尔蒂埃，他们都是世袭的君主，然而只能在再次授权的条件下才能移交其封邑。再低一级的是本尼凡托亲王塔列朗和蓬特-科沃亲王贝尔纳多特，他们只得到纯粹行政的权力。最后，在一些国君的领地内，拿破仑通过分配有用的采邑，如在意大利的几个公国和各种领土的赠予，来直接施加影响。

拿破仑在对付加入了联邦的各国君主时，遇到了如同卡佩王朝历代国王在对付封邑领主时，或是中世纪德意志皇帝对付各公国王朝时所遇到的同样的困难和危险。首先他对他们的才能存有幻想，以为他们象他自己那样积极活动，发挥行政能力；在实际工作中，他却发现他们很平庸。如果拿破仑不是象在威斯特法利亚那样亲自分担一部分工作，或者象在那不勒斯那样调派一些有经验的行政官员去为他们效劳的话，那他会更加感到失望。至少，他有权希望他们仍然是他的忠实的助手。他叮嘱路易说：“要永远做

438

个法国人。”他对缪拉说:“要记住,只是为了我的大陆体系,我才派你去当国王。”贝尔蒂埃以同样明确的词句把这个意思传达给那不勒斯国王:“你当国王，要象你当兵时所做过的一样。”拿破仑还对卡罗利娜写道:“我首先希望你们做符合法国利益的事，因为我是为了法国的利益才征服一些王国的。”他的下属对此是没有什么好争论的,有些人也能领会他的意旨: 欧仁始终忠心耿耿; 埃利兹也是如此,她不是没有野心,且也不乏才干,拿破仑即使不喜欢她,却在她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的一些特征;热罗姆同样尽力而为,但是说实在的,他能尽的力并不多。其他一些人却正相反,很难驾驭。当然他们的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 他们必须变更制度，建立军队，实行封锁并且筹款，而同时拿破仑还硬要他们的预算负担赏赐和战争特税的开支，并且在他们的领地中，他给自己保留了一部分;拿破仑对他们要求过苛，令人难以忍受。迪罗克对欧仁说:“如果你要换掉房间里的天花板而去请求陛下发布命令,或表示意见,你必须等待,如果米兰着了火，你去请示他要否灭火，那就得让米兰烧得一干二净,也要等候他的命令。”但是切不要胆敢不去请旨;拿破仑给他继子写道:“即使月亮快要掉到米兰，你也不要以任何借口做你权力以外的任何事情。”

然而,祸根则更深。正如在同样情况下几乎总会发生的那样,拿破仑的下属总是自以为是封邑的主人和独立王朝的开国之君。缪拉大声疾呼:“当国王不是为了听人指挥的”,这些人为了赢得其臣民的支持来反对法国，就本能地力求在思想感情上变成所在国的国民。约瑟夫说:“如果有人要我只为法国的利益而统治西班牙的话,那就不要指望我会这样做。”他们流露出暴发户那种可笑和幼稚的虚荣心,宠臣环侍,穷奢极侈,增加许多宫廷总管和御厩官, 439 滥施勋奖。加之他们都象他们的母亲那样对拿破仑的前途感到吉凶难卜,他们把拿破仑的飞黄腾达归之于偶然的机会; 由于不想在

他一旦失败时受到拖累，他们力图使自己赢得民心。这一点在卡罗利娜的信中得到了证明，她无意中坦率地写信给她的丈夫说：

“整个欧洲在法国的压迫下都被制服了。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维持我们现有的地位和保存我们的王国，所以你要做他〔拿破仑〕所希望的事、当他提出什么要求时，不要使他生气，因为他是最强有力的人物，你丝毫也不能反对他；假如你最终被迫离开王国的话，那只能是在你保不住它的时候，在你的子女面前，你就可以问心无愧了。”

这也是塔列朗的思想情况；也就是这种思想终于导致缪拉走向叛变。最后，家族中的混乱和勾心斗角也使拿破仑心烦意乱。他的妹妹都有情夫，而尤其是波利娜的帷薄不修，更是秽闻远扬。路易和奥尔坦斯夫妇关系失和，丈夫是不可救药的，他犯的权迷心窍的自大狂比他几个弟兄还要严重，而且是个迫害狂；妻子脾气好，颇有教养，可是遭到猜疑。他们在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就分居了，直到 1807 年才又短时相聚；未来的拿破仑三世在 1808 年生于巴黎，但路易从不相信自己是这个幼子的父亲，甚至也不相信自己是头一个孩子的父亲；奥坦斯于 1811 年偷偷地又生了个孩子，即弗拉奥伯爵的儿子，未来的莫尔尼公爵①。拿破仑支持他的继女而不支持他的弟弟；1809 年他把贝格公国赐给他们的儿子查理时，他自己担负起监护孩子的责任，随后即转交给奥坦斯。缪拉和卡罗利娜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把那不勒斯赐给他们的条约触怒了缪拉；因为，实际上这是送给卡罗利娜的礼物：她如比丈夫后死，就应自己戴上王冠，而不是让他们的长子继位；她后来不问政事，过着半隐居的生活。至于吕西安，他终于在 1810 年 8 月 7 日乘船去美国，但被捕而带往英国。拿破仑的母亲支持其他子女来反对拿破仑；拿破仑一直等到她拒绝承认热罗姆的第一次婚姻，才给她一

① 莫尔尼(1811—1865 年)在 1851 年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政变时，出力不小，后任立法院院长，成为他同母异父哥哥的大帮凶之一。——译者

个正式的尊号:"皇太后殿下",但是她并不满足,还想要一笔赠产和某种"政治地位",拿破仑沒有答应。

所以,从 1806 年到 1810 年,可以看到皇帝对各附庸越来越生气,并威胁要并掉他们的国家。这样就加速了联邦制帝国的演变,440 帝国之所以采用拿破仑各项制度,其目的原是要把它统一起来。拿破仑与奥地利联婚,想要增加罗马王的遗产的意图,以及为罗马王未来的弟妹创立家业的前景,这一切更使波拿巴家人亲族的地位越来越不稳固,不过他们早就知道这种地位已遭到损害。合并荷兰和与奥地利联姻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从 1809 年起,合并的事似已迫在眉睫;1810 年初,路易却把它推迟了,因为他同意割让了西兰和直到来因河的荷兰南方各省;1810 年 7 月 2 日,他逃出荷兰,随后到达了奥地利。4 月,缪拉在巴黎也自知王位难保;卡罗利娜却因为接受了陪伴玛丽·路易丝的职务而能够设法取得了暂时和解。拿破仑禁止缪拉任命大使;缪拉身边经常有形迹可疑的意大利人如加洛·马盖拉等,后者被缪拉任命为警务大臣,他同许多反法秘密组织有来往,因而可能是最先设想在他的主子缪拉统治下统一意大利那批人之一。卡罗利娜被迫再度分居退隐,并受到离婚的威胁。缪拉在关税方面采取反对法国的措施,他把好几个法国派来的高级官员撤职了,最后,留下来的法国人都要向他宣誓效忠。于是,事情已闹到了决裂的地步:1811 年 7 月 2 日,拿破仑禁止其臣民向缪拉宣誓;他行将吞并那不勒斯王国的风声就传开了。俄国的威胁使拿破仑与缪拉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缪拉到巴黎参加罗马王的洗礼,并随同大军出发去俄国。然而,沒有一个人相信事情到此为止。与此同时,热罗姆看到他在汉诺威的一部分领土被割去后,担心要把它转交给波兰。至于约瑟夫,他抱怨只是个徒有虚名的国王。最后,自从缪拉被调到那不勒斯以后,贝格大公国就已由拿破仑亲自治理了。

与各附庸国相反，那些处于被保护地位的联邦，通过永久性联盟同“大帝国”相联系，并照样存在。拿破仑沒有理由去触动他自己制订的“调停条例”。瑞士现在被围在拿破仑所征服的领土之中，不再具有直接的战略意义，因而不必加以占领来迫使它服从；直到 1809 年使用了巴塞尔桥和占领了特辛州的时候才破坏过瑞士的中立。相反，改组来因邦联是势在必行的。它的领土依然过于支离破碎。连它的成员国的法律地位也不一致：贝格公爵和威斯特法利亚国王是附庸国的君主，而且只要欧仁还沒有取代达尔贝格，拿破仑的傀儡法兰克福公爵就既不是法兰西帝国的皇族成员，也不是帝国大勋爵。维尔次堡大公国的存在得到 1809 年同奥地利签订的条约的保证，而奥地利暗中自以为对于它曾占有的费迪南的旧领地托斯卡纳和萨尔斯堡具有第二继承人的权利。虽然来因邦联中最重要的一些君主是通过拿破仑签订的条约而获得新的称号，其他的君主是通过继承权取得正统王位的。然而，最突出的是整个邦联还沒有宪法，也沒有一个能促进行政、教会、社会，甚至军事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

此外，大陆体系得到随着政治形势波动而临时组成的联盟的不断扩充，通过将来的努力可能把这些联盟变为持久的结合。普鲁士和奥地利已不可能反抗，前者由 1812 年的条约事实上已沦为附庸国。只有沙皇亚历山大，虽然是战败了，但自以为是得到法国平等对待的，因而以眞正“同盟者”的姿态出现，每次拿破仑要求他的支持时，他坚持只考虑本国利益，要求法国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连续不断的敲诈势必有导致俄罗斯战役的危险；只要亚历山大还不甘心俯首听命，大陆体系的政治结构就仍未完成。这个最后的障碍一旦消除，大陆体系就可能被吸收进大帝国里来，而同盟国就都变成了附庸国，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帝国本身或许也会并入法兰西帝国。

直到 1811 年,法兰西帝国的霸主地位在法律上只体现在各附庸国君主的地位上。缪拉的抵抗促使拿破仑确定了为各附庸君主服务的那些法国人的地位：在禁止其臣民向他的妹夫缪拉宣誓效忠的同时，他下令规定他们当然也是那不勒斯王国的公民。这一决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力图打破在旧制度下一些大家族可以不入特定国籍的关系,这些人越过国境到处拥有领地,他们是几个君主的封臣,喜欢为谁服务就为谁服务,并且在各国之上组成一个多国性的小团体。共和十三年花月 21 日(1805 年 5 月 11 日)的法 442 律没收了神圣罗马帝国各诸侯在法国的领地,同时,只是在转让其所有权条件下才归还其他德意志领主的领地，除非他们选择法国国籍。在各附庸国,譬如在威斯特法利亚,禁止新的君主的臣民仍然为外国服务，舒伦堡为了保留其土地不得不放弃他在普鲁士国王统治下的职位，来因邦联其他成员国被要求召回其在奥地利任职的属臣。因此，为那不勒斯王国提出的原则对法国人来说是一种特权，因为他们不失去原国籍而又可以成为被派去服务的大帝国内那些国家的公民。如果这一制度继续存在下去，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类似罗马人公民权的一种公民权的开始，他们还可以更容易地享受这种权利,因为大帝国不仅是一个政治统一体:拿破仑打算给它以法兰西帝国同样的制度和社会结构。

二、拿破仑的改革

在拿破仑思想上，他所建立的政治制度首先应该确保他的统治高于一切;他的政权,他的附庸国和盟国的政权都应该受到绝对服从,这点对他非常重要:因此,各种中间团体、各种特权和封建制度等都不容存在,使所有的人都成为直属国家的臣民;继承法也便于减少巨富的财产,使贵族从属于君主，使神甫变成君主的官吏。

另一方面，大帝国的所有成员国都应承担的首要义务是：提供财力和人力。旧制度由于行政管理混乱和行动迟缓，不能很快地动员国家的人力物力；因此必须通通废除，代之以拿破仑的官僚机构。在这一点上，拿破仑甚至采取征服的手段，因为他想证实这些方法的优越性，这是象查理四世这样的盟友都未能赏识的。

这些当前的迫切问题并没有妨碍拿破仑看到，通过行政和社443 会的革新，就使他能够安抚资产阶级和农民。他给热罗姆写道：

“德意志各地人民所迫切希望的，首先就是那些非贵族出身而具有才能的人享有得到你的青睐和录用的平等权利；其次就是要废除各式各样的农奴制，废除在君主与最下层的平民之间的中间环节……，把我的想法老实对你说，我扩展和巩固这个君主制更多的是依靠这些人的努力，而不是依靠打几次大胜仗的战果。”

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废除什一税和封建赋税、出售教会产业、取消行会、增加公务员、建立“贤明而公正”的行政管理、规定由“新贵名流”通过租税和制定法律的一部宪法，这一切肯定会交织成一个与维护法国统治休戚相关的利益的网；剩下的任务就由同法兰西帝国那样组织起的思想控制来完成。这项社会政策的要点体现在《民法典》里，所以拿破仑到处大力推广它。从1807年起，他硬要汉撒各城市、但泽和德意志各保护国采用，当然也迫使荷兰和威斯特法利亚采用；1808年他想在葡萄牙实施；1809年他想在西班牙实施。

现实主义不足以说明拿破仑推广《民法典》的那种小心翼翼和高度热情的理由，因为这是他全力以赴的事业。他从十八世纪继承的思想倾向使他对封建制度、宗教的不容忍思想和旧行政制度杂乱无章的经验主义真诚地抱有反感。他继续进行开明专制君主的工作；尽管过去的开明专制君主遗留下的传统大大地促进了他的工作，但他在大胆和行动迅速方面却使他们全都相形见绌。另

一方面，他的独断专行精神使他认为他的工作具有完善的特点：他对路易说："如果你要改动《拿破仑法典》，它就不成其为《拿破仑法典》了。"缪拉要删去其中有关离婚的一节，拿破仑对他说："我宁愿那不勒斯复归西西里旧国王，也不让这样阉割《拿破仑法典》。"他的体制同样具有永久和普遍意义；这是一种将巩固大陆上政治统一并与之协调的欧洲文明的结构。拿破仑认为人民可能提出抗议这一想法是荒谬的：首先，凡适合法国人的也必适合所有的人，他给欧仁写道："因为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之间的差别很少。"无论如何，如果还存在有地方主义的话，那就必须消灭之；拿破仑在1810年5月20日谴责路易的行为时，指出他若忠心耿耿可能就会将德意志西北部和汉堡并入他的荷兰王国，他还说："这可能形成一个消除德意志精神的各民族的核心，这就是我的政策的第一个目标。"结果，任何反对意见都被看成是对他的专制政权的叛变：他向热罗姆指出："我认为你用威斯特法利亚的民意来反对我是荒谬的，如果你听从民意，那你将一事无成。如果人民不要自己的幸福，那么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犯罪的，一个君主的首要职责是对他们施加惩罚。"广为推行法国的制度是拿破仑权力意志的表现形式之一。 444

但是，这一最高目标从未使拿破仑忽视迫切需要考虑各种情况。他对同化和统一的狂热受到了批评，然而，这里是拿破仑于1807年9月9日在一封信的旁边所写的话：

"让荷兰采用法国的行政制度，这对法国有什么好处？……荷兰征税制度的统一，以及与治理该国有关，并为舆论所关心的成百上千的其他事物，究竟与法国的利益……有什么共同点呢？"

事实上，拿破仑容许附庸国和盟国不止一次地改动，甚至删除他的各项法典，但话得说回来，在他完全控制的一些国家里，尤其是在意大利王国，他的体制达到了比在法兰西帝国更为完善的程

度。另一方面，连年不断的战争、审慎地对付盟国君主的必要性、国境线的不断变化、让意大利和德意志继续处于支离破碎的状况等，都不利于深入推行他的体制，因而其深入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譬如，贝格大公国虽然在缪拉离开后由拿破仑亲自统治，但却改造得不如热罗姆的王国那么彻底。如果考虑到拿破仑统治为期很短的话，那么他确是做了大量工作；然而这项工作依然是零碎不全的。

这还不是最坏的：从社会的观点看，见机行事是与他的"体制"冲突的。由于需要金钱并想充实自己的"特别财务署"，所以被废黜的君主、亡命者和僧侣的产业帮了拿破仑的大忙；其中什一税和封建租税占了很大一部分；要不要放弃这些呢？其次，他需要一个政府和行政人员的班子来收税征兵，为此，他不仅要依靠资产阶级，而且也要起用贵族，因为，除法国以外，资产阶级能提供的人数太少；①而且，不用贵族又怎能充实各附庸国君王的宫廷呢？因此之故，土地改革就不可能象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改革曾把农民争取过来的那样，采取为争取农民而必须采取的那种激烈方式。此外，拿破仑到处都排斥热情赞同土地改革的"雅各宾党人"，他在法国结好旧贵族，力求同王室联姻；在法兰西帝国里，大革命的成就是一个他可以不承担责任的事实，但在大帝国里，他必须承担这个责任，而他的"体系"内部就存在这一矛盾。结果，农民是被牺牲了：地租，有时连什一税也宣布只是可以赎买的。这对法国的影响和拿破仑的改革都是一个绊脚石。

分析拿破仑在欧洲的改革工作的各个组成部分，并阐述他的幻想力所激励的统一的欧洲，都还不足以表明他在历史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因为大陆体系尚未完成，而且不管拿破仑个人的梦想显得多么才华横溢，从长远来看，统一欧洲的工作并没有留下什么持

445

① 只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荷兰是例外，荷兰能提供不少资产阶级出身的官员。——译者

久的成就。

相反地，当他把从法国大革命中保留下来的成果移植到他所征服的地方时，他的历史作用是具有创造性的。正如1789年人民起义铲除了法国的旧制度一样，他率领法国大革命为他准备了的大军去消灭欧洲的旧制度；并代之以执政府时期在资产阶级协助下他所制订的组织机构。既然他至少有某些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国家世俗化——是与共济会的某些纲领相吻合的，那么，他的部下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员到处都同当地拥护法国制度的人聚集在共济会的支会里，也就不足为怪了。于是，拿破仑的很多敌对分子深恶痛绝地斥责他的帝国是共济会帝国。

拿破仑依然作为法国大革命的战士，这与他要重建一个合法皇朝和一个行会等级社会的意图是背道而驰的。但是，他所受的思想教育，他的经历，他的向外征服政策的需要等等都使他摆脱不了为世界上贵族灭亡和资产阶级兴起作准备的这一演进的制约。446 不管怎样，拿破仑的天才加速了演进的过程。他的事业的不可磨灭的特点之一，就是凡是他的军队得胜所到之处，他的进军都标志着一个8月4日之夜①。

三、地中海各国：意大利、伊利里亚诸省、卡塔卢尼亚

最深刻地打上拿破仑体制烙印的是意大利；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法国革命的干预和波拿巴本人已经为建立这个体制扫清了道路。皮埃蒙特、利古里亚和巴马通过合并完全与法国同化了；447 至于意大利王国，拿破仑于1806年把威尼西亚和瓜斯塔拉，

① 指1789年8月4日之夜，法国制宪议会从这夜起通过废除封建制度的一些重要决定。——译者

1808 年把马尔凯，1810 年又把特伦特区并进王国里去，从而为他建立了一个试验场地，在这里他不必象在法国那样，要考虑到波旁王朝统治的传统和对大革命的纪念。他对 1805 年宪法条例一点都不重视：尽管宪法规定立法院负责讨论法案，甚至可以否决某些法案，但他给欧仁写道："我将不再召集立法院"；于是，他就以法令立法。他井井有条地加强中央集权；从 1806 年起，司法仿照法国的榜样进行了改组；直到那时交由地方政府办的公共工程和教育改由国家管理；卫生检查工作也是如此，救济事业后来在 1807 年也由国家管理。

拿破仑既扩大了权力，便又增加官吏：1805 年第一次任命了警察总局局长；1806年增设了土木工程局；负责堤坝和运河的地方行政官听命于郡政务厅；还建立了管理公共卫生的中央委员会和郡委员会，由总督导官和郡的"公理会"管理救济事业，由内政部设专局管理教育；创办了一些国立中学，在米兰创办了一所法国不曾有过的女子中学，还创办了一所土木工程学校、一所兽医学校、一所音乐学院、三所美术学院，而剧院则由一个总监督领导。卡法雷利弟兄之一在 1806 年取代皮诺统率意大利王国的军队；军队在不断地改进和增加人员。财政大臣普利纳不得不提供日益增加的经费，他用 1806 年制定的以后作为人身税继续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增加间接税和开征注册税来摆脱困难；普利纳是个出众的、有创见的并且很勤勉踏实的行政官员，但他的热情却引起民怨沸腾：1814 年，一次暴乱断送了他的性命。意大利王国受到一条不可越过的关卡线的系统的包围，由于开辟了几条阿尔卑斯山公路而受到法国经济的严密控制，然而，它从其他一些公共工程中获得了好处。448

1805 年的宪法条例规定，从 1806 年 1 月 1 日起采用《民法典》；但首先必须把它翻译和印刷出版；尽管加紧工作，还是不得不延期到 4 月 1 日才采用民事诉讼法；跟着自然而然地设立了典当

铺和建立了戶籍制度①。事实上，这只是完成了共和国时期的废除特权和封建制度的事业。不管怎样，《民法典》轰动一时，因为它使戶籍世俗化、采用了离婚制度并打破了继承权的习惯法。此外，僧侣对随着教务专约而来的改革也是不喜欢的：教区减少了，修道院的人数受到严格限制，1805 年 6 月 8 日，除了几所集中了那些愿意要继续过寺院生活者以外，隐修院都被取消了；1807 年，慈善会也被解散了。然而，世俗僧侣取得了比在法兰西帝国內更为有利的地位：主教区、教务监理会和修道院均由国家给予土地或年金；本堂神甫的产业沒有收归国有。此外，根据教务专约的规定，神甫要听命于拿破仑；总的来说，他们显得是顺从的；1807 年强迫他们使用《帝国教理问答》，而教会的讲坛则用来进行有关服从征税和征兵的说教。争取土地贵族却要困难得多，可是，拿破仑坚持这是必要的；有些贵族屈服于欧仁的豪华宫廷的诱惑，有些穷贵族接受了挂名职务和赐赠；大部分贵族都拒不出任公职；他们的儿子不进国立中学或参军。唯独资产阶级，包括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官员，对这个政权表示一定程度的拥护；由米兰共济会总会发起并赋予统一的组织形式的"意大利皇家共济会"，在把所有的拿破仑拥护者聚集在高级官员领导之下这一点上起了重要作用。拿破仑如同在法国一样大有成效地利用勋章：意大利王国也颁发了该国的铁冕勋章。但是，拿破仑特别重视仪仗队，要不要在法兰西帝国加以组织他是犹豫不决的，然而在意大利仪仗队却成了最富有特点的制度之一。

拿破仑需要军官并坚持从本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中挑选，这在一定程度上象是作为人质，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把军队当作学校，用来培养意大利人迄今所完全陌生的公民精神和对王朝的感情。加冕典礼提供了召集一些仪仗队的机会；继之在 1805 年 6 月 20 日， 449

① 即由政府办理出生、结婚和死亡登记。——译者

一项法令规定成立四个骑兵连为宫廷服务；这些骑兵要在自愿的基础上，从家长被列入选举团名单或纳税最多的这种家庭中招募；由于在没有提供仪仗队名额的各郡里，暂时取消了顶替办法，所谓“自愿”实际上徒有其名；父母必须交付一千二百里拉的膳宿费，那个年轻人就能在两年后被任命为少尉。对于小资产阶级，拿破仑则建立了十二个轻步兵连，每人只要付二百里拉就可以成为军士。征募仪仗队很困难：尽管1810年规定了要征募五百五十一人，但到1811年还只征得三百六十七人；这些仪仗队在俄罗斯才第一次投入战斗。轻步兵比较容易招募。即使拿破仑的意图没完全实现，那也不能说他失败了。征兵不断地影响人民，尽管他们在帝国统治下已经感到很不满：废除封建制度和出售国有产业似乎都没有改变农民的处境，至少在平原地区是如此，那里仍然是由贫苦的佃农和短工耕种着大地产；对于小自耕农，意大利共和国确实无偿地取消了什一税和封建租税，但是国家租税的重担抵消了农民得到的好处。把波伦亚平原上十五个公社分别于1789年，1804年和1835年制订的地籍清册作一比较便可看出，贵族的田产已从百分之八十下降到百分之六十七，再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一。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田产却从百分之十七增至百分之三十，再增至百分之四十八。然而大地产的土地面积却一直保持原状：1835年大地产的土地面积占百分之七十二点零一，而1789年时为七十二点七七。

在意大利的另一端，拿破仑在那不勒斯王国留下的印痕也是非常深刻的。约瑟夫一登基，那里的改革就开始了，改革是在一批经他挑选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如萨利切蒂、米奥、迪马、罗德雷的儿子和李齐亚第律师等的主持下实行的。他们首先改组各部，成立两个新的部，即内政部和国务秘书部；接着设立参政院和审计院。省的区分继续存在，省下设若干县，而教区则合并到市的行政机关

中去,这是模仿法国共和三年宪法中市政府的组织。省有省长,县有县令,官衔虽然不同,可以看出就是法国的郡守和县长,正如法国的郡政务厅换了个名称叫省政府。省和县都设有议会,而公社基层单位则交给一个"十人团"管理。但是,不再成立选民团:国王据根县令的建议任命"十人长"。再从"十人长"提名的候选人中选择各级议会成员。按照法国的模式改组了法院和警察局,并急忙建立了一支宪兵队。财政大臣的任务特别艰巨:他以土地税和工业税取代旧制度下无数的租税;特权取消了;国家收回了曾一度交由包税人承包的间接税;用借据或列入"国债大册"上的债券来清理债务,由于借据转手要受损失,国家很快按市价把借据收买回来:1808年国债从一亿降到五千九百万金币。大部分收入来自国家的财产,包括耶稣会教士的、空缺的主教的和许多被取缔了的隐修院的产业。这样的概述仅仅提供了新政权在全国进行的统一、精简和清洗等艰巨工作的一个粗浅的概念。取消挂名职务,禁止贿赂,分立司法和行政,设立公开的会计制度,组织一个遵守纪律和尊重法律的官员队伍,这一切措施在这里比在皮埃蒙特和伦巴第更属创举。

这里的封建制度的压迫比在意大利北部更严重,它是从1806年8月2日开始明令废除的。男爵们保留其头衔及其本人的财产;但他们失去了司法权,关于他们的土地和个人身分方面都要服从普通法。封建赋税和地租的问题是根据法国制宪议会的原则解决的:对个人的权利,体现这些权利的租税以及领主的独占权①都毫无条件地被彻底废除了;对物的权利被宣布为可赎买的;包括库奥科在内的一个封建事务委员会负责执行这个法律。此外,通过

① 领主的独占权(banalité)是封建制度下领主独占磨坊、烘炉……等物的特权,农民不得私有这些东西,必须使用领主的东西,而领主则勒索使用费来剥削农民。——译者

451 1807年的法令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在这个地区村社公用和季节性放牧的丛林和荒地占了大片土地；法令规定在村社之间按人口进行分配。而且还决定在居民中间分配可耕的公地，优先分给那些已占有其中一部分土地的人，只要他们已开垦和圈围了这部分土地，条件是交少量的地租。国家对迄今按年出租的阿普利亚平原①改为自己派官收税；对宗教机构的产业也是由国家直接派人收税。

当约瑟夫把他的王国移交给缪拉的时候，拿破仑企图束缚缪拉的手脚，他命令约瑟夫于1808年6月20日在巴荣纳颁布了一个仿效意大利王国的宪法条例，但是缩减了有关选举的部分，并给予僧侣和贵族一种特殊的代表权，这一点表明了拿破仑政治思想的演变。议会由一百个成员组成，分为五排席位，头两排是僧侣和贵族，他们由国王选任；也是由国王指定的选民团推选业主的代表；国王从官吏选举会或团体推荐的候选人中指定商人代表和自由职业者的代表。政府里的职位只有那不勒斯人才能担任。两天以后又宣告翌年采用《民法典》。

尽管约瑟夫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仍没有完成，而且大部分徒有其名；尤其是他刚刚开始组织军队。因此在缪拉的统治下就显得进展很大。他的财政大臣，莫斯堡伯爵阿加尔继续进行安托万-马利·罗德雷的工作；他完成了土地税的改革，采用了营业税，设立了间接税管理局以及水道和森林管理局，开办了一片王家银行，通过采取以列入"国债大册"的债券，或者转让国有产业，以及把利息从五分改为三分等措施来完成清理债务工作。缪拉在规定的日期实施了《民法典》，但进行了重大的改动；随着又实施了民事诉讼

---

① 阿普利亚平原在今意大利东南角阿普利亚区，沿亚得里亚海的狭长平原。——译者

法、商法和刑法，以及有关抵押、戶籍、公证人和律师制度的法律。1809 年缪拉还批准了封建事务委员会的决议，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经济生活：他取消了行会和内地关卡，建立了土木工程局和有力地推进了公共工程；如果他有自主全权的话，他的王国还会抵制法国的进口；至于封锁，他执行得很差。然而他的主要力量是放在军队上，他是那不勒斯军队的眞正缔造者。 452

在那不勒斯王国里，法国大革命并沒有为改革打下基础，① 所有的改革都是在不到七年之內进行的；然而工作是做得巩固的：以后费迪南国王回国后也无法恢复封建制度，也沒有废除《民法典》。1799 年曾热烈欢迎法国人的资产阶级和一些自由派贵族，表现出他们的这种感情沒有变化而是加强了。他们如同在意大利北部一样，集合在共济会的支会里；缪拉讲究豪华排场，因而具有一定的魅力，他对法国采取独立自主的姿态，这也很得人心。但是，尽管他恢复了贵族长子世袭财产，却得不到多数贵族的好感，更得不到僧侣的好感，因为他不能缔结新的教务专约和重新组织教会的等级制。至于人民，他们太穷而无力赎买封建义务；公有产业转到了农场、贵族和富有的资产者手中；拍卖和分配公有土地需要时间，当缪拉垮台的时候，这项工作还进展不大。牧民和山区居民很少关心这些改革；而芒艾思将军只是靠无情的镇压才使他们有所畏惧；此外，英国人在不断威胁着海岸。因此那不勒斯王国不象意大利王国那样是由文官按照普通法律治理的；事实上它经常处于戒严状态，按军事管制治理。

拿破仑的影响较迟才深入意大利中部。埃利兹在她的公国里，在卢卡、马萨和卡腊腊等地取消了封建制度，采用了意大利教

① 这点是同意大利北部（比利时、来因地区也一样）比较而言的，法国大革命期间，那不勒斯在波旁王室的费迪南统治下，不象意大利北部在拿破仑未上台前，法国军队和革命影响已经为改革打下基础。——译者

务专约，关闭了隐修院并没收其财产，开办了学校并着手举办公共工程。她负责统治并入法兰西帝国的托斯卡纳，在那里采用了法国各项制度；治理托斯卡纳的是一个“政务会”，其中有热朗多和巴尔博伯爵，后者原籍皮埃蒙特，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①。两个主要的行动是取消隐修院和清理公国的债务。尽管发生不可避免的磨擦，新制度在这个国家里并没引起反抗，因为该国曾经有过开明专制政体的一些最先进的代表人物②。

在合并的那部分教皇属邦领土上则迥然不同，这里的旧制度无可否认地是最落后的，但是被一个“非常国务院”把它完全改造了；6 月 9 日任命的这个国务院从 1809 年一直存在到 1810 年年底，其中除了米奥利斯外又有热朗多和巴尔博。全部领土分为两个郡，一个郡守是罗德雷伯爵的儿子，在罗马的另一个郡守是拜罗伊特的前任帝国总督图尔农伯爵。诺尔文担任了警察局长。封建制度和异端裁判所都被取消了；1810 年解散了教务监理会，关闭了隐修院。早在 1809 年就颁布了《民法典》；但是，加以实行所必需的机构从未产生，特别是户籍机构；然而《民法典》却因宣布宗教自由而轰动一时：犹太人走出了犹太区，帝国的工作人员象其他地方那样聚集在共济会支会中。行政官员特别注意财政；他们采用了法国的征税制度，但综合消费税则除外，保留了磨粉税来代替消费税；他们统一了公债利息为二分，同时按二十倍的利息、用世俗化的财产支付的办法来偿还本金；债权人的损失，至少在理论上是四分之三或超过四分之三。郡守都十分积极开展工作。图尔农改组了医院和监狱，关心文化，协助阿尔萨斯人毕歇创办一个棉纺织工

453

① 巴尔博伯爵（1789—1853 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成为意大利统一运动中温和派的有名领袖之一，著有《意大利的希望》一书。——译者

② 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意大利各小邦曾出现过“开明专制”统治。以佛罗伦萨为首都的托斯卡纳大公国是改革较多的国家，大公李奥波德一世曾部分废除农奴制。——译者

场。拿破仑为他的第二首都也设想了一些宏伟的计划：修复了一些建筑物，街道打扫干净并有了照明；对码头、桥梁、街道和皇宫等建设进行了研究；一个古代文物委员会着手发掘工作，卡诺瓦担任了一个博物馆馆长的职务；最后，还着手改造庞廷沼泽地[1]，把四分之一的面积改为耕地。但是，新制度从沒有在别处遇到这样的敌对情绪。罗马居民习惯于行政松散、行乞和抢劫；而纪律、按期征税、公共会计和秩序，尤其是征兵在他们看来是难以容忍的，政府也来不及把工作进行到底。在各城市里，主要是在罗马，资产阶级靠僧侣和朝圣者生活，然而撤走教皇及其宫廷、取缔五百一十九所隐修院，其中包括五千八百五十二名修士修女，这对于资产阶级是一个无可补救的灾难；此外，数以千计的无能和无用的官员被裁撤了。敌对情绪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拒绝宣誓效忠；教士带头，许多官员以及几乎所有的法律界人士都跟着仿效；拿破仑用免职、取消养老金、监禁和流放的办法来回击。表现得最顺从的却是贵族。 454

尽管有这些保留，拿破仑体制的贯彻实施在意大利进展极快，只需要几年的时间就能完成行政和司法的统一。在伊利里亚诸省，条件却十分不利，它们在地理上是一些被分割为许多孤立小块的贫困山区单位，居民的语言、信仰和文化水平都不相同，并受旧制度官吏、贵族和僧侣的奴役，除了几个高度意大利化的沿海城市外，居民中还沒有真正的资产阶级。从 1806 年到 1809 年，拿破仑只拥有威尼斯的旧领土，即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的利亚的一部分以及一群岛屿；1808 年他把腊古扎共和国合并进去，不过给它一定的自治权。马尔蒙保持军事权力，而行政权则在丹多洛手中，他的称号是“行政长官”。丹多洛原是个药剂师，是犹太人的后裔，很有

① 庞廷沼泽地位于罗马城外东南方近海处，面积达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古代原为肥沃土地，因灌溉系统失修，竟成沼泽。拿破仑此项工程规模不小，到二十世纪仍在不断排水造田。——译者

钱，在威尼斯国里早已拥护新思想。他正直而勤劳、但独断专行，容易冲动，沒有同占领军的首长搞好关系。在伊利里亚建立选举制度是决不可能的，结果是出现了开明专制统治，还受到军人的干涉。丹多洛设立一个总咨议会协助他，其成员经他自己遴选；事实上，他在萨拉的办公室里决定一切。他把领土分为四个郡，每个郡又分为县和乡镇，他派代表、副代表和"乡长"驻在这些地方。他组织法院，雇用农民早已为威尼斯和奥地利行政官提供的潘都尔兵①充当警察。原有捐税照旧征收，而注意力主要是放在国库和国家土地的管理上。

主要的改革是针对僧侣的：为了能减少主教的人数，有了空额就不再补充；一部分隐修院和所有的慈善会被取缔了；除了现有的主教的收入外，教会所有的财产都被沒收，其中一部分收入用来增加本堂神甫和修道院修士的补助费。1807年，丹多洛也公布了一项关于国民教育的条例，在萨拉创办了一所国立中学和几所市立中学。马尔蒙也进行了道路工程建设。由于征兵引起了许多骚乱，

455 它不得不暂停征兵，而只进行局部招募，多少带有自愿性质。至于《民法典》，在伊利里亚只采用其中有关家庭和继承问题的章节，使妇女可以接受遗产并废除"补充继承人的指定"及"信托遗赠"②。马尔蒙对在沿海地区，譬如在萨洛纳附近的波格利扎地区控制着佃户的领主的权利似乎沒有触动，但废除了教会什一税。在达尔

---

① 原系1741年奥地利弗朗茨·冯·德·特伦克男爵从其克罗地亚佃农中组成的地方武装，用以弹压靠近土耳其边境的盗匪。潘都尔兵后来在地方上充任骑警。——译者

② "信托遗赠（信托赠与）"（fidéicommis），原是封建继承法制度；按照此制：甲将财产公开地或秘密地以遗嘱赠给乙（或在生前赠给乙），乙对这项财产有保管的义务，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但无所有权，从而无权出让或出抵，且必须在甲指定的时间将它移归给丙（真正的受遗赠人或受赠人）所有。1804年《民法典》并未废止这种制度。——译者

马提亚内地，土地问题以独特的方式提出来：1756年，葛里马尼法曾把达尔马提亚土地归威尼斯国家所有，国家把土地分给当地居民摩拉格斯人，给每人分配三分之二公顷，妇女除外，他们有权耕种和传给男子继承人，但不得转让；受益人必须服兵役并向政府交纳什一税。丹多洛废除了这项法律，把土地所有权授与佃户，同时把国家什一税作为土地税保留下来；1807年，他看到投机商劝诱农民出卖地产，便规定转让必须通过正式手续，使得转让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不管怎样，这是在拿破仑统治下各国里所能看到的最实在的土地改革之一。

因此，直到1809年，这个法国属地还享受自治权，法国实行的同化政策也是有许多保留的。在这之后，形势发生急剧的变化。卡尼奥勒、上卡林底亚，奥地利的伊斯的里亚，和的里雅斯特，以及大部分克罗地亚都合并到威尼斯的领土内，到这个时候，全部这些地区才改用"伊利里亚诸省"这个来自罗马帝国的名称。直属拿破仑军事占领的那部分克罗地亚则不同：它保存了共有制村社的社会组织和受军事当局控制的国有化经济；不纳入帝国关税体系之内；并继续按照传统办法提供一个分遣队的兵员。伊利里亚的其他部分在1809年12月25日接受一种由十个州长组成的临时机构，以莱巴赫为首都，不久以后，丹多洛就离职了。直到1811年4月15日，这种政治制度才最后确定下来。政权由一个总督掌握：第一任总督是马尔蒙，然后是贝特朗，1813年是朱诺，接着就是富歇。先由总督推荐，再由拿破仑任命的一些高级官员组成辅政会议，其中主要的是财政总管和司法主任委员。一共组成六个省，每个省由省长及其委派的代表管理。从这时候起，拿破仑毫不懈怠地为统一行政和法制而努力。从1812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整个《民法典》和法国所有的法律；建立了法庭、登记处、典当和公证人制度，但是没有实行户籍制度，尽管民事结婚已成为通例。从 456

1810年到1813年，开征了法国的租税，只有门窗税例外。债务用国有产业继续清理；1812年，清理年金的工作完成了。1810年11月27日，也实行了征兵。同年建立的土木工程队使用徭役来大力修建从卡尔洛瓦茨到阜姆的公路，和从莱巴赫到腊古扎的"拿破仑公路"。

教会什一税普遍地取消了，1811年4月15日废除了封建制度。领主所有的个人权利随着贵族的采邑及其特殊地位的消失而被取消；劳役和地租可以赎买，后者减少五分之一以补偿债务人应负担的土地税。这项法令具有深刻的影响，农民终于对法国统治感兴趣了；但这促使他们要求完全解放，他们首先抗租拒税；1812年，贝特朗强迫农民服从，并派出了催税官员到农民中去。使农民感到不满的还有剥夺了他们利用森林的习惯权利。贵族们也被激怒了，他们继续迁到奥地利去。习惯于约瑟夫二世制度[①]的下层教士保持中立；但是，从前在这个地方发号施令的方济各会教士进行了愤怒的煽动。不幸的是，法国人不可能使出口和过境贸易重新活跃起来，这是该地必不可少的财源，而的里雅斯特也是完全以此为生的，结果资产阶级在经受了废除奥地利纸币和以减轻债款来清理债务的打击之后，又遭受很大损失。因此，法国统治只博得少数人的好感，如果垮台也不会令人感到惋惜。而且，根本没有人相信它会持续很久，事实上，在1812年的法奥盟约中，法国答应把伊利里亚诸省割让给奥地利以换取它的加里西亚。

在西班牙，战争状态不可能认真实行巴荣纳宪法，也不可能有效地进行拿破仑在1808年逗留期间所颁布的各项改革。卡塔卢尼亚是唯一的例外。1811年12月，当时由麦克唐纳领导的军政

① 约瑟夫二世(1741—1790年)，奥地利皇帝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年)，是十八世纪开明专制君主之一，他加强国家权力而削弱天主教会势力，限制僧侣和僧团数目，迫使天主教会服从世俗政权。——译者

府让位给民政府，然而还是要服从德凯恩将军的命令。根据法令 457
该省分为四个郡。由于拿破仑决定要合并它，所以有计划地进行与法国同化的工作。这个时期只有一年多一点，因为1813年6月，繆歇不得不再撤退过埃布罗河，使这个地方又处于军事占领状态。而且改革工作只涉及到法国人实际占领的部分。他们只找到为数很少的“亲法分子”来帮助他们，甚至这些人对新措施也不很热情。因而这些新措施也有所缓和：教会产业沒有出售，《民法典》中删去了其中离婚和禁止“信托遗赠”的部分。

四、荷兰与德意志

荷兰与意大利有别，因为荷兰具有强烈的民族传统。长期以来，大资产阶级在荷兰掌握着政权，以致各种特权以及领主权利都已大为削弱。巴达维亚共和国已经实现了统一。拿破仑以1801 458
年，1805年和1806年的宪法改组了中央政府，路易又实行了一些补充的改革。直到1810年为止，皇帝所做的沒有超过这些，正如他在瑞士一样，并不企图摧毁行政自治以达到彻底同化。然而在荷兰仍然保存着旧制度的一些痕迹。虽然在1798年原则上已取消了行会制度，但据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在1806年12月仍在议论一项取消同业行会的方案。1796年本已宣布犹太人享有公民权，然而只是到1809年才取消专对犹太人征课的特别税。虽然封建制度已不存在，一些封建义务以至什一税仍然被保持下来。统一租税制度的措施遭到暗中抗拒，特别是抗拒拿破仑想以部分破产来减轻国债的方案。在荷兰被合并到帝国以后，一切都改变了。荷兰诚然还有一个单独的政府，由拿破仑派勒布伦去主持，就关税而言也仍不包括在帝国之內；但同化政策也执行得同在伊利里亚一样严竣。从1810年起，《民法典》和全部法国法律都在荷兰一体

施行；7月9日，国债利息削减了三分之一。1811年7月15日下令至迟从1813年起在荷兰征收法国各项租税。土地改革一如既往遭到最顽强的抗拒而未能实现；政府最后还是同意保留什一税，借口是什一税既已世俗化应被视为一种地租，而路易在位时的参政院尚未解散，它宣称反对赎买对于物的权利。

*　　　　*　　　　*

不象历届革命政府曾经占领或局部改组的意大利、荷兰和瑞士那样，来因河彼岸的德意志只是在1805年战争以后才开始进行459改革。即使德意志已经完全在拿破仑控制之下，改革的阻力仍然比其他地方要大得多，因为这个国度幅员广大，情况悬殊。事实上，奥地利和普鲁士尚保存着的一部分领土，从实行改革来看，是拿破仑不能控制的地方；他还必须同他的盟国搞好关系，因此他只能听任这些盟国的统治者从他的体制里采用适合他们需要的部分；甚至在他统治着的区域里，客观形势也并不总是允许他完成他的改革措施。

一部分被征服领土直到1810年才确定归属：拜罗伊特划给巴伐利亚，哈瑙和富耳达划给法兰克福公国，汉诺威的一部分划给威斯特法利亚王国，其余都合并入帝国，帝国还保有埃尔富特。除了在1808年废除农奴制以外，临时当局在这些地方并没有变动归属未定前的原有的秩序。

贝格大公国是拿破仑在来因河彼岸建立的第一个德意志国家。它是1806年由包括杜伊斯堡在内的克累弗公国部分领土，和包括杜塞尔多夫、爱北斐特和巴门在内的贝格公国所形成的，接着又从纳索夺取一些领土，或将一些降格的间接附庸的领地合并而扩大。到1808年又并入普鲁士在威斯特法利亚的一些辖地，马尔克伯国和伊泽洛恩、明斯特、多特蒙德、埃森、特克伦堡伯国与林根伯国而再扩大，总共拥有九十万居民。成了一国之主的缪拉不再

召集地方议会而自拥独断的大权。他取消了合议制的行政机构，把全国划分为若干县，每县任命一个专员管理，在各城市则建立市政府；除了涉及关税事务以外，缪拉并不想把构成他的国家的彼此互异的国土统一起来，而让它们仍然有各自的预算和会计制度；尽管如此他在全国各地都征收了土地税和人身税，并实行了当时普鲁士国王还不敢实行的征兵制。1808 年 7 月 15 日，当缪拉调任那不勒斯国王时，贝格大公国奉还给拿破仑，虽然拿破仑在 1809 年又封路易的一个三岁的儿子为贝格大公，他仍然通过他所任命的特派专员伯尼奥(从 1810 年起由罗德雷继任)而统治大公国。1808 年，全国行政机构统一起来，租税按法国税制逐渐地进行改革；1811 年又实现了各级法庭的改革；艾农·德·维尔福斯整顿了包括有矿山、森林和年入六十万法郎封建租税的大公领地；最后，在 1812 年皇帝颁布一部宪法，其中包括有参政院和由新贵名流选出的议会，新贵名流由政府指定，但政府直到 1813 年才公布名单。

由此可见，同化政策推行缓慢，而且是不彻底的。对教会的旧 460 制度变革不大；世俗化只触动了教务管理会；在贝格大公国也没有教务专约，到 1810 年才在预算上列入拨给僧侣的少量款项。在杜塞尔道夫创办了一所大学，但只是停留在一纸空文上；只有该城的国立中学确已招生上课。司法改革和社会改革同样地迟延不前。1808 年 12 月 12 日，拿破仑废除了该国的农奴制度以及对人的封建租税和劳役，并宣告了对于物的权利可以赎买；1809 年 1 月 11 日，他废除了采邑与封建习惯法；各种特权一概废除，并准许贵族与平民通婚；最后，1811 年 1 月 1 日宣布采用《民法典》。农民抗议保持地租并拒绝向领主缴纳地租。多特蒙德的一个书商马伦克罗特鼓动农民抗租，而法院竟惩办农民；1811 年农民派了两个代表去见皇帝，但他们回国后被关进了监狱。拿破仑知道后下令调查此事；但伯尼奥指出，这个事件关系到国家领地收入，于是 1811

年9月13日的法令肯定了各项成例：就严格意义来说，封建赋税仍然应无偿废除，包括军役税、独占权、买回权①、司法权等等；对于物的权利仍然应予赎买。农民坚持抗拒；德意志其他地方的农民都沒有如此高度觉醒的，这显然是由于该地毗邻已被并入帝国的莱因地区的原故；皇帝对当地的贵族关照备至，而他们却认为受到严重打击，因而对皇帝毫无感激之心；沒有其他地方更能显示出，皇帝这种照顾贵族的政策是和推进法国影响如此背道而驰的。

整个说来，拿破仑对贝格大公国的政策，同他对伊利里亚或波兰那样粗暴地推行法国制度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后两个国度对接受改革更不具备条件。这究竟是由于他疏忽大意考虑不周，或是由于他对大公国的前途尚无把握，是很难断言的。贝格大公国的居民已被置于巴黎的最高法院管辖区域之内，这似乎预示着行将合并；他们已多次要求并入帝国，以便替他们的产品打开新的市场；但是他们在亚琛和明兴-格拉德巴赫的竞争者提出强烈抗议，因而使他们的合并要求未能如愿以偿；无论如何，看来如果拿破仑有意并吞贝格大公国，他原可加紧进行同化工作的。

461 拿破仑在对待威斯特法利亚王国上的做法则迥然不同，从建国一开始在原则上就引进了法国制度，而且雷厉风行，不稍懈怠，以致在拿破仑支配下的德意志中，它变成了模范国，正如意大利王国在亚平宁半岛所起的作用一样。然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是由一些彼此差异极大的地区组成的，如不伦瑞克公国、黑森-卡塞尔选侯邦、普鲁士的领土哈耳伯斯塔特与明登、从汉诺威分出来的奥斯纳布吕克与格廷根，还不必谈其他一些世俗化了的教会领地或降格附庸之类的小邦；总共加在一起有二百万居民。1810年1月14日，汉诺威剩下的领土也并入了该王国，但到同年12月13日，

① 买回权(retrait)指封建领主在其所授与他人的领地被后者出卖时，可以买回的权利。——译者

它又失去了汉诺威的北部。甚至在热罗姆还没有到达即位时，1807年11月15日就已颁布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提交给被召到巴黎来的该国名流绅贵代表团；代表团成员都是由贵族推派产生的，他们提出了一些要求，这些要求中现在看起来有些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们证实了在这个本质上是德意志的国度，正如在德意志其他地方一样，社会问题乃是首要的考虑。这些人对废除农奴制度提出了一些保留，坚持必需补偿，至少要能抵偿对物的权利，他们还要求延缓施行《民法典》并保持贵族的"补充继承人的指定"与长子世袭财产。拿破仑当然是坚持己见的。他不折不扣地规定要贯彻现代国家的各项原则：政权和行政组织的统一、中央集权、司法和执行机关的分立、执行机关的分工、公民平等、宗教自由，最后还要成立立宪政府。这个政府包括四个部、一个国务秘书厅和一个参政院，还有由国王任命的各郡政府，它们有权提名地方政府和治安法官的人选，并负责选举一个有一百名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会，其中七十人从土地所有者中选出，十五人从商人和工厂主中选出，十五人从自由职业中选出。法国的行政组织和司法机构，以及征兵制度都是一整套地搬过来，《民法典》也是如此照搬，其后果当然是也要废除一切特权、农奴制和行会。

威斯特法利亚的政府由一个法国人的摄政会议负责，其中有伯尼奥、西梅翁和若利韦；拉格朗热将军出掌陆军部，约翰·德·米勒出任国务秘书大臣。热罗姆下车伊始就推翻了原有的人员任命，以便安插他带来的一些冒险之徒；这个年青人素来沉湎于花天酒地，他举债一千万，从而使财政困境更为恶化。可是新制度的推 462 行却坚定不移地逐步铺开。法国的租税如土地税、人身税、营业税、间接税、印花税等都开始征收，虽然事先也曾交立法议会通过；国债都统一并确定下来；公证制度和抵押机构都组织起来。王国的多数居民是新教徒，热罗姆此时取代原有各邦邦君成为大部分

僧侣的首领；他也沒同罗马教廷签订教务专约，便擅自遴选天主教的神甫；取得公民权的犹太人获准设立一个宗教监会；户籍制度开始执行，但仍交由僧侣办理；1810年，全部遭到取缔的教务监理会和隐修院等天主教会的绝大部分产业，都予以沒收幷公开拍卖。只有土地改革尚未实行。宪法只规定取缔农奴制度和对人的权利，而何谓对人的权利仍须以几个法律加以明确规定。至于对物的权利的赎买，1809年颁布的税率已加以解决；在这些地区里，农民所受压榨最甚的是劳役，政府对劳役加以明确规定下来，幷禁止予以增加、改变和出卖。然而农民往往拒绝履行劳役，也很少同意赎买。因此政府必须三令五申来确定义务，在等待农民能下定决心表示同意期间，法庭似乎不顾《民法典》的规定，力图保持份地的完整，以便保证租税的缴纳和劳役的分派。另一方面，政府却要求郡守加快分割村社公地和取消公共牧场，以便加速消灭理论上已废除了的耕地强迫轮休。

贵族由于丧失了等级的特权而受到沉重的打击；然而在一定程度上贵族也感到差堪自慰，因为他们获得了高官显职，极少法国人来到这个王国，王国政府可以就地不受限制地起用德意志人。有些曾在普鲁士做官的人就为新国王热罗姆效劳，如哈登堡亲王的表弟比洛、马尔恕斯、舒伦堡和多姆等；一个不伦瑞克人沃尔夫拉特男爵出任內政大臣；施特龙贝克对引进《民法典》贡献很大；由选举产生的各机构和军队中充满了贵族。至于资产阶级，至少可以看出许多文化人接受或保持了职位，如莱斯特、马滕斯、雅各布·格林，更不必谈约翰·米勒了。

463 1810年12月宣布的合幷把第三块德意志领土置于拿破仑统治之下，其中包括汉诺威的北部、汉撒各城市和贝格公国四分之一土地，以及分布在这些领土之中的一些小王侯的辖地等；1811年1月22日，奥耳登堡也幷入其中。这一块领土分为三个郡，由一个

总务委员会管理;正如同一时期在伊利里亚一样,拿破仑在这里也毫不迟延地推行法国制度,1811年12月9日宣告施行《民法典》;采邑及其继承权、农奴制度、对人的权利、领主的各项尊荣特权、桥梁道路通行税、独占权、渔猎权等等一扫而光,不予补偿,而在威斯特法利亚王国,尤其是在贝格大公国里,这些改革则是经过多次反复才完成的。然而,合并时间过短,以致未能深刻改变这里的社会关系,当地居民也不象其他各地居民那样领略到改革的好处;因为合并的目的是想要彻底执行大陆封锁,这必然要实行极其严竣的军事统治以取缔走私活动。

在来因邦联其他各邦中,拿破仑并不能为所欲为。各邦的王侯对他们新获得的主权小心防护,唯恐或失,他们接受与法国结成永久同盟并成为拿破仑的被保护国,只是由于畏惧拿破仑把奥地利割让的领土据为己有,从而在德意志南部建立起有如蒙特热拉说过的一个"法国郡守府";作为交换条件,拿破仑把他们的主权写进邦联条例上,并延缓召开议会直到实现普遍和平的时候。他说过:"建立制度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在此期间,他展开了劝说活动:1807年在米兰,1808年在埃尔富特,他都提出了关于采用《民法典》的或多或少明确的倡议,并责成他的外交官们去加以推荐。如果不是由于开明专制传统,和形势促使王侯们采用一部分他的新制度的话,拿破仑或许根本得不到王侯们丝毫的让步。蒙特热拉在巴伐利亚,赖岑施泰因在巴登都与拿破仑抱着同样的理想,另一方面,这些邦国中最大的几个由于突然增添了来源各异的领地——如奥地利辖地、教会领地、降格附庸的土地、旧日的自由城市等等——而出现了各种不同政体,各种特权和各种素来势难两立的宗教信仰拼凑在一起的混乱不堪的局面;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些都融为一体,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采用法国模式,此外似乎别无更好办法。最后,这些邦国还要设法找到建立一支强大军队所必需 464

的金钱和兵员，有了强大的军队才能满足拿破仑的要求，而一旦拿破仑被打败，也才能对他战斗，并且可以自卫以防胜利者主张收回拿破仑已划给了它们的那些领土。因此之故，这些新建国家，以及那些获得领土最多的国家，一般说来都实施了最深刻的变革；这些国家也因此都无意采用立宪政体，尽管在理论上法国仍保持着立宪政体，因为这些国家的统治者都不愿受到宪法的限制；最后，解放农奴也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开明专制从未破坏君主与贵族的联盟，而约瑟夫二世曾因主张破坏这个联盟而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讲，尽管南部德意志各国都曾效法法国，它们还是更近似普鲁士，因为普鲁士为了富国强兵进行改革之时，仍然在讨好贵族。

人们原来揣测，至少在美因河畔完全凭空拼凑起来的两个公国，即法兰克福和维尔茨堡两个大公国，拿破仑的势力应该是无保留地支配一切。实际上，他在法兰克福大公国的势力确是巨大的，但在维尔茨堡大公国却绝非如此，虽然以前的托斯卡纳公爵变成维尔茨堡大公后很拥护拿破仑，并且在拿破仑的宫廷里甚为得意。拿破仑自知必须同他的德意志盟友搞好关系，对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明无过于他对维尔茨堡大公的态度。费迪南确知他在1809年同奥地利签订的条约使他受到保护，而且在拿破仑第二次结婚后，他既是出自哈布斯堡皇室，而更见重于拿破仑。相反地，法兰克福大公达尔贝格的一切都得自拿破仑。在1803年他还是美因兹大主教的助理时，他是各教会选侯中唯一曾得到领土补偿的人，他得到了累根斯堡、阿沙芬堡侯国和韦茨勒城；到1806年，他被提升为全德意志首席主教，又获得几处降格附庸的领地，特别是得到了法兰克福城。在那些以前的自由城市里，他只委派专员，并就当地居民所拟订的候选人名单遴选元老院议员，而并没有取消它们的自治权。到1810年，他被迫把累根斯堡割给巴伐利亚，因此而

得到的补偿是富耳达与哈瑙两城，就在这个时机他被晋升为大公，而以欧仁为储君。他的治下计有居民三十万人，1810年8月16日的特赐令状给这些居民建立统一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同样的租税和统一的度量衡；令状还宣布了宗教自由，废止特权和农奴制，取消行会而实现劳动自由。达尔贝格是一个十八世纪的高级教士，热诚相信启蒙思想，是一个奉行约瑟夫二世政策的人，他确信这些措施都是符合理性的，对于这一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他。但他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一个忠于本民族的德意志人，他亲眼目睹世俗化运动和结束神圣罗马帝国，不无忧伤；但是这个老于世故，善于逢迎的人决无意做出牺牲，而他的利益和癖好都使他要讨好拿破仑。他在1810年采用了《民法典》，1812年采用了《刑法典》。虽然他赞赏法国制度，但却并不是满腔热情地爱戴它，他始终慎重对待他的臣民，特别是对与他同一出身的贵族。 465

因此法兰克福大公国在一些细节的具体事务上，还是比威斯特法利亚王国落后得多；而达尔贝格统治的时间确实也比热罗姆更短。大公国的中央权力机关有一个内阁由阿尔比尼和博伊斯特参加，一个参政院和等级议会，议员由大公任命终身任职的选民提名，并按职业分院议事，正如在意大利和威斯特法利亚一样。大公国全国划分为四个郡，各郡所设机构与名称都同法国一致。公社也是如此，以至法兰克福城失去了它的元老院和一切表明它独立地位的机构；但是在郡和公社之间则保留下“乡区”或称“司法区”的原有机构，它继续同时行使行政和司法的权力。另一方面，虽然仿效法国开征了一些新税，如注册税、印花税、专利税、间接税等，并且也废除了免税特权，这些都使租税制度得到一定程度的统一，但是仍然容许并入大公国的各地区保留其原有的传统租税、预算、会计制度和国库，而大公国的财政部只收盈余款项而已。

1813年，大公国进行司法改革：全国设一个最高法院，两个上

诉法院，每郡设一个民事法庭和一个轻罪法庭；但是初审仍保留了领主的司法权，而教区法官也仍保留他们的裁判权，这一特征可以用达尔贝格本人的主教身分来说明。尽管宣布采用了《民法典》，宗教自由仍未得到承认，因为宗教婚礼仍然是有强制性的；在这方面所做到的只是对异教的容忍而已。1807年准许犹太人购置地产与从事某些经营，同时却仍限制他们只能聚居在某特定区域，仍征收犹太人特种税，他们也不能享有公民权。法兰克福城的犹太人为数众多而且富有，他们在1811年赎买了特种税，在1812年取得了公民权；富耳达和阿沙芬堡两地的犹太人也在1813年争取到免除特种税。犹太银行家，特别是罗思柴尔德家族，在财政上对大公的支援肯定是有助于犹太人的解放：阿姆歇尔、罗思柴尔德和另一犹太银行家奥本海默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城选民团的成员，同时博尔内成为警察总署的秘书。

466

社会改革则更加不彻底。根据建立来因邦联的条例，各降格附庸邦保留它们的各项特权；贵族不仅保全他们的司法权和有关尊荣权利，而且采邑和个人的权利都原封不动。在哈瑙和富耳达两个小邦里，拿破仑在1808年已经无偿地废除了农奴制；其他各地虽根据宪法的令状宣布了废除农奴制，然而到处都只是一纸空文，因为按规定农民必须全部赎买根据农奴制产生的一切租税，而能决定这样赎买的村社寥寥无几。至于对物的权利和什一税，在公爵领地和被没收的教会产业上是可以赎买的；而在领主庄园里，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参政院和官僚们对此正式表示反对；结果是又一次曲解《民法典》，而只要农民的份地还承担着封建义务，份地仍然是不得分割的。

从法兰克福大公国到维尔茨堡大公国，我们就可以看出同样鲜明的对比。从1803年到1805年，维尔茨堡主教邦曾隶属于巴伐利亚选侯国，巴伐利亚把僧侣的产业世俗化了，实行了宗教容

忍，但其统治方式仍然没有现代化。维尔茨堡大公设立了一个内阁和一个以佐伊费特为首的参政院。除此以外他几乎没有改变巴伐利亚在那里推行的统治制度；行政和司法仍合在一起，掌握在各级僧侣手里；旧的法律仍然有效，《民法典》未被采用。费迪南并不敌视开明专制；而他对改革徘徊不前或许是由于他在饱经忧患之余，想过安静的日子，也由于他要慎重对待维也纳宫廷日益开倒车的倾向。

相反地，革新精神深刻地改变了南部德意志各大邦。在蒙特热拉推动之下，巴伐利亚早在选侯国升格为王国以前，甚至在1803年合并领土以前，就已经着手改革。自1799年以来，巴伐利亚调整了各部的权限以便统一职责，并创设了参政院。1802年，司法已从行政分立出来。1805年改组了官僚机构：禁止卖官鬻爵、职位世袭和贪污贿赂；开始制订官吏任用的考试办法，规定升迁制度和行政纪律。国家的职权在不断扩大；1800年国家负责火灾保险；城市的司法权被逐渐缩小或取消；1804年实行了征兵制；1805年内政部增设国民教育局。在巴伐利亚这样一个教皇威权至上论的堡垒中，蒙特热拉的约瑟夫二世式的政策雷厉风行，引起举国沸腾：1801年，新教徒获准进入天主教的家庭；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再婚时娶了一个信奉新教的巴登公主；1803年，领土合并导致了准许信仰自由和各派基督教徒举行礼拜的自由，同时准许他们充当公职，并在不同教派之间通婚；1804年，学校在原则上都对各教派信徒一视同仁。天主教会日益严密地从属于世俗政权之下，1802年，政府取缔了一切托钵僧团，继之在1803年又封闭了一切隐修院，并没收了它们的产业。蒙特热拉热心于传播启蒙思想：1802年，他宣告了小学义务教育制；翌年，他又取消了书籍出版的检查制度。如果他能自行作主的话，行会原来也可全部废止；除了在慕尼黑城以外，他只能做到削减行会的垄断权并取消行东的世

467

袭权。

因此，拿破仑无需再去说服蒙特热拉改变思想；但是，拿破仑授予新升格的国王以国家主权，并将大片领土置于他统治之下，特别是百端待举的提罗耳，再加上他个人的影响和威望，从而加速了巴伐利亚的改革。1808年巴伐利亚宪法，显然受到威斯特法利亚王国宪法的启发，提纲挈领地载明了改革的各项原则。在这之前巴伐利亚本是一个王公的家产，现在从法律上过渡到一个具有公法规范的国家的地位：领土成为不可分割的，王位继承世系不变，王室领地同君主本人的产业划分开来并且是不能让予的，一旦王室年俸确定以后，宫廷的费用从此变成私事，不得再增加国家的债务。中央政权明确地集中在五个各有专责的大臣手里，废止了过去的合议制。事实上蒙特热拉包办一切，因为他一人身兼三个部的大臣，规定的大臣会议实际上未起作用。然而终于改组了枢密顾问机构来负责起草法律和处理行政讼诉。旧的省区撤废而代之以新划的"县"，各"县"由专员领导，辅之以一个办公厅主任和若干顾问；财政从行政部门分立，每县由一个财政督导员负责。各大城市由国王任命一个市警察局长，并由选举产生一个市议会；其他市镇则自选市府负责人；无论大小城市乡镇都在中央行政部门监督领导之下。经过创设一些上诉法院和一个最高法院，并规定法官终身任职，从而使司法组织趋于完备。

468

巴伐利亚国家也承担起社会救济和公共卫生的事业，并在1807年下令强制种痘，为全德意志做出了榜样。第一批师范学校创办起来，在1808年尼特哈默尔又组织起包括普通中学和专科中学的中等教育；改组了的巴伐利亚科学院增设了艺术研究部；保存下来的各大学都现代化起来。1809年的宗教敕令使天主教会进一步沦于从属地位，以致罗马教皇拒绝同巴伐利亚缔结一项教务专约。巴伐利亚在经济统一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内地关卡一

律废除,国家接管驿运事业,下令统一度量衡。而当时主要问题是开辟财源,因为政府支出浩繁。按照法国的办法,直接税的征收推广到全部领土;根据完备的全国土地丈量而整顿土地税;全国统计局着手展开工作,绘制全国地图的工作也在开始;新开征一些间接税,并实行严格保护主义的关税税则。军队一直在扩充,1812年取消了豁免兵役的旧制;1809年已建立国民自卫军,1812年又组织了宪兵队。

由于规定了公民平等,废除等级以及取消种种特权,宪法强化了国家权力;从1807年起,免税特权已经废止;随着等级的废除,代表各等级的会议也不复存在,其实在1807年已经取消了这些会议投票通过租税的权力。宪法诚然保障了个人自由、信仰自由和出版自由;它也建立了立宪制政府和一个全国国民代议机关。而实际上,立法机构并未召集过开会,统治仍然是警察式的和绝对专制主义的,它可以任意逮捕、检查书信、严格审查报刊、禁止一切结社集会。但至少宗教自由已经肯定实施,1808年对新教徒的最后一些歧视限制完全取消;1809年的敕令准许新教徒建立正式组织,并可以改变宗教信仰,还免除新教徒迄今为止仍被迫缴纳给天主教本堂神甫的捐献;1813年授予犹太人私人举行礼拜的自由,但是还没有授予他们公民权。 469

巴伐利亚这种专横的和中央集权的统治推广到新合并的提罗耳便激起了叛乱。从拿破仑的观点看来,这种统治还远不够完备。因为基层的司法机关仍然没有同行政机关分立,行会尚未废除;虽然在1813年才采用了法国的《刑法典》,但始终未采用《民法典》,构成巴伐利亚王国的各区域仍保持各自的习惯法。看来蒙特热拉可能害怕法国皇帝的渗透干预,所以从1806年以来,他压低了改革热忱的调门;或许也由于他也放弃了克服贵族的抵抗的念头;对贵族来说,实行《拿破仑法典》是给他们致命的最后一击。降格

附庸王侯按照达成了的协议，保留了他们的财政、司法和尊荣的特权，也保留了他们的司法机构。贵族也得以维持部分的特殊地位：象在法国一样，由于国王的特恩颁赐了一些贵族长子世袭财产用以代替已取消了的“信托遗赠”；此外，在1809年再度把妇女排除在贵族产业继承权之外；全国贵族编制成姓氏谱册，并规定应尽的义务，如有违反则从谱册中除名，因而册上有名者的威望反有增加；领主的司法权受到控制，但未取消。至于农民，则国家并沒有为他们做什么事。1808年宣布无偿废除农奴制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人身负担；前一年已下令原则上要把劳役明确固定下来，但是可以赎买；并且只要农民同领主签订一项契约，封建租税也可赎买，不过领主可以拒绝签订此项契约。由此可见，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仍然落后于其他拿破仑体系的国家；虽然在国家与贵族二者之间的关系上，力量对比已变得有利于国家，但是它们二者之间毕竟存在着联盟的关系。只有在沒收的教会领地上，农民通过付出补偿金，他的土地所有权才得到解放，而且仍然必须缴纳一项赎买税。农村的旧制度则较明显地受到触动，因为在1803年已取消了乡村公社和强迫轮种制，并下令瓜分村社公有土地，准许瓜分家族田庄；但是这些法律上的措施不是可以立竿见影的。

470

符腾堡的演变则显然不同，并且更有其特色。符腾堡公爵弗里德里希在1803年升格为选侯以后，直到1805年继续同他的邦议会争执不休，因此他未能展开任何改革，而只能局限于改组他的内阁，入阁名流中就有温青格罗德伯爵。弗里德里希慎重地不把他新取得的领土并入他的旧领地，在新领土上进行专制统治但实行宗教容忍。邦议会呼吁合并统一，向巴黎提出控诉，并且勾结了王储。弗里德里希的对策是发动一次政变，解散邦议会；但当他下令选出一个新的邦议会后，新的邦议会拒绝通过征税并向维也纳提出呼吁，而维也纳支持了邦议会。1805年10月2日，拿破仑路

经斯图加特时,建议弗里德里希结束这个议会:“替我把这些恶棍赶走。”由于邦议会拒绝提供应交给法国支配的金钱和士兵,因而遭到拿破仑的痛恨。12 月 30 日,升格为拥有完全主权的国王弗里德里希一世取消了邦议会。从这时开始,他得以放手改革他的国家;从 1806 年到 1814 年,改革活动从未松懈过,总共发布了二千三百四十二个诏书和命令,而巴伐利亚在此以前虽然已经完成大部分改革工作,但从此以后改革的势头却逐渐减弱。

正如他的邻邦巴伐利亚一样,弗里德里希一世的施政服从于强化他个人权力的需要。但是,他的性格专横独断,长期以来遭到抗拒更使他愤怒,因此他是真心热衷于独裁统治的;他的大臣都只不过是他的办事员,虽然他设立了参政院,但并不同它商量。他不象蒙特热拉那样深受启蒙思想的熏陶,所以毫不考虑思想自由,也不关心社会进步。因此,他从拿破仑体制中更专门吸取对他个人有利的东西。

符腾堡划分为若干县,由县长治理;国王直接任命和监督地方政府的官员。高级司法机构按照法国系统加以组织,与行政机关分立。宪兵队也建立起来;警察增加得非常之多。财政机构经过改组,采取国家专卖盐和烟草的办法,土地税大大增加。国家接管驿运事业,承担起领导学校的工作,并把教会置于国家管理之下。弗里德里希避而不颁布宪法,也不保障他的臣民的丝毫权利。刑事法庭甚至也不公布判决书,法庭只条陈意见而由国王决断。迁徙一概禁止,任何旅行皆须得到批准,一切集会都在禁止之列。全国实行严格的出版检查制度;蒂宾根大学丧失了自治地位,由国王派一个监督来领导该大学;申请入该大学注册需要批准,批准入学后,学生被指定在某一学院上课,不能自由选择。密探受到纵容,肆无忌惮;全国居民被有计划有步骤地剥夺了反抗的可能。从这个时期以后,高压政策比法兰西帝国更甚的符腾堡因此具有梅特

471

涅式的统治特色。

唯一幸存的改革是一定程度的宗教容忍；1806年10月15日的敕令规定对各派基督教徒一体待遇；犹太人获准购置地产，幷可以经营一种业务。至于社会的组织，弗里德里希也避免宣布任何原则；虽然他实现了法律的统一，他幷不采用《民法典》。严密受制于国王幷须负担租税的贵族，丧失了部分的司法权；贵族被禁止实行"信托遗赠"，同时又增加了许多新赐封的贵族；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获准通婚；从此任何人都可以购置地产。天主教僧侣的产业被世俗化。但是封建制度未消失：什一税、封建义务和劳役照样征课；国王只满足于取消人身的奴役。行会也没有受到触动。国家的统一、中央集权化和专制统治在符腾堡比在巴伐利亚取得更为突出的进展，而社会的旧制度在符腾堡也保存得更多一些。

在巴登，改革开始得更晚些。在1803年的领土合幷以后，天主教会的产业都已世俗化；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例外，隐修院都已关闭。原有国土与新幷土地综合编成三个省，但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仍然保持合议制的形式。政府实行这些改革幷未遭到任何抵抗；它轻而易举地剥夺了降格附庸各城市的几乎全部权力，幷在1806年废除了布赖斯高的等级会议。巴登大公卡尔·弗里德里希名不虚传是一位开明君主，但他已到垂老之年，而左右近臣又严重对立，水火不相容，因为他续娶的霍赫贝格女伯爵久想一旦前房绝嗣，确保她的孩子继位。拿破仑终于表示不能容忍，特别是他对大公的孙子同斯特凡妮·德·博阿尔内失和非常不满。1807年，达尔贝格的侄子埃姆里希-约瑟夫·达尔贝格公爵实行了一些新制：任命五个大臣代替合议制，设立参政院和着手改革财政。

472

巴登的一些激进的改革乃是赖岑施泰因的成就，这位大臣原籍巴伐利亚，和蒙特热拉一样倾心于启蒙运动的传统，主张同法国亲近友好。他把全国划分为若干县，把合幷来的一些小邦编入各

县，并将地方政府置于中央政府监督领导之下。然而他沒有把改革进行到底，或许由于改革时间太短，因为他在1810年就被撤职；以致各县之下仍保留着行政和司法沒有分立的“司法区”，巴登实行了征兵制，特别是从1811年元旦起采用了《民法典》，尽管也对该法典做了些变动。宗教容忍已在巴登实现，并在1808年适用到犹太人。巴登不象符腾堡那样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但是巴登也沒有颁布宪法。作为关键问题的公民平等还只在理论上存在。首先，降格附庸邦也同在德意志其他地方一样，保全了它们的种种特权：司法权、尊荣权和封建赋税、武装卫队、特殊的家族地位等等。其次，它们的官员依然只在高级法庭里出庭受审，而不受初级法庭的管辖。贵族也享受这种特权，他们同样也可豁免缴纳人身税和服兵役的义务；他们还保持“信托遗赠”和贵族长子世袭财产；此外，贵族的土地还豁免三分之一的土地税。最后，沒有触动贵族的采邑和封建赋税，而什一税、封建义务和劳役都照旧不变。农奴制度既已在十八世纪末不复存在，平民各阶级的处境并沒有改善许多。

在来因邦联其他成员中，有一个仿效法国最为全面的，这就是统治着二万九千臣民的安哈尔特-科特恩的邦君。他给这些臣民一个郡守、一个郡政务厅、一个郡议会、一个上诉法院和一些区法院，也沒忘记组织一个参政院；他采用了《拿破仑法典》，废除了领主的种种特权和司法权，也沒有忘记实行征兵制。其他一些小邦的邦君虽然不如他那样热忱，也都愿意进行改革，从中取利。其中最重要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大公路易一世，他迫不及待地废除了邦议会，取消了纳税特权，只有降格附庸照例地不在此限；他在1808年也采用了《民法典》，虽然也做了些改动；他规定了劳役的明确条件，并宣布有补偿地废除农奴制度。纳索公爵同样地废除了豁免纳税的特权、农奴制度和许多严格属于封建的赋税。1810

473

年，扎尔姆的邦君也对全体臣民征收土地税。在安哈尔特其他邦君那里，在图林根、在梅克伦堡，改革只限于对财政系统和征兵制度的某些细节变动；各邦议会和社会的旧制度都原封未动。萨克森同样应列入这一类。桑夫特本来很想积极主动进行改革，但是他性格不强，不足以克服顽固敌视任何革新的内政大臣霍普夫加滕的反对，而在这一点上，邦议会完全同霍普夫加滕意见一致：贵族仍然豁免纳税义务，而宗教容忍也只限于对天主教徒，把加尔文教派屏除在外。在萨克森特别重视改组军队，并增添了宪兵队。萨克森国王弗里德里希的情况近似符腾堡大公，也是拿破仑的一个忠实盟友；这位国王思想迟钝，庸庸碌碌，对改革沒有兴趣；但是如果拿破仑对他施加压力，他原可能做出让步，而拿破仑对他施加的压力并不比对巴伐利亚人或符腾堡人更大一些，唯恐引起他的不满。然而在拿破仑送给他的华沙大公国里，拿破仑就认为不必同样照顾他，于是，就不考虑他这个名义上的元首，而放手进行组织华沙大公国的工作，正如拿破仑在意大利王国和在威斯特法利亚王国一样。

五、华沙大公国

1807年7月22日，拿破仑在德累斯顿时已经给华沙大公国制定一个宪法规章。中央政府、行政和司法机构都是以法国为蓝本。国君任命六个部的大臣和一个国务秘书大臣，稍后再加上分别负责国民教育、水道和森林、粮食供应、军政和国家奖券等的一些督导官。参政院起初只不过是大臣聚议之所，但到1808年加入了一些参政官，继之又增加一些审议官。华沙大公国这个参政院比之法国的参政院享有更重大的权力，因为除了管辖行政诉讼而外，它还兼理最高法院的职能。此外，它的政治作用与日俱增：它

474

的成员当然取得议会中“使节院”①的议席，到 1809 年开始参与治理国家。尽管有这些新制度，在华沙的行政权在事实上仍然是合议制的，而且缺乏有效率的领导，因为大公常驻德累斯顿，并沒有行使他具有的合法权力委派一个总督。大臣会议诚然有一个主席，即斯坦尼斯拉斯·波托茨基，但此人并无一个政府首脑的权势。

大公国行政区划分为郡、县和公社；各级地方政府均已取消合议制，行政机构由郡守负责，由一名秘书长和一个郡政务厅协助郡守；县由县长领导，公社由市长和助理人员领导；大公指派郡守和县长，而由郡守遴选各市镇政府人员。在每一级都设有一个参议会，先由郡、县的“贵族大会”② 或由公社的大会提出候选人，然后再由大公从中指派议员。各县有一治安法官，从县的“贵族大会”推荐的名单中遴选任命，各郡有一郡法庭，由若干终身任职的法官组成；每两郡合设一刑事法庭，全国设一个上诉法院。全国也派有若干警务专员或治安长官。大公国立即就采用法国的征税制，并且组织了一个审计院。教育受到突出的重视，各地设教育委员会主持其事。天主教会置于国家权力之下，宪法授权大公任命主教。至于军队则交由波尼亚托夫斯基将军统率；1808年实行了征兵制。475 至此波兰第一次有了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和整套的职业公务人员；这些公务人员就为波兰提供了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在西欧曾有助于资产阶级的形成。

正如在拿破仑体制的其他国家一样，波兰政府也是专制政府。大公国宪法保障有个人自由，但也同法国一样，警察专横，权力无边。至于出版自由，宪法上一字未提。不过宪法还是规定有一个

① “使节院”是波兰议会的下议院，代表小贵族；上院“元老院”则代表大贵族。——译者

② 波兰的“贵族大会”(diétine)是始自十五世纪的各省议会，国王颁布新法律或征集骑士出征皆须得到它的同意。——译者

议会，但议会沒有立法的创议权，而且每两年最多只举行十五天会议；此外，它的议长或主席是由大公任命的；无论如何，在1809年和1811年这个议会是依法正规地召集开会的。议会由两院组成，元老院由大公任命终身任职的主教和贵族组成，职权只限于审议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规定；另一院称为“使节院”或众议院，议员的产生一方面由各县“贵族大会”选举一名有住所的拥有地产的贵族或其子任代表，另一方面由各公社选民大会选出代表若干人，参加选民大会的有平民地主、本堂神甫和副神甫、拥有资财一万盾的巨商大贾、曾得勋章的文武官员。就其组成而论，这个议会与意大利王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的议会有所不同，而近似那不勒斯王国的议会，尽管它的贵族色彩更为浓厚。在议员的产生中财产资格和职业仍然起了作用，但是议会两院的划分是以保持等级制度为基础的。议员投票诚然是一人一票，不再是以等级为单位；但是即使不计入公社选民大会可能也选出的贵族代表，贵族在全部议员中也已占五分之三，可是另一方面，选举制度却比那不勒斯和威斯特法利亚更为开明，因为在这两国，选民团的成员都是国王指派的，他们也只能选举国王指定的候选人，而在波兰则选民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并举行名副其实的选举。

由此可见，拿破仑很能因地制宜。在伦巴第和威斯特法利亚，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程度的巩固的地位权力，拿破仑就不给贵族特殊的代表权。在意大利南部，贵族的势力比北部贵族要强大得多，他就采取不同措施；但是，又由于在波旁王朝统治时，那不勒斯王国的贵族已经在政治上被剥夺了一切权力地位，所以拿破仑只给他们一个由国王任命的上院。在波兰，比起资产阶级微不足道的力量来，贵族的权势看来非常强大，以致拿破仑只好让贵族占支配地位；况且不久以前贵族还统治着波兰，拿破仑只得同意让他们在遵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眞正的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同时

476

也使平民间接地得到好处。因此，拿破仑想把贵族拉到自己一边来的努力，在波兰表现得比在其他地方更为突出；波兰贵族保持了它的特殊身分，而国家大权也就操在他们手里。

这种情况对于农民是有害无利的。宪法在维持贵族的政治特权地位时，也宣告了公民平等和废除了农奴制；1810 年 8 月 15 日采用了《民法典》。这样，农民就不再被固定在土地上，并且得到诉讼的权利。但是土地仍然属于贵族所有，而且 1807 年 12 月 12 日的命令规定，除非农民能够提出契约根据，否则份地是靠不住的，领主可以随时收回。这项规定使土地耕作者的处境更为恶化，因为农民世代拥有的或终身拥有的土地，通常只以习惯法为依据，并沒有书面的佃约。一切封建赋税、地租田税、劳役和什一税全部照旧；甚至额外任意加重的劳役也未受触动。政府也委派了公证人，并且公布了佃约的标准格式，用以提倡明确规定佃期、租额和劳役条件；但是缔结书面佃约者寥寥无几。领主既有了撤佃权这个武器，便用来胁迫农民维持现有的沉重负担，甚至借此更加重农民的负担；可以肯定，不少只耕种极小块田地的农民，利用他们新获得的自由权，干脆弃地出走。但是波兰当时沒有工业可以吸收这些自由劳动力，其后果只能是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动乱。至于僧侣的产业则原封不动，在以前普鲁士统治的地区已经世俗化了的产业，则划归大公国所有。当时代表法国驻在华沙的大使比尼翁在 1812 年写道："农民的处境根本沒有一点改变。"

尽管如此，波兰贵族仍然惶惶不安，因为他们深恐拿破仑并非到此为止。各大家族尤其愤愤不平，因为宪法把全部贵族地主不分大小置于同等地位，并允许平民进入议会，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拥有的权势的不能容忍的打击。然而他们现在仍然盘据国家的高官显职，或者安置了他们的代理人。特别是恰尔托雷斯基家，虽然他们本人都沒有出面，在内阁里却有他们的耳

目,如斯坦尼斯拉斯·波托茨基的妻子卢波米尔斯卡娅就是亚当·恰尔托雷斯基的表妹,财政大臣马托茨维奇被公认为是亚当·恰尔托雷斯基的人,而非常敌视法国的元老院秘书涅姆策维奇也继续对亚当·恰尔托雷斯基忠心耿耿。罗马天主教会对拿破仑的敌意也不可忽视,因为教会对农民很有影响。宪法规定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大大地触怒了教会,尽管宪法承认它是国教,并且除了离婚改由民政当局办理外,戶籍工作仍然交给教会负责。虽然世俗僧侣并沒有表示任何反对,但属于各僧团的僧侣却迥然不同,特别是在拿破仑同罗马教皇决裂之后;结果不得不把德意志人占多数的贝农教派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受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圣使的操纵。共济会发展了一些支会,在1810年共济总会统计在波兰有十二个支会,这构成了天主教会不满的一个新的理由。犹太人的问题,同时也就是一个社会问题,给天主教僧侣提供了反对法国的一个绝好的武器。宪法并沒有把犹太人排除在外,因此犹太教徒得与基督教徒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但这引起了舆论大哗,以致在1809年宣布,除了缴付特种税者经大公个别特准以外,所有犹太人的政治权利一概暂停十年;1808年禁止了犹太人未经批准而购置地产;1812年又禁止了他们租种国有土地和经营酒业;甚至为了限制他们人口增长,仍然要先经批准才许结婚。应该承认,看来犹太人并不急于想被同化;1812年,据说是根据他们的请求,允许他们在付出一笔代役金后,可以不服兵役。

六、欧洲文明

因此,可以看出,在大帝国里,拿破仑体制已经发生重要的分化:国家制度的改革到处都取得了进展,而社会的改革则每况愈下,或者半途而废。拿破仑对贵族日益彰明较著的偏袒,令人对他

所致力的解放事业的前途感到成败难卜；尽管如此，他异常重视《民法典》，我们可以相信：一旦他重建欧洲大陆的和平，他就会采取必要措施在各地全盘加以推行。因此可以说，他有意识地在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再致力于行政统一和社会统一，这种统一应该成为一种崭新的欧洲文明的结构。在拿破仑身后，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这种新欧洲文明不顾反革命势力的反动而发展起来了，虽然，发展得既缓慢又多波折，并且走了样，而这些缺点就拿破仑来说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新欧洲文明的各项原则很大一部分与1789年的原则一脉相承，因此这种新欧洲文明是带着法国的标记的。 478

在法兰西帝国以外，拿破仑没有采取措施为欧洲文明加进一个思想文化，而法语本来可以成为沟通这种思想文化的工具。在意大利王国、那不勒斯王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政府人员的绝大多数是就地录用的；在行政和教学中仍然使用意语和德语。但是在法兰西帝国以内则迥然不同，例如在荷兰，1811年10月22日的法令责成各私立学校的校长在三个月内创造条件讲授法语。随着并入法兰西帝国领土的增加，法语应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各附庸国的宫廷和拿破仑委派的高级行政官员的办公室里已通用法语，因此凡是想爬上高级官位的人必然要精通法语，而学校教育也必须把这一点考虑在内。我们不会怀疑到拿破仑曾想根除其他各种语言，因为甚至在法国本土，他也不曾想根除掉各地方言。但是与其他各种语言同时通用的法语应该成为统一了的欧洲大陆的语言。通过这个交流工具，古典文化的地位一定会得到巩固，更何况在拿破仑心目中，除了古典文化以外，别无文化可言。毫无疑问，他想要把巴黎变成欧洲帝国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和社会活动的首都，正如它正成为政治上的首都一样。他把从所征服的各国夺来的艺术杰作全都运到巴黎来，为的是要把巴黎变成世界博物馆。这种世界文明的概念乃是十八世纪理想的

流风余韵，并可上溯古罗马的传统和天主教的影响；而浪漫主义思想，则推崇自发地多样化的而且也是无从消灭的各民族文化，与之针锋相对，这种思想归根结蒂是否定人类的统一性的。

479

七、大陆经济

在与英国的斗争中，欧洲联合把大陆封锁既视为斗争的象征，也当作斗争的武器；但是，大陆封锁对欧洲经济起了反作用，因为这迫使欧洲经济不得不自力更生。所以，大陆封锁既能产生一些利益，从而巩固欧洲经济，但这些利益因英国胜利也将遭受损害，它也能破坏欧洲经济，如果大陆市场不能组织起来使每一成员国都能继续生存的话。

在一定程度上严厉地实行封锁的国家里，封锁产生的影响与在法国的相类似。沿海城市及其工厂都受到破坏：在地中海，首先是热那亚，其次是威尼斯，继之是里窝那，最后是的里雅斯特。这最后一个港口的吞吐量，从 1807 年的五千艘船共二十万八千吨下降

480

到 1812 年的二千六百艘船共六万吨。在北方，最先衰落的是汉撒各城市的港口，接着是波罗的海的港口，最后是荷兰的港口。

靠走私供给商品的德意志各大市集的贸易变得不稳定了。因此封锁遭到了船主以及商业界和银行界最有势力人物的反对。工业的情况却不同；虽然棉织工业在原料来源方面碰到了一些困难，其它一些部门也苦于不再能够出口，但是，整个说来，本地的生产却以摆脱英国的竞争为幸，而且查禁英货起了鞭策的作用。比如在法国，纺织业和织布业取得了最显著的进展，尽管这种进展由于严重的走私而有所减慢；在萨克森，虽然总的来说结果不如 1805 年那么好，但是在 1810 年却比 1805 年超过了四分之一，特别是印花布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增加了一半多；瑞士、巴登南部，甚

至意大利北部，也同样地从这些形势中得好处。毛织业也兴旺起来了，例如在瑞士和丹麦。在德意志、西里西亚和威斯特法利亚的矿产扩大了销路；图林根的铁器业和武器、巴登的草帽和刷子业，还有化学产品也都是这样。甜菜制糖法也在这些地方发展了——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公国和马格德堡——并且在荷兰和俄国也推广成功。当英国的范例到处激发企业精神的时候，封锁比旧制度下的重商主义理论和局部实践更能使人们领会到：保护关税制能多大地促进早期的企业精神。在1815年以后，这一教训并沒消失。在这个意义上，大陆体系的所有成员都对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英国工业表示关切。然而，却不是所有的成员都从中得到同样的好处的；因为越是到了东欧和南欧，农业就越来越占明显的优势，所以，封锁主要是有利于法国，其次才是德意志、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但消费者并不象工业家那样如意，而这些国家本身看到它们的海关收入由于禁止英国进口而减少，它们也象拿破仑那样表示忧虑，这都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不顾任何困难只抓生产是不够的；问题是还要使贸易流通适应新的条件，要重新分配市场，这样才能供应消费者和给制造商——如汉诺威以及西里西亚的织布商——寻找新顾客，他们直至那时原是向海外各地出口的。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英国市场支配着海洋，它象一个生物一样，在生产活动的推动下自然地成长着，而欧洲市场，由于大陆各个地区自然而然地转向自己的海岸，因此它只是在理论上由封锁统一起来，实际上却象受到离心力的作用一样走向四分五裂。这方面的证据是，横贯欧洲的贸易路线仍然持续存在，这条路线自从战争以来就不能穿越法国，但又穿过中欧组织起来；法兰克福的市集，尤其是来比锡的市集一直是生意相当兴隆的，直到1809年，的里雅斯特还把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产品转运到巴伐利亚和萨克森。从这个时候起，横贯欧洲

481

的运输线进一步向东延伸:沿着商队的路线,从波罗的海到来比锡和从萨洛尼卡到维也纳。

另一方面,新的特点是,基本上有利大陆贸易的路线从西到东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说,封锁的成功和大陆体系的巩固取决于从西到东的路线战胜从北到南的路线,后者通过走私证明海上贸易仍然是非常活跃的。这些贸易路线交叉的两个主要中心是斯特拉斯堡和里昂。斯特拉斯堡成了法国货物运到德意志、奥地利和俄国去的集散地,货物先运到来比锡再分别转运;在返运中,斯特拉斯堡通过来因河得到从法兰克福来的货物以及从维也纳来的货物,直到1810年,维也纳还把棉花从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运到斯特拉斯堡。但是,里昂在贸易方面的变化更是一件新奇的事,因为拿破仑完全控制着意大利,他开辟了阿尔卑斯山路。其目的首先是政治和军事的。为了能通到米兰,他最先开凿辛普朗通道:这一通道于1805年完工。但在这个期间,皮埃蒙特已被合并了;修建瑟尼山的道路就得到优先考虑,并在1806年就已完工。同时,也正忙于修建热内弗尔山的道路,这条路纯粹是战略性的。随着法国的统治达到意大利中部,通往沿海的道路逐渐引起了注意:在1810年,拿破仑决定加以修建并经过斯培西亚和佛罗伦萨把它延伸到安科纳和的里雅斯特;他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个工程。辛普朗通道是难于到达的,因为海关人员不容易管理,直到1810年,它主要是由士兵和旅行者使用。瑟尼山路相反地立刻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使里昂成了这条路线的起讫点;差不多全部对意大利贸易都经过这条山路:在1810年,将近有三千辆客车,一万四千辆运货车以及三万七千只驮骡经过。由于皮埃蒙特和意大利王国已差不多成了向法国购买工业品和提供农产品及纺织原料的殖民地,所以里昂的工业从中得到了好处:瑟尼山路成了丝绸之路。伊利里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因为在1810年,皇帝使之成为来自地中

482

海东部沿岸诸国的棉花商队的中心。在斯特拉斯堡杜绝了来自维也纳的货物之后,里昂又成了输入棉花的大门。由于棉花的运输,瑟尼山路已不够用,同时,由于伐累已被合并,所以辛普朗在贸易上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有待分晓的是,这些物资供应线的供应是否足以弥补越来越困难的沿海贸易。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法国的航行系统还是很不完备的,在其它地区则运河很少;而河流又几乎不能利用,甚至在来因河上,1803 年的"帝国大法"所规定的入市税虽已减少,但并沒有取消通行税所强加给航行的限制。控制各段河道的特权同样也沒有取消,在这些地方,人们不得不根据有利于搬运行会的规定装货。当时,马车运输事业非常兴旺,例如在索恩河上的夏龙那里把货物运至法国內地,再如在里昂,那里的博纳福公司成了当时大企业之一。但是,对于沉重的物资,马车运输不能够达到海运的数量;即使人们制造相当多的车辆,也沒有这么多的马匹,同时道路也支持不了;而且,除了法国、德意志南部的某些地区和意大利北部的某些地区以外,道路都还沒有铺碎石。

既然当时在帝国之外已经有了好多个工业生产中心,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中心制定发展的范围,把大陆市场划分为几个关税区。建立大的经济统一体甚至会使人们更愿意接受领土的集中:贝格大公国不断地要求并入帝国以便在帝国內寻找主顾;如果关税壁垒能够撤除的话,荷兰便会更倾向于合并。拿破仑原可以作主实现意大利贸易统一;伯尼奥和巴赫尔也多次建议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但是各种各样的考虑反对或者至少拖延这个解决办法。首先要慎重对待附庸国和盟国,它们唯恐失掉自己的主权,不会同意放弃它们的海关自主权。其次,拿破仑的制度改革和军事需求要它们付出很大一笔钱,所以很难减少这些国家的财源,这些国家甚至提高了关税率。此外,疆域的调整总在不断进行,因此, 483

经营企业和交流产品的条件不是有所改善而是每况愈下。很多由于自然条件或历史关系而结合在一起的地区都被分割开来了：例如，意大利王国与达尔马提亚和伊斯的利亚、与诺瓦腊和皮埃蒙特、与热那亚和里窝那都被分割开来；再如瑞士与意大利、日内瓦和黑林山；提罗耳与意大利和奥地利也分开了；伊利里亚与匈牙利和维也纳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尽管免税过境已得到阜姆的批准，同时在1812年又得到了的里雅斯特的批准。贝格大公国被紧夹在法兰西帝国和毗邻的德意志各邦之间，遭遇尤为可悲：它的销售额从1807年的五千五百万法郎降到1810年的三千九百万。一些商务条约能起到暂时缓和的作用；但是，拿破仑并不鼓励这样做，因为他要把这些贸易的利益保留给法国。

的确，拿破仑的欧洲政策的症结所在就是：他并非就欧洲市场本身来考虑问题，而只是从它与法兰西帝国的关系来考虑。"法国高于一切"，他于1810年给欧仁的信中是这样写的。在设想和建立了大陆体系之后，他在法国本土内就没有偏离执政府时期的重商主义一步。他的国境一直对他的盟国及附庸国严格封闭着，象对英国人那样，譬如对贝格大公国的居民和瑞士人就是这样；为了使法国的生产者没有竞争对手，他甚至拒绝合并贝格大公国，同时从关税着眼，他把荷兰和德意志北部各邦屏于帝国之外，虽然他在政治上已把这些国家和法国结为一体。另一方面，他又力图迫使各国实行有利于他本国的臣民的特惠关税，就意大利王国和那不勒斯王国而言，他达到了这样的目的。他的这种态度可以从法国的形势得到说明；法国是大陆上最工业化的国家，因而受封锁和战争之害最深；它已失去了殖民地市场和英国市场，接着，在1808年，又失去了所剩下的最好的主顾西班牙：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拿破仑竭尽全力为法国保住意大利。法国是大陆体系的中心，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使法国避免经济崩溃。然而，政治上的考虑再次

484

使他沒有把这项政策推向极端。他沒有采取任何措施去阻止萨克森人和瑞士人夺取德意志市场；在来比锡的市集上，法国仅仅出售一些质量最高的商品。相反地，他为自己保留下他能完全控制的意大利。这样，他就在三个主要的工业地区之间分割了欧洲市场。此外，在坚持要保留这块禁脔的里昂人的推动下，他逐步地在意大利王国周围设立了不可逾越的海关壁垒，只有靠法国的这一边除外，他强迫意大利王国接受1808年的商务条约，在1810年，他自称唯独他有权在意大利王国进口呢绒和棉织品，他在那里对出口到奥地利和瑞士的生丝抽税，以便里昂能对此进行垄断；他还强迫意大利王国让那不勒斯和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棉花免税过境，并尊重法国与伊利里亚之间货运往来的权利。在1810年，意大利王国向法国购买了价值四千三百万的货物，在1812年，达到八千二百万；它运往法国的粮食、亚麻、苧麻以及丝绸，在1810年是七千三百万，在1812年是九千二百万。它的遭遇并不象人们所说的那么坏，因为它的贸易一直是出超的。法国沒有损害意大利王国的工业：它只是在那里取代了以前英国的地位；由于法国只能供给意大利王国一些价格高昂的商品，所以当地产品继续供应人民。拿破仑甚至不完全反对王国采取一切办法增加工业设备：尽管他不愿意给王国派遣熟练工人，但他还是允许给它二十万法郎购买纺织机器。但是，王国的工业家念念不忘的只有这一点：封锁原应对他们有利可图，然而法国把封锁的全部利益都据为已有。而那些吃到封锁苦头的人则更振振有词，到处都在附和这种看法。

尽管工业支持封锁，尤其是在它进行革新的时候，但是，这种赞同不是沒有很大的保留的：在大陆内部的商品流通碰到了过多的障碍，人们认为这是皇帝为了只对法国有利而保持和加强的。至于农业，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这个问题特别关系到普鲁士、波兰以及俄国靠近波罗的海的一些省份，这些地区找不到任何人来购买

它们从前出口英国的剩余粮食；只有挪威这个经常需要进口的国家能够提供一个市场，但是陆路不能达到挪威。这些国家的林业485 产品本来在西欧是更受欢迎的：但沒有船舶，这些产品就运不出去。就是拿破仑本人也难于出售他的葡萄酒和白酒；在丰收的年份，他的粮食也是过剩的。农民所出售的至多只供应当地的消费，所以不应夸大这一不利条件：它仅仅波及贵族大地主和大农场主等一小部分人；但是，这是一些有势力的人，而封锁毕竟总是趋向于削弱农产品的价格、削弱农村的购买力，从而损害了工业，而封锁在别的地方则有利于工业。由此造成的大陆市场的缺陷、经济的虛弱以及财政的亏空，最后使得皇帝不得不对封锁制度进行改组，幷通过颁发特许证的方式暂时放松一下。不论他的动机是多么迫切，这种放松还是引起了破坏大陆体系的离心倾向。拿破仑对大陆各国封闭了法国港口，同时却向美国人开放，这证明指责法国有利己主义是很有理由的。各盟国及附庸国声称有权摹仿拿破仑这种做法，而俄国就带了头。

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相对独立的市场来加强欧洲联盟，这显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它要求长年累月的强制措施。第一个要排除的障碍来自领土的分裂破碎以及由此产生的"內地"关卡。这是要"大军"来解决的任务。在公共舆论面前，英国的有利地位在于能证明：任何形式的大陆体系都是建立在军事专制之上的。

八、大陆体系与民族

大陆体系能否存在下去取决于俄罗斯战役的结果。拿破仑一如既往又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下一次的胜利上：其余的事都将迎486 刃而解，再视形势发展而定。因此他对于欧洲联合的前途，幷沒有确定的计划。可以断言的是，自从1810年以来，他加深了帝国的

古罗马特色；他的继承者今后都将在即位十年之内，在他定为第二首都的"不朽城"里举行加冕典礼；拿破仑想把玛丽·路易丝亲自带到罗马去，并在那里为她加冕；为了这件大事，一些准备工作已在进行。罗马教皇将来既可住在巴黎，也可住在罗马；迟早有一天，庇护七世总会有一个甘愿接受新的"巴比伦之囚"①的教皇成为他的继承人。以后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可以任意想象：在沙皇亚历山大的军队崩溃之后，波兰将会复国；在俄国土地上成立一些新的公国来保护这个重建起来的国家；废黜贝尔纳多特而代之以一个可靠的人；德意志将进行改组；伊比利亚半岛将会降服；君士坦丁堡将会被征服，成为帝国的第三首都；大陆的和平大概会得到保障，拿破仑所设想的那种欧洲文明会逐步推广。

有人曾试图使这种推断与作为世纪的特征的民族主义协调一致，好象皇帝曾打算要把大陆体系改变成一个由许多独立自主民族自愿组合的团体。他为大陆所梦寐以求的世界文明同这样的理想决不是背道而驰的；但是，靠征服而建立起来的统一，对于法国大革命初期所设想的、作为其事业最高成就的各民族自由联盟完全是一个否定。然而，拿破仑的这种幻想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人们注意到拿破仑总是抓紧利用正在起作用的各种力量来实现他的目的，而每当他认为时机适当的时候，他也从不忽视民族的思想感情。在法国，拿破仑的权力就应归功于这种民族意识；尽管他为了他个人的帝国迷梦而牺牲了国家的利益，但法国人却一直把他视为民族的领袖，因为他们的命运与他的命运已是休戚相关，不再可

---

① "巴比伦之囚"原为古代犹太人被迫迁出耶路撒冷达七十年的传说。十三至十四世纪罗马教皇与法国国王展开长期的教权与王权之争，到十四世纪初，教皇卜尼法斯四世已敌不过法国国王腓力四世，但未屈服。1303年卜尼法斯四世死，在腓力四世的压力下，红衣主教团选出克力门五世（原为法国人）继任教皇，并将教廷迁至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约七十年，直到1377年才迁回罗马。史称"阿维尼翁之囚"，有时也因七十年放逐而比附为教皇的"巴比伦之囚"。——译者

分。而且他在继承大革命的事业时，通过中央集权、兵役、在外敌面前保持敌忾同仇的长期战争以及激发集体自豪感的节节胜利，加强了法国人的团结。在法兰西帝国以外，他显得更加谨慎得多；虽然波兰人不能谴责他背信弃义，因为他从来沒有对他们许诺过什么，但是他利用了他们的爱国精神；他把意大利的国名第一次写在政治地理上、使伊利里亚的名称复活以及给予斯洛文尼亚语和克罗地亚语以官方语言的地位显然不是沒有用意的。

487

还值得肯定的是，拿破仑通过他的政治体系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的发展。尽管他沒有完成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领土统一，他大大地简化了这两个国家的地图；他把一部分南部斯拉夫各族人集结在一起，这是自十四世纪以来从沒出现过的事。[①] 他进行的改革不是无足轻重的：废除各省自主、特权和封建制度，代之以行政集权、公民平等和国内市场的统一，他创造了发展政治民族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他算得上是好几个现代民族的缔造者之一。但是，这些是与他的意志无关的后果；一个政治家的行动总是带有他所沒预见到的一些反应，皇帝沒有逃脱这一共同的命运。人们可以说，他要把意大利给他的第二个儿子，而建立领土广大的单位则是为了便于将来治理扩及到整个大陆的帝国：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把大陆联合在一起，又把它一部分一部分地分割给皇族成员，这与民族独立毫无共同之处。

75

实际上，拿破仑并沒有与民族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无论这种民族感情是以君主政体的形式，或者是以革命的形式出现的，因此，他不喜欢它，并且不信任它。在法国，他认识到，爱国主义使人民关注民族的永久利益，使人民面对着他们的领袖时关注自己的尊严，不论这个领袖是多么深得人心，或是使人民不能容忍的唯我独

① 指十四世纪七十年代后土耳其人入侵巴尔干半岛以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即丧失政治独立。——译者

尊的专制。他知道，爱国主义总有一天会与他自己的个人专权作对的，所以他千方百计要用“荣誉”——即对他本人以及对他的皇朝的个人效忠——来代替爱国主义。在国外，这种倾向更起着支配作用，对拿破仑来说则更是事关重大。从他的观点看来，他的论点是正确的：民族的思想感情与帝国的概念水火不相容，较之与专制主义彼此不相容尤有过之，帝国概念碰到的最可怕的敌手就是民族思想感情。

488

第三章　各种独立力量

与拿破仑的天才同时并存的还有其他各种力量——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力量，都在继续起作用，这种作用对拿破仑的事业或者是背道而驰，或者是各行其是。拿破仑创造了一种统治方式和一个社会，在其中个人的力量得到革命的解放，但同时其中也混杂有开明专制的传统，有追摹旧制度而恢复的社会等级制度，还有新建立的法统。然而各国旧王朝和旧贵族不甘心被推翻，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各族人民则反抗他建立世界帝国的企图。另一方面，精神文化生活也保持其自主地位。最后，资本主义继续在进展，并在许多方面日益与拿破仑的事业相抵触。如果拿破仑的大军不曾突然溃败，这些力量很可能俯首听命，或稍收敛；但历史学者今天所能确切记载的只是：在 1812 年以后，这些力量在大陆体系的废墟上取得了胜利并且支配了整个十九世纪。

一、旧制度的大陆各国

在法兰西帝国以外，拿破仑体制在欧洲各地无不遭到贵族的489顽抗，贵族从其中看出平等主义革命的精神。拿破仑触怒了这些贵族，因为他取消领主权力，并把贵人们贬低到臣属平民的地位。拿破仑在附庸各国虽然慎重对待贵族以致不顾农民的利益，但无济于事，因为贵族认为这只不过推迟打击他们而已。拿破仑重建了世袭贵族制度，但也无济于事，因为暴发户新贵族能同旧贵族平起平坐，这正是旧贵族所最不能容忍的。福斯伯爵夫人在 1807 年

写道:“这伙人把咱们践踏到入地三尺了”;在威灵顿和别的高贵勋爵的眼里,法国皇帝从来只不过是“波尼”①,而罗马王则是贵贱混合的“小杂种”。各国帝王也同样高傲自倨;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决不会承认这样一个人创建的皇朝法统,此人竟敢沒规沒矩随意废黜了他们那么多的王室世系。加之各国帝王也很提防贵族,他们受到拿破仑的威胁时,更要抓紧贵族为他们效劳。他们也害怕任何贬低贵族的作法都会鼓励犯上作乱的精神。然而国家权力在法国如此强大,使他们不禁心驰神往,并为他们提供了某些可以借鉴的东西。各国帝王的态度取决于他们各人的智慧,而尤其是取决于他们的左右亲信。但是不管他们采用什么革新,这种革新必须与保全贵族的目标相符。这就是普鲁士改革同拿破仑体制大相径庭的特征,而普鲁士改革在大陆各国中是唯一尚有成效的改革。这样就可以看出,法国大革命所开掘的鸿沟依然如故,并且不管拿破仑做了些什么,在欧洲人的心目中,他始终是法国大革命的战士。

在普鲁士,改革工作在施泰因被撤职以后继续进行,而尤其致力于军事改革。沙恩霍斯特扩充兵员已经远远超过提尔西特条约规定的限额,主要地是扩增骑兵;另一方面,他利用在1808年受过短期训练的退役士兵(即“速成兵团”)建立了后备力量,并利用士兵按惯例每年休假一个季度还乡的机会来训练本教区的青年。在1811年,沙恩霍斯特以修缮要塞为借口召集工兵,而实际上是进行军事演习。技术的改进也明效大验:全国军队整编为六个军团;并力图使步兵学会散兵作战,在这点上确实也只取得相对的成效;随军行李已被减轻,而帐篷也已淘汰;炮兵改组了,并更新了装备;补给制度也采用了征发的办法。尽管有这一切改进,沙恩霍斯特仍未能建立起真正的全民军队;免役规定诚然已大加限制,而

① “波尼”(Bony)是对波拿巴(Bonaparte)的贬称。——译者

为了使得资产阶级满意，军队中废除了体罚。但是，普鲁士国王既不下令实行义务兵役制，也不肯同意组织民兵。虽然见习军官已规定必须通过考试，军士也可晋升到尉官，但是贵族的垄断，除了国王明令规定的某些例外，却仍然在事实上得到确认，因为一有军官职位空缺，贵族出身的高级军官有权提名他们的继任人选。虽然创办了三所培养下级军官的学校，但并没有取消那些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士官学校；此外还为军官设立了同事间的荣誉法庭，这样就使军官仍然成为一个十分紧闭的贵族阶层。但沙恩霍斯特至少能争取到在参谋总部和陆军大学组成一个高级指挥部，这个指挥部虽然业务技术尚非十分杰出，但具有团结一致精神，准备发动进攻的意志，并把一切行动服从于公共事业。至于威廉·德·洪堡，在 1808 年 12 月从驻罗马大使任上召回后，担任教育和宗教的领导工作，在职不过一年半。他的主要政绩即为创办柏林大学，自丧失哈勒大学后，德意志人即有此意，至此始得实现。洪堡延揽许多名流教授，如费希特与施莱尔马歇、沃尔夫、萨维尼、尼布尔、博克等，因此使柏林大学声誉日隆，从而对普鲁士在政治上大有裨益。

490

行政和社会的改革则只有在再度起用哈登堡（1810 年 6 月 4 日）以后，才重新着手进行。他被任命为宰相，因此终于使中央政府有了首脑。这个私生活不检点的机会主义者不能博得全体爱国者的信任；虽然他对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和秘密团体都并不推心置腹，但是他的目标和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并曾在西里西亚同施泰因秘密会晤过。他对拿破仑的榜样要比施泰因敏感得很多，而对贵族不象施泰因那样尊重。早在 1807 年他就说过，普鲁士也同样需要一次革命，但是所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他很愿意以威斯特法利亚王国为榜样。因此他比施泰因所激起的反感要大得多，以致时至今日他的声誉还远不如施泰因那么高。哈登堡进

行改革首先要考虑的是财政问题。虽然根据特里亚农敕令所规定的关税税则和据此而来的缉私使他获得一千二百万盾，他仍需另辟新财源。他甚至不敢在东普鲁士设立所得税局，他只能做到在10月27日宣布增加印花税，以及肉类消费税，并把磨粉税推广到乡村地区；但是他乘机取缔了领主对磨坊、啤酒作坊和酿酒作坊的独占权。他也准备完成土地改革，特别是由于西里西亚仍继续发生动乱；1807年他曾不得不吁请法军协助控制农民，但到1811年农民又起来造反。哈登堡很想废除封建义务和劳役，交换条件应是免除领主对农民救济和保护的义务；农民的公地使用权和农民庇护所都应在取消之列；从此调整集中耕地，废除强迫轮种耕地和瓜分村社公地都不再有任何阻碍。为了实行土地调整，准备用领主负担的捐税来抵偿农民负担的捐税，如果有差额则由农民让出其份地的一部分，或交纳地租，以补不足之数。这个制度在十九世纪里不仅盛行于普鲁士，而且盛行于整个东欧；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制度或多或少地把农民沦于仍然替领主耕作的雇工，继续使农民处于依附的地位。不过在原则上，除去国家以外农民别无其他主人；哈登堡甚至考虑过从容克手里收回警察权，如果还不能剥夺他们的司法权的话。1812年，哈登堡从法国照搬来宪兵制度，并在各县派有国王任命的警察局长。 491

哈登堡预见到这些措施势必引起贵族的猛烈反对，他便寻求公共舆论的支持。而且他同爱国者的想法一样，认为必须让全国各界参与政府。作为第一步他先只召集一个由他选定的缙绅会议，从1811年2月到9月举行会议。以马维茨为首的容克地主提出强烈的抗议：他们反对一个人民的代议机构，而主张恢复各省的等级会议，因为其中除了为数无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以外，有权出席的几乎全部是容克。普鲁士国王不得不屈从哈登堡的原议，他下令逮捕了马维茨和芬肯施泰因。这是一场明摆着的社会冲突。有如

马维茨所说，国王诚然可以册封新贵族，但是他不能创造高贵的灵魂。而约克在威廉亲王面前大声疾呼："如果殿下剥夺了我们的权利，那么殿下的权利又有什么依据呢？"莫龙根县的贵族在1814年提出抗议反对"法国立法有毒害的影响"。尽管贵族如此反对，在1812年还是召集了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院，每省派出来自城市和乡村的两名贵族和两名议员，由地主通过两级选举制产生。这个议院要求制定一部宪法；但是正如在前一次的缙绅会议上一样，贵族在议院中拥有多数，他们的责难迫使哈登堡进行妥协。1811年9月14日的"调整敕令"，把原来对土地只有使用权的"占用户"变为土地所有者，并且取消他们的封建义务和劳役，条件是他们要放弃部分份地给领主，如果份地是世袭的放弃三分之一，如果份地仅是终身或有期限的，则须放弃一半。领主对农民的保护权，农民对公地使用权和"农民庇护所"等当然仍在废除之列，不必付出补偿给农民。这个法律并没有改变世袭佃户（即能付清地租的世袭永租佃户）的义务，并没有减轻农民的沉重负担。即使如此，容克仍然不愿接受它；从1812年起容克就已开始讨论对这个法律要作限制性的修改；到1815年，这个法律暂时中止施行，而到1816年对绝大多数农民而言这个法律已告废除。

限制领主警察权的努力也同样未见成效。1811年9月7日，哈登堡已取消把磨粉税推广到乡村地区，并归还贵族的独占权，于是只得转而加重直接税——人头税、资本税、所得税，最后还有营业权税。这种营业权税是仿效法国而来，至少可以取消行会的垄断权。至于容克的种种特权则完全没有触动；他们完全保持原有的继承权和"信托遗赠"，司法权和保护权，狩猎权和豁免租税权。这样一来，普鲁士便大大落后于西部德意志；普鲁士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所取得的进展不大；贵族的特权照旧存在，农民的解放徒有虚名。从许多方面来看，华沙大公国本土还要比普鲁士更为现

代化。

俄国的改变比普鲁士还要少得多。在提尔西特和约以后，亚历山大又恢复了实行改革的兴趣；这次战争使他认识到政府机器必须加以改进。同法国结成同盟从一开始就重新唤起他青年时代的回忆，并重新引起他侈谈自由主义的癖好。虽然同“密友委员会”比较起来，斯彼兰斯基的计划更为明确，行动也更为坚决，但是他的努力并沒有留下什么可观的成果。这个东正教祭司的儿子，在历史上留下了在修道院里给他取的别名，乃是一个杰出的传道士和教授。库里亚金家族把他提拔到政府中任职，接着他成了内务大臣柯楚别伊的左右手；1806 年他同沙皇建立了直接联系，并曾随侍沙皇到埃尔富特。从埃尔富特返国后，亚历山大要他起草一部宪法草案，并在 1809 年在原则上接受了他的草案。根据这个草案，俄罗斯帝国划分为若干大管区，下设若干县，县下设乡；各乡由土地所有人选出一个杜马；乡杜马提名乡政局的成员和一个 493 出席县杜马的代表；以此类推，直到推选出一个有权通过法律和预算的帝国杜马；由一个对帝国杜马负责的内阁行使行政权；每个地方行政区域都有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法庭，法庭由元老院负责监督。沙皇还任命一个咨询性质的帝国参政院。

可以看出，这个草案部分地受到英国的影响，因为斯彼兰斯基娶了一个英国牧师的女儿，他从早年起就非常赞赏英国政治制度。他的草案原曾设想建立一个两院制的议会，其中一院代表土地贵族；但是他很快认识到，俄罗斯贵族既沒有英国贵族的才能，也不具有英国贵族的独立性。然而，他所拟议的地区划分、行政组织和法官选举，以及设立参政院和各部等等看来却透露出法国的影响。相形之下更可看出，他拟议的社会改革甚至不值得称为草案：它根本沒有考虑解放农奴的问题，虽然现在商人也取得购置地产权，获得选举权的土地所有人几乎全部还是贵族。亚历山大决定斯彼兰

斯基的方案只能逐渐地分阶段实施：1810年他设立了参政院，1811年设立各部；斯彼兰斯基被任命为国务大臣，他规定公职候选人必须有大学文凭并须通过一项考试。这样便使官僚机构得以建成；此项成果，与其看作是英国式的，不如说是拿破仑式的，其实还是符合俄国发展需要的，因此它成为斯彼兰斯基方案中唯一能垂诸后世的成果。即使斯彼兰斯基并没有丝毫触动贵族的种种特权，贵族对他还是疑惧丛生；人们知道他在准备一个法典和一项关于犹太人的法律。他既不得不整顿帝国财政的烂摊子，于是便加重税收并考虑开征所得税，虽特权阶级也不能豁免，因此招致对他更多的不满。正如在普鲁士一样，俄国贵族也把这些革新斥之为法国的影响；因此当对法战争迫在眉睫时，他被指控有叛国罪行，因为他同巴黎保持着通信关系，其实他这样作是奉沙皇之命而且是为了沙皇进行"秘密"联系的。但是为了抵抗拿破仑，亚历山大需要贵族的拥护，1812年3月29日，他流放了他的这位朋友。

至于约瑟夫二世的君主国，它的政策的彻底改变博得反动贵族的喝采，因为弗兰茨一世既固执己见又见识浅薄，不管什么样的改革一概拒绝。拿破仑体制见之于奥地利者只有对自由思想的压制与警察恣意专横；但是这些并非是从外国抄袭来的，因为比较地来说，拿破仑尚非蒙昧主义的顽冥不化之徒，他还具有自由主义君王的形象。奥地利政府全力以赴要解决的是财政问题。为了付给法国的战争赔款，奥国不得不把皇室的银器拿去抵押，并发行强制公债；即使如此到1811年还有一千七百万尚未付清；女婿拿破仑允许延期偿付，而在罗马王诞生之际，又慨允延到1813年7月4日之前偿付，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当然他一文也未到手。为了应付国内的支出，奥国政府印发纸币。奥多纳心力交瘁而死，继任的瓦利斯伯爵于1811年2月20日宣布破产：规定纸币以五分之一的价值兑换新币，而新币的价值又很快地一落千丈。匈牙利的议

会反对极为猛烈，以致奥皇不得不解散议会，并公然违反宪法实行独裁统治。

反对法国的斗争因而从来沒有失去其社会性质。在拿破仑的所谓盟国中，旧制度下的贵族保持住他们的优势地位，但是他们看出，如果大陆体系大功告成，这种地位必然难保；因此，贵族把拿破仑的失败当作自己的胜利来欢庆。贵族把神圣同盟变为反对资产阶级和农民的一种保险公司；从今以后，奥地利显然要成为领导这个公司的国家。

二、盎格鲁撒克逊人与自由主义

面对着屈服于专制主义的大陆欧洲，盎格鲁撒克逊人保持了他们的传统。在英国，托利党人不再反对议会制度；除了在爱尔兰以外，他们不再继续停止施行"人身保护法"，并很有节制地实施 495 1799 年的各项法案。托利党人是皮特的门徒，他们在许多方面已仿效十八世纪的辉格党人。他们站在英国国教的立场上，然而他们也慎重对待非国教信徒；他们为暴发富戶和杰出军人晋封贵族大开方便之门，滥发勋奖，慎重地把大资产阶级纳入旧有贵族之列。他们的社会政策同拿破仑的社会政策如出一辙，其要旨在于既保持等级制度，而又不树立法律上的特权地位。但是他们并非不反对拿破仑的统治制度，因为他们仍然珍视他们的宪政和自由主义的习惯，同时也因为他们固然容纳一些新进的贵族，但他们力求使政权把持在世家大族的手里。

大陆各国的贵族，无论是封建贵族还是军功贵族，对自己的特权都是唯恐或失，在他们看来，英国贵族未免接纳过宽，过分地使财富凌驾于出身之上。象施泰因和斯彼兰斯基那样具有卓识远见，愿以英国贵族为模范的大陆贵族，实属凤毛麟角。大陆各国豪

门大族对于英国贵族善于牢牢掌握政权，心羡不已；然而他们却与专制帝王和拿破仑本人看法并无二致，都认为英国乃是政党政府软弱无力的例证。托利党深陷于个人争权夺利之中；这种争夺既使卡斯尔雷和坎宁倒台于先，又使帕西瓦尔和韦尔斯利失和于后。1812 年 2 月，当威尔士亲王出任摄政并拥有全部王权时，果然不出所料任命辉格党人入阁。威尔士亲王虽为摄政，但其本人道德威望不高，他的妻子卡罗琳和女儿夏洛特则颇得人心。格雷和格伦维尔坚持要组成一党内阁；韦尔斯利退出，5 月间帕西瓦尔遇刺身亡，政局混乱达于极点。那时拿破仑正向涅曼河进军；英国举国上下深感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内争暂息。卡斯尔雷出掌外交部，范西塔特随同出任财政大臣，还有巴瑟斯特，他们在利物浦勋爵领导之下组成一个行将摧毁大陆体系的政府。9 月间议会解散，新选出的众议院坚决支持他们；但是他们仍须努力才能树立威望。

另一方面，大陆上有人怀疑，议会制政府是否能有效地维持旧制度。某些征兆表明，托利党的优势地位迟早难保。因为当托利党人继续加强"谷物法"时，工业资产阶级和商业资产阶级正明显地转向自由贸易；在这一点上，年青的皮尔已经表现出令人不安的独立立场。在议会内，坚决反对"谷物法"的惠特布雷德或是伯德特尚不足为患，因为辉格党的领导上层中如罗素、霍兰、格雷等家族和派系都不支持他们。在议会外，由于团结在布鲁厄姆和西德尼·史密斯周围的、在苏格兰的一个不断扩大的小组的活动，辉格党的实力有所恢复。1802 年由杰弗里创办的《爱丁堡评论》和 1807 年西德尼·史密斯出版的《彼得·普利姆莱信札》风靡一时，以致在 1809 年坎宁和索赛决定创办《季度评论》与之抗衡。此时托利党改变政策而主张战争，辉格党则反其道而行之支持和平倡议，而这是一个深得民心的政纲。这些辉格党人至少是还没有以民主派自居。但是政治的激进主义正在开始形成为一个政

党。改变了政治信仰的科贝特发动了一场很激烈的笔战反对政府；卡特赖特少校大声疾呼要求普选权；普莱斯恢复了他的宣传运动；詹姆斯·穆勒争取到边沁从而对他们帮助极大。边沁此时已决心投身政治运动，在1812年写成了他的《议会改革原理问答》。但是在欧洲那些意图保持或指望恢复其特权的人，总的说来，仍然认为最可靠的保证还是绝对专制主义。

由此可见，英国的影响主要是对资产阶级，以及一些存留下来的自由主义派贵族起作用。托利主义本身对他们并沒有什么特殊的吸引力。托利党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如以前的辉格党人一样，不过是一个腐朽的寡头，并且因丑闻迭出而声名狼藉。他们诚然也稍微修改了刑法，实行了某些行政改革，并在1807年取缔了奴隶贩卖，其动机不过是为了提高糖价，并敷衍虔敬派[①]教徒和人道主义者，但是他们越来越奉行沃波尔[②]的信条：quieta non movere（“一动不如一静”）。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仍然悬而未决；1810年，已就任爱尔兰委员会主席的奥康纳有力地推动了宣传工作。由于格拉顿也投入改革运动，1812年众议院决定通过实行改革；但是改革未能实现，因为奥康纳和天主教僧侣拒绝关于遴选主教所规定的必要的保证条件。然而辉格党人比较合乎现代潮流的看法只起了弥补的作用，其实这一点也是无关轻重的：因为在拿破仑铁腕专制统治下的鲁瓦耶-科拉尔、邦雅曼·贡斯当，甚至在夏托 497 勃里昂的心目中，英国是立宪政府和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既能杜绝民主政治又能保持对合法君主的尊敬，因此对他们格外具有吸

① 虔敬派（piétistes）是路德教派的一支，主张精读《圣经》，身体力行。——译者

② 沃波尔（1676—1745），辉格党领袖，在1715—1717年和1721—1742年两度组阁，对英国内阁制政府的形成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当时首相一职虽尚未取得法律的地位，但沃波尔实际上成为第一个英国首相，他对当时党派斗争，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译者

引力。正如一个世纪以前一样①，英国又时兴了。在帝国的末期，法国人热中于议会制政府，其实并不确切理解它究竟具有什么內容，有如后来在1815年以后所展示的。但是他们远远沒有停留于此，亲英情绪此时对拿破仑的统治已经起了干扰作用，到复辟时期更是狂热。

托利党人丝毫无意于鼓励其他国家采用他们本国的政治制度。也许象卡斯尔雷这样的人在內心深处幷不十分乐意向一个议会说明自己的行动，但是无论如何，托利党人一致同意认为，其他各国人民都沒有能力自己治理自己。在辉格党人之中，至少还有几个人反对伯克的见解，认为英国政治习俗具有普遍的意义。这些人在输出英国政制时，甚至相信必须按照他们的意愿先加以改革，使英国政制也具有条理性和一致性，而这是旧制度下英国所完全忽视的，看来他们是受到法国历次宪法的启发。本廷克勋爵在实际控制西西里时就是这样干的：1812年7月，他引为自豪地提出一个逻辑结构谨严的宪法，幷且规定根据财产资格选举一个议院，这一规定适用于全国。这个西西里议会废除了封建制度。但是当本廷克被调到西班牙去时，一个反对党在西西里公开表示要求更为激进的改革，而在饥馑引起一些骚动时，国王费迪南四世乘机恢复他的权力。本廷克从西班牙回到西西里时，便要求王后离去，宣布解散议会而举行新的选举，幷且不顾选举结果而自居于独裁者的地位。在1814年本廷克被召回国后，他的后任阿考特便借口此次实验效果不佳而放弃了本廷克的尝试，从而使费迪南四世得以反攻倒算。

就美国的民主政治而论，它的政治生活风平浪靜，原可提供成为一个范例。党派之争似已结束。在杰佛逊第一任总统期间，联邦党已销声匿迹；而共和党也已逐渐采纳其对手的主张。杰佛逊

① 指十八世纪初启蒙运动初起时，孟德斯鸠等都赞颂英国政治制度。——译者

诚然裁减了陆海军，并偿清了半数的国债；然而他也为美国取得了路易斯安那，并且为实施 1807 年的禁运法案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 498 权力。1809 年继杰佛逊担任总统的麦迪逊终于向英国宣战，这场战争迫使他更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对于欧洲而言美国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范例；美国的影响，在与英国的和法国革命的影响汇合在一起时，彰明较著地表现在拉丁美洲。

如果说在大陆上，尤其是在法国，自由主义大有前途的话，其原因是在资产阶级的增长和 1789 年理想的进展上。拿破仑所尊重的自由只限于宗教自由和经济自由，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他也保存了人民主权和选举原则，各被征服国家都同法国一样得到了一部宪法。这样一来，就存在一种政治生活的格式，甚至拿破仑的专制主义由于反应力，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在英国，辉格党人非常善于体会并且乐于赞赏拿破仑各项改革的解放性质；在欧洲各地，这些改革都被人认为是法国大革命启发下的成果，因此其必然产生的后果是：凡是拿破仑从大革命纲领中屏弃掉的东西，总会逐渐重现出来。甚至在俄罗斯，斯彼兰斯基的谨小慎微的改革也为俄国军官准备下条件，一旦对法战争胜利把他们带到西欧的时候，他们就受到了法国思想的感染。从 1812 年起，法国思想对西班牙的影响日益显著地表现出来，虽然西班牙是奋起反抗法国统治的。霍韦兰诺斯在 1809 年向中央"政务会"争取到的议会，在 1810 年 9 月 24 日召开，这是在原则上由省"政务会"选举产生的；但是被法军侵占的各地区的议员是由逃到加的斯的各该地区人士推选产生的；而西班牙所属美洲各地的代表二十六人，则由摄政会议指派产生。当时加的斯拥有全国最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些人所受新思想的浸染也最深；因此在议会里就有一个现成的自由派多数，但是他们并不可靠地反映出多数西班牙人的意见，因为多数西班牙人

对拿破仑作战不仅是反对专制主义和外国占领，而且也是在反对法国大革命。虽然如此，1812 年的宪法仍然只不过是法国 1791 年宪法的一个翻版。1812 年宪法诚然仍保持天主教作为国教，并禁止信仰其他宗教，但是僧侣和“奴才派”① 却仍然拒绝接受宪法；自由派在 1813 年决定取缔异端裁判所，削减隐修院的数目并没收被解散寺院的收入。

一旦拿破仑帝国垮台，自由主义就会立即重新展开反对旧制 499 度的斗争：路易十八复辟时就不敢拒绝给法国资产阶级一个议会，而西班牙则将在 1820 年首举义旗反抗神圣同盟。

三、文化生活

在拿破仑掌权的时期里，文化生活的进展出奇地缓慢下来。500 在欧洲大陆上，各专制政府都致力于使人们保持缄默；英国人更多地关心具体细节的改革，而少关心思想；在美国，文化活动完全没有展开。此外，在这些年代里，进行讨论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每一个人采取一定的立场，各执己见，只等战争解决，做出仲裁。最重要的是，战争吸引着青年人的精力，而日益增长的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转移了许多人的思路。但是，就继续在进展中的文化生活而论，拿破仑的实验并没有使它焕然一新，论战仍然是在传统思想同十八世纪思想之间展开的。

思想上普遍的麻木消沉状态不利于十八世纪思想，能够任意表示意见的官方报刊、政府当局和教会无不或多或少公开地替反革命作宣传。虽然拿破仑自己捍卫了一部分 1789 年的遗产，但他是按照他特有方式捍卫的，而他并无意求助于“空论家”。卡巴尼

① “奴才派”(serviles) 是 1810—1813 年西班牙议会中效忠君主制度的保守派，由于他们对君主的卑躬屈膝而得名。——译者

斯在 1808 年逝世，但是德斯蒂·德·特拉西、然格内和福里埃尔还在继续他们的工作，他们的理性论的实证主义仍然拥有许多忠实信徒，其中就有斯汤达尔①。然而，由于同宗教复兴相协调的唯灵论抬头，而鲁瓦耶-科拉尔正在巴黎大学加以讲授，理性论的实证主义便日渐黯然失色。曼恩·德·比朗力图重新赋予人的思想以直觉认识自身存在的能力和创造形而上学的本领，儒贝尔思想的发展也有同样倾向，而象比埃尔·拉罗米居厄尔这样一个观念论者也有些屈从于当时流行的思想。在英国，哲学上激进主义的开山祖师边沁的经验主义比法国观念论者更为显著，他正日益关心政治和经济的改革。在德意志，占统治地位的哲学乃是先验论的唯心主义，虽然它在国外还没有许多皈依者；这种哲学思想正日益受到神秘主义的浸染，尤其是在谢林的思想里。

*　　　　*　　　　*

然而，科学却继续大有进展。在数学方面，拉普拉斯、蒙日、勒让德尔、普瓦松、普安索和阿拉戈等使法国遥遥领先；在德意志，高斯才初露锋芒。法国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同样人才辈出、成就辉煌，如马吕斯、比奥、盖-吕萨克、迪隆、夏普塔尔、贝托莱和泰纳尔等。但是英国在这方面也不相上下，拥有沃拉斯顿、道尔顿和戴维等人；瑞典有柏采留斯，因而也不稍逊色；朗福德虽定居于法国而原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有关化合的许多基本定律订出以后，化学作为一种科学终于确立起来，它不断地分解出许多新的元素，501 它所带动的年青的化学工业飞跃发展。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的贡献也超群绝伦；在大名鼎鼎的拉马克以后，继起的居维叶和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又名噪一时。动物学、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学不再是单纯叙述性的；拉马克和若弗鲁瓦·圣-伊莱尔提出

① 斯汤达尔（1783—1842 年）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红与黑》（1830 年）、《巴马修道院》（1839 年）等。——译者

了物种变异的初步概念，而居维叶则为物种不变的原理辩护，在他们之间展开了十九世纪最有名的大论战之一。阿维奠定了结晶学的基础，而康多尔在继续他对植物学的研究。比夏阐明了组织细胞的结构，布鲁赛、拉埃内克、科维扎尔和迪皮特伦等人的工作大有助于医学的发展。能与法国自然科学家分庭抗礼者只有亚历山大·德·洪堡一人而已，他以考察西属美洲而闻名于世。在历史学和语言学领域里，德意志名列前茅，而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则英国居于首位。

在十八世纪，科学知识曾不断被用来猛烈攻击种种传统思想；科学知识进一步发展却反击了理性论的实证主义。拿破仑无意中促进了科学知识的发达，他在中等教育中给科学以重要的地位，并保持国民公会所开设的各高等学校，在这些学术机关里学者能亲自传播他们的各种发明。况且拉普拉斯、拉马克、居维叶、安培等科学家也应列入当代最优秀作家之中。这些名学者之中确实也有一些人把自己的研究附会于传统的成见，居维叶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游学斯图加特，因而习惯于按属类和按种别思考问题，有如经院学派一样，在他看来，科学无非是要论证上帝在自然界所已创造的秩序；他以能阻拦敌对学派的实证主义的传播而自鸣得意。但是不管经过多少迂回曲折，学者的客观研究不仅推动了思想的转变，也推动了经济的转变，从而推动了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的转变，因此，这些研究无不间接地有助于摧毁与之密不可分的传统势力。

*　　　*　　　*

反革命的领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继续利用唯理论的经验主义。1802 年，博纳尔出版了他的《原始立法》，德·梅斯特在 1810 年出版了《政制原理论》。1808 年，夏尔·德·哈勒尔出版了《通用政治概述》作为他的巨著《政治科学的复兴》的前奏，而这部巨著的 502

第一卷到1816年才出版。直到那时他的学说自命是纯粹实证的:他同博纳尔一样,把他的学说建立在家长最高权力的基础上,他论证这种权力是有事实基础的。然而,博纳尔和德·梅斯特是在为权威的等级性辩护,并认为现代王权确属合法,而哈勒尔却在唱反调,他要捍卫贵族的政治要求而否认国家的权力,在他看来国家元首只不过同其他土地所有主一样也是一个地主而已,但这个地主非法僭有领主的权利,因此理智要求退回到封建制度。

博纳尔,而尤其是约瑟夫·德·梅斯特,仍然要诉诸神意天命,稍后一些时候哈勒尔自己终于也援引神意天命,并皈依了天主教。同样地,反革命势力的大多数人要寻找哲学武器时也倾向于传统的宗教,而世俗政权对于这个倾向也予以鼓励。世俗政权曾不断地猛烈打击天主教会的俗世物质利益;世俗化运动推广到整个法兰西帝国和一些附庸国家,甚至也推广到巴伐利亚。但是对于教会的精神影响,这些考验未必是无益的。罗马教皇庇护七世继其前任之后也遭拘禁,因此引起人们的同情,这种同情是教皇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所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低级僧侣受到国家政权的严密控制,实际上就是受国家任命的主教的控制,因而本能地求助于教皇至上论。天主教会历经磨难反而得到清洗并加强了纪律性,神职人员出身平民者较之往日为数大增,因此教会正在聚集力量,只等拿破仑一旦垮台,便发出大举反扑的信号。然而,护教的神学理论水平不高,而且不能免于受到时代精神的浸染。当时各国政府无不奉行约瑟夫二世式的主张,即视《教理问答》不过是道德说教的教科书,而视神甫只是政府的一个雇员。敌视知识的浪漫主义的影响,把一些与托马斯主义①毫不相干的并且对教义具有危险性的因素引进了天主教思想。即使博纳尔和德·梅斯特也不

① 托马斯主义是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年)的哲学和神学体系,主张信仰高于理智,教权高于政权。托马斯主义成为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译者

能完全摆脱这种倾向的影响；夏托勃里昂的审美的和情感的天主教主义形成了一个教派，而拉芒內企图用常识和世人的普遍同意来论证基督教教义的真理时，便不自觉地为以后的一次大分裂打下了基础。虽然如此，仍然有一些相当重要的人物通过这些不同的途径皈依了天主教。若干德意志浪漫主义者改信天主教曾经轰动一时；在罗马，有一群德意志艺术家对文艺复兴前艺术家的作品发生兴趣，倾向于追摹当时的表现方式，被称为"拿撒勒派"①；他们的领袖人物奥韦尔贝克在1813年信了天主教。在德意志和英格兰，新教也在重新扩大影响。施莱尔马歇此时已成为堪称模范的牧师；费希特，尤其是谢林，日益迁就传统的基督教义。循道教派虽然在1812年发生了一次新的分裂，仍然颇为流行；同一年浸礼会派却建立起统一的组织，也同样流行一时；非英国国教信徒自称拥有两百万人之多。

503

在各传统的宗教以外，神秘主义继续在泛滥。圣马丹在1803年已去世，但有如当年安托万·德·拉·萨尔②一样，也后继有人，其门徒尚在，如阿扎伊思和后来任教档案专科学校的让斯。神秘主义的中心仍然是里昂和阿尔萨斯。在里昂，印刷商巴朗什正在冥思苦想要通过神秘的直觉而连续性地解释教条；在阿尔萨斯，奥贝兰牧师（直到他1806年逝世为止）、蒂尔克海姆男爵、萨尔斯曼和莱载-马內西亚郡守等都或多或少陷入了迷妄论。有些冥想趋向于多神的信仰调和论，或者以观察数字的魔力而延续犹太人的秘教③；在1805年以后，法布尔·道利维就是这样从观念论转到

---

① 拿撒勒在巴勒斯坦北部，传说是耶稣的故乡，因此犹太人称早期基督教徒为拿撒勒人。此处指在文艺复兴最有名的大师出现之前的，力图重振中世纪的宗教艺术的艺术家。——译者

② 安托万·德·拉·萨尔（生于约1388年，死于1462年以后）著有传记体小说《圣德莱的小约翰》（约1456年），他死后，短篇散文小说继起流行一时。——译者

③ 犹太人的秘教（Kabbale）指公元前二世纪出现的希伯来人的神学。——译者

神智学，而在 1813 年出版了《毕达哥拉斯[1]的金玉诗篇》。在德意志，自 1803 年以来在卡尔斯鲁厄任教授的容-施蒂林始终是神秘主义的权威，而与巴德尔名望相埒；有如法国的贝加斯，容-施蒂林也沉溺于千年至福说[2]，拿破仑则正好被他们视为“基督之敌”。德意志这股思潮和法国的思潮在阿尔萨斯合流起来，克吕德内夫人就是在阿尔萨斯初入此道，得识奥秘的。她在结识容-施蒂林之后，在阿尔萨斯会见了奥贝兰，又在圣马丽亚-欧米纳会见了方丹牧师；不久以后，她又出现在日内瓦，1813 年她被日内瓦驱逐出境。她把她的一些冥想告知了德·斯塔埃尔夫人；这时斯塔埃尔夫人已在请奥古斯特·施勒格尔为她朗读圣马丹的著作，并已接待过文学家扎哈里亚斯·维尔纳，此人已成迷途难返的神秘主义者，后来终于改信了天主教并当了神甫。德·斯塔埃尔夫人在不甘落后的冲动之下，也钻研起《以耶稣基督为师》[3]和居荣夫人的著作。在俄国一如既往，各种神秘主义的流派流传甚广；当时在贵族社会中最为时髦者是所谓“心灵基督徒”派；已被哥利津和柯谢列夫讲道入迷的亚历山大在 1812 年开始攻读《圣经》，深思索求经义真谛，因而自认行将成为克吕德内夫人所预言的救世的白衣天使。

*　　　*　　　*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里，浪漫主义运动成为革新和鼓动的巨大源泉。由于德意志为浪漫主义创立了哲学并几乎完整地接受了它，德意志认为浪漫主义是自己天才的产物；其实浪漫主义运动是 504

---

①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 580—500 年）古希腊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把数说得非常神秘的唯心主义论者。——译者

② “千年至福说”(millénarisme)是基督教的一种迷信，即信耶稣基督将会复活，并将统治人间整整一千年。——译者

③ 此书出现在十五世纪，用简明有力的拉丁文写成，在布道书中别具一格，流传甚广，而出自何人手笔，迄无定论。——译者

激荡整个西欧的思潮，它得力于卢梭的学说非常之大已无庸置疑。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者对他们的形而上学总是含糊其辞。海得尔堡集团主要是偏向于探索过去，他们之中有几个人把艺术用来为旧制度和日耳曼主义辩护；不久又出现了第三代的浪漫主义者，他们只想以民族情绪的代言人自居。从浪漫主义首倡者的有说教意义的活动中，他们所保留的主要是对美学规律的轻视和对创造性狂想的辩护。在所有国度里，浪漫主义学派的重要主题之一是激情的宿命论，歌德在1809年出版的《亲和力》小说中或许还没有公然背弃这种宿命论，但是他终于谴责了德意志浪漫派在文学创作中的自以为是和放肆，并同他们分道扬镳。如果不把克莱斯特算在他们里面，那么他们都没有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克莱斯特由于内心动摇不定和不能适应环境，终于在1811年自杀了，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浪漫主义永恒的主题。诺瓦利的理想的象征主义，即认为概念与可见世界是和谐地共处于事物的内部，毫不符合克莱斯特的实际情况；因为他的本性和他所处的多难的时代使他在世界上只能看出不可调和的冲突与无所不在的对抗。因此他的戏剧的灵感源泉完全是悲剧性的。在《施勒芬斯泰因一家》中是个人对其家人的斗争，在《罗伯特·居斯卡尔》中是英雄向敌对势力的斗争，在《庞代锡来》中是种族和两性的斗争；在《赫尔芒的战斗》中是民族间的斗争；在《汉堡王子》中是良心与法律的冲突。

但是德意志浪漫主义者在推动语言学、历史学和法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比较他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更能垂诸永久。格林兄弟继其海得尔堡朋友们之后，搜集了《民间故事集》，并从事研究本国的语言史；克罗策尔发表了对希腊神话进行象征意义解释的许多著作。对于作为古典主义对立面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兴趣，不仅对莎士比亚一个人有利，而且对西班牙传奇抒情

诗，对卡穆恩什[1]，对东方和印度都有利。威廉·德·洪堡也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自从十八世纪末以来，语言学评论最杰出的代表作是沃尔夫在1795年出版的《荷马研究导论》一书；沃尔夫的弟子奥古斯特·博克又增添了历史的研究，而尼布尔在1811年开始出版他的《罗马史》。最后，浪漫主义精神也渗透到法学思想中，萨维尼和艾希霍恩把法律视为"民族精神"自发的创造，以反对《拿破仑法典》，他们认为它是学者人为地造作出来的，尤其指出它是与德意志人民生活毫无联系的一种从外国输入的东西。这样就把法学研究同这个社会的总的历史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学研究面貌一新。

505

在英国，浪漫主义正在开始影响一些卓越的诗人。"湖畔诗人"华滋华斯，而尤其是科尔里奇久已归顺英国国教，并已变成用说教者的腔调说话；索塞则已改信保守主义，领受一份年金并在1813年被封为"桂冠诗人"[2]。但是一些青年贵族在气质上对影响日益增长的清教徒的清规戒律感到格格不入，这些人的地位和财富使他们能保持在物质生活上不必仰求于人，他们的才华使他们成为一种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倡导者。拜伦的作品虽然在形式上仍然是古典主义的，但是他已成为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浪漫派的典型。他是一个高傲的贵族，不能忍受任何规章律法的约束，反抗门阀等级的同恶相济，但并不是一个梦想解救被压迫阶级的革命者，虽然他最后是牺牲在希腊起义者的行列中。他是一个独树一帜的人物，单枪匹马对抗全世界，他认为除了受自己支配以外不接受别人发号施令，他把法外之徒当成榜样，甚至要学魔鬼造上帝的

---

① 卡穆恩什（1525—1580年）是葡萄牙的诗人，曾歌咏瓦斯科·达·伽马寻找新航路到印度的航行。——译者

② 桂冠是古代希腊人用月桂树枝叶编制的帽子，用来奖给竞技的优胜者或卓越的诗人。近代各国宫廷用以奖给御用诗人，英国王室公开册封"桂冠诗人"的称号是官方授予的很高的荣誉。——译者

反。感情冲动和放荡不羁的拜伦在气质上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带着苦乐交错的心情让自己听从激情所注定的命运，他感到自己是命中注定要遭受不幸和死亡的。他为了逃避社会、祖国和自己，便在大自然中沉思瞑想，或到远方异邦孤独流浪。这样他就发现东方对他有吸引力，在1812年开始发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在1813年出版了《邪教徒》，在1814年出版了《海盗船》，这些作品在此后的许多年里，有力地促使描写异邦情调和地方色采的作品蔚成风气。

在雪莱身上也可以看出放荡不羁和病态感伤，他被牛津大学开除后，就以多神论的理智主义和对自由恋爱的歌颂来向虔诚主义挑战。他最早的几篇文章是在1810年发表的，在1813年出版了《马布皇后》。德·昆西同科尔里奇一样是吸鸦片的瘾君子，也同样猛烈攻击英国的礼法习俗。英国不欢迎这些大胆豪放的人；但是，与此同时华尔德·司各脱却把浪漫主义移殖到英国来，这种浪漫主义的精神类似海得尔堡学派，同样是具有中世纪气息、保守的和民族主义的。司各脱起初是写诗，然后是写历史小说，这些历史小说风靡一时，誉满全球，①特别是在1814年出版《威佛利》一书以后。他的小说中赞扬道德高尚的叛逆者和打抱不平的骑士，穿插着民间传奇常见的情节，如身世不明、隐名改姓、幽灵幻影和阴谋诡计等等，以致在这种形式下，浪漫主义既能取悦一般群众，而又不致触犯权贵人士。

在法国，文学仍然在受到法兰西科学总院的奖掖，并仰承文艺批评大师若弗鲁瓦的赞赏，因此它始终谨守传统章法。当时优秀作家屈指可数，其中最有才华的是诗人德利尔。邦雅曼·贡斯当的杰作《阿道尔夫》与古典主义一脉相承；但是官方的文艺理论

506

① 司各脱关于拿破仑的著作，是极其敌视拿破仑的，虽然写得生动，行销一时，但没有历史价值。——译者

丝毫不把小说列入高雅文学。尽管拿破仑很欣赏奥西安，他仍然信守这种美学的理论；在他看来，法国的影响正日趋衰落，到他在位的晚期，浪漫主义在德意志和在英国的得势使他很感疑虑不安。然而，人们也不再会有所误解：法国大革命已经断送了古典艺术的前途，因为一则古典艺术本是为贵族创作的，而革命使贵族四散逃亡；再则革命削弱了古典艺术的教学和研究，而沒有这种教学和研究，资产阶级就不再能欣赏古典艺术；三则革命使资产阶级中加入了一个沒有教养的暴发户阶层，他们在毕克塞雷古的传奇剧中，在亚历山大·杜瓦尔的舞台剧中，在皮戈尔特-勒布伦的小说中得到更多的乐趣。在这类大众化的文学里表现出一种纯朴的浪漫主义的某些特征：无拘无束的想象力、各种文学体裁的掺杂结合、现实主义的初步尝试。官方的文艺批评硬说传奇剧为一种降格了的悲剧；但是勒梅尔西埃的剧作《宾多》(1801 年上演）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809 年上演）已突破传统古典悲剧的章法，这些剧作尽管存在很多弱点，仍然预示了巨大变革即将到来。此外，人们仍然很爱读十八世纪的早期浪漫主义的作品；行吟诗人诗歌仍然受到普遍欣赏，所谓克洛蒂尔德·德·絮维尔的诗歌大受欢迎，而奥西安的诗的流行更有过之，取该诗中主人公奥斯卡和马尔万娜之名为名字是时髦的事；勒絮尔的歌剧《吟游诗人》，以及画家热拉尔和吉罗代，都受到麦克孚生所伪造的诗集①的启发。

可是，最能造成浪漫主义滋长的气候的还是当代的重大事件。507 革命的大动荡、拿破仑的崛起、连年不断的战争，这一切有力地激起人们的想象力和个人野心；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地位，而当时的种种机会并不都是对各种不同性格的人适宜的，擅长写作的失意者便以笔墨文字自述感怀。从 1802 年起，勒

① 即指《奥西安诗选》，参看本书上卷，第 15 页。——译者

奈[①]在他的《基督教的真髓》中，就流露出不合时宜者的苦恼，而他的哀怨夹杂着愤怒和骄傲。史南古的《奥勃曼》同勒奈患有同病，然其绝望之情更为悲痛，而在米尔瓦耶和谢纳多莱的笔下，这种绝望之情有所减弱，演变成拉马丁式的忧郁[②]。另一方面，虽然已经正式宣告了自由与平等，但是当时的风俗习惯和《民法典》都远远没有贯彻这些原则，特别是有关妇女的地位更是如此，夏托勃里昂在创造了成为情感同义务冲突的牺牲者阿达拉这一形象以后，斯塔埃尔夫人又创造了苔尔芬和柯丽娜，她们的结局也同样悲惨，因为这位女作家论证说，社会偏见拒绝给妇女幸福的权利。归国的亡命者满脑子对外国的回忆，皇帝的士兵与官员回国后的叙述等等都有助于扩大当时法国人的眼界，促成对异邦情调的爱好。波拿巴远征埃及当时已激起对东方的好奇，1811 年夏托勃里昂出版的《巴黎至耶路撒冷纪行》，重新唤起这种好奇心；他的散文史诗《殉教者》也同样能使读者引起乡愁。最后，对外国文学的接触日见增加。忠实于其客观实证主义的观念论者如福里埃尔、热朗多都批评法国人成见太深，他们承认每个民族的著作皆有其固有的优点，并有其应得的魅力。在帝国时期，这种折衷主义对于南欧各民族特别有益。斯塔埃尔夫人的《柯丽娜》已经引起法国人对意大利的重视；从 1811 年起，然格内开始出版他的《意大利文学史》，而西斯蒙第正在日内瓦讲授南欧文学。斯塔埃尔夫人成为德意志的代言人，由于浪漫主义是在德意志成为自觉的运动的，她所起的作用具有头等重大意义。

---

① 即夏托勃里昂，他的全名是弗朗梭瓦-勒奈·德·夏托勃里昂，他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即以“勒奈”为名。——译者

② 拉马丁（1790—1869年），诗人与政治活动家，诗集有《沉思集》（1820 年出版）、《新沉思集》（1823 年）等。他是复辟王朝时出现的主要浪漫主义诗人，用当时流行的悼歌体裁表达感伤的沉思。到七月王朝时，拉马丁投身政治活动，1848 年革命后起了反动作用。——译者

斯塔埃尔夫人的父亲是有日耳曼血统的，她嫁给一个瑞典人，她本人是新教徒，她很象日内瓦人一样对加尔文派的英国和路德派的德意志深感同情，就她的气质而论，热情充沛甚于批判精神，因此她醉心于北欧文学也是很自然的事。早在1801年她发表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一文中，她对古典主义的普遍价值提出怀疑，她确认美有相对性，并根据气候条件的不同而把北方各国同南方各国作出鲜明对照，前者在文学上的代表作是奥西安，后者是荷马。她不断地赞扬北方各民族是严肃认真，热爱自由，道德高尚，信守宗教而又不迷信。然而在这个时期她仍然认为古典文学是优越的，因为她一直受古典文学教育，而她此时还不了解德意志，也不通德语。但到1803年她被拿破仑放逐后，她渡过了来因河，当她归来时带来奥古斯特·施勒格尔，他同她在一起直到1810年，并把德意志的浪漫主义介绍给她。她周围的人也同样受到影响，因为邦雅曼·贡斯当在1809年写了《沃伦斯泰因》，而内克尔·德·索絮尔夫人在1811年翻译了奥古斯特·施勒格尔的《戏剧文学教程》。发展到后来使斯塔埃尔夫人写了《论德意志》一书，在此书中她对法国文学更少好评，而称颂莎士比亚和德意志作家。她屏弃了古典文学的章法和批判精神，以激昂的笔调赞颂"热情"的美德，这纯粹是施勒格尔的思想。1810年这部名著在巴黎一出版就立即被没收禁止，直到拿破仑失败后才得发行。然而在帝国最后几年里，在文艺批评中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已公然对立，阵线分明。这场争论也波及到意大利，在意大利也普遍爱读北方各国的文学作品，或者是直接阅读原著，或者更多的是通过法文译本，这些作品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在1807年佛斯科罗所写的《墓碑》诗集中。

508

造型艺术也在开始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虽然在这个领域里旧传统善于坚守阵地。拿破仑对于建筑特别感兴趣，保持威望的

意愿与他个人的喜好加在一起，使他发出这个庄严的具有古典主义色采的敕令:“凡是大的，总是美的。”然而他在命令某些艺术家采用或向他们推荐以他的战功为主题的当代史画面时，却在无意之中指引他们走上一条趋向浪漫主义的新路；但是拿破仑对富丽而沉重的“帝国风”艺术风格的形成并无关系，这种风格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所受伊特鲁利亚艺术和埃及艺术的影响。拿破仑所任用的博物馆馆长德农是一个相当折衷主义的艺术家和业余爱好者。极力提倡那种模仿古人的古典艺术的乃是卡特勒梅尔·德·坎西。他认为一个理想的和柏拉图式的原型才是美的，他认为必须消除个人的特点和严格遵守图案样纸的构思，才能接近实现理想的原型，所以他把雕刻看作主要艺术。在卢佛尔宫工作的佩西埃和方丹,设计旺多姆圆柱的贡杜安,负责凯旋门的夏尔格兰等人仍然忠实于传统艺术，卡特勒梅尔的学说也与达维德喜爱的风格完全相符。当时伟大雕刻家是些外国人,如丹麦人托尔瓦德森,而尤其是被拿破仑特别赏识的意大利人卡诺瓦。

然而艺术远不如卡特勒梅尔所企望的那样表现为一式一样。由于发掘庞培古城而在十八世纪盛行一时的亚历山大主义① 是同达维德绘画的遒劲而紧凑的线条背道而驰的，并给吉罗代和普律东作品里渗入一种色情的和忧郁的沉闷情调。在卡诺瓦的作品里,一种柔媚优雅的风韵和对景物的偏爱也破坏了风格的纯洁性。在装潢艺术中,亚历山大主义仍占统治地位,而与帝国模式同时并存。另一方面,现实主义也出现在画像中,热拉尔,特别是达维德,在这方面是无与伦比的。最后，吉罗代从奥西安和夏托勃里昂诗中所取的主题，以及人们从当代史实吸取的题材，如达维德的《拿破仑的加冕典礼》,格罗的战场实况,热里科的士兵画像,所有这些

① 亚历山大主义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56—323年）死后的希腊文明、文学和艺术。——译者

都使画意的变化多端，构图的突出动势，和色调的强烈多彩结合在一起，因而都是纯粹浪漫主义的作品。西班牙画家戈雅、英国画家如劳伦斯、罗姆尼和雷伯恩等人的绘画更是不拘一格；同时英国也产生了以康斯特布尔和特纳为首的风景画派，这一派即将把最新颖和最动人的成分带入新的绘画里。

至于在音乐领域里，革命的思想一被压抑，它们在法国所引起的音乐革新就成绝响；余存下来的只有偏爱旋律乐曲，反对优雅音乐，还有对音乐技巧一定程度的忽视，以及不再为革命热忱和振奋所需要的夸张，这种夸张却与达维德艺术不无关系。当时主要的作曲家有法国的梅于尔，有卜居巴黎的意大利人斯彭蒂尼，前者的歌剧《约瑟夫》和后者的抒情悲剧《火神》都是1807年问世的。1811年从俄罗斯归国的布瓦勒迪厄成功地提高了喜歌剧的声誉。就取材广博和表达有力而论，作曲家贝利奥兹的老师谢鲁比尼似乎已经属于浪漫主义派，但在当时人们还不大爱听他的音乐。

以上这些大家的名望较之鼎鼎大名的贝多芬无不黯然失色。510 他长期卜居维也纳，一方面没有停止为钢琴谱曲，另一方面从十九世纪初以来，已经写出他的伟大的器乐曲、四重奏、前奏曲和前八个交响乐。他的作品不止一次地以其大胆的技巧和表现的新颖有力，而使当代人大为震惊；同时又因内部充满予人启发的生命力而征服了听众。他喜怒无常，性情暴躁，热情而敏感，但因耳聋而与世阻隔，因多次失望的爱情而饱受折磨，他好猜疑而易冲动，又因出身平民，家道贫困，以致在贵族圈子里注定要在情感上遭受许多痛苦的伤害，而他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出入贵族社会；从许多方面看，贝多芬属于浪漫主义派，并且正如诗歌之于诺瓦利那样，音乐为贝多芬创造了一个梦幻世界，可以用来对抗现实世界。但他决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他的乐曲中有许多表达出一个健全人的欢乐、善良、兴奋和诙谐，有充沛的毅力和饱满的意志；另外一些乐曲则

表达出对英雄伟迹和向宇宙间敌对力量战斗的向往。他从来没有沉沦到心灰意冷，因为他是十八世纪的产儿，燃炽着焦虑不安而又顽强的乐观主义思想，是一个自发的共和党人，深刻地意识到全人类的休戚相关，对人类的前途深信不疑。从许多特征看，他近似卢梭，而在德意志人之中，他的思想使他更多地接近古典主义者，特别是接近席勒，而较少地接近浪漫主义者。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象克莱斯特一样的悲剧人物：他的最悲壮的作品表达出英雄人物同叛逆天性的决斗，但是根据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来看，却也表达出法国大革命对旧世界，自由对专制，觉醒的各民族对拿破仑大帝国的狂风暴雨般的冲突。

四、欧洲和美洲民族的觉醒

各族人民逐渐发展文化生活的后果是：十八世纪主要地是在511 德意志，在作家和大学教师中发展了民族文化主义。古典文明被视为是法国人的创造，它把各族人民沦为从属的地位。用改革制度与军事统治来加强法国思想影响的拿破仑体制更加深了这种反感。基督教教义本来是一种普天一致的文明，各民族在不否认普天一致的文明这一原则的同时，在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等领域本能地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力求探索出表现本民族感情和行动的固有方式的特征，这就是雅恩在 1810 年称之为“民族性”的东西。探索这些固有方式的途径或是上溯本民族的历史去找，因为各民族认为自己过去没有受过外来影响，或是从平民各阶级的生活去找，因为他们的无知使他们没有受到世界主义的影响。赫德尔和伯克在为这种民族主义辩护时，把每个民族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不可能彼此同化，德意志浪漫主义者把这种哲学发挥到极点时就赋予每个民族一种“民族精神”，其最重要的表现是民族

语言。到了拿破仑时期，意大利的库奥科和俄国的克拉姆津都有这种看法。

当拿破仑的统治似应把法国在意大利的势力更加巩固下来的时候，当一些归附法国的作家，如孟蒂与塞萨洛迪，以及整个的官方文学，即所谓“郡守文学”都在卑躬屈节歌颂拿破仑的时候，这一时期意大利思想界的主要特征却是更为有力地反抗法国的优势。塞萨里恢复了托斯卡纳语言的古典的纯洁性，并编纂了一部词典；曾在米兰和那不勒斯先后在梅尔齐和约瑟夫手下工作的库奥科，定居在帕维亚的佛斯科罗，虽然没有在政治上反对法国，但在涉及语言和文学的民族独立性时却毫不妥协。在佛罗伦萨，公然反对法国征服者的尼科里尼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但是在故纸堆中从历史上寻找祖国的名著。卡诺瓦的艺术成就和意大利的音乐也激起民族自豪感。拿破仑似乎也曾认真考虑到这种情绪。1809 年，他 512 下令在已并入法国的那部分意大利法庭上恢复使用当地语言，这无疑只是为了改善司法行政而做出的必要的让步，而当 1812 年恢复克鲁斯卡学会[①]时，意大利学术界就认为完全有根据欢呼胜利。比利时对法国文化没有丝毫抗拒；在来因地区，法国文化虽然没有激起一致反对，但也没有取得进展。在荷兰，文学界却在深自反省，而拒绝任何对外国的模仿。

在法兰西帝国以外，挪威在 1813 年创办了自己的大学。在东欧，俄国此时出现了文学杂志：1802 年克拉姆津创办的《欧洲信使》和从 1808 年起由格林卡编辑的《俄罗斯信使》。克拉姆津致力于形成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和消除古典的文学体裁，如颂歌和悲剧。在提尔西特条约以后，格林卡和罗斯托普钦起来大力反对在宫庭与贵族中盛行的外国生活方式；格林卡特别颂扬俄国固有的传统，

---

① 克鲁斯卡学会是意大利历史悠久的学术团体，1582 年创办于佛罗伦萨，在 1612 年出版过一部大词典。——译者

反对西方的新事物；过去曾经热中于启蒙运动的克拉姆津，此时却醉心于民族传统，并开始撰写一部莫斯科大公国史。在哈布斯堡皇朝统治下的各民族中，匈牙利不断要求把马札尔语也定为官方语言；捷克人也觉醒起来，从1792年起在布拉格大学开设了捷语讲座；杜布罗夫斯基制定了捷克语语法；历史学家沙法利克和帕拉茨基正在准备写作。在被征服的伊利里亚，马尔蒙允许在正式文件中和在小学里通用斯洛文尼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在他的庇护下，修道院长沃德尼克用斯洛文尼亚语编写小学课本。最后，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徒也动了起来：希腊人是最先进的，政治团体倍增；在塞尔维亚人之中，民族传统一向由僧侣保持着，因此与东正教密不可分；而在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语言和历史则复兴起来了，1813年在雅西创办了一所摩尔多瓦语学校。

在那些久已形成民族国家的国度里，或在那些对自己丧失了的独立记忆犹新的国度里，如英格兰与荷兰、瑞士，波兰与匈牙利，西班牙与葡萄牙，文化的民族主义当然同政治的民族主义融为一体；而在别的国度里，则是前者促进了后者的形成。捷克人、伊利里亚的各斯拉夫族人、罗马尼亚人，甚至希腊人当时都似乎还不曾想到要象塞尔维亚人那样，要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但是，在意513大利，早在法国革命时期已经开始的，从文化爱国主义转向政治爱国主义的演变取得了一些进展，而在德意志，这种演变刚刚实现。法国大革命鼓吹民族主权原则，从而助长了这种演变，这个原则很自然地就被用来反对拿破仑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实际上，法国人在这些国度里建立国家机构，组成一个公务人员阶层，特别是组织了军队，从而也同样地助长了民族情绪的滋长，培养了后来反抗神圣同盟的最坚决勇敢的战士，至少在意大利就是如此；在这个国度的南部，法国人也引进了发源自弗朗歇-孔泰的革命组织“烧炭人兄弟会”（“烧炭党”），这个组织从缪拉统治那不勒斯时起似乎已

经在一定程度上主张统一全意大利。

然而，对这些因素的影响不应过分夸大；法国征服这一事实要比这些因素重要得多。无论各地的爱国主义能唤起多大程度的理想主义，除非出于极其现实主义的动机，爱国主义是不会采取政治形式的，甚至在文化民族主义特别发展的上层阶级中也是如此。无论如何，在人民群众中对于外来的和新出现的事物的排斥，始终是爱国主义最主要的成分，从外国派来的士兵和官吏的出现总会在人民群众中立即引起反应。拿破仑体制有它的功绩，但是拿它给予的利益与所加的负担权衡一下，总的结算还是负担、弊害多于德政。首先，这位皇帝把战争费用的重担压在被征服各国身上，这些国家遭受部队的勒索和劫掠、征发物资，还不用谈战争特税，例如威斯特法利亚被抽的税就达两千六百万。在这些以外，拿破仑原则规定各被征服地都必须经费自给，甚至贫困的伊利里亚也不例外；最多只有在那些还没有平定下来的国家，例如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拿破仑才支付占领军的薪给，而这是万不得已的，是他心有不甘的。在1807年，约瑟夫在那不勒斯付出了四千四百万给军队，而法国只偿还了六百万。威斯特法利亚付出一千万给构成该国军队半数的一万二千五百法国人。在1809年，意大利王国的全部支出是一亿二千七百万，其中付给法国的是三千万，供本国军队用的是四千二百万。此外，新的行政当局费用浩繁。简而言之，各地租税无不大大地猛增：贝格大公国在1808年缴纳六百万，到1813年增到一千三百万；威尼西亚在这五年中增加了两倍。此外，还得提供兵力：1810年意大利王国的军队是四万九千人，到1812年增到九万一千人；贝格大公国在1806年维持五千军队，到1811年增到九千四百人。最后，大陆封锁引起不满的人比使之满意的人要多。除了饱受战争破坏的西班牙以外，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在1812年最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德意志之所以在1813年成为反法起

514

义的策源地，并不是由于纯粹精神力量的热忱，而是由于它是通往俄罗斯的大道，自从 1811 年夏季以来，全部法国大军云集德意志；普鲁士则与波兰一样，成为法国远征俄国的基地，不得不倾其所有以供养大军。早在 1811 年 12 月 5 日，虽然热罗姆的辖地还位于后方，他即已发出警报：

"此间群情激昂达于顶点……人们提出要仿效西班牙，而一旦战争爆发，来因河与奥得河之间各地皆将揭竿而起。局势动乱的主要原因不仅是不甘外国压迫，更强烈的原因是一切阶级莫不面临破产，苛捐杂税、战争捐献、供养驻军、士兵过境，骚扰无穷。人民已被剥夺到一无所有，因而再也不会丧失什么，人民陷入走投无路之境乃是最可怕的……人民对上层政治动向漠不关心；他们感觉到的只是逼在头上的眼前的灾害。"

这位威斯特法利亚国王本来还可以补充说：贵族和资产阶级也同样蒙受其害，并且由来已久，而这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在各附庸国里，国债暂停偿还或只部分折还，退休金与年金停止支付，前朝文武官员都被辞退。在仍然独立的各国里，特别是普鲁士，都被迫照此办理。凡此种种灾难人们无不归罪于征服者。

另一方面，在彼此情况差异极大的各地区一下子建立起来的拿破仑体制，重新搬出那种声称保证造福人民而不必倾听人民意见的开明专制统治，这种统治现在所治理的地区更广，推行的决心也更大。在一些不如法国富有，而又习惯于松散的政府统治的国度里，或有时还习惯于半野蛮统治的地方，如伊利里亚，这种开明专制就显得过于复杂，要求过高和徒重形式。把《民法典》推广到这些国度里，彻底改变原有的家庭和财产关系的习惯，造成的恶果更大。《民法典》是公然世俗化的法律，对各种宗教信仰一视同仁，实行民事的户籍制度，允许离婚，解放犹太人，保障共济会，这一切都引起僧侣的反对。在信新教的各国里，人们并不都赞成授予天主教徒以平等地位，例如在荷兰，据法国官员的报告说，就有人想

515

方设法不让天主教徒就业。在伊利里亚、波兰和俄罗斯，东正教的神甫把拿破仑看成是“基督之敌”。由于拿破仑推行教会产业世俗化，取消什一税并与罗马教皇决裂，天主教徒特别激烈地反对他。由于他废除封建关系和宣告公民平等，贵族的愤怒尤为可怕。伯尔尼和日内瓦的绅贵们，荷兰和汉撒各城市的富绅们对宣告公民平等这一点，也始终不肯原谅。资产阶级和人民也不乏抱怨的理由：手工业者对取消行会制度惶惶不安；公务人员对法国人盘据高官要职忿忿不平；革命法国的忠实拥护者“爱国派”则被视为雅各宾党人而一贯受排斥；农民抱怨土地改革太袒护了领主。对拿破仑统治保有好感的只有一定数量的获得了高官显职，购买了大量国有产业，以及得到大陆封锁好处的大资产阶级。拿破仑在许多国度里创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行政与社会的结构，在所有这样的国度里，共同的利益驱使人们渴望获得独立并转而反对法国。波兰的例子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因为波兰受拿破仑之惠特多，而如果拿破仑战胜俄国，它势必会获益更大。可是波兰的僧侣暗中仍然敌视拿破仑，贵族犹疑不定，深恐实现少数民主派所已要求的新的改革；而且贵族还不能原谅拿破仑没有把普鲁士偿还的抵押借款全部给波兰，在总数四千三百万外加四百万延期偿还的利息中，拿破仑减为二千万，分三年付款。没有得到完全解放的农民只为他们的负担操心，他们同普鲁士农民一样，被过境的法国大军骚扰不堪，他们把一切重负归罪于法国人。波兰并不象拿破仑所期望的那样满腔热情而毫无保留地拥护他。

拿破仑时代的战争，通过一些意料之外的曲折反应，还有利于其他一些民族的进展。芬兰从瑞典分立出来，它从沙皇亚历山大那里得到一部由斯彼兰斯基起草的宪法，宪法授予它自治权。英国舰队把挪威从丹麦隔绝出来，使挪威陷于饥馑，但在事实上变成独立国家，虽然它本无反对丹麦国王弗里德里希四世的意图。在

516 美洲，西班牙的殖民地行将形成一些新国家，而巴西也不再受制于葡萄牙。1812 年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可纪念的日期；美国独立以后，英国一直使这块以前的殖民地在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甚至还在那里保持一个强大的亲英派，1812 年美国对英国发动了第二次独立战爭。对英决裂似乎是由一些新起的人物如克莱、卡尔洪、韦伯斯特等建议麦迪逊总统作出决定的，这些新人想要夺取加拿大，并想要靠设立关税壁垒来发展工业，从而保证美国的独立自主。战爭是艰巨的，美国既沒有军队，也沒有金钱；联邦政府不得不大事举债并召集民兵，这样做是不顾北部各州的抗议而进行的，在对英和约缔结的前夕，北部各州甚至威胁要拒不听命联邦政府。入侵加拿大沒有成功；在 1813 年和 1814 年，美国必须击退英国人在伊利湖上和向善普伦湖发动的进攻；巴尔的摩受到攻击，华盛顿市也被烧毁，甚至到 1815 年，杰克逊将军还要击退英国人对新奥尔良的一次进击。在海上，美国的巡逻船和私掠船拿捕了二千五百艘敌船，但是并不能打破英国对美国各港口的封锁。对英战爭使美国死亡三万人，用去二亿美元，结果在领土上毫无所得，而商业损失却十分惨重。但是战爭使美国工业得以征服国内市场；战爭结束以后，1816 年的关税税则又为工业保住了国内市场。经过这次艰巨的战爭，美国民族情绪大大加强起来了。

各民族的反抗给拿破仑造成了许多困难：提罗耳的起义惊扰了他，西班牙的起义削弱了他。但是只要他的军队保持完整，这些都不是致命的威胁：在沒有得悉他从俄罗斯败退以前，普鲁士居民是不敢动弹的，而且即使在拿破仑大败退的过程中，别的民族也沒有效法普鲁士人。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虽然法国统治所激起的不满无可爭辩地促成民族个性的发展，但是纯洁而无私的民族主义感情只不过激励了一些少数民族，而且同人民的苦难与各阶级利益所受的损害比较之下，只居于次要地位。提罗耳的例子突出地

证实了这一点：提罗耳起义的矛头是指向巴伐利亚的，而巴伐利亚并沒有一丝一毫侵犯提罗耳的“日耳曼性”。人民的愤慨主要是战争引起的，特别是对俄战争的准备工作；如果拿破仑打了胜仗，重建了欧洲大陆的和平，这种愤慨是可以平息下去的。虽然如此，从民族的觉醒中可以预见到，一旦皇帝去位，他所建立的大陆体系势将随之解体。 517

至于社会的不满，它们部分地是彼此矛盾的，以致在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现代化的那些国度里，全民族的联合行动障碍重重。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何以君主与贵族的联盟对民族运动的态度极不明朗，并且在他们取得胜利以后转而反对民族运动。在1812年春季，亚历山大已经摆出各被压迫民族的保护者的架势，而从1813年到1815年，沙皇本人和他的盟友一再发出空洞的诺言。但是，除去他们不愿因此打乱他们协调分配领土的计划以外，他们还认为，不言而喻，他们的权力决不能稍有削减，他们发动起来反对法国的农民和资产阶级应象从前一样忍受贵族骑在他们头上。顽固地维护旧制度的奥地利，在国内受到许许多多被奴役民族的威胁，因此拼命要把意大利和德意志重新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而决不容许反法斗争具有革命的性质。反法战争这种极其暧昧的双重性质，已经预示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将是压迫者反对受了欺骗的人民的残酷斗争的历史。

五、资本主义的进展与欧洲向全世界的扩张

在整个拿破仑时期里，货币始终是充裕的。本书已多次指出，这是英国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从1809年起，英国通货膨胀不断加剧；英格兰银行收进为数日增的财政部证券，该行的商业往来贴 518

现的数字在 1814 年达到 1795 年的五倍之多，当时发行了二千八百五十万镑的钞票。也在发行钞票的私人银行在伦敦没有增加很多，但在外地据统计在 1809 年有将近八百家之多。由于英格兰银行发行了一镑和两镑的钞票，硬币逐渐从市面上消失，物价不断上涨：以 1790 年为基数，1814 年的物价指数则为198。英格兰银行的库存在 1815 年减少到只有二百万，汇兑率下跌了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然而这对出口并无妨碍。在法国，通货膨胀较为缓和。法国的财富积聚一直在继续进行，仍然经常有人抱怨硬币短缺；但毫无疑问，纸币数以倍增。法兰西银行的钞票发行量从 1806 年的六千三百万增到 1812 年的一亿一千一百万。纸币的流通速度也在加快，从 1809 年到 1812 年，贴现数字是四至五亿，在 1810 年达到七亿四千七百万；如果不是拿破仑加以控制的话，这个数字还会更大，并且活动范围还会大大扩充到外省；外省有许多地方银行开业；对于外省银行的活动，现在还不了解，看来业务范围不致很大。当时使用纸币的还只限于少数商人，更为重要的是金属货币的增加，这部分地是由于新铸货币的增加和贸易顺差的增加，而主要地还是由于战争赔款和从新增领土来的"特别财务"收入。据估计从1799年到 1814 年有价値七亿五千五百万法郎的金银流入法国。在法兰西帝国内，虽然制成品的价格在上涨，农产品的价格有时还下跌；但是总的看来，物价都比 1789 年显著上涨。许多大陆国家都采用了发行纸币制度，因为硬币不是被藏了起来，就是流到了法、英两国，而这两国却由于货币充裕而特别有利于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拿破仑把法国革命的许多改革推广到欧洲相当广大的地区，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达。这些改革如劳动自由、废除农奴制和封建义务、土地买卖自由、取消内地关卡和桥梁道路通行税、统一度量衡等等都是符合亚当·斯密的学说的，他的学说在法国由加尼埃，特别是由让·巴蒂斯特·萨伊广为传播，萨伊在他

1803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论说》一书中阐明和补充了亚当·斯密的学说。

战争始终是刺激经济发展的因素。在英国，战争迫使商业寻找新的市场；在大陆上，战争有效地保护了工业发展；大陆封锁只不过加重了连年不断战事的后果，因此之故，要准确论断大陆封锁本身对生产情况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战争对生产的破坏显然超过了有利影响：政治局势变幻不定，以及因此给贸易关系带来的干扰，到处都压抑了办企业的劲头；而且大陆上工业的进展尤其有赖于英国机械技术的推广，所以，如果英国人能继续供应大陆各项设备，工业的进展本来可以更为迅速。 519

在经济领域内，科学研究所激起的发明创造精神，并沒有由于战争而减弱到象其他事业那样的程度；但是若与十八世纪的发明成果相比较，则这一时期的成果不大。1792 年霍恩布洛设想过的蒸汽压缩后的膨胀力，到 1804 年被伍尔夫继续运用，他利用两次中继的压力，发明了复式蒸汽机。在美国费城，机械工人和建筑师伊万斯对锅炉做出一些显著的改进。1798 年，莫多克在伯明翰的博尔顿的工场里装置煤气照明以后，1807 年在伦敦的蓓尔美尔街安装了最早的煤气路灯；菲立普·勒邦在法国也同时完成了这项实验工作，但他死于 1804 年，以致未能付诸实用。在帝国末期，菲力普·德·吉拉尔也成功地实现了机械纺麻。另一方面，运输问题日益迫切要求注意解决；1811 年，麦克·亚当向英国众议院提出碎石铺路基的方法，这个方法此后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虽然在法国已经运用了这种方法。英国的煤炭业正在日益增多地运用钢轨运输，钢轨的断面不断在改进中。最后，人们在设法研制一种可以行驶在一条“铁路”上的蒸汽机动车；到 1804 年，特里维蒂克制造出第一部火车头，赫德利在 1803 年也制造了一部；斯蒂芬森在 1814 年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在水上，运输革命也已开始进行，但只是

在美国；1807 年，富尔顿成功地在哈得孙河开办了汽船航运；然而当时还沒有人敢于到海洋中去用汽船冒险。

人们倾向于认为，战争使得当时的制造商为了保持他们的销路，宁愿依赖军事胜利和走私，而不指靠技术改进和薄利多销，这有助于说明发明创造何以进展缓慢。虽然机器使用在英国是在推广之中，但推广得相当慢，甚至在棉纺织业中综合的“骡机”也还沒有到处都取代“珍妮机”，在 1812 年所使用的织布机也还不超过二千台。至于羊毛业，工具的改革刚刚开始，而且只限于纺毛；使用机器较多的是花边制作。冶金业是较为先进的部门：木柴炉已近绝迹，为了熔炼生铁普遍采用了搅炼炉和碾压机。除了棉纺织业和采矿业外，水力和蒸汽力的利用还很罕见。虽然工业集中确是大势所趋，但进展还不显著。1812 年只有十四家棉织工厂，1806 年在曼彻斯特才开设了第一家利用蒸汽力的工厂；在花边业，最早利用蒸汽力的是在 1810 年。金属加工业的生产始终是非常分散的；其他工业就更加如此，只有酿酒业是例外。在伦敦，手工业无可争辩地仍占优势。从整个来说，资本主义企业保持着显著的商业性质，商人找些在家庭内劳动的计件加工工人，给他们提供原料和往往是租用来的工作机。

520

在法兰西帝国以内，尽管对新的生产发明很注意，按照传统方法增加生产的考虑仍然占优势；当时已经采用的新方法则有：“骡机”、“雅卡尔”①、牟罗兹地方 1805 年采用了奥伯坎普夫的花布印染机、道格拉斯的和科克里尔的纺毛机。第一座反射熔炉是 1810 年在勒·克勒佐出现的。这些零散发生的进展主要是在阿尔萨斯与北方，在里昂与在圣太田，在诺曼底，在萨尔国有煤矿里。而最显著的进展则是在比利时和在亚琛地区。就是在这个时期，比利

① “雅卡尔”是以发明人约瑟夫-马利·雅卡尔(1752—1834 年)命名的一种织布机。——译者

时的矿山开始装配起新机器；在列日，在拿破仑的帮助下佩里埃创办了一间铸炮厂，而在1810年多尼开设了一所工厂运用自己发明的处理锌的方法，这就是“老山厂”的起源；由于棉纺织业发达，根特重新出现繁荣景象；在维尔维埃，由于引进了英国机器而开始了呢绒业中的工业革命，这座工业城市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1810年有八十六家工厂和二万五千工人。与比利时情况相反的是意大利，意大利的情况很少改善，好几个地区与法国西部类似，都 521 丧失了传统的市场，日益更多地转而经营农业。就整个帝国说来，工业设备的革新是相当有限的；在棉纺业中，纺车仍未绝迹，而“珍妮机”的使用大约到1806年才盛极一时；冶金业仍然墨守陈规使用木柴熔铸；蒸汽机为数无多，比利时的矿业只是到1807年起才开始采用，而在纺织业则到帝国末期才采用，例如阿尔萨斯是始自1812年。企业的集中只有在棉纺业和毛纺业中才以工场的形式出现。相反地，商业性质的集中进展惊人；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商业巨头为数倍增：除了原有的鲍温斯，除了里夏尔与勒努瓦两家棉业巨头和奥伯坎普夫外，此时又增添了泰尔诺，他专营毛纺业并且首创开司米制的女用披肩，还有牟罗兹的多尔菲-米埃格、蒙贝利亚尔的雅皮兄弟、奥丹库尔的珀若和列日的科克里尔。这些人并不想划分职能，他们同时既是商人又是制造家，并且一方面开办工厂，另一方面继续大量利用分散的家庭计件劳动。同英国相比较，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法国银行组织一样薄弱。

在帝国以外，在萨克森和瑞士也具有同样特征，在大陆上还只有这两国在棉织业和印花布业中开始出现了设备革新与企业集中。在美国，棉织业也同样蓬勃发展起来，1803年只有四家工厂，到1815年就增到五百家；但是美国的织布业仍很落后，第一家用机器的工厂是到1813年才由罗厄尔开办的。美国经济的主要特点是棉花种植的发达，从1801年到1811年棉产量翻了一番，还有

对外贸易与航运事业也很发达；这时仍然是阿斯特家族和吉拉尔家族盛极一时的时期。

农业比起工业来更加保持传统的方式，只有英国例外，英国在这方面突出地比大陆更加先进。大陆上几乎只有荷兰和法国北部在农业上采用了现代的耕作方法；在波罗的海各国与普鲁士，领主们宁愿加重剥夺农民和增重劳役，而不愿革新耕作方法。

在大陆上，资本主义集中进展极其缓慢，所引起的社会后果就522 当时而论是非常严重的。农业的雇工和手工业的帮工象往常那样糊口度日，他们所关注的更多的是工作机会和食品价格，而不是工资多少和劳动条件；他们同雇主之间的冲突当时还只是偶而发生的、地方性的，而且无论如何总是仅限于职业范围的冲突；他们除了重建传统的帮工联合会和一些互助团体以外，无意建立其他组织；有如在十八世纪一样，他们的历史主要地表现为周期性的严重失业和歉收引起的物价昂贵。

但是在英国则迥然不同。英国的工人阶级数量不断增加，而且逐渐集中到英格兰北部和西北部的"黑乡"①；圈地运动所引起的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雇用女工和童工、采用机器导致的流行病似的失业、经济危机，这一切使工资永远追不上物价的水平。这些广大群众被迫离乡背井从农村涌入城市，拥挤在不卫生的破屋中，营养不良，既无学校教育又无文化娱乐，他们的生活每况愈下，朝不保夕。他们不顾 1799 年的条例，继续结成一些"组合"；由于这些"组合"总是坚持援引以前的各种条例的权利，议会在 1813 年废止了关于限制工资的条例，在 1814 年又废止了关于学徒的条例。这样一来就同法国一样，在以往的立法中只保留下打击工人的规定。1802 年，根据皮尔之父的提议，议会通过了保护童工的第一个"工厂法"，但是它沦为一纸空文。工人既被剥夺了一切合法申诉的可

① 这些地区因煤矿业和钢铁业集中，所以通称为"黑乡"。——译者

能，于是不时诉诸暴力，通常是指向机器；这些“卢德派”的骚乱最有名的是1811年和1812年那两次，这都是大规模经济危机的结果。可是却有人从中追查阴谋活动和法国思想的影响；指挥镇压工人的梅特兰将军硬说存在有一种企图“颠覆本国政府与毁坏一切财产的非常坏的思想”。根据来自哈利法克斯的工人约翰·贝恩斯的多次演说，我们就可看出，当时仍然有些人士保持着对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民主派鼓动的记忆；贝恩斯以六十六岁高龄而被判处流放，因为他祝贺最近的多次暴乱，视之为革命的前奏，他说：

“长期以来，这些吸血鬼靠吸我们的血过日子……他们挑起了战争；从而发战争财，养肥他们自己；他们把我们派到全世界各地去打仗，为的是要在法国扑灭自由，在全欧洲保持专制统治……我等待黎明破晓等了好久了；不论我是多么老，但愿我还能看到民主的光辉胜利！” 523

但是，英国工人群众如果都已受到一种革命热忱的激励的话，他们本来至少可以要求普选权；但是从他们的行动中我们只能看到饱受苦难者的一时激动，而还沒有政治的自觉。如有人论证过的，很可能是由于某些影响而约制了工人的行动，如非国教徒的影响；汉纳·莫尔大量增设的“主日学”① 的影响，以及互学互教的学校的影响，这是由一个年青贵格会② 会友兰开斯特从1798年起提倡，和一个团体从1810年起加以赞助的。但是工人群众之所以还沒有大规模的运动，其主要原因乃是工人还不够高度集中，并且

① “主日学”即“星期日学校”，因基督教认为耶稣复活在星期日，故称星期日为“主的日子”，简称“主日”。英国基督教会在1780年首倡，逐渐流行于英、美等国。传到我国即称“主日学”。这种学校起初还以教童工和工人子弟读书识字为标榜，后来以灌输宗教思想为主。——译者

② “贵格会”也译为“公谊会”。“贵格”(Quaker)意译为“颤抖者”，为英国人福克斯(1624—1691年)创立，是清教徒的一派。——译者

从 1795 年以来，凡工资不足者可以按照面包价格得到适当比例的救济金。对于有产者而言，“济贫税”成为一种保险费。

社会演变的情景引起某些人士产生新的思想。虽然英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从正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情景是无可指摘的，这种情景却促使他们产生深刻的悲观主义，马尔萨斯就已经提供了例子。银行家李嘉图从 1810 年开始著书立说，指出价值的基础是劳动；但他也论证：在英国由于人口增加而必须开垦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从而保证了较好土地的所有者获得级差地租；此外他还肯定了工资铁律。人为了摆脱饥馑而作的努力越来越艰苦；劳动所分得产品的比重日益增大，而资本家的利润则总是趋于减少，其最后结局必须是停止垦荒；在这以后，马尔萨斯的法则必将无情地起作用。在大陆上，西斯蒙第从一种李嘉图思想中完全没有的道德观点出发，在准备写作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部在 1819 年出版的书尖锐地批判新的劳动组织关系中，由于机器的竞争，工资劳动者在变成经常贬值的一种商品。傅立叶早在共和十二年已经在谴责大革命后个人主义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与傅立叶相反的是圣西门，他保持住十八世纪对现代工业生产的积极性的热忱，但是他想要加强对现代工业的组织，以期使它更为积极一些。

524

这几个人决不是要提倡民主，而傅立叶和圣西门对法国大革命后果的猛烈攻击，则与同时代的反动思想合拍。例如圣西门要求由“才能之士”，即学者和技术专家，来领导社会，以便使“统治者阶级在知识上永远比被统治者优越”。这样圣西门是想要建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贵族等级。但是他也意识到，要使这个贵族等级保持才智的垄断地位，必须经常通过精选而不断更新，因此他主张取消世袭制。西斯蒙第与傅立叶，也同圣西门一样，都在攻击经济自由与竞争。他们全都不大考虑政治问题，一心只想为了一切人的利益而创造更多的财富。社会主义正在不顾当时硝烟弥漫而从

资本主义本身中诞生出来，并在准备为民主运动注入新的生命。此时罗伯特·欧文已在思考他的共产主义实验方案。

在欧洲以外，通过英国对美洲贸易的进展，资本主义表现了它的征服精神；但是战争继续阻碍了白种人的扩张。在远东，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继续努力开设商行；早在1802年他们便要求葡萄牙人允许在澳门派遣英国驻军，到1808年一支英国舰队出现在澳门，但也未能取得任何成功；在广州，不断发生一些事件激起中、英两国人的冲突。安南王嘉隆也不得不在1804年击退一次对交趾支那的进犯，1808年又击退一次对河内的进犯。在日本，一艘英国船在1808年出现在长崎，想要拿捕荷兰的船舶；稍后一些，在爪哇立足了的莱佛士试图迫使在日本出岛的巴达维亚商站接受他的控制。在中国，嘉庆正越来越受到一些秘密会党的威胁，在1813年山东爆发了一次大规模起义。日本原来也不能对外国作出任何认真的抵抗，1808年佩鲁船长的出现引起日本统治者惊惶失措。欧洲的内阋拯救了远东达四分之一世纪有余。

至于殖民情况，它在大英帝国内进展极为有限。为数不多的移民皆愿前往美国，而愿往开普者在1808年以前几乎沒有，去加拿大的也寥寥可数；在将近1815年时，在澳大利亚只有包括四百流放罪犯在内的六百至七百移民，他们在耕种二万英亩的土地。加拿大出现了有利的情况；在本时期的末年，下加拿大约有二十五万居民，其中二万至三万是英国人，而上加拿大约有七万居民；美国人的走私活动对哈利法克斯港非常有利，英国海军部的需要又促进了木材的出口，从而为一项兴旺的工业奠定了基础。在爪哇，斯坦福德·莱佛士着手革新殖民方式，把本地人的首领变成官员，把土地租给居民，并准许自由种殖和自由买卖；但是莱佛士缺乏足够的时间和金钱贯彻他的改革。 525

白人的扩张特别是在美国继续非常顺利昌隆，不尽是由于外

来移民的增加，更多的是由于出生率过高，这些过多的人口构成一股不断推进的人流，从大西洋沿岸涌向西北部地区。1802 年，俄亥俄成为一个州；印第安纳和伊利诺斯也在 1815 年以后不久成为州而加入联邦。在美国南部，相反地是黑人的数量随着棉花种植业的发展而不断增加，据估计当时已超过一百五十万人；1812 年路易斯安那被批准成为一州加入联邦，佛罗里达则引起美国虎视眈眈；麦迪逊占据佛罗里达西部直到当时还是有争议的领土彭萨科拉，而杰克逊率领田纳西州的民兵展开对克里克人[1]的战争。

盎格鲁撒克逊人扩张的唯一竞争对手是俄国人。俄国人已深入外高加索，并且在打败了波斯人以后，迫使波斯在 1813 年签订古利斯坦条约，承认俄国占有达格斯坦和巴库，以及只有俄国有权在里海拥有一队战舰。俄国人想同中国建立关系没有成功，1805 年亚历山大派遣的使团被阻于蒙古。1799 年创办的自令公司已在经营阿拉斯加，并派遣由雷扎诺夫和克鲁任斯特恩率领的探险船队取道合恩角。雷扎诺夫在 1804 年到达长崎，未获准许上岸，而在 1806 年从阿拉斯加驶出直到旧金山。俄国人从鄂霍次克海试图夺取库页岛，侵袭千岛群岛和北海道岛，使日本人大为震惊。稍后俄国人又图谋在加利福尼亚开辟一块殖民地用来供应阿拉斯加的给养，1811 年在旧金山以北修建了一座堡垒。他们在这里遇到了开始常住哥伦比亚[2]和俄勒冈的加拿大公司的人员。

传教会所起的作用仍然是很不显著。在中国，罗马教皇派来的代牧主教徐德新在 1803 年召集第一次布道议事会，但从欧洲来

526

① 克里克族是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当时还住在佐治亚州和亚拉巴马州；从这时起被白人种族主义者赶往西部，逐渐被赶过密西西比河。——译者

② 指现在加拿大西部海岸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不是南美洲的哥伦比亚。——译者

的神甫却一个也沒有参加；1805 年清朝又严禁外教，1815 年他本人也被斩首[1]。1807 年，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广州上岸。浸礼会派也进入了缅甸。"圣书公会"是在 1804 年创办的，客观形势当时却还不允许它做出较多的工作。

在欧洲人的心目中，殖民地仍然起着重商主义给它规定的作用，但殖民的旧制度已岌岌可危。法国曾一度废除奴隶制度，这是法国一项重要的成就，而当它企图恢复奴隶制度时就失去了圣多明各；1807 年英国取缔了奴隶贩卖，这就会断绝奴隶的来源。另一方面，美国作出了榜样，白人移民和土生白人决心不再容忍"垄断贸易"，要与欧洲一刀两断以摆脱它。西班牙正处于丧失美洲属地的过程中。西属美洲各地在承认费迪南七世为合法国王以后，毫不迟延地声称它们只是从属于他个人，而在他被囚于法国期间，它们完全有权自主。1810 年，当法军攻陷安达卢西亚而中央"政务会"困守在加的斯的消息传来时，西属各殖民地进一步采取了措施：4 月 19 日，加拉加斯推翻了西班牙"政务会"派来的总督，5 月 20 日，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推翻了总督；新格拉纳达[2]于 7 月，基多于 8 月，智利和墨西哥于 9 月相继爆发起义。各殖民地向英国建议缔结一项商务条约，博利瓦尔并亲赴伦敦；阿瑟·韦尔斯利从中干预其事；但是西班牙议会拒绝废除"垄断贸易"，并宣告其美洲臣民是犯上叛乱。博利瓦尔就返回委内瑞拉，米兰达继之而归。他们召开国会，1811 年 7 月 7 日，国会宣告委内瑞拉独立，并通过一部宪法；新格拉纳达也效法宣布独立。在阿根廷，起义的领袖已经

---

[1] 徐德新(L.-G. F. Dufresne)，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1777年潜入四川传教，初用汉名李多林，1785 年被捕，解往北京，释放后驱逐出境。1789 年再度潜入四川，改名徐德新。1815 年 5 月在四川新津被捕，同年 9 月在成都斩首。——译者

[2] 西属美洲四大总督辖区之一，大致包括现在的巴拿马、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译者

彼此不和，其中马利亚诺·莫雷诺已被逐；制宪议会迟到1813年才召开。虽然保存了天主教作为国教的种种特权，但是新独立的各国无不宣告保障人权，到处都废除了奴隶制度，对印第安人的劳役制和领地监护制。

在新独立的各国内很快地就发生了内讧：土生白人排斥了西班牙移民；温和派对号召黑人和混血人起来参加斗争大为惊惶；领袖之间相争不已；城市之间互相猜忌提防，为保持独立自治而不断反过来倒过去；山地居民仍受僧侣播弄而支持西班牙殖民者；在委内瑞拉，利亚内罗斯人① 替任何出钱者作战。因此西班牙人仍然

527 坚守着一些据点。在墨西哥，1811年西班牙人枪杀了伊达尔戈神甫，1813年他的同志莫拉莱斯神甫继起领导独立斗争，在1815年也同样牺牲了。西班牙人仍控制着利马，以利马为据点向基多反扑，并成功地把它从格拉纳达人手里夺回来；经过多方策划后，西班牙人又从阿根廷人手里夺回上秘鲁；巴拉圭则摆脱了西班牙人的控制；但西班牙派驻蒙得维的亚总督艾利奥负隅顽抗为时稍久，并求援于葡萄牙人，只是到1814年才由阿尔维亚尔最后解放了该城。在智利，罗萨斯、卡雷拉和沃伊金斯互相争夺领导权，1813年，纠集兵力退守南部的西班牙军大举反扑，重新占领了整个智利。在委内瑞拉和新格拉纳达的斗争反复曲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两地宣告独立后，西班牙军仍盘据在马拉开波地区与奥里诺科河河谷；1812年，他们相当轻易地战胜了米兰达，7月25日，米兰达投降，他被送回加的斯，1816年死于加的斯。博利瓦尔得以脱身而去到卡塔赫纳。1813年，格拉纳达人授权他攻入委内瑞拉，8月6日他收复加拉加斯。他的敌人又一次向东撤退，1814年又从那里出击并打败了他；他不得不回到新格拉纳达。在此时刻，已复辟的费迪南七世派出援军；1815年春季，西班牙舰队到

① 委内瑞拉本地的草原牧民。——译者

达，而博利瓦尔登舟驶往牙买加岛。只有阿根廷仍保住独立自由，但内爭削弱了它，而1814年当选为总督政的阿尔维亚尔，曾要求英国保护，在1815年4月被推翻。因此，西属美洲的前途尚待分晓；不管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宗主国永远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重建殖民统治的旧制度。

* * *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就是利润，它构成一种与拿破仑的政治和军事理想毫无瓜葛的力量。在它最完善的形式下，资本主义生产诚然是反对民族壁垒的，因为民族壁垒妨碍自然资源的开发并阻止全球各地之间合理的分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世界的帝国本来更能适合资本主义生产。但是资本主义不过刚刚开始，而它那些深受重商主义精神浸染的代表人物，却一心只想保住本国使之成为一己所有的禁脔。此外，这些代表人物也同他们的同胞一样，按照人的本性都是热爱国家独立的；拿破仑对法国的偏爱本来迟早会把这些代表人物变成反对帝国的民族主义者，直到民族主义思想使他们彼此互相敌对为止。然而，对拿破仑而言，这还不是最坏的事。严重的是工业资本主义是在英国诞生，成长和强大起来的：只有工业资本主义能提供英国作战所需要的财富；而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对拿破仑的胜利就是资本主义的胜利。 528

529

第六编　拿破仑的败亡
（1812—1815年）

第一章　大陆体系的瓦解
（1812—1814年）

大陆体系的创立和维持都得力于法国大军的多次胜利。因此每次战争都使大陆体系受到一次考验。俄罗斯战役原可望使此功业臻于完善；但其结局却为一场大败。大军既已溃亡，皇帝仓猝重建新军，虽然新军不复具有大军威力的主要因素，如混合编制，但如果它如以往历次战争那样，仍然只对一个或两个大陆强国作战，则新军仍然可以再次取胜。而这一次大陆各强国吸取二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急忙联合起来投入反拿破仑的战争。大陆体系于是土崩瓦解，拿破仑从舞台上消失了，而法国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一、俄罗斯战役

在对俄战争中，拿破仑统率了七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其中六十530一万一千人在战争过程中相继越过了边界。这些部队反映出大帝国的面貌，其中有三十万法国人，包括新并入法国的居民；十八万德意志人，包括施瓦岑贝格统率的三万奥地利人和约克统率的两万普鲁士人；九千瑞士人、九万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三万二千意大利人、伊利里亚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和可靠性相差极大。大军从来没有成为如此人数众多的乌合之众，法

国本土的法国人几乎不到三分之一。

在维斯杜拉河的前线上，四十五万人和一千一百四十六座大炮的密集的突击部队，分成九个兵团，外加近卫军、四个骑兵团和各盟国部队。这支按照习惯的办法结合的部队，实际上由于队伍庞大、战线漫长和联系困难，是很难掌握指挥的。事实上拿破仑把这些军团编为几个方面军：他本人在涅曼河上指挥二十二万七千人，欧仁率领八万人在他后面一点，热罗姆指挥右翼军七万六千人；再向右边是施瓦岑贝格；在最左翼则是麦克唐纳和约克。但是，这样就必须有优秀的方面军统帅，而热罗姆尤其不能列入优秀将领之内！皇帝在选派他时，是受皇朝偏见的支配的。指挥调动的细致准确已经不复存在。 531

正如以往习以为常的一样，拿破仑意欲使这次战争打个速决战。直到6月20日，他希望战争在波兰境内打开。当他指挥他的主力部队向科夫诺进军时，他拒绝命令右翼军向华沙进军，热罗姆的庸才本身就成了诱敌的圈套。如果敌军大量涌入华沙大公国，他就可以迂回到敌军右侧而击溃敌军；这样就可以结束战争。但是俄国人按兵不动。因此必须进入敌国去攻击敌军。士兵只携带了四天的面包，跟着来的辎重车也只带来二十天的面粉，因为估计是在三周以内，决定性的打击必将迫使亚历山大投降。

可以肯定，在沙皇左右近臣中的主和派也不乏其人，例如康斯坦丁大公和鲁缅佐夫。6月28日，沙皇派遣巴拉索夫去向拿破仑议和，条件是要拿破仑同意撤出俄国的领土。敌视法国的人，如阿姆费尔特、施泰因等，一直是在提心吊胆，唯恐沙皇不能坚持下去，他们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不管怎样，最后还是沙皇的自尊自大感占了上风。然而，俄军质量俱差，似乎无法补救。在涅曼河后边，巴克莱·德·托利指挥十二万人；在布格河上，巴格拉齐昂部署了不到四万人；再往南面，托尔马索夫带领的军队稍微多些；在第二线，

维特根施泰因向前推进以保卫德维纳河和里加。在内地，还有三十万至四十万名新兵、哥萨克和民兵可供调遣；齐查戈夫正率多瑙河方面军兼程前来；但这些都需要时间。时间是可以利用撤退去赢得的，那些认为空间和严冬是俄国最宝贵的两大盟军的人，如罗斯托普钦等，在他们看来撤退是有益无害的。相反地，大多数人想到外敌入侵就感到愤慨，或者担心内地被侵会使他们皇上作战的意志受挫。最后大家都同意采纳德意志亡命者法尔的计划。拿破仑进攻时，巴格拉齐昂一面后退，一面抵抗，而巴克莱则后退扑向敌军的侧翼。亚历山大比之法国皇帝更加无意于把战争带进俄国的心脏地区。但是这却是势难避免的，因为他的将军们感到自己力量薄弱，并且非常害怕自己的对手；他们既获得可以任意撤退的权限，便大举后撤以避免惨败，这样在无意之中就迫使他们的敌人在追击中消耗实力，精疲力竭。

拿破仑的军队在1812年6月24日和25日渡过了涅曼河，26日就以每天走十法里的急行军攻下了维尔纽斯，打算击溃巴克莱。但是拿破仑扑了个空，巴克莱已经向德维纳河北岸的德里萨筑垒大营撤退。还要对付的只有巴格拉齐昂。达武从维尔纽斯向明斯克进军以截断巴格拉齐昂的退路，同时热罗姆跟着追击巴格拉齐昂。但是热罗姆还差很长一段路程才赶得上，他也沒有急急追上。沒有被追迫交锋的巴格拉齐昂转向南方而巧妙地避开了达武，渡过了第聂伯河，然后再掉师北上。热罗姆被撤职而回到了威斯特法利亚。达武在莫吉廖夫打击了巴格拉齐昂，但是沒有能拦住他。维尔纽斯的作战计划失败了。

7月3日，拿破仑再发兵攻取维帖布斯克，意欲插进俄国两支军队之间；当他在24日到达该地时，为时已晚：巴克莱先从德里萨撤退，再退到维帖布斯克，又退到斯摩棱斯克，在这里终于和巴格拉齐昂会师。

俄国两支军队如此汇合后，巴克莱承担向维帖布斯克方向发动攻势。拿破仑就立刻采取第三个作战计划：他避开了巴克莱而挥师南下，渡过了第聂伯河，而在8月16日出现在斯摩棱斯克城下，但是未能攻克该城。因为巴克莱发觉拿破仑的动向后，立即回师，在12日及时地赶回保卫该城。17日一场血战后，法军只攻占了郊区。俄军又一次后撤，19日退到瓦卢迪诺，后卫部队掩护退却。法军是否跟踪直到莫斯科呢？

从一开始，这次战争的新特征就显示出来。拿破仑式的战略破绽百出：敌人不顾一切地后退，沒有任何自然障碍足以阻止其后撤；法军也无从突然进击，因为在荒漠的平原上，骑兵还沒有得到消息弄清敌人动向就已筋疲力尽；法国军队所擅长的强行军，由于距离过长而失去其惯有的效能。这次强行军较之往常尤其令人疲惫不堪。从6月26日起，在向维尔纽斯行进时，掉队的和开小差的数以倍增，其比例之大骇人听闻。辎重给养跟不上，几乎立刻就需要就地设法取给，但是这里什么也不能提供。沒有燕麦吃的战马成批地饿死。气候也在其中起作用：6月底有暴风骤雨，深夜转寒，接着又是酷暑逼人。在斯摩棱斯克，作战部队减少到十六万人。那末，到莫斯科还能剩下多少人呢？尤其是外国部队显然在瓦解。符腾堡师原有一万六千人，到9月4日只剩下一千四百五十六人。两翼和后方部队的情况也不稍佳。麦克唐纳未能攻下里加，而波洛次克的胜利者古维翁-圣西尔眼看在他面前的维特根施泰因的队伍在不断壮大。雷尼埃和施瓦岑贝格足以使托尔马索夫望而生畏，但是齐查戈夫的增援即将到来。拿破仑原指望波兰人全民奋起大举攻入乌克兰。6月28日，老恰尔托雷斯基领导建立了一个联盟会议，以此取代议会，并立即重建起波兰王国。法国皇帝对待这个消息十分冷淡，保持沉默，因为此时激怒普鲁士和奥地利是不妥当的，更不必在沒有打垮亚历山大以前，便使他感到绝望。 533

拿破仑甚至也不把立陶宛合并入华沙大公国，而正如对待库尔兰一样，他把立陶宛交付给一些法国官员管理。波兰人感到失望和不安，加之疲惫不堪，很少被马兰内大主教德·普拉特大使鼓动起来；因此波兰人准备等到胜利在望时再大声疾呼。

在这些情况下，是不是停止前进，整顿好征服的地区，补足军队的给养，让军队就地驻扎过冬，要比较好些？拿破仑在维帖布斯克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然而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彻头彻尾改变战争的面貌和胜利的前景：这就是对农民宣布允许废除农奴制度。拿破仑是懂得这一点的；但是，大革命的传统现在使他感到非常厌恶，以致他认为这种手段是不足取的下策。从这时起他断定，帝国所要求的战争努力决不能迁延时日，否则将有损它的威望；在德意志，其后果尤其不堪设想。除此而外，他还深信，打进莫斯科必将使亚历山大屈膝投降。因此，他重整旗鼓，继续前进。

9 月 5 日，他行进到莫斯科河畔时，突然与俄军遭遇。库图佐夫已经接替了巴克莱，库图佐夫不愿不经抵抗就放弃莫斯科。他的右翼有河水为屏障，敌人无法接近，左翼背靠森林，不能立即包抄。拿破仑攻其中军，9 月 7 日，经过长时间的浴血奋战，夺取了俄军几座多面堡。法军损失三万人，俄军五万。[①] 在战斗最紧要关头，拿破仑拒绝出动近卫军；库图佐夫得以不溃而退，渡过莫斯科城南的纳拉河，而拿破仑在 14 日进入莫斯科。从 15 日到 18 日，莫斯科被多处大火烧毁，这些火，至少有一部分，是罗斯托普钦下令放的。

亚历山大从德里萨退出后回到圣彼得堡。他同英国缔结了和约，并把俄国舰队交给了英国。8 月底，亚历山大和贝尔纳多特在阿博的会晤肯定了俄国和瑞典的联盟；可是，虽然贝尔纳多特现在 534

① 这场激烈战斗是在博罗迪诺村展开的，是拿破仑战史中一场重要战斗。——译者

已经接受了英国的补助金，他在没有取得挪威以前，而且只要拿破仑还在打胜仗的时候，他并不认真准备派兵到德意志去冒风险。因此，沙皇只好靠自己单独作战。他的妹妹叶卡德琳娜、各国亡命客（现在阿恩特、德·伊韦尔努瓦和斯塔埃尔夫人都加入了这一伙）纷纷要求作战到底。亚历山大如果投降，他无疑地害怕俄国贵族什么都干得出来，这些贵族已经苦恼和愤怒到发狂的程度。但是，看起来似乎是，亚历山大特别受到一种英雄姿态的诱惑。他的来自各国的左右随从把他看成是最后的一线希望，预先恭维他是欧洲的救主；他私下里也毫不怀疑，胜利将使他成为欧洲的主宰。这正是他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他要充当这个角色完全符合他的虚荣心，符合他空谈自由的爱好，符合他内心深处本能地要求称霸的野心。他越来越沉湎于神秘主义，轻易地就自以为上帝指派了他去战胜"基督之敌"。这样他就自命为此次十字军的首领，此次十字军是从前伯克所祈求和鼓吹的，因此亚历山大对拿破仑的一切讲和倡议都充耳不闻。

皇帝无法继续向前推进了。在莫斯科城内，他的军队是安全的；然而，军队只能支配占领地区，并且军队的交通线不能确保安全。官方的传统说法无疑地夸张了这次战争的民族性质，但是，面对着抢夺粮食的入侵者，农奴也和其他人一样四散逃亡，而在走投无路时，便用游击战反击入侵者。飘忽无定的哥萨克人骚扰一切外国部队。如果拿破仑自陷于严冬的封锁之中，则对他的命运没有信心的欧洲和法国本土，可能乘此摆脱他的统治。直到十月中旬，拿破仑仍抱有希望，因为库图佐夫用谈判停战协定来愚弄缪拉；然后，到 18 日那一天，库图佐夫突然在温克瓦攻击缪拉。第二天，顿然警觉起来的拿破仑下令从莫斯科撤退。

从塔鲁丁诺到斯摩棱斯克，库图佐夫可以抢先几天到达。为了恫吓他，拿破仑挥师南下，24 日在马洛雅罗斯拉韦次攻击库图

佐夫；然后，他避开库图佐夫而奔上通往斯摩棱斯克的路上，达武掩护这次退却，好不容易顶住了米洛拉多维奇的部队。当拿破仑出发的时候，天气还很好，但是气候陡变，大雪从空而降。法军来时，这个地区焚毁已尽，既乏衣食可掠，又无房舍可蔽。战马冻饿死，车辆、大炮都被抛弃，拖在后面的掉队士兵越来越多，每天至少有十分之一或死于霜冻，或被哥萨克俘杀。从 11 月 9 日至 13 日，法军退入斯摩棱斯克，而从 14 日至 18 日，又从该地分队分批出发。俄军已经抢在前头，截断了通向克拉斯诺耶的路。15 日，拿破仑没有遇到很大抵抗就通过了；但 16 日欧仁通过，17 日达武通过，则都经过一番战斗；18 日，内伊被阻击，在渡过结冰的第聂伯河时，奇迹般地脱了险。拿破仑重整队伍，到达别列津纳河时，收集残部只剩约三万之数。在别列津纳，一个严重的危险局面出现在法军面前：齐查戈夫在和托尔马索夫会师后，已经调师北上，施瓦岑贝格并未追击，以致齐查戈夫得以攻入明斯克，继之又夺取了波里索夫。在北边，维特根施泰因已经渡过了德维纳河，逼退乌迪诺和维克托。乌迪诺急驰前往收复波里索夫，但发现别列津纳河上的大桥已被破坏。在 25 日到 26 日的夜晚，埃布莱属下的架桥兵赶修了两座桥。拿破仑在 27 日渡过了河，而第二天在两岸都展开了激战。在右岸，齐查戈夫能够顶得住；在左岸，由于库图佐夫不很得力，维克托得以逃脱，但抛下了掉队的士兵。到这时别列津纳河尚未结冰，天气还不算太冷，但从此以后，严寒日益加剧，足以摧毁法国大军残余士兵。12 月 9 日，一万人左右到达维尔纽斯，再经科夫诺退往科尼希斯贝克。四万散兵逐渐归队。麦克唐纳主动退到提尔西特，雷尼埃和施瓦岑贝格则退到布格河上，总共还有五万五千人。拿破仑总共损失四十万人，另有十万人被俘。

大帝国的盾牌大军已不复存在，要重建大军，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自从 1793 年起，法国军队所采用的混合编制已不再可

能实行；一支新的骑兵也不能仓促组成。然而，无从补救的大灾难丝毫不能动摇拿破仑，他已经专心致志要重建一支军队。12 月 5 日，在到达维尔纽斯以前，他得到消息，知道 10 月 23 日马莱在巴黎夺取政府失败，29 日他和同谋犯都被枪决。但是，必须在从俄国败退这个可怕的消息传播出去以前，及时地重新巩固自己的政权。拿破仑把统帅权交给缪拉，和科兰古坐上雪橇，溜回法国。这时他充满了幻想：要求普鲁士和奥地利增派部队，并且估计缪拉能够守住维斯杜拉河，顶住俄军，然后等到明年春天，他亲自率领新编劲旅再出现到维斯杜拉河上。

二、普鲁士的倒戈和1813年第一次战役

536

如果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仍然忠顺，缪拉或许可以坚持得住。筋疲力竭的库图佐夫沒有越过边界。他认为俄国不必继续进行战争，而和他抱有同感的大有人在。决定再发动攻势的是亚历山大本人；他撤换了鲁缅佐夫，在 12 月 23 日带着涅谢尔罗杰出现在维尔纽斯。怂恿亚历山大这样做的是施泰因，他从 11 月 17 日起力劝沙皇，应拯救德意志。他们号召德意志人民奋起反叛，要求德意志各邦王侯反正，否则将被废黜。亚历山大还指望其他各国叛离法国。意大利人保卢奇和一些德意志亡命客已经同约克暗中接洽。约克请示普鲁士国王，可能他并未得到任何指示；但是俄军已把他和麦克唐纳隔开，他本来不难杀出一条路，而他不愿再打下去，12 月 30 日他同俄军在陶拉格签订了中立条约。俄军侵入普鲁士，比洛拒绝同缪拉共同作战，麦克唐纳历尽艰辛撤退到维斯杜拉河上。弗里德里希-威廉免去约克的职务，但是约克佯作不知而跟着俄国人走。俄国人有充分根据可以信赖波兰贵族。12 月，恰

537 尔托雷斯基曾请求沙皇重建波兰，而由他的一位兄弟担任波兰国王。华沙政府的几个成员愿把大公国献给俄国，条件是与立陶宛联合起来，并颁布一个宪法。涅谢尔罗杰和施泰因都表示反对，前者认为不符合俄国的利益，后者则借口这将妨碍反法同盟的组成。1813 年 1 月 13 日，亚历山大只保证他对波兰人的善意；波兰人对此感到满意而没有抵抗俄军。至于施瓦岑贝格，他进行谈判并且不战而退。华沙在 2 月 9 日被俄军占领。

法国人向波森撤退，缪拉回到那不勒斯，而由欧仁接替他。1 月 30 日，施瓦岑贝格同俄国单独签订了停战协定，因而向克拉科夫方向撤退，这样牵动了波尼亚托夫斯基并使雷尼埃失去掩护，以至雷尼埃师团一部分被击溃。2 月 12 日，欧仁离开了波森，到 2 月底，又过早地放弃了奥得河防线；不过，从此时起，普鲁士的倒戈确实是已酝酿成熟了。

弗里德里希-威廉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相信，法国大军的溃亡解放了他，而且如果拿破仑愿意把华沙大公国给他，他或许就会心满意足。他对奥地利心怀疑惧，相信奥地利对法国是忠顺的；他怀疑俄国想要并吞整个波兰，甚至想并吞东普鲁士。他的左右亲信意见分歧：克内泽贝克劝他立刻同亚历山大结成同盟，哈登堡看法相同，不过较为慎重；安希龙倾向于同梅特涅协调行事，共同对法、俄两国提出调停，在不让俄军进入德意志的情况下，使德意志得到解放。在 12 月底，普鲁士国王倾向拖延到明年春天再作决定，到那时如果拿破仑再度攻入俄国，便在他的后方倒戈。在维也纳，克内泽贝克得悉普鲁士不必对奥地利心怀疑惧；维也纳方面甚至直言不讳地劝告他同沙皇取得谅解；但他主张同沙皇结成同盟的建议，遭到国王的拒绝。

对普鲁士的决策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爱国者的革命行动。约克的倒戈首先发难。国王起初胆战心惊，这才决定派遣使臣去见

沙皇，沙皇答应"恢复"普鲁士，他对这位使臣软硬兼施，又是恳求，又是威胁。另一方面，弗里德里希-威廉自知必将激怒拿破仑，便听从劝告，决定离开柏林，1月22日，他移跸布莱斯劳。在此期间，约克已回师普鲁士；施泰因以沙皇的特派专员身分到达科尼希斯贝克，并在当地召开等级议会。被吓坏了的政府官员终于拒不服从，施泰因不得不让位给约克；而实际上彼此并无分歧。等级议会通过决议建立后备军，决议俟国王批准后生效，授命约克负责组织工作，与正规征兵制并行不悖，在志愿兵不足的情况下，所有十八岁至四十五岁男子均有义务参加一支部队，但可雇人顶替。等级议会注意保留选派军官的权力，以免使这个人民武装引起贵族的不安。国王很不喜欢这项非法的倡议，但是如果反对，又可能因此保不住自己的王位，何况在布莱斯劳以沙恩霍斯特为首的主战派因此已加强起来。弗里德里希-威廉接着在2月3日也号召凡能自费装备的臣民组织志愿兵团，以辅助正规部队。为了推动臣民参加，他在9日宣布，在战争期间取消从十七岁到二十四岁的免役优待。10日，他发表第一篇《告人民书》。同时，他派遣克內泽贝克去见沙皇。两国谈判迟迟未能达成协议，因为普鲁士要求恢复1806年的边界，至少应恢复东部国界，而亚历山大只答应给普鲁士等量的领土。施泰因打开了这个僵局：他挺身而出和俄国大使安斯切特去到布莱斯劳，国王作了让步。2月28日，俄普同盟条约在卡利什签字；3月15日，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会晤；16日，普对法发出宣战书。17日，普王宣布在全国建立由十七岁到四十岁男子组成的后备军，不得顶替；由两个贵族和一个平民代表组成的各地区委员会负责指派军官。4月21日，又征召四十岁以上男子组成民军，但实际上没有出动过民军。为了战胜法国，普鲁士从法国搬来了"全国皆兵"，正如长期以来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诺所主张的，而只拥有五百万人口的普鲁士在贯彻这项办法时

538

非常严格，这种严格程度是法国救国委员会也未曾认为是必要的。

俄普同盟，对于俄国而言，具有关键性的重大作用。俄国人在第一线只投入了不过七万人的兵力。即使在八月份以前普鲁士后备军还不能投入战斗，即使在五月份报名参加志愿军的只不过七、八千人，但是由于征召了 1808 年遣散的三万至四万受过短期训练的士兵和军官（速成兵团），也由于新兵入伍，普鲁士正规军能够立539 即派出三万五千人上前线，与俄军合作围攻法军各据点。从 3 月 4 日起，欧仁已撤离柏林，退到易北河西岸。敌军随即渡过了易北河。2 月 24 日，汉堡起来叛离法国，3 月 18 日，俄军进入汉堡；同一天，达武撤离德累斯顿，整个萨克森被敌军蹂躏，法国人被逼退到萨勒河以西。

在道义上，普鲁士民族运动也同样起了巨大影响，因为战争因此具有了解放性质。这是亚历山大梦寐以求的；在德意志史学中，这次战争至今仍称之为 Befreiungskrieg（解放战争）。在大学的青年学生、资产阶级和贵族中，这种狂热特别突出。在柏林，费希特中断了他的讲课，而同施特芬斯与施莱尔马歇一道，热情地宣讲国王的呼吁书。各省民族运动的高涨发展很不平衡。在西里西亚和西普鲁士，波兰籍士兵拒绝服从而纷纷开小差；在东普鲁士，广泛地采用顶替办法。尤其是在乡村，很多农民拿起武器，但并非出于爱国热情，而是出于习惯上对容克和对政府官员的唯命是从，这些农民几乎还没有从农奴制度下得到解放。另一方面，贵族操纵军队，只允许资产阶级充当下级军官，这样，使法国大革命军队产生威力的最积极的鼓舞力量之一，在普鲁士是没有的。尽管如此，发动的结果还是大为可观：从 3 月到 4 月，有一万五千志愿兵参加自由兵团，后备军还未计入；参加后备军的人数最后达到十二万至十三万之间；到八月份，后备军上了火线，占全部作战部队半数以上；普鲁士军队的面貌为之一新。不言而喻，职业军人不太欣赏后备

军，正如法国大革命全民从军初期一样，因为后备军训练不足而又易临阵惊慌。

普鲁士的奋起感动了所有的德意志人。爱国者的宣传从1812年年底开始，日趋积极。保卢奇雇用了默克尔从事宣传；阿恩特写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册子，其中著名的是《德意志士兵的教理问答》，其主旨为呼吁全体德意志人起来对"恶神"战斗，必要时可以不顾其王侯的反对。施泰因希望进一步行动起来，他劝告亚历山大和弗里德里希-威廉最好能颁发谕旨，组织起民族战争，这样可以使守成持重之士与漠不关心之人都下定决心。果然在3月19日，两位君王发出告德意志人的公告，并且在宣布解散来因邦联时，责令各王侯反正归顺，否则将被视为不配受尊敬而遭废黜，两位君主建立一个委员会负责治理占领地区，并主管在占领地区组织后备军，540 而任命施泰因为委员会主席。这种鼓动立即得到汉堡和萨克森的响应；而且不止于此，拿破仑新的征兵激起民变，例如在哈瑙和在贝格公国，从而有助于反法宣传。梅克伦堡倒戈了，王侯中大多数都愿这样做，但他们仍然害怕法国皇帝；施泰因的威胁重重和起义的呼吁使他们感到不快，从而也不利于普鲁士扩张势力；这些王侯便向奥地利方面寻求支持。

在民族热潮中涌现出新一代的诗人，他们轻视梦想和空论，而专心致力于歌颂士兵的英雄主义：例如战死疆场的特奥多尔·克尔纳留下了杰出的诗集《诗与剑》；又如鲁克尔特在1814年出版了《战斗的诗篇》；还有申肯道夫、乌兰德等人的作品。虽然如此，如果说德意志爱国主义已可看出略具雏形，但还远未完全成熟。德意志人由于法国人使得他们日子非常难过，因而只是在赶走法国人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心协力的；但是，就大多数德意志人而言，他们所看到的没有超过这一点，还没有对政治上的民族性形成一个清楚的概念。爱国者的领袖人物并不总是能把政治上的民族性同

文化上的民族性严格地分辨清楚，例如，格奈森诺并不反对看到英国在对它有利的情况下，在来因河与易北河之间建立一个大邦。就是象施泰因这样主张统一的人，由于历史情况造成的形势，也提不出一个明确的蓝图。究竟由普鲁士，还是由奥地利来领导统一，他们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施泰因甚至认为即使普鲁士不复存在也是无伤大体的。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无助于排除统一的困难，只足以表示对解决统一问题无能为力。尤有甚者，这些人认为，如果沒有欧洲的帮助，德意志人不能做到自己解放自己；因而他们同意让欧洲来组织这个新的德意志国家，由欧洲来保证它，也就是说，把它置于欧洲的监护之下。此外，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混杂着一些或多或少的进步的自由思想，而贵族的爱国主义则联想到要维持或恢复政治的或社会的旧制度。至于王侯们，他们既不关心一种必将削弱他们主权的统一，也不关心一个必将限制他们威权的宪法。民族团结是在暧昧不清的状态中实现的，每个人在等待如何把胜利变成对自己有利。在必要的期间內，他们使人民怀着希望，541 以激励人民去作战；但是奥地利的干预势将确保只对王侯和贵族有利。

这个干预是梅特涅深思熟虑和坚定不移地准备好的。法国大军的灾难已经解放了奥地利，奥法联盟实际上已经解体，因为这个联盟未能按照它的原意保全大帝国，而大帝国正是靠掠夺奥地利而扩充起来的。12 月底受命前往巴黎的布勃纳将军通知法国，他的皇上不再增派部队；继之，施瓦岑贝格撤离了前线。拿破仑惊呼："这是走向倒戈的第一步"。他对皇朝联盟曾寄予多少希望，现在他感到受到多么残酷的欺骗！但是他还是镇定下来，面临困难强作欢颜：他首先必须解决俄罗斯人和普鲁士人，然后再同奥地利人算账。梅特涅对此也深知不疑。有人或问：拿破仑是否可以付出一定代价，而能重新巩固法奥联盟。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奥地利

如果帮助拿破仑粉碎了俄国和普鲁士，奥地利此后势将完全听从拿破仑的摆布。梅特涅只能在至少同普鲁士取得协议的情况下，同时约制亚历山大和拿破仑，以求恢复均势和持久和平。因此他派布勃纳去提出由他出面斡旋，并推动法国作出让步。如此解决办法对他是最为惬意的，因为作为政治家，他不愿普鲁士壮大，而他比弗里德里希-威廉更加不信任沙皇，他不仅怀疑沙皇对波兰有野心，还怀疑沙皇对土耳其有野心。德意志的沸腾的情绪使梅特涅深感不安，因为这种情绪无论对旧制度还是对奥地利，都同样构成威胁。但是若要恢复德意志各邦的力量，必须要法国同意退回到吕内维尔条约规定的疆界之内，而梅特涅深知拿破仑是决不肯善罢甘休的；因此他只得等待有利时机参加反法同盟，以达到推翻拿破仑的目的。梅特涅出身贵族并且本人也因法国大革命受到损失，所以他和整个奥地利贵族一样，对推翻拿破仑感到很高兴。他派到沙皇那里的大使勒布策尔特恩自夸说他同俄国人与普鲁士人"从来是一致行动，共同粉碎法国革命，以争取正义事业的胜利"。

果然，皇帝对布勃纳只愿慷慨地让出伊利里亚，他还同意让葡萄牙国王复位，至于已经"符合宪法地"并入帝国的那些国度，他一个也不肯放弃，甚至华沙大公国也不放弃。他在立法院公开重复 542 这些主张。事实上，他承认让奥地利充当了谈判的中间人；但是自此以后梅特涅拿定了主意，跟拿破仑谈判争论只不过为了争取时间，为了能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动员。施展这个手法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奥地利贵族急躁难耐，根茨本人也不以如此拖泥带水为然。赫尔迈尔重施故技，想把提罗耳煽动起来，以致梅特涅在3月间不得不把他抓起来。4月间，施瓦岑贝格被派到巴黎。这一次，梅特涅亮出了他的条件：要求放弃伊利里亚、华沙大公国和整个德意志。拿破仑最后答应由奥地利、普鲁士和奥耳登堡公爵瓜分华沙大公国；但是，作为补偿，萨克森应合并位于易北河同奥得

河之间的普鲁士各省。奥地利表明自己不再是法国的盟国，也不再是中间人，奥地利现在进展到武装调停，它确定不移的意向是：任何一方如果拒绝接受它认为是合理的方案，它即进行干涉，对之作战。奥地利的态度已经足以动摇许多仍然忠顺于法国的德意志各王侯。从2月起，萨克森国王已自德累斯顿出走，最后避难到奥地利。施泰因的一再威胁使他晕头转向、惊慌失措。3月26日，梅特涅提出愿意保证萨克森国王的领土完整，并为他取得一部分领土以补偿他失去华沙大公国。4月26日协定签字：如果调停失败，萨克森军队将与奥地利军队一致行动。在此期间，梅特涅也在同巴伐利亚谈判，巴伐利亚对拿破仑的帮助只是非常有保留的。缪拉在回到那不勒斯后，也曾立即遣使维也纳，表示如果让他保住他的王国，他愿与奥地利合作。维也纳方面对他很表欢迎；但是本廷克刚刚占领蓬扎岛，又梦想发动一场在英国监护下的意大利民族运动，他保留费迪南四世的权利，并要求加埃塔向他投降，又扬言将以二万五千人大举登陆。只因发生了此事，缪拉背叛拿破仑一事未能立即实现，他一怒之下又加入了法国大军。

拿破仑毅然拒绝不战而降，这又有什么可以令人大惊小怪的？还没有人打败了他，而且正可以象1807年一样，在奥地利还来不及发言以前，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战役足以打得俄军和普鲁士军溃不成军，退出战争。在法国人面前，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呢？如果他同意重新成为一位民族领袖，法国人很乐意原谅他；但是，如果他承认失败，他必将不复成为法国人的主宰，因此他宁死

543 不降。有人批评他过于自私自利，其实他不把民族利益放在心上为时已久，他只知从自己出发考虑问题。何况即使他接受了梅特涅的条件，他也得不到任何保证，不让敌人利用赢得的时间，然后得寸进尺地提高要求，而这恰巧是即将出现的情况。沙皇直到3月11日才非常勉强地接受调停，只不过是为了敷衍奥地利人，奥

地利人向他保证，调停必将失败，奥地利人当然就将同他合作。4月初在伦敦，韦森贝格见到卡斯尔雷，后者直率地拒绝调停，并引证了拿破仑的讲话。梅特涅完全承认，如果只有英国的利益悬而未决，大陆的和平仍可实现。卡斯尔雷从俄罗斯战役开始以来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因而谨慎小心，但是现在局势已在明朗化，他可以不把梅特涅放在心上而采取行动。3月3日，他答应贝尔纳多特取得挪威和瓜德罗普岛，条件是瑞典出兵三万人援助沙皇。丹麦已经同俄国签订了中立协定，因此争取丹麦大有希望。

卡利什条约已经使英国决定援助联盟各国。英国已经派遣卡斯卡特勋爵和威尔逊为驻沙皇亚历山大总部的代表；4月间，卡斯尔雷又把他的兄弟斯图尔特勋爵和杰克逊一道派到普鲁士国王那里。他答应提供补助金，条件是要扩大汉诺威的版图，而尤其是要普鲁士和俄国承诺，决不背着英国同拿破仑单独议和。至于将要让法国保存的疆界，卡斯尔雷没有把话说死，一切要看军事行动进展如何而定；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拿破仑同意梅特涅所提的条件，自从卡斯尔雷提议的条约签字以后，这些条件也必将重付讨论。因此必须在战场赢得一次新的胜利。对此所能表示异议的只是：这一新胜利或许只能是不大的胜利，虽然是足够导致和平的胜利，如果双方事先都有思想准备作出合理让步的话。而在拿破仑的心目中，这一胜利应该刚好能够使他不作出任何让步。

奥地利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自从1809年以来，它的军队减少到十五万人，但是由于经费不足，到1813年初，能立即投入战斗的军队不超过六万人。2月9日决定再动员四万人入伍，但是一切都感缺乏。4月16日，政府决定在1811年已发行的纸币以外，再发行一种新纸币。直到5月初才得以在波希米亚组成一支新的军队。拿破仑因此有足够时间去击败俄国人和普鲁士人，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544

他以其一贯充沛的精力准备利用这个机会。1812 年 9 月 22 日，当他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已下令征召 1813 年适龄新兵入伍，从而把应征新兵的队伍从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七千人。他从西班牙召回一些部队，又把巴黎卫戍部队派到德意志去。1 月 11 日，他把 1812 年春天编制成军的第一次服役的十万国民自卫军改编加入现役军队；同时他征召 1814 年新兵入伍，应征新兵达到十五万人，还有从 1809 年到 1812 年应征入伍的十万士兵。4 月 3 日，他再多征召 1814 年入伍的九万人，和第一次服役的国民自卫军八万人。此外，仪仗队又重新建立起来，他打算从中抽调出一万骑兵。驻德意志各军都经整顿，从中抽调干部去训练图林根和来因河区域的新兵。拿破仑补充大炮、枪支、装备和车辆并没有遇到很多困难，但是补充马匹并非易事，以致他只能带几千骑兵上战场。财政问题使他大伤脑筋。戈丹编制的 1813 年预算是十亿多支出，而收入是九亿零六百万。皇帝捐出了他价值八千万的私人财宝；他把村社公产换成地租券，以出售地租券的收入作保证，发行了一亿三千一百万债券。他颁发了成百上千的特许证，并批准出口商自由进行转口输入，但需纳税百分之六，从而加强了封锁的财政性质。但是信用已经动摇，经济活动陷于瘫痪。金币都被收藏起来，它的价格也在高涨；殖民地产品的价格则在下降，因为人们认为解除封锁指日可待。5 月 20 日至 23 日，交易所发生一次恐慌的风潮。6 月间，国库的任务变得非常困难。

拿破仑认为，建立摄政制度，并由玛丽·路易丝担任摄政，既可巩固他的皇朝，也可讨好奥地利。他想同他在 1812 年夏天带到枫丹白露的教皇取得协议，借此试图同天主教徒言归于好。他亲自去同教皇商谈，在 1 月 25 日使教皇同意签订新的教务专约的初步条款，2 月 13 日他把这些条款作为国家法律予以公布。教职的任命应依照 1811 年全国主教会议的方案授权批准。但有几个红

衣主教提出异议，教皇在3月24日撤回他的意见。冲突重新展开，信守条约派为数激增对抗反对条约派。立法院在2日举行会议，一如往常噤若寒蝉。然而，全国的情绪已很明显，无可置疑。皇帝还从来不曾要求全国做出如此重大牺牲：1814年的适龄新兵已提前入伍，全部开赴战场；即使已经雇人顶替者这次也仍须应召入伍；已婚的男人也在招募从军之列。如果说法国人仍然忠实于拿破仑的话，他们追随他已全无热情，仿佛拿破仑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他们的战争。 545

拿破仑在4月15日离开巴黎，去到当时向萨勒河推进的美因河方面军，而欧仁则率其部分军队溯易北河而上。28日晚部队已经集中完毕，29日和30日，法军在默斯堡和魏森费耳斯渡过了萨勒河。法军在数量上占压倒的优势：十五万人对四万三千普军和五万八千俄军。但是，由于缺乏骑兵，法军既不能进行侦察，也无力追击；尤其是将领之中有几个是平庸之辈：贝特朗和劳里斯顿从未指挥过大军团。至于同盟军方面，最高统帅维特根施泰因的权力是有名无实的；27日同盟军仍然又分散兵力，各行其是，当维特根施泰因下令在来比锡以南集中，准备在萨勒河入易北河河口处攻击法军时，他自己率军开往维滕堡，而布吕歇尔则开往穆尔德河前沿，米洛拉多维奇和托尔马索夫则停留在后面。29日，沙皇听托尔的建议，采取了另一个方案：在山脚下等待拿破仑，而如果拿破仑向来比锡进军，则从侧面攻击法军。

拿破仑这次的战斗方案是他自认为平生最完美的战斗方案之一。实际上，他直趋来比锡从两翼包抄敌军，机智地布置各军团按梯队推进，如遇敌军攻击，可以相互支援；一旦拿下来比锡，全军集中转而南下，把敌军逼向波希米亚，聚而歼之。5月2日，他指挥攻打来比锡，但同时内伊军团放松警惕，在卢岑前面遇袭，遭到布吕歇尔狠狠的攻击。马尔蒙对内伊的支援很不得力。皇帝急驰赴

援，稳定了战局以等待贝特朗进攻同盟军左翼，而尤其在等欧仁截断敌军向东去的退路。但是贝特朗和欧仁都未能及时赶到，而且都只率其部分军队前来。维特根施泰因因此得以脱身而向易北河撤退，所损失的兵员比较法军的损失要少得多，他损失约一万二千人，而法军则损失了两万到两万二千人。拿破仑一举歼敌的方案落了空。但至少萨克森国王乘此再度易帜，他献出了托尔高并把军队交给拿破仑。

546

当俄国人退向斯普里河时，普鲁士人在内伊追击之下向北逃退，最后决定同俄军会师，只留下比洛一军掩护柏林。拿破仑已得到维克托和塞巴斯蒂亚尼两军的增援，就展开了战斗，5 月 20 日渡过了斯普里河攻下包岑，以吸引住敌军而给内伊足够时间从北驰来，从侧面和背面夹击敌军。21 日发动了总攻击，但是内伊又一次来得太迟，指挥失误而缩小了他的包抄行动。同盟军又一次得以逃脱，他们退到西里西亚，沿着群山一直退过魏斯特里茨河，放弃了布莱斯劳。同盟军的物资装备很差，而拿破仑虽然损失不小，但仍保有数量上的优势。普鲁士的后备军需要过相当时间才能投入战斗，而奥地利军队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同盟军唯恐如果他们撤退得离开奥地利边界太远，梅特涅就不能坚守中立，因此他们冒很大危险停留在巨人峰与奥得河之间。因此，对拿破仑而言，这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但是他放弃了这个机会而提议签订停战协定。

拿破仑不知道敌人是如此虚弱，而奥地利又是如此准备不足。萨克森人已经向他揭露了梅特涅的意图，布勃纳在 5 月 11 日到来，向拿破仑确切明言他的上司提出的条件，并提议在布拉格举行会谈；拿破仑同意开会，没有提出任何条件。但是拿破仑感到不安，因为与此同时他曾试探同亚历山大谈判，而毫无成果。因此，他怀疑同盟军异乎寻常的撤退可能是他们同梅特涅配合搞的圈套。现在他估量自己就目前而言还不能同时抵抗三大强国。他的军队

的状况并不是很好。军队的给养跟不上;由于新兵占的比重过大,有些团队显然很容易溃散,这些新兵经不住连续急行军。军队中患病者达三万人之多,号称有四万七千人的第三军团在4月25日只剩下了两万四千人。武器的补充日见稀少。停战可以获得增援,尤其是骑兵的增援;事实上,停战后军队人数增加了一倍。当然,停战对敌人也是有利的;但是拿破仑相信,即使人数相等,他也能打败敌人。此外,无疑地他对制止奥地利参战,和通过谈判把俄国拉过来,都尚未感到绝望。简言之,他在5月25日派科兰古去同盟军谈判。科兰古对他们谈话的提法使他们感到惊讶:"你们知道吗？停战是完全对我们有利的。……如果你们有把握奥地利将和你们一致行动,你们就根本不必想和我们讲和。"同盟军只愿意停战一个月,而只是听取梅特涅的意见以后,才同意停战到7月20日,这个期限是梅特涅所需要的。6月4日,停战协定在普列斯维茨签字。 547

三、秋季战役

从外交上看,停战协定的后果对拿破仑不利。英国的全权代表们不久以前才到达賴亨巴赫会见同盟各国的君主;6月14日,他们同普鲁士国王签订了条约,15日,同沙皇签订了条约。这些条约是按照卡斯尔雷规定的条件签订的:恢复和扩大汉诺威、重建普鲁士、不得单独媾和;交换条件是英国提供二百万英镑的补助金,其中三分之一给普鲁士,其余都给俄国,并且由同盟各国发行五百万英镑的公债,由英国承担半数的担保。此后,普鲁士人和俄国人不得在沒有英国参与下对法国谈判,而英国对法国所要提出的条件尚有待阐明。卡斯尔雷的思想深处是要把法国的一切敌人联结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集团,这个想法只是到1814年才最终实 548

现。现在他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但还有待于争取奥地利。

在这段时间里，梅特涅已经把奥国皇帝带到吉茨钦，6 月 3 日，涅谢尔罗杰在该地会见了奥国君臣。弗兰茨仍然反对参加对法作战；不过他应允先就和约条件取得协议，并签订一项同盟条约，一旦他的调停失败立即生效。梅特涅亲自去到賴亨巴赫。普鲁士人和俄国人承诺同意奥地利照会拿破仑的各项条件：瓜分华沙大公国、放弃伊利里亚和汉撒各郡、重建普鲁士；他们只增添了一个条件：立即从普鲁士各要塞撤退。在梅特涅方面，他答应支持解散来因邦联，并认可如果英国一旦参与讨论，还可以提出其他要求。6 月 27 日，大陆三强在賴亨巴赫签订了同盟条约；但此约只有在拿破仑拒绝奥地利的调停以后才能生效。在拿破仑拒绝的情况下，普、俄两国的最高要求就将也变成奥国的要求：奥国将重新恢复它 1805 年的疆界，并要求法国放弃全部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

梅特涅的立场依然如故：一方面，他对沙皇所抱的疑虑不安并未稍减；另一方面，他越来越不相信可能同拿破仑达成协议。26 日，梅特涅应拿破仑之召前往德累斯顿。两人会见时发生激烈的争论。拿破仑提出把伊利里亚给奥地利，以换取奥地利维持中立，梅特涅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奥地利是在强制执行调停，如果调停被拒绝，奥地利将参加同盟军。30 日，当梅特涅即将离开德累斯顿时，拿破仑改变了态度：他接受奥地利的调停和举行和会，停战协定延期到 8 月 10 日。拿破仑只想争取时间，直到 7 月 22 日才给科兰古发出训令，指示科兰古要求恢复战前状态，并拒绝授予科兰古全权，而他本人又不在场，却到美因兹去看望玛丽·路易丝，直到 8 月 5 日才回来。当 7 月 28 日科兰古终于在布拉格出现的时候，同盟各国的全权代表拒绝举行任何全体会议，而让科兰古去见梅特涅。他对梅特涅还是同在普列斯维茨时唱的同一调子："只要告诉

我，你们是否有那么多的军队足以使我们终于清醒过来？……我同你一样也是欧洲人，一点也不差……无论是通过和平或通过战争，把我们引回法国去吧。”这些激励的话是多余的，梅特涅已经拿定了主意：他要求法国无条件地接受一些初步条款。8 月 5 日，拿破仑只好让步而要求关于初步条款的正式照会。9 日，在早晨三点钟的时候，他接到了初步条款；但是他的答复直到 13 日才送到：他放弃除但泽以外的华沙大公国，并接受恢复普鲁士（条件是普鲁士让给萨克森五十万居民作为补偿）；他也放弃伊利里亚，但是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的利亚两地不包括在内。如果拿破仑毫无保留地做出让步，那么，一切势将重新从头做起，因为在 7 月 5 日，卡斯尔雷为威灵顿在维多利亚大胜所激励表示赞成俄国人和普鲁士人的最高要求，把西西里保留给费迪南，并把他已经答应给贝尔纳多特的利益规定下来。但是，从 8 月 10 日午夜起，梅特涅已经宣告和会结束。12 日，他对法宣战。9 月 9 日，大陆三强的同盟在特普利茨肯定下来；10 月 9 日英国给奥地利五十万英镑而和奥地利联结在一起。 549

从军事上看，停战协定对所有交战国都很有利。普鲁士后备军的一部分现在开赴前线，这次普鲁士总共可以出动十六万人，俄国总共达十八万四千人，奥地利也有十二万七千人。自从丹麦再度宣告站到法国一边以后，贝尔纳多特对拿破仑已经毫无指望，他带来了二万三千瑞典军队。此外，沃尔莫顿统率了九千英德联军，梅克伦堡提供了六千士兵。面对着同盟军这五十一万二千人，拿破仑可以出动四十四万二千人，还未计入易北河上各要塞驻军二万六千人；但是，在第二线上，同盟各国所能动员的后备兵源远远超过法国。无论如何，拿破仑现在拥有的骑兵已经达到四万人。

7 月 12 日，同盟军在特拉申贝克制订了作战计划，亚历山大邀请贝尔纳多特来到特拉申贝克。问题首先是要攻入拿破仑的后

方萨克森，由贝尔纳多特和布吕歇尔从北面，施瓦岑贝格从南面进军。布吕歇尔宁愿单独行动，最后取得协议编成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都有普、俄两国军队参加，以此鼓舞贝尔纳多特和施瓦岑贝格，同时也是为了监视他们。波希米亚方面军由十二万七千奥军，外加八万二千俄军和四万五千普军组成，他们从 8 月 11 日就越过了边界。西里西亚方面军由布吕歇尔任统帅，包括六万六千俄军和三万八千普军。北路军由贝尔纳多特任统帅，由七万三千普军，二万九千俄军和二万三千瑞典军组成。波希米亚方面军应从易北河左岸向德累斯顿推进；贝尔纳多特则守卫柏林，向维滕堡进军；布吕歇尔根据法军动向而赴援波希米亚方面军或北路军。此外，根据贝尔纳多特的坚决主张而做出决定：必须有计划地回避法国皇帝，而只同他的将校交锋。这种战略丝毫没有拿破仑式战略的意味，其所以采用是由于奥、普两国人都想自保疆土，但也由于这位伟大统帅的威名引起他们的恐怖。同盟军不追寻决定性的交战，而是重新拾起十八世纪的传统做法，即用威胁交通线和一点一滴地消耗敌人使之筋疲力尽等手段，迫使敌人败退。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办法居然取得成效。尽管许多军事学家赞赏拿破仑在此次战役几个不同阶段过程中表现的天才和毅力，我们应该承认，他对整体的作战概念不似过去惯有的那样完美无缺；或许是因他遭遇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

550

法国皇帝此时所处的局势同 1796 年 8 月的局势极为相象，当时他的事业刚刚开始，这种形势曾使他赢得最出色的胜利之一。因此，人们原可期望他用几乎全部兵力猛攻敌方的北路军，从马格德堡出发的吉拉尔将军可以从侧面进攻，达武以及丹麦军可以从汉堡出发攻击它，那么，可以肯定北路军将被击溃而柏林必被占领。布吕歇尔同施瓦岑贝格则可能会师，但这对全局的影响不大。可是他们必将拿下德累斯顿，而拿破仑要照顾萨克森国王，这是他不

能容忍的。此外，他把达武留在汉堡，法军已再度进入汉堡，这又占用了他四万人。他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分兵驻守一些要塞，从而使他自己减少了活动回旋的余地，这是他打败仗的初步的原因。事实上，此次战役中两处敌军之间的距离，较之1796年要多出两、三倍之远，而拿破仑此次所指挥的队伍远比1796年为多，但战斗力则较差。拿破仑本来可以从俄罗斯战役开始阶段所发生的情况总结出：一次大规模的攻势必将使他的部队筋疲力竭，劳而无功。最后，无可置疑的是，他对敌方北路军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他相信乌迪诺拥有七万大军足以对付北路军，甚至可以攻占柏林。至于他本人，他摆下的阵势是既可以逸待劳，又可随时出击敌军中最大胆冒进的方面军。由于他不知道敌军在波希米亚的集结，他对施瓦岑贝格毫无戒备，并假设施瓦岑贝格若要赴援布吕歇尔，必取道出卢萨斯山口，因此他派两个军团监视此路，同时以另外四个军团据守博伯尔河方面；他本人则指挥近卫军和骑兵以为后备部队，驻守包岑地区。但乌迪诺军相距过远，以致既不能互为声援，又不能召之即至。这样一来，拿破仑违背了自己的常规，大大地破坏了统一行动的原则。此外，敌方波希米亚方面大军的组成，并从易北河以西出击法军，使拿破仑的兵力布局全盘失效。 551

有如既往，猛将布吕歇尔总是首先发动攻势；拿破仑立即驰击，令他惊讶的是敌军仓卒后撤。8月23日，在他还未能迫使布吕歇尔交锋之前，他忽然得悉施瓦岑贝格已经在德累斯顿郊区击退了古维翁-圣西尔。他毫不迟延地甩开布吕歇尔，火速赴援德累斯顿；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布吕歇尔不敢进犯，他还留下七万五千人给麦克唐纳，这样就过度地削弱了他的机动主攻部队。起初他设想经皮尔纳推进，以便从背面进攻施瓦岑贝格，这样必然是有决定意义的。但是，德累斯顿行将不守！因此，在皮尔纳一线，他只派遣旺达姆一军。8月26日清晨三点钟，屏障德累斯顿

城的各方形堡实际上刚刚被敌军攻占，年青的近卫军及时赶到制止了敌人。27 日，波希米亚方面军的两翼都被包抄，中军也几乎被突破，死伤一万人，被俘一万五千人，溃不成军，分成几队败退。倾盆大雨使法军不能扩大战果，乘胜追击很不得力，加之拿破仑突患感冒，随即折回德累斯顿。旺达姆率军猛向特普利茨推进，以求切断敌方退路，在库尔姆忽然发现已被围，终于带七千人，四十八门大炮投降。这次非常的失败挫伤了法军最近获得胜仗的士气。

然而祸不单行。为自己后方提心吊胆的贝尔纳多特，完全不想冒险作战，唯恐打了败仗动摇他在瑞典的威望，因此他不发动进攻；此外他或许并不认真想对本国同胞作战，他指望一旦拿破仑垮台，他们将会同意他回国即位称君。然而，8 月 23 日乌迪诺已经 552 在格罗斯贝朗向比洛发动了进攻，贝尔纳多特不得不支援他的部将。萨克森士兵纷纷开小差，被阻击的乌迪诺退过了易北河。在麦克唐纳军那一方面，8 月 26日他在卡茨巴克河上展开了攻势，但是他发觉自己的左翼和中路都遭到布吕歇尔的攻击，他被布吕歇尔击退，撤到博伯尔河上。他属下的一个师被切断而遭歼灭，他总共丧失了两万人和一百门大炮。拿破仑派遣内伊去打贝尔纳多特，他本人飞驰前往攻打布吕歇尔，不料布吕歇尔望风而退。施瓦岑贝格乘此再度威胁德累斯顿，而拿破仑回兵救城，又一次见奥地利军避而不战，自行引去。在此期间，内伊已渡过易北河，9 月 6 日在登内维茨展开战斗，损失一万五千人。贝尔纳多特向南推进极为缓慢而且绕着走，然而他的骑兵也深入到威斯特法利亚，30日占领了卡塞尔。

形势变得严重起来。法国军队减员的速度令人震惊。主要的原因不是历次战斗中的伤亡，而是这些连续不停的和不断加速的来回调动的行军，同时也是饥饿造成的，因为士兵每天只得到半磅面包，再也得不到肉类。病员达到九万人之多，第三军团在 8 月15

日还有三万八千人，到10月1日减到一万七千人。敌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却逐渐显得可怕。拿破仑尽最后一次努力，也未能追上布吕歇尔，于是他放弃了卢萨斯，撤退过易北河。但是，同盟军重新执行最初的作战计划，由贝尔纳多特从北面，施瓦岑贝格从南面，分头向来比锡进击。10月4日，贝尔纳多特越过易北河，击退了內伊；从9月26日起，施瓦岑贝格扑向克姆尼兹，缪拉受命前往阻击。在同盟军审慎地向前推进时，拿破仑在两天里行军八十公里，猛扑向布吕歇尔，布吕歇尔也是刚刚在瓦腾堡渡过易北河的。但是，拿破仑又一次扑了个空：布吕歇尔已经向西逃走，正同贝尔纳多特一样，逃到萨勒河对岸而得到掩护。法国皇帝一度想亲自渡过易北河右岸，彻底改动作战基地；但当他弄清布吕歇尔的动向时，他决定转向来比锡进军，因为缪拉在来比锡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拿破仑既不下决心撤出德累斯顿，仍留古维翁据守该城，又不下决心召达武前来。这样，他在来比锡周围只集结了十六万人，而围攻他的同盟军则有三十二万人。

然而这些同盟军的分布彼此相距很远。布吕歇尔向北移动，但贝尔纳多特到18日才赶到。施瓦岑贝格本人骑马行进在埃尔斯特河与普莱泽河之间，处在极其暴露的地位：如果法军在14日能够集中起来，第二天就可以歼灭施瓦岑贝格。但是法军未能如此迅速集中，16日早晨仍在等待麦克唐纳，而布吕歇尔以其一惯的猛冲猛打迫使马尔蒙北撤的时候，內伊还不能下决心派出拿破仑所要求的几师人。清晨战斗在来比锡城南的瓦绍高地打响。施瓦岑贝格首先发动进攻，他受到猛烈反击，意识到形势危险，便调上后备部队；而拿破仑此时仍在等待增援部队到来才下令发动决定性的进攻，但增援部队不见到来。麦克唐纳终于出现，然而为时过晚；他未能包抄敌军，这一天战斗结束时双方对峙不下，不分胜负。拿破仑仍然可以杀出一条退路，这是他避免灾祸的一个最后机会。 553

但是他宁可顶住同盟军的总攻；10 月 18 日，他的部队被击退进来比锡城内；贝尔纳多特军从东北方涌入，而萨克森军阵前倒戈加速了法军的失败。法军在撤退时只有通过兰德瑙桥，19 日，敌军再度进攻，法军炸毁了这座桥，从而牺牲了后卫部队。法军总共损失六万人，其中二万三千被俘；同盟军伤亡六万人。

巴伐利亚在 9 月 17 日与同盟军签订停战协定后，10 月 8 日签订雷德条约加入到同盟军方面；23 日，符腾堡也同样倒向同盟军。但是当拿破仑经埃尔富特和富耳达撤退时，符雷德亲王分兵攻占维尔茨堡，以致贻误军机，直到 10 月 30 日，始在哈瑙拦截拿破仑。符雷德在哈瑙打得不好，被拿破仑冲了过去。法国大军的残部从 11 月 2 日到 4 日，在美因兹渡过来因河。大军中流行斑疹伤寒；还有十二万人被围困在德意志各要塞中，不能起作用。

在此期间，奥地利人已经占领了伊利里亚，并且由于巴伐利亚倒戈，正从德拉瓦河和提罗耳向前推进；受到奥军威胁的欧仁已经沿阿迪杰河撤退。11 月 15 日，欧仁在卡尔迪埃罗打了一场胜仗，但是并不能扭转战局。敌军占领了罗马涅和马尔凯。缪拉在埃尔富特和拿破仑分手，回到那不勒斯后即与梅特涅恢复谈判。

至于西班牙，也不复为法国所有。在 1813 年春季，起义在比斯开省和纳瓦拉省取得进展，使克洛泽尔的部队不能脱身。约瑟夫麾下只有七万五千人，而又分散在从马德里到萨拉曼卡之间。5 月 15 日，威灵顿指挥七万人发动进攻，以其右翼在萨拉曼卡省击退法军，同时以其左翼渡过杜罗河，援助加利西亚省的西班牙人而迂回包抄了法军。约瑟夫撤出马德里，集中兵力于卡里昂河之后，继之又撤退直到埃布罗河。威灵顿这次进军指挥得当，以致不经战斗便扫清了比斯开湾沿岸的法军，并得力于巡逻沿海的英国舰队的配合，确保了更加靠近法国的一个作战基地。6 月 21 日，威灵顿指挥八万人攻击列阵于维多利亚城前、萨多河后的五万五千法

554

军，打得法军全线溃败。战败的法军撤退过比达索亚河，富瓦和克洛泽尔成功地到这里来同他们会师。絮歇孤军奋战，还能抵挡住西班牙人；在维多利亚战役之后，他被迫撤退到埃布罗河下游。萨拉戈萨陷入敌手，从西西里来的本廷克攻击托尔托萨和塔拉戈纳。絮歇被迫穿过卡塔卢尼亚省撤退，一直退到菲盖拉斯。

大帝国就此完结了，而法国又象1793年一样，面临着外敌入侵。

四、法兰西战役与拿破仑退位

从瑞士到北海，法国边界上只有不到六万兵力的单薄防线，而到达来因河上的同盟军有十四万人，他们可以几乎不经战斗而长 555 驱直入巴黎；相反地，如果他们在冬季屯兵不进，拿破仑就将重建一支军队，从而彻底改变力量的对比。这正是亚历山大和布吕歇尔的意见；另外一些人则对1792年的往事心有余悸，深恐激起法国人全民抵抗，因此认为除非兵力十分雄厚，否则不要打进法国。他们主张陈兵边境，火速调集增援部队并等待贝尔纳多特前来，到了春季再行进军。此时贝尔纳多特并未如英国人所吁求的西进荷兰，却挥师北上进占荷尔斯泰因，1814年1月14日，他在该地迫使丹麦将挪威割让给他。加之同盟军经费严重不足，同盟各国君主无不感到缺乏金钱，因为直到此时为止，英国人运送了充足的武器和军服，但是现款则一文不给；只要英国对德意志的贸易一天沒有恢复，英国人就担心付出现款会削弱英镑的地位。在赖亨巴赫所同意发行的公债似已不可能；还在夏季的时候，德·伊韦尔努瓦曾研究发行一种同盟各国通用的纸币，但沒有实现，因为一方面他反对施泰因建议的强制流通，另一方面，英国人拒绝全部担保。英国人如果担保，这种新纸币就等于银行票据，它势必流回英国，从

而损害了英国人的货币。到9月20日，英国终于同意交付给同盟各国一些债券，利息为百分之六；德意志各银行很勉强地才肯贴现这些债券。对于何时进军法国，施瓦岑贝格在11月7日至8日举行的同盟军作战会议上，提出通过一项折衷的期限：不规定发动进攻的日期，但决定必须尽快开始进攻。这样势必要发动冬季战役。对拿破仑而言，这是致命的打击。

然而，在发动攻势之前，梅特涅要求再一次举行和谈。10月17日，拿破仑在来比锡已经和刚被他俘虏的默费尔特将军会谈，并有意地释放他回去。拿破仑当时表示：如果能使英国归还法国各殖民地并恢复海洋自由，他愿意放弃华沙大公国、德意志、荷兰、西班牙，也许甚至可以放弃意大利；显而易见，他仍然希望分化瓦解同盟各国，而特别是要把奥地利再拉过来。在埃尔富特，梅特涅亲自同法国驻魏玛公使圣埃尼昂晤谈；11月9日，俄国人和普鲁士人很勉强地同意了派遣圣埃尼昂回国，转达以自然疆界为基础的和平条件。此外，俄、普两国人也表示愿向英国要求做出一些让步和保证，因为他们也不是心甘情愿容忍英国在海上称霸的。

556 梅特涅的和平倡议究竟有多大程度是出自真诚的，对这个问题总是众说纷纭，即使梅特涅本人或许也难道其详。他同他的盟国的关系相处不好，而他知道这些国家不能没有他的合作，因此他公然执行他个人的政策，其主要目标即恢复哈布斯堡皇朝的威势。在德意志，他结好南部各邦的王侯，从而阻拦了革命派爱国者的得势，10月21日，他把施泰因担任主席的治理占领地区委员会置于同盟军总部创立的外交委员会之下。他施展伎俩使自己成为意大利的主人；在秋季战役的过程中，他不间歇地同卡罗利娜·波拿巴谈判，到12月10日他使盟国同意派遣奈珀克到缪拉那里去。显而易见的是他要把欧仁赶出意大利，而实际上，梅特涅的意图还要与那不勒斯协同剥夺罗马教皇。同样地，他想渗进瑞士，在瑞士扶

植反革命力量，并树立奥地利的势力，这样就可以让他从北边去接近意大利，同时可以威胁里昂，从而把意大利同法国隔开。最后，梅特涅比往常更加想要遏制俄国对波兰和土耳其的野心。他同亚历山大的决斗开始了。沙皇已经同普鲁士达成交易，把萨克森给普鲁士，萨克森国王已经成为同盟军的俘虏，而沙皇则保有华沙大公国；沙皇捍卫意大利各邦君主，并在拉阿尔普的怂恿下，以瑞士人的保护者自居。沙皇为了报私怨而决心要拿破仑退位，他梦想以贝尔纳多特接替拿破仑，因为此人已经在他的庇荫之下。梅特涅不难洞烛其奸，与之针锋相对，踌躇满志地考虑到要保全法国皇帝，或者至少也要保全他的皇朝，由玛丽·路易丝摄政必然把法国同奥地利联系在一起。至于拿破仑是否肯以自然疆界为满足，梅特涅并不相信他能就范；但是这个建议是及时而可取的：它至少可以在法国人面前揭露拿破仑。

拿破仑在11月15日接见了圣埃尼昂；第二天他委派科兰古去谈判；但是，对于同盟国所规定的条件，他保持缄默。这个消息一传开，舆情大哗，群起反对拿破仑，并反对马雷，因为马雷迎合其主上本能的冲动，直到最后仍主张作战到底。或许为了要平息舆论，或许更是为了要争取时间，皇帝似乎要改弦更张了：他撤换了马雷，而任命科兰古接任外交大臣，12月2日，新任大臣接受了从法兰克福提出的和议初步条款。 557

但是为时已经过晚。11月16日，勒布伦已经撤出了阿姆斯特丹；17日，海牙暴发了起义，由奥根多尔建立的三头统治的首要任务是向伦敦求援，并召回奥伦治亲王，亲王立即奔返荷兰。12月4日，同盟各国考虑到拿破仑的缄默，就散发了一个公告，其中把拿破仑同法国区别对待，它们又一次向法国提出和平建议，这次不再提到自然疆界，这个疆界已经在荷兰被突破。不出梅特涅所料，许多法国人认为他们的皇上不能辞其咎。即使和平建议没有让法

国民族付出任何代价，但它确认皇帝个人被打败，拿破仑也不愿接受这项和平建议。然而也必须承认：即使拿破仑接受了这项建议，又有谁能担保实现它？梅特涅这次和平建议较之以往历次建议更不可靠。大陆上各盟国既已同英国有约在先，不得撇开英国单独媾和，而现在英国已经公然表示反对。8 月间英国派遣到梅特涅处的年青的阿伯丁，相当随和地听从梅特涅的决策；但是从 9 月18 日起，卡斯尔雷援引皮特的意图，曾要求给荷兰在靠近法国一边有一个适当的屏障，因此当奥伦治亲王提出要占有比利时的时候，卡斯尔雷表示赞同。因为英国想保有好几处荷兰殖民地，在赞助恢复低地国家的统一时，英国想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卡斯尔雷还想把来因河左岸一部分土地给荷兰，11 月 5 日，他拒绝法国保留这部分领土。然而，我们可以想象的是：此时在奥地利主持下进行谈判，法兰西民族能够保住共和国时期对外征服的某一部分领土。

同盟国的进攻一度因涉及瑞士的冲突而推迟。由于亚历山大的坚请，弗兰茨在 12 月 11 日撤回了他已经下达的侵入瑞士的命令。然而梅特涅试图劝说瑞士各州自动吁请盟军入境，也未能成功；但是他的代理人之一，前任萨克森大臣桑夫特促使瑞士将军瓦特维尔发布一些措辞含混的公告，并在伯尔尼挑动起一次贵族的

558 反革命。梅特涅在施瓦岑贝格的赞同下，就以此为借口重申前议，12 月 16 日，施瓦岑贝格受命率军进入瑞士。21 日，他的部队从沙夫豪森到克尔之间越过了来因河并开进了巴塞尔。布勃纳率军直趋日内瓦以进攻里昂，而同时施瓦岑贝格向贝藏松、第戎和郎格勒等地推进。29 日，瑞士宣布废除“调停条例”。1 月初，布吕歇尔也从科布伦茨到曼海姆之间渡过了来因河，深入洛林，并经巴勒杜克包抄阿尔贡纳。在侵入者进攻的面前，法国的元帅们向马恩河撤退。到 1 月底，施瓦岑贝格正向特鲁瓦推进，而布吕歇尔打到圣

迪济埃。在这期间，科兰古已经启程，6日在吕内维尔曾致函梅特涅，对一个月以来毫无信息深表惊讶。他得到的答复是：大家在等候卡斯尔雷。1月18日，卡斯尔雷到达巴塞尔；这是一桩关系重大的事件。

在1813年，英国在大陆上所起的作用仍然还是很有限的，它只有在西班牙派有相当数量的军队，并且也没有运送过硬币。直到秋季为止，英国国内仍然困难重重。但是法国从德意志和荷兰撤退，以及1813年的大丰收，使英国处境发生令人震惊的改变。封锁正在解除，中欧重新对殖民地产品和英国制成品开放，这些货物就大量涌入中欧。物价坚挺，指数跃升，1811年为158，1813年升为185，1814年升为198。商业中激发起投机的热狂，工商业的复苏消灭了失业并稳定了工资。1814年英国的出口总额达到七千多万镑，大大超过1802年的六千零二十万镑，而1802年是历史上空前的繁荣的一年，与此同时，恢复谷物进口和丰收使面包价格下降到1808年的价格，从而使平民各阶级平静下来。英国安定下来以后，从此便可考虑在财政上做出新的努力。范西塔特使议会通过增加税收，并在1813年举债一亿零五百万镑；这年的支出是这个时期最多的一年，达到一亿七千七百万镑；补助金从三百万镑跃进到八百多万镑，在国外的支付提高到二千六百万镑以上；而国债也达到八亿三千四百万镑。唯一的困难在于兑换率仍然很低：1813年，西班牙的皮亚斯特升值百分之三十八；为了供应威灵顿，英格兰银行不得不从它的库存中抽出一百四十万镑的黄金。又一次地由罗思柴尔德家族出面救助：内森在荷兰，詹姆士在巴黎，还有他们在法兰克福的弟兄们无不尽量地支出法国货币；得力于他们提供了法国货币，威灵顿在进入法国时能付现款采购；在1814年，英国所承诺付给同盟各国的补助金也是由这个家族充当中间人付款；因此在1817年奥地利皇帝封法兰克福的罗思柴尔德为贵族。 559

从此以后，英国虽然武装部队不多，却能把它的意志强加于人，发言振振有词。

在卡斯尔雷看来，此时是大好时机。虽然大陆各盟国也曾答应若无英国参加不与法国议和，然而它们在布拉格和法兰克福竟把英国撇在一边而进行谈判，而且看来是不把英国的殖民地和海上的要求放在眼里。梅特涅同缪拉谈判，不大考虑国王费迪南。英国外交官中的多数不太能干，他们在远离本国时，不能随着朝夕万变的战场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给他们的训令。英国政府认为卡斯尔雷必须亲自到现场去。他亲自起草了他 12 月 26 日的训令：英国主张对法和约必须由盟国共同一致签订，交换条件是英国在 1814 年提供五百万镑的补助金；英国认为对海洋自由沒有讨论的余地，至于英国在战爭期间所占领的殖民地的归还问题，应视各盟国如何解决荷兰问题而定；西班牙和葡萄牙应该复辟，而那不勒斯的费迪南应该得到补偿。关于大陆上其余问题，训令上一字不提，以致卡斯尔雷可以有便宜行事的全权：这样他就能在大陆各盟国之间以调停者的姿态出现，从而贯彻英国外交部的，实际上也即是皮特的传统政策。卡斯尔雷所赖以博得荣誉的事业终于开始。一旦到达巴塞尔，他立即设立一个阻拦法国的屏障：提出荷兰应在欧洲的保证下占有比利时，而普鲁士则分得马斯河与摩泽尔河之间的土地，这样一来就使得普鲁士在将来不可能同法国达成任何妥协交易。然而，在这个时候卡斯尔雷还应允，如果军事进展形势有此必要的话，法国的边界可以推进到特里尔。

1 月 24 日，卡斯尔雷在奥地利人的陪伴下来到朗格勒与俄国人会晤。他立即在亚历山大同梅特涅之间以居间调停自任。大家一致认为拿破仑的失败已成定局。沙皇拒绝再同拿破仑谈判，并主张废黜拿破仑而代之以贝尔纳多特；梅特涅则愿在塞纳河上的夏提荣举行他曾答应科兰古召开的会议，同意同拿破仑谈判，并且

无论如何不同意要贝尔纳多特，而宁愿要一个摄政统治。对于此时是否仍宜同拿破仑谈判的问题，英国政府内部有不同意见；虽然卡斯尔雷对此没有明确表态，他是知道英国摄政王和公共舆论越来越更加敌视这个"科西嘉人"的；他反对贝尔纳多特，作为交换条件，他说服梅特涅放弃摄政统治的方案，他深信这样一来波旁王室的复辟成为势所必然。这样他就迫使沙皇同意召开会议，这次会议推迟到2月5日才召开，为的是等待决定性的战斗见个分晓。最后，卡斯尔雷要求同盟各国就和约条件取得一致看法，1月29日，他使大家同意把法国拉回到1792年的边界之内。解决这点以后，外交家们出发到夏提荣。在此时刻，法兰西战役适才开始。 560

这一次，拿破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源再能仓促建成一支新军队。士兵根本不感缺乏。从1813年10月9日起，他要求从1808年到1814年适龄入伍者之中征集十二万人，8月24日他已经从这些年的适龄入伍者征集了三万人补充驻西班牙的军队。这次征兵似乎没有感到困难；但是他还要征集1815年适龄入伍者，即要征十六万人，而这次大举征兵是在他从德意志返国时才着手进行的，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11月15日，他再从1803年到1814年适龄入伍者中征集十五万人；如果东部边界被突破则最后再增加十五万人，20日，他把其中四万人补充到1808年到1814年适龄入伍者的部队里；12月17日，他把各要塞的国民自卫军编入现役，1814年1月8日，把巴黎的国民自卫军编入现役。接着他又决定建立志愿兵联队，大量吸收巴黎失业者参军；他甚至谈论到要发动全民总动员。到1月底，十二万五千人左右已经集合在新兵训练站里，但是未经任何训练，加之其中多数人既无军服，甚至也无武器，因为仓库和军械库已经一干二净。有如1793年，又实行征发武器、马匹、饲料和谷物，但并未很严格执行。尤其感到缺乏的是钱。在11月和在1月，拿破仑曾下令大量增税，但是什

么时候才能征收到手呢？间接税的收入正在变得几乎微不足道。国库再也拿不出钱来。在来比锡战役以后，政府债券从七十四法郎跌到五十二法郎；硬币都被收藏起来，纸币则倒流回法兰西银行。薪给和养老金超过两千法郎以上者被削减四分之一；政府开始用还本金库的债券支付供应商，这种债券不过是一种期票，正如大革命时期的指券一样。一旦退回到法国原有疆界以内，帝国最后也和督政府一样不得人心；这是很自然的事：既不再能迫使外国人出钱打仗，帝国只能向法国人索取作战的财源。

561

法国人对此大有反感，头一次表示了抗拒。帝国的贵族和拿破仑恩宠提拔的大量显贵现在都认为他的失败不可避免，从而都想巴结他的后任，不管这个后任是何许人，以便分沾政治权力，而这种权力是拿破仑拒绝分给他们的。当 12 月 19 日立法院开会时，竟敢要求皇帝把同盟军提出的条件通知该院，皇帝作出了让步。莱内以委员会的名义宣称：法国只是为了捍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才继续打下去；同时，他请求皇上保证臣民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12 月 29 日，立法院通过了这个委员会的要求，以此之故，皇帝立即下令该院延会。在雾月时拿破仑同资产阶级缔结的公约至此终告撕毁。

至于人民，他们认为在两支庞大军队一支接着一支折损殆尽以后，皇帝竟想再建立第三支，这是难以容忍的。在几个月的期间里，拿破仑日益变得不得人心。全国渴望和平，但很快地深信：不给国家和平的正是皇帝。同盟军的公告，再经王党分子传播解说，收到了离间皇帝和人民的效果。以为象征旧制度的波旁王朝要比拿破仑好一些，法国人民并未作如是想；但是法国人已经感到厌倦和气馁，他们开始消极抵抗皇帝——这是皇帝留给他们唯一权利。自 1812 年以来，拒服兵役者为数日增，到这时已不可胜数；人们拒纳租税，不服从征发命令。居民眼看外敌入侵，无所作为，至少在

同盟军能够约束其士兵时确是如此；而在南方，英国人所受到的对待相当不坏，因为英国人购买时有钱付现。

在正常的时候，帝国行政当局不难惩办不法分子。但迅雷闪电般的外敌入侵使行政当局不容有足够的时间采取行动，而更坏的是这次入侵还使行政当局陷于瘫痪。那些归附拿破仑政权的旧官吏意识到自己现在令出难行，无能为力，并且预见到皇帝行将垮台，便为一己的前程设想，而同王党分子暗中来往，或者甚至里通外敌。拿破仑仿效往日救国委员会的办法，派出特派专员到各郡去，试图以此"重新发动机器"；但是和当年议会特使的成就相比，这些特派专员的微不足道的行动尤其表明公共精神的败落。王党分子促成了政权的全部解体；有如在共和国时期一样，祖国的不幸给他们带来希望，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帮助"我们的好朋友敌人"。他们通过讲话和散发传单散播绝望情绪，并鼓动不服从政府法令。西部再度动乱起来。在弗兰德，弗吕沙尔把逃避兵役者武装起来配合协助敌军入侵；同盟军到处都可找到向导、侦探和卖国贼。到12月3日，塞伊伯爵到了弗赖堡，他以弗朗歇-孔泰省王党的名义，把他的故乡献给奥地利。3月12日，波尔多市长以其城市投降英国人，英人携昂古莱姆公爵随军入城。拿破仑也时时谈到，他又重新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战士，并重新燃起民族热情，但这不过是徒托空言。试问怎样能够将1793年的回忆同他从事建立起的贵族君主政体二者协调起来？他一手造成的贵族紧迫地提醒他关心保卫社会秩序，并警告他要提防"卑贱的民众"。仅有香宾出现过一次全民抗敌，当时在战斗最激烈时，外国士兵干出了骇人听闻的暴行。但是这种全民抗敌既没有充分时间发展起来，又没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加以组织领导。 562

1月25日，拿破仑离开巴黎时，把妻子和儿子托付给辅政约瑟夫照料，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此时拿破仑所掌握的兵力

不过六万人左右，而这些人甚至也还没有集中起来。他急驰迎击普鲁士军，估计在圣迪济埃可以两军相遇，因为布吕歇尔已经到达奥布河上，正在行军想和施瓦岑贝格会师。皇帝紧追布吕歇尔，29日在布里埃纳打败了他，然未能阻止普、奥两军会师。2月1日，拿破仑在拉·罗特埃尔被比他多三倍人数的敌军战败后，后撤到特鲁瓦，继之再撤到塞纳河上的诺让。战斗取胜似已无望；如果他想保全皇位，只有不讲条件接受谈判，别无他途可循。在2月4日至5日的夜间，他授权科兰古全权便宜行事。7日，科兰古在夏提荣接到同盟军的条件，规定法国回到1792年的疆界；科兰古表示抗议，指出这违反从法兰克福提出的和谈初步条件，然而他并不抱有任何幻想。科兰古一向是主张和平的人，目前又是这样不寻常地拥有议和全权，因此这是他千载一时的可以决定国家命运的机会。但是他不敢当机立断，并非由于怕被斥为卖国贼，而是由于为人平庸；他仍请示他的皇上决定。在2月7日至8日的夜间，经过几小时痛苦地反复思考，拿破仑终于决定让步。但是，一到早晨他又变了卦，因为他刚察觉出同盟军在军事上犯了错误；整个战局有转机，希望又来了。

同盟军为了满足布吕歇尔，也为了便利行军和供应，事实上再563 度分兵进军。布吕歇尔听任施瓦岑贝格沿塞纳河而下，他自己却在2月2日率所属各师取道塞赞纳和小莫兰河河谷，以一列纵队成梯形推进。他打算切断麦克唐纳的退路，此时麦克唐纳在约克进逼下沿马恩河后撤，他已成功地到达乌尔克河。就在这个时候，拿破仑急驰前往猛扑敌军。2月10日，在尚波贝尔，拿破仑击溃了奥尔苏费耶夫统率的俄军，把敌军切成两段。他立即移师蒙米赖，11日在该地完全击溃萨肯兵团，其残部投奔在蒂埃里堡前的约克。12日，约克军又被法军攻击突破，仓促后退渡过马恩河；同时拿破仑迂回进军指向布吕歇尔，此时布吕歇尔正在沃尚进逼马尔

蒙。布吕歇尔14日遭到袭击后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又被打散，总共损失约一万人。拿破仑这几天的胜利是辉煌的；但是这次胜利并没有摧毁敌军，敌军几师人正向夏龙集结。另一方面，施瓦岑贝格的部队越过了塞纳河，把维克托和乌迪诺赶到耶雷河，麦克唐纳率部队到这里同他们汇合，再退到荣纳河和洛恩河而抵达蒙塔尔纪和枫丹白露。

拿破仑在从沃尚向蒙特罗行进时，本来可以实现他的作战计划中的得意杰作之一，但是他的兵力不足。他向耶雷河前进，把敌军推向塞纳河外，而在18日经过苦战克复蒙特罗。施瓦岑贝格有足够时间重新集结他的部下并退向特鲁瓦；虽然布吕歇尔已经退回到奥布河上，施瓦岑贝格仍取道肖蒙和朗格勒继续后撤。

这些败仗打乱了同盟各国的步调。2月17日，奥地利人出面提出签订停战协定，24日，又重申此议。拿破仑在22日给他的岳父的信中，和在派弗拉奥前往吕西尼谈判时发出的训令中，都宣称他只有在法兰克福提出的议和条款的基础上才进行谈判，他不能使法国比他上台时变得更小。此外，卡斯尔雷已抗议奥地利人不应单独提出停战谈判。虽然施瓦岑贝格已派出五万人增援布勃纳，布勃纳敌不过奥热罗，但是贝尔纳多特正在率部前来，同盟军终将取得胜利已无庸置疑。比洛和温青格罗德两军已进入香宾，同时朗热隆和圣普里厄斯特从德意志带来两个兵团的生力军。2月24日，布吕歇尔又向前推进，这次的目标是大莫兰河谷。卡斯尔雷不但不感到绝望，相反地还在催促盟国讨论最后的决策。2月15日，同盟军已经商定：如果拿破仑在巴黎陷落以前不肯议和，则盟国可能不得不考虑首都终将表示的“愿望”，从而拒绝再以拿破仑为谈判对手。26日在肖蒙，盟军决定最后一次把条件交给科兰古，并规定了3月10日为最后期限。3月9日，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期限行将到期的时刻，卡斯尔雷办到了使同盟四强签订为期二 564

十年共同对付法国的公约。为了保证它们自己负责建立起的新欧洲秩序受到尊重，四国约定在必要时各自提供十五万兵员。至此卡斯尔雷终于使欧洲反革命二十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同盟变成现实，而只有到这个时候，卡斯尔雷才肯付出他答应在1814年提供的五百万镑。3月10日，未能劝说拿破仑让步的科兰古请求同盟军宽延答复的最后期限到3月15日，他提出一份反建议，其中要求法国仍保持欧仁统治意大利，萨克森仍归其国王，在重新改组欧洲的国际会议上法国将有其发言表决权。夏提荣的谈判到19日终于完全破裂。此时从巴黎来的维特罗尔男爵已经受到盟军的接见；盟军并批准他去探看阿图瓦伯爵，他到南锡会见了后者。在此期间，在法国被占领地区，王党分子的阴谋活动得到盟军或多或少公开的鼓励。3月22日，英国政府最后决定不再以拿破仑为谈判对手。

这场戏此时已近尾声。2月28日，拿破仑再度冲出追击布吕歇尔，布吕歇尔正在进逼马尔蒙和莫蒂埃，直到3月1日他被阻于乌尔克河。布吕歇尔发觉有腹背受敌的威胁，便移师北上，想同正在攻打苏瓦松的比洛和温青格罗德会合。如果不是苏瓦松这个要塞在3日突然投降盟军，布吕歇尔势将全军覆灭，现在反而得以渡过埃纳河在拉昂城周围集结整顿他的全部军队，同时法军则不得不在贝里-奥-坝找寻一个渡口。拿破仑在克拉纳击退布吕歇尔的一次进攻以后，分兵两股向现已集结有十万敌人的拉昂进军。9日，拿破仑在拉昂城南被打退；驻扎在城东的马尔蒙夜间遭到袭击而溃败。10日，拿破仑也受到进攻，退向苏瓦松，从苏瓦松他掉师直趋兰斯击溃了圣普里厄斯特的军团。虽然打了这场胜仗，拿破仑的作战方案仍然是失败了；因为这时施瓦岑贝格的面前只有麦克唐纳和乌迪诺两军，他乘此时机慢慢地收复了一切失地。从17日到19日，拿破仑放弃正面攻击布吕歇尔，而从兰斯急行军到梅

565

里，这次想从侧翼攻击布吕歇尔；布吕歇尔又一次拔脚就跑，而且跑得更快。19日，他到达塞纳河与奥布河中间地带。

在这关键时刻，拿破仑并不放弃战斗，而是放弃阻止同盟军进攻巴黎。他决定进军洛林，以便集合洛林各地驻军，并在切断敌军交通线后，再回师巴黎城下进攻包围巴黎的敌军。但是施瓦岑贝格突然决心行动起来，20日和21日，当拿破仑渡过了奥布河来到阿尔西时攻打了他；加之布吕歇尔也取道夏龙前来。拿破仑经过一番苦战才摆脱他们，然后撤入圣迪济埃。施瓦岑贝格和布吕歇尔再度会师后，终于决定沿大小莫兰河谷齐头并进攻取巴黎。莫蒂埃和马尔蒙的部队都在25日在费尔-香班努瓦斯被打垮，一直撤退到巴黎城郊，而在29日皇后玛丽·路易丝已弃城出走。30日，莫蒂埃和马尔蒙两军残部又受到攻击，慢慢地被逼退，到了晚上他们投降了。惊惶不定的拿破仑急奔回来，31日到达枫丹白露，他还不承认被打败，而仍部署准备再战。但是，他已经被出卖和被抛弃了。

3月31日，同盟国发出宣言，劝导巴黎人选择适合法国的政府，并举出波尔多为榜样，波尔多曾经欢迎昂古莱姆公爵。巴黎的王党分子欢呼敌军入城，并戴起白色帽徽。其实这种人只是一小撮。31日晚，同盟各国君主在塔列朗家里确定决不再同拿破仑进行谈判，并要求元老院建立一个临时政府。塔列朗当然成为这个临时政府的头子。巴黎市委员会和政府各院立即呼吁召回波旁王室。4月2日，元老院决议废黜皇帝；3日，立法院同意并以两院联名宣布废黜皇帝。元老院议员接着仓促拼凑出一部宪法，其中他们最关切的是规定元老院继续存在，并维持他们自己的薪给待遇原封不动；然后，到6日他们召唤路易十八归国即位。在这期间，元帅们在枫丹白露拒绝再追随他们的皇上作战，并劝谏皇帝让位给太子。4月4日，拿破仑让步并派遣科兰古、内伊和麦克唐纳三

人去见沙皇；他们在途中遇到从埃松纳撤退下来的马尔蒙，便邀马尔蒙同去巴黎。亚历山大迟迟不答。但是在施瓦岑贝格的劝诱下，马尔蒙答应背叛拿破仑；虽然他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却在4日至5日的夜间下令他的部队调向敌方，从而暴露了枫丹白露。这时起沙皇要求拿破仑直截了当地退位；6日，拿破仑最后屈从表示同意退位。

566

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战争仍然在继续进行。1月间，缪拉扯下了假面具，已进占罗马，继之占领托斯卡纳，并侵入罗马涅。然而他又犹豫起来，因为他被英国本廷克的行为所激怒：本廷克同他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本廷克只是迫于卡斯尔雷之命才同意签订的，因而佯作疏忽，仍派兵登陆里窝那，意图进攻热那亚。欧仁还能在明乔河上拦击奥将贝勒加德，并且还指望为他自己保住意大利王国，所以同缪拉进行谈判，但他们未能达成协议，4月13日，缪拉向塔罗河发动攻势；米兰爆发了起义。16日，欧仁签订了一个协定，规定允许他撤出意大利。在比利牛斯山方面，苏尔特想解救潘普洛纳和圣塞瓦斯提安两地都未成功以后，步步后撤，1813年10月，比达索亚河一线失守，11月，尼维尔又失守，12月尼夫河一线又不守。他于是撤退到波城的急流险滩后面，这样就让威灵顿长驱直入波尔多。2月底，苏尔特虽在奥尔泰兹一战失利，但整个3月份他仍转战塔布城周围，然后撤退到图卢兹，4月10日，他最后在图卢兹被打败。

4月11日签订的枫丹白露条约决定了拿破仑的命运。他本人获得厄尔巴岛和一笔年金，玛丽·路易丝和他的儿子得到巴马，他的家属都得到年俸。20日，他和他的部队告别；他曾毫不怜惜地带领他们作战，然而却只有他们对他忠心耿耿直到最后。

第二章　复辟与“百日”

567

各国君主取得胜利便集会于维也纳，按照他们的心意重新组织欧洲。在法国，路易十八确认了1789年的原则和拿破仑的各项制度；但是为时不久那些感到失望的贵族便纷纷提出异议，从而动摇了他的政府。这正是拿破仑所指望的。他不甘心于受命运的摆布，又担心他的处境会变得更坏，因此他决心最后一次碰碰运气。他的卷土重来给法国带来新的灾难，并导致他自己终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

一、维也纳公会与反革命的胜利

同盟军既成了法国的主宰，便着手把他们的条件强加给波旁王室。4月20日，刚被元老院指定为辅政的阿图瓦伯爵签订了停战协定，交出仍被法军据守着的一切要塞，连同全部装备和仓库。5月30日，和约在巴黎签字。除了蒙贝利亚尔和牟罗兹而外，塔列朗还为法国力争保全了尚贝里与安纳西，以及他本人拥有一些私人利益的部分萨尔地区。同盟军没有勒索任何战争赔款，甚至也没有要求归还拿破仑从被征服国度掠夺来的艺术品。既然同盟军已决定把法国退回到“1792年的边界”，而这边界并不把殖民地列入其中，英国便自行夺到多巴哥岛和圣卢西亚岛、法兰西岛、罗德里格岛和塞舌尔群岛；西班牙重占圣多明各岛其原占部分。在即将召开的维也纳公会上，同盟国对法国所夺取的领土无论如何处置，法国事先承诺一概接受。 568

这次会议是欧洲史上还不曾举行过的重大会议，引起各方面都寄予很大希望。但首先是那些旧日的“正统的”当局寄予很大希望。在被剥夺王权的君主中，几个最重要的已经重登宝座。从1813年12月11日起，拿破仑本人已经根据瓦朗塞条约释放了费迪南七世，又在1814年1月把罗马教皇送回本国；黑森选侯、撒丁国王、摩德纳公爵和托斯卡纳公爵都已重返其首都；英国国王重新领有已被升格为王国的汉诺威。但是那些拿破仑的同盟者，是否要把拿破仑所给他们的都一并交出来？问题特别多的是德意志；帝国骑士和教会王侯纷纷保卫他们的权利。德意志人民奋起作战是为了争取独立，而不是为了恢复旧制度，况且还曾得到享有自由的许诺，因此人民同样感到惶惑不安。德意志爱国者主张统一，但是他们并不能确切知道应该怎样统一；而从这年年初起，戈雷斯在他主办的《来因报道》上发动了一个强大的运动，反对王侯们的自我中心。意大利人欣喜的是赶走了法国人，忧惧的是奥地利人卷土重来。另一方面，法国所解放了的资产阶级和农民都不愿再度沦入从属地位。1815年5月22日，在发动反对拿破仑新战役的前夕，普鲁士国王亲自允诺颁布宪法。但是，一方面有像巴德尔这样的崇古派，他们对君主们施加压力，主张新的政治秩序应当建立在宗教原则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有像圣西门和奥古斯特·蒂埃里这样的维新派，他们要求最后应组织起“欧洲社会”。所有的人一致瞩望于这次会议的是建立和平，如果不能有永久和平，至少要有一个长期的和平。

卡斯尔雷、梅特涅和普鲁士人都未能高瞻远瞩。至于沙皇，虽然他乐于倾听容-施蒂林和克吕德内夫人的预言（这些预言是通过皇后的一个嫔妇传给他的），却照常玩弄神秘主义伎俩以实现他的野心。他不久以后就对塔列朗说：“欧洲的传统礼仪就是欧洲的法律。”在“四强”的心目中，这次会议的任务应只限于批准它们作

出的决定；而其中的英国仍以调停者自居，邀请同盟各国到伦敦去解决分歧，作出决定。亚历山大在伦敦摆出了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姿态，他奉承恭维辉格党人从而激怒了托利党人，并冒犯了英国摄政王。在伦敦的会谈沒有达成协议就散了，9月间在维也纳也沒有获得较多的成果。维也纳公会因而迟迟未能举行，虽然塔列朗在西班牙的支持下，能够使各国同意确定11月1日为公会开幕的日期，从而为他个人赢得一个为外交界赞赏的胜利；但是这次公会从来沒有名副其实地开过大会，一切都在委员会里进行，重大的问题都由"四强"决定。主要的分歧一直是涉及华沙大公国和萨克森，俄国想占有大公国并要把萨克森转交给普鲁士。梅特涅一直在反对；而英国政府则对此漠不关心。英国政府所关心的只是坚持避免讨论一切有关海洋自由的问题，并保留处理殖民地问题的权利：它把马耳他岛和赫尔果兰岛据为己有，又从荷兰人手里夺到开普、新加坡、圭亚那的一部分。英国政府也使会议通过谴责贩卖奴隶，但是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不肯合作，沒有能够立即加以取缔，关于欧洲大陆上的事务，英国政府授权卡斯尔雷相机行事。

然而卡斯尔雷认为他的国家不能对大陆事务袖手旁观：在所有的英国政治家中，他是前所未有的最具有欧洲头脑的一位政治家。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包围法国，因此他主张扩大荷兰，把普鲁士安置在来因河上，并让奥地利留在意大利；但是他同时也认为绝不能允许沙皇夺到大陆的霸权。他认为主要是使普、奥两国亲近和解以加强德意志，这样才能既反对法国又反对俄国。起初卡斯尔雷似已成功在望，梅特涅同意把萨克森给普鲁士人，如果他们不再追随亚历山大的话。但是弗里德里希-威廉深受这位朋友的责备，便不承认他的大臣们同梅特涅谈判的结果。形势显得如此严重，以至在1815年1月3日卡斯尔雷愿意负责同梅特涅和塔列朗签订一个同盟条约。塔列朗自夸立了大功，他写道："反法同盟已

569

告解体”，而确有许多人相信了他这句话。诚然，塔列朗表现出非常机智灵活；可是，他所卖弄的领土公正处理和“正统主义”等原则所发生的实际效果，并不如传闻之甚。沒有任何人想给他任何东西，并且，如果他在捍卫正统主义，人人都知道他这是为了讨好路易十八，因为路易十八想把他的王室中人重新扶上那不勒斯和巴马的宝座。塔列朗曾同卡斯尔雷和梅特涅通谋，促使他们抛弃缪拉，这倒是实有其事。此外，同盟各国丝毫无意使同盟破裂。卡斯尔雷准备作出一些让步，并且很快地就说服亚历山大取得协议：普鲁士人只能得到三分之一的萨克森，把托伦和波森还给了普鲁士人；至于从荷兰方面，普鲁士人也只获得欧庞和马尔梅迪。普鲁士人接受了来因区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也提不出更好的地方。这样一来，卡斯尔雷也跟在拿破仑的后边促进了德意志的统一。塔列朗反对把萨克森国王移至来因河上，卡斯尔雷同意了塔列朗这个看法，从而有效地为来因河的普鲁士化铺平了道路。处理完德意志问题以后，卡斯尔雷便离开了维也纳。拿破仑的卷土重来并沒有打断维也纳公会各委员会的工作，6 月 9 日签署了最后议定书。

这个最后议定书曾被视为一项杰作。然而，对东方的问题仍然留有列强角逐的余地，因此，势必还将导向战争。在 1813 年 7 月至 10 月间，土耳其人乘有利时机重新占据了塞尔维亚，继之在 1814 年 11 月塞尔维亚又爆发了一次起义，结果把土耳其人围困在一些要塞里。于是沙皇声称，根据布加勒斯特条约，塞尔维亚人应享有自治权；此外，土耳其苏丹一直对沙皇在高加索的征服地持异议。完全可以预见，迟早有一天亚历山大会要求占有君士坦丁堡，作为他自以为对欧洲所做贡献的报酬。因此之故，梅特涅曾建议马赫穆德请求欧洲各大国保证其领土。但是俄国人表示反对，而英国人置未来于不顾，也拒绝参与保证。

此外，旧制度的外交官对他们自己的成就感到得意，这也是很

自然的事，因为他们根据他们最珍爱的均势原则，彼此分割了领土和"臣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维也纳公会的工作是与欧洲新潮流背道而驰的，因为它根本不考虑法国革命战争所唤醒的民族意识。卡斯尔雷对辉格党人的抗议充耳不闻，在这一点上正和梅特涅同样盲目。把伦巴第人和威尼斯人送给了奥地利，不顾比利时人的反对硬使他们臣服于荷兰人，波兰又一次被肢解，甚至德意志人也被凑集在一个陷于瘫痪，而又被普、奥两国拉锯争夺的邦联之内，这些被牺牲的民族显然不会忍耐很久必将重申他们的权利。

政治的、行政的和社会的反动也随之而至。1814 年 5 月，费迪南七世尚未进入马德里之前，就已废除了 1812 年的宪法；西西里的费迪南也继起效尤。罗马教皇和意大利各王公，从中部到北部德意志各邦的君主纷纷动手摧毁拿破仑的政绩；普鲁士国王则中止了容克地主所深恶痛绝的土地改革。梅特涅自认确有把握使南部德意志也重新回到健全的教义之上。就这一方面而言，卡斯尔雷和托利党人也同梅特涅深抱同感：自由是英国贵族才能独享的特权，而大陆上的愚民未可作此非分之想。然而他们不需很多时间即将察觉出，随着拿破仑军队传播开的法国大革命精神并没有随着他的失败而消亡。甚至就在此时，欧洲贵族满腔怒火地看到大革命的精神在欧洲仍有其一席之地。好几个篡权夺位者仍然安居宝座之上，欧洲贵族把这视为一个标志。缪拉诚然已成众矢之的，因为他顽固地坚持要占据马尔凯而与梅特涅有隙，1815 年 1 月，梅特涅暗地抛弃缪拉给卡斯尔雷和塔列朗处理。但是贝尔纳多特仍然君临瑞典，并且在 1814 年 8 月得到英国协助，迫使挪威人选举的国王、丹麦的克里斯蒂安把挪威王位让给他。"波拿巴"本人仍在统治着厄尔巴岛，而他的"小杂种"(威灵顿这样叫他)有朝一日将成为巴马公爵。反动派认为尤其严重得多的是：在尼德兰、来因地区、德意志南部、瑞士，不得不全部或部分地保持法国的

571

新事物。为了迫使奥伦治王室的威廉应付好比利时人，卡斯尔雷认为必须强使威廉颁布一部宪法。沙皇也曾答应给波兰人一部宪法。在法国，历尽困难始得复辟的正统国王，远不能恢复绝对王权及其种种特权，他也得委曲求全，保留大革命和帝国的成就，并且不得不与资产阶级共同统治这个国家。

拿破仑的迅雷闪电式的卷土重来又一次证实了这个相当收敛的复辟王朝是多么脆弱不稳。

二、法国第一次复辟与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卷土重来

路易十八在1814年4月24日到达加来。元老院通过宪法代表全国召唤他回国登基，然而要指望他接受这个宪法殆无可能。572 5月2日，他在圣多昂发布一项宣言，其中只把这个宪法看成是一个草案；他准备保存这个宪法的一些主要规定，诸如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国有产业的出售、维持帝国各项制度、立宪制政府的原则等等；但是人民主权从公法中勾销掉了，代之以国王"将钦赐"的一个"宪章"。这个"宪章"由一个委员会从5月22日至27日起草完成。政治组织是从英国人那里搬过来的。国王通过各负专责的大臣行使行政权；国王独有提出立法之权；贵族院和众议院通过租税和法律，贵族院议员由国王任命，并有可能世袭席位；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有财产资格的限制，缴纳三百法郎直接税者始有选举权，缴纳一千法郎直接税者有被选举权。但是目前暂时由帝国的立法院改为众议院；帝国的新贵族也成为贵族院的多数——八十四名元老院议员和若干元帅。6月4日，宪章在两院中宣读。

大资产阶级相当满意地接受这个宪章，因为一方面它阻拦了反革命，而另一方面又剥夺了普通人民的一切政治影响。但是，问

题仍然在于要看路易十八是否把政府交给显贵们，也即是否像英国国王一样，按照议会多数的愿望选用大臣。可是路易十八全然无意效法英王，他只不过把旧制度下的“高级国务会议”和“争议处理会议”加以改头换面，而他的大臣只不过是些高级雇员，他们同国王个别联系，彼此并不构成一个政见一致集体负责的内阁。资产阶级深感失望。更糟的是：路易十八对政务不感兴趣，而外国的一些大使，尤以威灵顿和波佐・迪・博尔戈为最甚，则插手法国政务。这个政权实际上无政府可言，从而遭到削弱。

全国的群众处于漠不关心的状态，在群众眼里，波旁王朝已经一文不值，同盟军和亡命者也惊讶地确认这种情况。路易十八回国一事并沒有征询人民的意见，人民所以容忍他，只因为在他们心目中，他是外国人强加给法国的，以此作为实现和平与从法国领土撤军的条件。对于这次和平，人民当然毫不感谢路易十八；不但不感谢，相反地，他的白色旗在人民看来是国耻的标志。宪章上沒有丝毫可以引起人民热情的规定；只要不恢复种种特权，也不再征收什一税和各种封建租税，群众对这个政权也就听之任之。

然而这恰恰是旧贵族和僧侣所不愿容忍的，特别是僧侣，既然已使宪章宣告罗马正教为国教，他们认为不应使其沦为一纸具文。所有这伙人都把宪章视为一种过渡性的让步，而阿图瓦伯爵也抱有同样看法。路易十八不得不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对于贵族，他把他们安置在宫廷中，在皇室禁卫军中、在政府部门和在军队中充任高官显职，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军官则只发半薪而予以遣散，阿图瓦伯爵曾答应取消的“综合消费税”，却又借口财政困难而继续征课。僧侣则获得国王颁发敕令严格规定必须遵守礼拜日的习俗、免除教会学校一切租税并不受政府任何管辖、取消政府任命的教育总长。政府不能拒绝做出某些象征性的姿态：给基贝隆半岛 573

登陆死亡的王党分子树立纪念碑,[①] 追封卡杜达尔为贵族;政府因而就有更多的理由纵容贵族的叫嚣和僧侣的说教谴责。很快地全体法国人都认识到,除非全盘恢复旧制度,否则无法满足他们。人民从缄默容忍变成愤慨。至于士兵,复辟政权完全不能指望他们。

不久即有种种秘密策划在暗地进行。富歇深信欧洲是不会容忍拿破仑回来的,因此倾向迎立奥尔良公爵,或者争取奥地利支持拥戴玛丽·路易丝为摄政。相反地,马雷则致力于拥戴拿破仑,并在 1815 年 2 月派遣弗勒里·德·夏布隆去向拿破仑汇报国内情况。一些将军准备发动兵变; 3 月 5 日,拉勒芒和德鲁埃·戴尔隆即试图在北部发动一次兵变。他们失败了;但就在这个时刻,消息传来:"他"回来了!

拿破仑从来不肯听天由命,何况他有充分理由表示抱怨。有关当局拒绝把他的儿子给他;而玛丽·路易丝则已以奈珀克为其情夫。路易十八拒绝如约付给他年金。或许他已获悉,在维也纳正在议论把他放逐到圣赫勒拿岛。2 月 26 日,即在夏布隆离开厄尔巴岛之后两天,拿破仑登舟返回法国。此行结果只为他招致新的不幸。

3 月 1 日,拿破仑一帆风顺到达儒昂湾。从儒昂湾出发,他向格勒诺布尔进发,拉贝杜瓦耶上校在该地迎候他,并将要塞交出。10 日,里昂工人热烈欢迎他胜利归来。曾经夸下海口要生擒拿破仑的内伊也于 14 日在隆勒索尼埃宣布起义,并在奥塞尔与他汇合向巴黎进军。直到此时仍很自信的路易十八受到这个打击后,自知大势已去,乃于 19 日到 20 日的夜间,仓惶出走里尔,继之逃往根特。3 月 20 日,拿破仑回到杜伊勒里宫。带着三色旗的雄鹰才

574

---

① 基贝隆半岛在法国西部莫尔比昂郡,1795 年 6 月 7 日,亡命的王党分子在英国支持下在基贝隆登陆,被青年革命将领奥什指挥的共和国军队一网打尽。——译者

又从一个钟楼飞到另一个钟楼，一直飞到巴黎圣母院的塔楼上。

三、"百日"

拿破仑没有遇到任何认真的抵抗。波旁公爵和昂古莱姆公爵夫人妄图拉走一部分军队，都失败了。昂古莱姆公爵从朗格多克推进到德龙河，但很快就被包围，他乘船逃往西班牙。拿破仑的归来虽然没有遇到直言不讳的敌人，然而他发觉法国有了很大变化；在"百日"期间，法国政治生活显得生气勃勃，这使得他感到为难、不安。 575

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在光天化日下公然再度表达出来，并且恢复了革命传统。在他飞驰的归途中，拿破仑不惜诉诸大革命的精神，他猛烈地攻击那些企图恢复旧制度的贵族和僧侣。路经奥顿时，他就曾使用革命期间的语言喊出："我要把他们吊死在路灯上！"事实上当时是有一个汹涌澎湃的人民运动确实在反对贵族和僧侣们。另一方面，雅各宾派的资产阶级纷纷也重建起结盟军，4月底布列塔尼的结盟军已经组成，5月14日巴黎的也组成，而尤其在东部各地，在洛林和在斯特拉斯堡，在布尔戈尼厄和在多斐内，结盟军的组成获得很大成功。在这些组织中，令人回忆起救国委员会和共和二年的军队，大唱《马赛曲》和《出征歌》。行政当局对此感到惊慌不安，有意识地采取措施，务必使大革命精神的复活不致产生任何实际效果。拿破仑是同意的，他无意于重新发动大革命；绝对专制和世袭的君主政体既已失而复得，人民只应保持缄默，静候下达出征命令。

但是拿破仑对待自由主义者的态度，不敢象对待人民那样轻率专断。自从他到达里昂之时起，无疑地是出于拉贝杜瓦耶的忠告，他开始发出大量诺言，虽然或许他本人也并不重视这些诺言。

但是，在巴黎，报纸杂志、合法团体以及参政院本身都要求组织一个立宪制政府。拿破仑在论及路易十八时曾说："这个恶棍替我把法国惯坏了。" 其实路易十八是无能为力的，他绝不是心甘情愿，576 而是迫不得已地去迁就那些名流新贵，这些人物的势力部分地是帝国时期政策的产物。而拿破仑既不想依靠人民，也只得同路易十八一样迁就他们。为了不致食言，他仅允颁布一个《帝国宪法补充条例》，并由他亲自和邦雅曼·贡斯当共同起草。甚至在3月19日，贡斯当还在《辩论报》发表了一篇恶毒攻击拿破仑的文章，但是一经召见，他立即效忠皇帝。这个补充条例相当多地摹仿宪章，而且也同宪章一样是一个妥协性的文件。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没有能够争取到保持有财产资格的选举权：拿破仑恢复了普遍选举权和各级选民团；但是他对元老院中有一部分世袭贵族则作了让步，这是他在共和十二年宪法中所拒绝过的。《补充条例》的妥协结果没有使任何人感到满意。在《补充条例》付诸全民投票时，参加投票的人数很少；在选举议员时，半数以上的选民未参加投票。保留世袭贵族使爱国党人心灰意冷，使他们拥护拿破仑的积极精神消失殆尽。至于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他们也不信任拿破仑，很快地就重新攻击他。《补充条例》在一次"五月校场大会"①(实际上迟到6月1日才举行）上举行盛大仪式予以宣布以后，议员们就着手自行改为制宪议会，而从事修改这个条例。简而言之，拿破仑疏远了那些热诚拥护他的法国人，而并不能博得新贵名流的好感。

---

① 公元五世纪，法兰克人征服高卢后，每年三月举行法兰克武士的大会，称"三月校场"，自公元755年起改为每年五月举行，改称"五月校场"。在这些集会上举行军事检阅，或全体自由人向法兰克最高首领致敬献礼，并由首领召集武士议论军情，或召集僧侣解决纠纷，或商讨国家大政。自九世纪末年以后不再举行。

拿破仑恢复历史上这一古老集会形式，为的是激发人民的忠君情绪，表示问政于民的传统。——译者

自由主义的反对派使政府感到头疼。担任警务大臣的富歇各方敷衍，面面俱到，此外他还秘密地同梅特涅谈判。担任内务大臣的卡尔诺很少更换官员。特派专员的行动并不比1814年更为得力。路易十八所保留下来的帝国时期的出版检查制度，现在被废除了，王党分子趁机利用这一措施。他们利用经济上的危机、利用对征兵的恐惧和不可避免的战争而兴风作浪。在5月初，旺代郡又一次暴动起来，在布勒塔尼省又出现了舒安分子。叛乱分子攻占了布列绪尔和肖列，拿破仑不得不派出由拉马格统帅的西路军。叛乱很快地被镇压下去。6月20日，旺代的头子们在莱热附近被击溃，25日求和。然而这些叛乱分子牵制住了三万人的兵力，因而给同盟军在最后关头帮了大忙，如果拉马格的军队投入滑铁卢战场，则同盟军或将必败。

不论历史学家对当时各种政见感到多大的兴趣，在这三个月期间里，法国人首先关注的还是外敌的威胁。拿破仑在向巴黎进军的路途上，他曾保证说他是在同奥地利一致行动；但是很难相信他会抱有这样的幻想。在他重登皇位时，他向同盟各国提出过和谈建议，并曾向它们派出一些使节。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早在3月13日，同盟各国在维也纳已经宣布拿破仑为法外之人；25日，在肖蒙签订的同盟条约得到确认。在这场大决战中，各国君王和贵族又一次自命是在捍卫各族人民的独立，甚至是在捍卫被一个暴君奴役的法兰西民族的自由。事实上他们自己何尝不深知问题并不在此，现在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要一劳永逸地扑灭法国大革命，要彻底打垮在他们眼里成为体现大革命的这个人。波佐·迪·博尔戈写道："拿破仑正高举着大革命的火炬向巴黎挺进。跟随着他的是人民的渣滓，还有军队……外国列强必须趁早在罪恶萌芽时加以彻底扑灭，否则它将又一次动摇社会秩序的一切基础……这是热中抢劫和暴行以破坏财产权和法律。"欧洲正以铺天盖

577

地之势来压倒法国，总共已出动七、八十万大军，还有雄厚的后备兵源，以及英国所拥有的一切资源。

复辟王朝留下的军队约有十六万人，还有十万人或经准假，或擅离职守而回到家里；拿破仑号召他们全部归队，并把他在1813年10月9日已征召入伍的1815年适龄新兵同这十万人混合编制起来。拿破仑又号召志愿从军，召回已被复辟王朝遣散的军官，并保持他所建立的国民近卫军的组织，派其中一部分加入现役驻守各要塞，或组成后备师。总共他集合起七十万人。不幸的是武器、装备和马匹均感不足，而钱更缺。最糟糕的是国民精神状态，虽然比之1814年已稍振作，但仍然不是热情很高：新兵不是迅速去报到，而且远不是全部都去报到。拿破仑如果对各地结盟军表示支持，或许尚可重新燃起公共舆论的热情；但是他既屏弃革命的热忱和救国委员会的范例，便不敢重新实行普遍征兵，也不敢实行混合编制，如果能把国民近卫军混合编入正规军队，他就不难带领至少二十万大军去比利时。然而，我们应该承认，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把一切安排得更妥善些，因为军情紧迫，必须抢在同盟军调动好以前，迅速出击并收复来因河战线。

拿破仑最后这支军队已同大革命的传统决裂：它是由饱经训练的军人组成，而且其中大多数都曾上过火线。它比1813年的军队更为可靠而有战斗力，何况配备的炮兵和骑兵也好得多；但是，从数量上看是太少了些。除了国民近卫军和分散在各地国境线上的兵力以外，北路军总共才有十二万六千人：六个军团、近卫军和四团骑兵。参谋部和最高司令部的人选都不是第一流的，而在林尼之战前夕，布尔蒙竟投了敌。至于皇帝本人，尽管有不同的说法，无论如何，看起来他的健康、精力和信心都大不如前。

578

从法国已撤出的军队中，有两支仍然驻扎在比利时。一支是由英国人、汉诺威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所组成的，共有九万六千

人，而威灵顿奉命前来担任指挥；另一支是布吕歇尔统率的十二万四千普鲁士军队。因此，敌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他们仍然过于分散，可望对他们来个突然袭击，或至少可以各个击破，这是拿破仑唯一可以打出的牌。但是，打一次胜仗，即使取得压倒的胜利，其实也还不能决定全局。

从6月6日起，拿破仑开始把部队从里尔调动到梅斯，以便在桑布尔河以南集中；并于15日大举进攻沙勒罗瓦，插进两支敌军中间。但是他的军令没有被准确执行，林尼和四臂村都未能攻克。拿破仑本人也听任敌军败退撤走，16日整个上午毫无进展。实际情况是：布吕歇尔和格奈森诺已重新集结了八万四千人，决心冒险一战；而威灵顿，直到12日还在按兵不动，在15日仍然在等待法军从蒙斯方向来进攻，突然迅速地向东调动以便攻击法军的侧翼。最后，到16日中午过后，拿破仑发觉普鲁士人集重兵于林尼；他决定打，命令内伊和德鲁埃从四臂村迂回到普军的右方。但是拿破仑已经把洛博兵团留在沙勒罗瓦，洛博到晚间才赶来，以致拿破仑手下只有六万八千人。内伊受到威灵顿不断加强的兵力的攻击，无法脱身。拿破仑的命令也未能顺利传达下去，以致德鲁埃在两个战场之间来回移动，对哪个战场也帮不了忙。布吕歇尔的军队被从中间突破，被迫撤退，但未被歼灭。拿破仑得了感冒而离开了战场，法军也未乘胜直追，直到17日上午将过的时候，格鲁希才领兵追赶败退的敌军，到了夜间终于发现，敌军并不是退向那慕尔，而是向瓦弗前进。格鲁希此时不是渡过迪勒河去拦击普军，而是尾随普军追击，以致布吕歇尔得以不受阻拦地前进去增援威灵顿。 579

此时威灵顿已向北退走，并已在苏瓦尼森林的前面，在圣让山高地上构筑阵地，他共有六万七千人，阵地右边有乌古蒙庄园和圣拉埃农庄强固的屏障，阵地中心也隐蔽得很好。阵地的左翼比较暴露，但是他在这一边等待普鲁士援军的到来。在17日一整天，

拿破仑调动军队转而进攻威灵顿，他此时有七万四千人；18日由于大雨造成的困难，他等到将近中午时才发动攻势；其后果是到下午一点钟时，比洛就出现在法军的侧翼。正面进攻英军阵地是由内伊指挥的，他指挥得很不好，首先进攻英军右翼，在乌古蒙庄园前受阻攻不上去，于是转向中路进攻，直到下午三点半都被阻于圣拉埃农庄；继之，以密集纵队推进的步兵遭到扫射，经过激烈肉搏后被击败；骑兵也冲入英国人的方形阵地，但被英军击退；最后集结起来的步兵再度进攻而动摇了敌军的阵线。内伊请求出动近卫军给敌人最后的、致命的一击。但是拿破仑已不得不派出很大部分的近卫军去增援洛博，因为洛博被比洛不断增多的部队逼得逐步后撤，拿破仑只能派出五营老近卫军，英军方面抵挡这些老近卫军攻击的是英国的近卫军——威灵顿最后的后备队。就在这个时刻，齐坦到达法军的最右翼，于是英军转入反攻。拿破仑的部队阵脚大乱，溃不成军，惊慌逃窜，伤亡三万人，被俘七千五百人。格鲁希在瓦弗还能令敌军不敢轻视，甩脱敌人全师返还。法军残部到拉昂集中后退过塞纳河。

21日拿破仑回到巴黎，仍想重整旗鼓，继续抗敌。但是议院表示反对，次日他宣布退位。议院选一个以富歇为首的执政委员会，他决定拿破仑应于29日离开马尔梅松。议院宣称反对波旁王朝，6月30日威灵顿到达巴黎城郊，议院派出代表团去见威灵顿。当时普遍认为宜以奥尔良公爵取代路易十八，仍留在维也纳的塔列朗也附和此议。要使同盟各国都同意废君复辟，并非轻而易举；亚历山大始终强烈地反对他。但是亚历山大此时不在巴黎，拿破仑出乎意外的大败使威灵顿和路易十八得以控制解决方案。路易十八立即兼程回国，28日他在康布雷允诺宣布大赦。威灵顿答复议员代表说，改朝换代无异革命行为，而革命行为势必招致法国被580 肢解。在这个问题上议院和执政委员会发生分裂。7月3日，受

任为军队总司令的达武签署了巴黎投降书，并将军队撤退过卢瓦尔河。8日，路易十八再即王位。

此时拿破仑在7月3日到达罗什福尔。他曾要求派出帆舰，以便乘坐前往美国，执政委员会借口海上有英国巡逻舰，命令他登舰待命，事实上扣留他当作囚犯。14日，路易十八下令把他交给英国人。不过还没有做到这一步，9日拿破仑已开始同英国人谈判，要求把他带往美洲，或者到英国；15日，他登英舰"伯雷勒芬"号，把自己交到英国人手里。

英国政府、普鲁士人，甚至梅特涅都想割去法国几省之地。卡斯尔雷坚决反对这么干，他得到威灵顿和亚历山大的支持。最后，他终于使首相利物浦改变了主张，同时沙皇也说服了奥地利。因此，普鲁士人陷于孤立，不得不让步。9月26日提出的和约草案被塔列朗拒绝；但路易十八撤换了塔列朗，11月20日在第二次巴黎和约上签了字。这次和约从法国夺去菲利普维尔和马利恩堡、萨尔路易、朗道和萨尔等地，以及法国还保留的那部分萨伏衣；法国应付赔款七亿法郎，外加私人要求的赔偿二亿四千万法郎；同盟军将占领法国三至五年；此外，这一次法国还得交还从其他国家掠夺来的艺术品。同一天，同盟各国重新确定它们的同盟条约，并决定永远不许波拿巴家族重登法国皇位；卡斯尔雷又提出增加一项附文：同盟各国每隔一定期间应举行会议审查欧洲局势。从9月26日起，亚历山大已经同普、奥两国签订了一个神秘的公约——神圣同盟，要按基督教教义保障和平并确保欧洲大陆有良好的政府。

至于拿破仑，此时他正在驶向圣赫勒拿岛的途中，同盟各国决定把他囚禁在该岛上。他去到这个遥远的、偏僻的孤岛上，在赤道的烈日下，在辽阔的海洋中，如此悲剧式流放的结果，反而使他的一生更增添了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魅力，这种魅力将永远扣人心

弦，引起人们的遐想。它也有助于产生关于拿破仑的传说，这种传说使他在历史上所起过的作用走了样。他受到欧洲帝王们的迫害，因此他在法国人的眼里又成为这个革命民族的英雄。帝王们所以要囚禁他，不仅因为他个人的威名使他们心惊肉跳，而且是因为他们要打击报复这个竟敢娶一个公主的暴发户士兵。拿破仑本 581 人则在口述他的回忆录时，最后仍表现出天才横溢，不减当年，他把他的政策中的个人因素完全置诸脑后，而把自己单纯地视为解放人类和各民族的、武装起来的法国大革命的领袖，这场革命正是通过他的双手放下武器的。

1821 年 5 月 5 日，拿破仑闭目长眠了。

结 束 语

拿破仑创建新皇朝和世界帝国的大业，功败垂成，因而使诗人浮想联翩，视之为第二个因其大胆而遭天罚的普罗米修斯①——人的天才向命运之神奋战的象征。另一些人则与之相反，把拿破仑看成是历史决定论播弄的玩物，他们的理由是法国大革命必然导致独裁，而取得自然疆界又注定了法国永将征战不休。为了不陷入玄学的空论，历史学者倾向于同意诗人的看法。只要革命的敌人仍在勾结外国，要拯救革命就必须有一个无上威权的政府，而资产阶级要建立起这样的政府正需要拿破仑其人，这在历史学者看来是一个事实。法国合并比利时和来因河左岸势必遭受新的攻击，历史学者也应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可能的。但是，军事独裁本身并不意味着必须重建世袭君主政体，更无需另立新贵族阶层；捍卫自然疆界的最好办法也并不是要越过这些边界去向反法同盟各国挑衅。这些都是拿破仑个人的意图要这样干的；客观形势诚然有利于实现他的意图，然而这种个人意图却是发自他天性的最深处。此外尚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即谓拿破仑的个人意图乃是注定要失败的；为了教训那些妄图步恺撒后尘的人，为了整个人类的福利，也许最好能把这一论断看成是无可争辩的。然而我们却不敢苟同，因为在莫斯科，亚历山大的抵抗意志原有可能衰退；在卢岑，同盟军本来也有可能全军覆灭。现在可以肯定说的只是：拿破仑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类，从此人类进入文明；但因此激怒了"万神之神"宙斯，把普罗米修斯锁在悬崖上，令鹰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这个动人的神话两千多年来成为西方诗人咏歌，艺术家描绘的主题。——译者

所冒的风险太大，而在这些冒险行动中，法国丧失了大革命时期所征服到的全部领土。

虽然拿破仑的个人壮志未酬，他的所作所为却留下了深刻的584痕迹。在法国，革命后的新国家尚未定型，拿破仑给了它一整套行政机构，这显然是大师的杰作。1789年的革命已使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但是随后民主力量起而与之相争，①在皇帝的庇护下，新贵名流才得以保住政权，增殖其财富并扩大其势力；一旦摆脱了平民的威胁，他们就准备自己登台进行统治并恢复自由主义。在欧洲，法国思想的传播、英国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的壮大，都在导致同样的后果，拿破仑在摧毁欧洲旧制度并把现代社会秩序的各项原则传入欧洲时，大大加速了这个演进过程。文化的蓬勃发展、人民主权原则的宣布、浪漫主义的传播等等都预示了民族的觉醒，拿破仑所进行的领土调整和种种改革促进了这种觉醒。资本主义正在西欧生根发芽，大陆封锁保护了资本主义早期的成长。长期以来浪漫主义激荡于全欧洲，拿破仑则正好成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出类拔萃的英雄人物。拿破仑个人的影响诚然是可观的，但是只有顺应当时正在推进欧洲文明的那些潮流，他的影响才能起作用。要谈历史决定论吗？历史的决定作用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来。

既然在这方面拿破仑成为一代伟人，我们就不难理解何以关于他的传说形成得如此之快，而又如此根深蒂固。然而，在他的个人意向和他的具有持久性的成就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而关于拿破仑的传说则只保留了他的成就这一面。事实上他越来越敌视大革命，敌视到这种程度，如果时间许可的话，他可能最后会部分地废弃公民平等；然而，人民的想象却把他塑造成大革命的英

① 指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人民运动，尤其是共和二年无套裤汉对国民公会施加的压力。——译者

雄。他曾梦想建立一个世界帝国；然而，在法国人看来他依旧是"自然疆界"的保卫者，欧洲的自由主义者则把他看成是反对神圣同盟帝王们的各民族的捍卫者。他曾建立最严峻的专制统治；然而，人们却打着他的旗号去反对君主立宪的波旁王朝①。他是浪漫主义者崇拜的偶象，然而，就其思想方法及对文学艺术的兴趣而言，他却眷恋于纯粹的古典主义。从政治的和民族的观点来看，这种含混的传颂后来使法国又出现了拿破仑三世②。

只有浪漫主义者没有完全看错此人，因为拿破仑只是在所受教育及其智慧表现方式方面才是古典主义者。他的行动的原动力 585 来自想象，即其性格中不可克制的进取精神。他能永远具有动人的魅力，其秘密即在于此。因为人总是被追求权力的浪漫主义梦想所萦绕，即使只是在转瞬即逝的热情所激动的青年时代。因此，象巴雷斯所描写的那样的年青人，兴奋若狂地去到拿破仑墓前顶礼膜拜的，将世代不乏其人。③

① 指1814年和1815年复辟的波旁王朝为了同大资产阶级妥协，不得不"钦赐"宪章，在形式上建立君主立宪制。参看上文350页。——译者

② 指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利用"拿破仑传说"所造成的舆论，在1848年12月当选为第二共和国的总统，三年后发动政变建立个人独裁，又过一年称帝为拿破仑三世，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到1870年普法战争，拿破仑三世兵败被俘，使法国蒙受色当惨败之辱，割地赔款。——译者

③ 莫理斯·巴雷斯（1862—1923年），法国民族主义作家，1897年出版《民族精神的小说》三部曲第一部《飘零的人们》。在这部小说中，巴雷斯描写的一些青年想要做出一番事业，便到拿破仑墓前顶礼膜拜，从拿破仑的性格和精神汲取生活的力量和献身事业的精神。——译者

参考书目(提要)

第四编　提尔西特条约后帝国的对外征服

参看第一编第三章第二节和第三编的参考书目。

第一章　大陆体系

关于英国的一般著作，参考第一编第二章第二节书目。关于英国的经济和外交，仍看第三编第一章引过的 Crouzet 书和 Butterfield 的书。

关于西班牙，主要的参考书是 Fugier, Napoléon et l'Espagne, 但只写到巴荣纳会晤的前夕。从英国辉格党人观点写的有 Sir W. F. P. Napier, History of the War in the Peninsula and in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year 1807 to the year 1814 (London, 1828—1840,6 vol.; 2^{e}ed. 1890)。现在的权威著作是: C. W. C. Oman, 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 (Oxford, 1902—1930, 7 vol.).

关于英国和坎宁在西班牙事件中所起的作用，看 J. H. Rose,Canning and the Spanish patriots in 1808, 载《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t. XII (1906—1907), p. 39-52。

关于 1808 年西班牙的情况和起义的准备过程，至今还缺乏社会和经济的研究著作，多数现有著作仍然把西班牙起义说成是纯粹爱国主义的和完全是自发的，这是旧有的传说而已。

关于法俄联盟，主要著作仍是 Vandal, 前引书。

关于拿破仑在西班牙，要看法国参谋总部出版的: Balagny, Campagne de l'empereur Napoléon en Espagne (Paris, 1902—1907. 5 vol.).

第二章　1809 年的战争

全章仍参看第一编第一章、第三章第二节和第三编的参考书目。

关于德意志的觉醒，看 H. von Treitschke, Deutsche Geschichte im-neunzehnten Jahrhundert, t. I (Leipzig, 1879), 此书只写到 1814 年。Meinecke, Das Zeitalter der deutschen Erhebung (Bielefeld, 1906; 2ᵉéd., 1913) 是很好的简述。再补充 Le romantisme politique en Allemagne, textes choisis et présentés par J. Droz (Paris, 1963)。

关于普鲁士，仍要看 Treitschke 和 Meinecke 两书。普鲁士邦档案馆已开始出版有关普鲁士改革的文献: C. Winter, Die Reorganisation des preussischen Stades unter Stein und Hardenburg, t. I (Leipzig, 1931).

关于奥地利，看 W. C. Langsam, The Napoleonic Wars and German nationalism in Austria (New York, 1930); 关于匈牙利，看 Kecskemeti, Témoignages français sur la Hongrie à l'époque de Napoléon, 1802—1809 (Bruxelles, 1960)。

关于 1809 年战役，奥地利参谋总部出版有: A. Veltze, Das Kriegsjahr 1809 in Einzeldarstellungen (Vienne, 1905—1909); 法国方面的文献是: W. de Fédorovicz, 1809. Campagne de Pologne depuis le commencement jusqu'à l'occupation de Varsovie, t. I: Documents et matériaux français (Paris, 1911).

第三章　英国的成就

关于英国的海上霸权，看 H. Acton, The Bourbon of Naples (1734—1825),(London, 1956); J. Saintoyant,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pendant la période napoléonienne (Paris, 1931)。

关于西班牙战役，看 H. Brett-James, Wellington at War, 1794—1815, A selection of his wartime letters (London, 1961): 此书选辑了威灵顿的信件、命令和一般通讯的摘录共一百七十五件，其中涉及西班牙战役者八十三件，有关 1814—1815 年法国和比利时战役者二十六件。关于威灵顿的传记，看 L. Guedalla, The Duke (London, 1931); R. Aldington, Wellington (London, 1946)。代表法国观点的有: Mémoires du Maréchal Soult. Espagne et Portugal, texte établi et présenté par L. et A. de Saint-Pierre Paris, 1955).

第四章　大陆封锁

仍看 T. H. Mahan, 前引书; E. F. Hecksher, The Continental Sys-

tem (Oxford, 1922) 是很好的综合论述; E. Tarlé, Kontinentalnaia Blodaka (Moscou, 1913); F. E. Melvin, Napoleon's Navigation System(New York, 1919)——这两本书利用了未发表过的文献。至今还没有完整的论述法国封锁的历史著作。

关于英国的贸易,主要地仍看 F. Crouzet 前引书;还要补充同一作者在«Revue historique» t. CCXXVIII (1962) p. 45—72 发表的论文 Groupes de pression et politique de blocus: Remarques sur les origines des ordres en Conseil de novembre 1807; W. F. Galpin, The Grain Supply of England during the Napoleonic Period, Publication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istory and Politcal Sciences" Vol. VI (New York, 1925); J. Holland Rose 在他的«Napoleonic Studies» (London, 1904) pp. 166—203 和 pp. 204—221 所辑的两篇论文: Napoleon and the British Commerce 以及 British Food Supply in the Napoleonic Wars。Rose 指出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但 Heckshe r和 Galpin 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心理的因素,也没有把粮食问题放在全局里考虑。

关于拿破仑对美国的政策,看 Phœbe-Anne Heath, Napoleo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war of 1812(Toulouse, 1929); 再补充 U. Bonneil, La France, les États-unis et la guerre de course, 1797—1815 (Paris, 1961),这部书的贡献不仅在于私掠船战争的历史(从 1800 年到 1815 年,法国人拿捕了五百艘美国船),而且在于法、美贸易史和大陆封锁史。

关于 1811 年法国危机的最佳论述是: L. de Lanzac de Laborie, Paris sous Napoléon, t. VI (Paris, 1910); Odette Viennent, Napoléon et l'industrie française. La crise de 1810—1811 (Paris, 1947).

第五章 俄罗斯战役的准备过程

除本编全编的参考书目外,主要再看 Vandal, 前引书,和第三编第一章参考书目。

关于瑞典的情况可看: D. P. Barton: The amazing career of Bernadotte (London, 1929).

第五编 1812 年的世界

第一章 帝国的法兰西

仍看第二编第一章参考书目。

关于拿破仑的私生活及其家族，仍看第一编第三章参考书目，还有 Masson，前引书。

关于政府组织和行政机构的演变，看 J. Godecho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Paris, 1951), 尤其要看 C. Durand, L'exercice de la fonction législative de 1800 à 1814 (Aix-en-Provence, 1955) 和同一作者的 La fin du Conseil d'Etat napoléonien (Aix-en-Provence, 1959)。关于警察看: E. d'Hauterive, La Police secrète du Premier Empire. Bulletins quotidiens adressés par Fouché à l'Empereur (Paris, 1908—1922, 3 vol.) 只编到 1807 年；第四卷 (1808—1809 年) 由 J. Grassion 主编，已于 1963 年出版；第五卷(1809—1810 年)即将出版。

关于国民经济，选看: Chaptal, De l'industrie française (Paris, 1819); A. Chabert, Essai sur le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de 1798 à 1820 (Paris, 1945 et 1949; 2 vol.).

关于思想控制，选看: abbé G.Constant, L'Église de France sous le Consulat et l'Empire (Paris, 1928); G. de Grandmaison, La Congrégation (Paris, 1899); A. Latreille, Le catéchisme impérial (Paris, 1935); comte d'Haussonville, L'Église romaine et le Premier Empire(Paris,1868—1869, 5 vol.)。关于教育，仍看 G. Pariset, 前引书有关论述和书目；A. Aulard, Napoléon et le monopole universitaire (Paris, 1911)。关于宣传，看 R. Holtman, Napoleonic propaganda (Bâton-Rouge, [1950])。

关于社会演进和舆论，参看第二编，第三章，第三节参考书目；E. Lavasseur,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Paris, 1889—1892, 3 vol.); 同一作者的 Histoir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同上第一编第二章第三节引)。关于 1812 年的粮荒和最高限价看: Lanzac de Laborie, Paris sous Napoléon, Vol. V. (Paris, 1908); G. Lavalley, Napoléon et la disette de 1812(Caen, 1896). 关于思想界可看: H. Guillemin, Madame de Stäel, Benjamin Constant et Napoléon (Paris, 1959).

第二章 大陆体系

关于附庸各国君主，看 Masson, 前引书；B. Nabonne, Joseph Bonaparte, le roi philosophe (Paris, 1949), 同一作者的 Pauline Bonaparte (Paris, 1948); F. Rocquain, Napoléon Ier et le roi Louis (Paris, 1875);

Fürstenbriefe au Napoléon I, publiées par F. Kircheisen (Stuttgart et Berlin, 1929, 2 vol.); Lettres personnelles des souverains à l' empereur Napoléon Ier, publiées par le prince Napoléon et J. Hanoteau (Paris, 1939).

关于意大利，仍看 A. Fugier, 前引书；L. Madelin, Rome sous Napoléon (Paris, 1906)。

关于德意志，看：H. A. L. Fisher, Studies in Napoleonic Statesmanship. Germany (Oxford, 1903); M. Dunan, Napoléon et l' Allemagne. Le système continental et les débuts du royaume de Bavière, 1806—1810 (Paris, 1942); 关于一个小邦统治情况可看 J.Courvoisier, Le maréchal Berthier et sa principauté de Neufchâtel, 1806—1814 (Neufchâtel, 1959); 在贝尔蒂埃元帅统治的七年里，他从该邦搜括了八十五万法郎之多。

关于波兰，看 M.Handelsman, Napoléon et la Pologne(étude du regime), 载《Revue des études napoléoniennes》 t. V (1914), p. 162—180; Abel Mansuy, Jérôme Napoléon et la Pologne en 1812 (Paris,1930), 附有丰富的参考书目；波兹南科学之友社出版了由 A. Skalkowski 主编的 Correspondance du prince Poniatovski avec la France (Poznan,1921—1929, 5 vol.) 原文是法文；1964 年的《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出版了一期专号，研究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波兰，附有近年来波兰对这个时期研究成果的书目。

关于大陆经济，参看本编第四章参考书目；E. Tarlé, L'unité économique du continent européen sous Napoléon Ier, 载法国《Revue historique》; t. CLXVI (1931), p. 239—255. 关于大陆封锁对附庸各国的影响，Heckscher 前引书，有简要的叙述；此外应补充关于意大利北部的：E. Tarlé, Le blocus continental et le royaume d'Italie (Paris, 1928); 关于瑞士的：B. de Cérénville, Le blocus continental et la Suisse (Lausanne, 1906).

第三章 各种独立力量

关于普鲁士，仍看 Cavaignac, 前引书；de la Blache, La régénération de la Prusse après Iéna (Paris, 1910)。

关于英、美，除看第一编第二章有关书目外，补充 M. Roberts, The Whig Party, 1807—1812 (London, 1939); G. Chihard, Jefferson (Bos-

ton, 1929)。

关于科学和艺术，看 J. Fay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a science, 1789—1815 (Paris, 1960); L. Hautecœur, Histoire de l'architecture classique en France, t. V: Révolution et Empire, 1792—1815(Paris, 1960); 同一作者的 Louis David (Paris, 1954); 英国的 «Apollo» 杂志 1964 年 9 月份专号，专论拿破仑在艺术领域内的功过。

关于欧洲的扩张，除仍看第一编第二章第五节有关书目外，关于马来亚应补充 R. Coupland, Sir T. Stanford Raffles (Oxford, 1926); 在太平洋方面，看 J.-P. Fabre, L'expansion française dans le Pacifique, 1800—1842 (Paris [1953]), 此书第一编讲帝国时期，主要讲博丹到澳大利亚沿岸探险经过，这是布维埃和梅尼埃根据大英博物馆保存的手稿已经叙述过的，但著者补充了法国海军部的档案。

第六编 拿破仑的败亡

第一章 大陆体系的瓦解

关于俄罗斯战役，看俄国参谋本部出版的 La guerre nationale de 1812 (Péterbourg, 1901—1914, 20 vol.) 法译本只出了八卷，到 1811 年底为止，巴黎，1903—1911 年。E. Tarlé, La campagne de Russie, 1812, Paris, 1941; 2e éd. Paris, 1950. (塔尔列此书俄文原著出版于 1938 年)。关于整个战役的回忆录选看: Mémoires de Caulaincourt (Paris, 1933, 3 vol.); comte de Ségur, La campagne de Russie, t. I: La marche vers Moscou, t. II: La retraite, édition augmenté d'extraits de la réfutation du général Gourgaud, préface et notes par J. Burnat (Paris, [1960] 2 vol.); comte A. de Montesquiou, Souvenirs sur la Révolution, l'Empire, la Restauration et la règne de Louis-Phillipe, presentés et annotés par R. Burnand (Paris, 1961): 作者参加了从俄罗斯撤退，拿破仑命令他把宣布在俄国惨败的公告专程送回法国。

关于外交活动，除前引有关梅特涅各书外，补充 C. Buckland, Metternich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from 1809 to 1813 (London, 1932); Sir C. K. Webster, British Diplomacy, 1812—1815 (London, 1921), 1931 年增订改书名为: The Foreign Policy of Castlereagh. Britain and the R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关于拿破仑第一次退位最权威的著作是 Henri Houssaye, 1814 (Paris, 1888)。

第二章 复辟与“百日”

全章的参考书: Histoire de France contemporaine,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Lavisse, t. IV: La Restauration, par S. Charléty (Paris [1921]), 附有重要的参考书目。

关于维也纳公会，参看本丛书（“民族与文明”）下一卷: L'éveil des nationalités et le mouvement libéral, 1815—1848, nouvelle rédaction par F. Ponteil (Paris, 1960).

关于第一次复辟，看: P. Bartel, Napoléon à l'île d'Elbe (Paris, 1947); Memoires de Marchand, I. L'île d'Elbe. Les Cent Jours, publiés par J. Bourguignon (Paris[1952]).

关于“百日”，最权威的著作是 Henry Houssaye, 1815 (Paris, 1805—1905, 3 vol.)。

关于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看 O. Aubry, Sainte-Hélène (Paris, 1935, 2 vol.); D. M. Brookes, St. Helena Story (London, 1960): 此书部分地根据家藏文献，作者是东印度公司代表 William Balcombe 的后裔，拿破仑流放圣赫勒拿岛最初几个月就住在他家。

关于“拿破仑传说”，看: Ph. Connard, Les origines de la légende napoléonnienne. L'œuvre historique de Napoléon à Sainte-Hélène (Paris, 1906); J. Dechamps, Sur la légende napoléonienne (Paris, 1931); J. Lucas-Dubreton, Le culte de Napoléon, 1814—1848(Paris, 1960).

索　引

（索引页码系原书页码）

三十